

荣新江 著

# 辨伪与存真

## 敦煌学论集

Essays on Dunhuang Studies  
*Rong Xinjiang*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序

《鸣沙集》是我在台湾出版的一部敦煌学的论文集，主要内容以探讨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为主，涉及到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藏经洞中混入的黑城文献，以及相关的唐五代敦煌寺院的藏书状况与藏书制度、唐五代敦煌禅宗典籍的抄写与流行情况等等。当时我关注的焦点是藏经洞封存的文献和绘画品的性质，为此也花了不少力气来分辨出原本不是属于藏经洞的文献及其来历。

这本文集中有关敦煌学方面的文章，我个人对《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等几篇文章比较满意，其中前三篇译成英文发表，后一篇也有日文翻译，在海外稍有影响。但是由于一些文章不是发表在常见的刊物上，又收入台湾出版的论集，不容易查阅，故反响有限。学术贵在切磋，《鸣沙集》中的一些论文和书评颇带一些学术批评，当然也希望听到善意的回馈，只要是纯学术的讨论，自当推进学术的进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一直有意出版《鸣沙集》的大陆简体字版。这一想法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先生的认同，他鼓励我尽快整理再版。

如果只是简单地繁简转换而变成一本论集，又有些不甘心，所以府先生的好意，一直没有领受。今年暑假，稍得闲暇，于是整理近十年来没有收入《鸣沙集》和《敦煌学新论》的相关文字，发现后来所撰有关敦煌学的论文，仍然主要是围绕着藏经洞宝藏、写本辨伪、禅宗文献的追踪、黑城文书的剔除等内容，加上有关王国维、狩野直喜、向达、常书鸿等人的敦煌学史论述，可增补者逾十万言。此外，近十多年来海内外敦煌藏卷纷纷公布，昔日笔者

费尽艰辛而挖掘到的珍宝,今日已成学者治学之公器,正可以借董理旧文之机,增补若干图版。旧文新篇汇集在一起,约有三十余万字,辅之个别精选的图版,不敢说旧貌变新颜,多少算是有一些新贡献吧。

因为旧著所探讨的材料多出土于鸣沙山下的莫高窟藏经洞,所以题作“鸣沙集”。此名虽然听起来响亮,但若读者不明了其中内涵,或有可能以为是古人别集。故听从友人建议,此次增订再版,更名为“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因为本书的主要一组论文是有关敦煌文书的真伪辨别,所以突出这一点;而书中其他论文和书评,也都在敦煌学的范围,故以“敦煌学论集”为副题,希望以此为敦煌学的广袤大厦添砖加瓦,也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荣新江

2009年7月9日于北大朗润园

## 《鸣沙集》序

大约十年以前,林聪明先生开始主编《敦煌学导论丛刊》,即约我写一本《敦煌地理文书导论》,因为那时我正在校理敦煌出土的地理志书和行纪类写本。我校敦煌地理文书,原本只是作为研究敦煌写本的基本功,所以不能专心致志。待文书校订一过后,已经有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辑校》、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等陆续出版,而李正宇和李并成两位先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敦煌方志所记山川、河渠、建置、道路等均有详细的考证,远非在北京的我所能及。因此,林先生的约稿迟迟未就。八月间,林先生过京,又约为他主编的《敦煌丛刊二集》写稿,盛意可感,遂相商废弃旧约,另制新篇。

我历年所撰敦煌学文字,除已结集的《归义军史研究》和《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外,倒是大多数“纯”属于敦煌学的范围,有论文、有回顾和展望、有书评、还有个别学习敦煌学大家的心得体会,因略加整理,编成是集。本集所收敦煌学论文、书评等,内容大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敦煌学的学术史问题,一是敦煌学的方法论问题,而所探讨的材料,基本上是出土于鸣沙山下的莫高窟藏经洞,故此题作《鸣沙集》,而以“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为副题。

然而,本书并非系统地探讨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问题,只是就敦煌学的某些方面有所总结,并以书评的形式探讨了一些敦煌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迄今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具有权威批评性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出版,也没有系统的敦煌学方法论的著作问世,但面对着突飞猛进、玉石混淆

的敦煌学的现状,我们需要利用各种形式的文章,大到一篇专论,小到一个脚注,来表彰先进,黜退陈腐,使敦煌学健康地发展。

敦煌学本来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所以利用敦煌资料来研究宗教、语言、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等方面的学者,当然要遵守所属学科的学术规范。同时,敦煌学又是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也有一些处理敦煌写本和洞窟材料的专门方法,这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尚有待系统地讨论。遵守学术规范,首先是要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最简单的作法是要指出你所处理的问题或资料的前人研究成果,这同时也是表明你本人的研究是在哪些方面超过了前人。换句话说,表彰别人的成就,是对自己所取得的成果的肯定。从目前的敦煌学界所发表的大量成品来看,也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存在着大量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次品,相信陆续发表的书评和将来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对此会做出毫不留情的批评。具体的学术规范问题,也即具体的方法论问题,诸如史料的校订,引文的出处,甚至论著的出版年份、卷期、页数等,对于敦煌学研究的进步来讲也不容忽视。在这方面,敦煌学的确有其本身的特性。比如,利用敦煌文献所作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原本,但大多数有学术价值的写本存在国外,能亲睹原卷的学者毕竟有限。这样就使得原本上的朱笔淡画常常被忽略,但根据原卷对这些外观加以详细描述的法蘭西和英国编纂的目录,却很少见到人们加以利用。其次是图版,在近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刊出《英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清晰图版前,人们多用缩微胶卷或《敦煌宝藏》,但仍有不少更为清楚的照片在这些方便得到的合集以外,如早年书刊上发表的照片,又如王重民先生摄回而存于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照片,还是值得加以利用的宝藏。最大的问题是录文,因为敦煌学界没有像历史学界那样拥有标点本二十四史,有不少写本都是在最近的年代里才被学者随同研究论著一起抄录发表,各人的录文质量水准相差虽然不大,但有些极为关键的字词是衡量录文好坏的准绳。现在有的研究者只图省事,所引写本往往只注编号,似乎都是他一人从原卷录出,其实不然。合理的做法是应当注出录

文的根据和自己的重要更正,注明出处就如同引用二十四史的标点本一样,并不损害一篇论文的价值。

敦煌学界在学术史和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是有些研究者的在没有就所研究的问题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时候,就急于写文章。有的则是明知故犯,把别人的成果偷梁换柱式的变成自己的“成就”。从另一方面来讲,迄今的敦煌学研究成果里面,基础工作很不够,如研究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外语的限制,没有重编更为详尽的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写本目录,特别是带有每个写本研究成果索引的写本目录尚未出现,研究者本人若不勤于积累,其研究成果必然是不完美的。

上述有关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想法,贯穿于本书各篇文章当中。希望本书能够在敦煌学向更严格的学术天地迈进时,助上一臂之力。

本书所收文章,除个别文字订正外,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因为有些关于学术史的评论自有其时间性。一些篇章附载了新拍或新补的图版资料,为此向提供照片资料的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表示感谢。向为本书编辑出版提供帮助的林聪明先生、郑阿财先生、郝春文先生表示感谢,还应当特别感谢林悟殊先生、邓文宽先生、赵声良先生允许我把合撰的文章收入本集。

荣新江

1997年11月15日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 目 录

序.....	1
《鸣沙集》序 .....	1

## 论 文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1
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 .....	28
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 .....	47
附录: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	56
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 .....	74
敦煌写本辨伪示例	
——以法成讲《瑜伽师地论》学生笔记为中心 .....	91
有关敦博本禅籍的几个问题.....	102
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	123
有关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	
——积翠轩文库旧藏“略出本”校录 .....	140
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 .....	158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 .....	165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 .....	181
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0

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	199
关于北大所藏常书鸿致胡适的一封信·····	236

### 回顾与展望

敦煌学研究揭开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	242
敦煌文献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47
《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编写刍议·····	252
档案与敦煌学研究·····	259
敦煌学与唐研究·····	262
“21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67

### 书 评

《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评介·····	274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	280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	284
《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评介·····	291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评介·····	296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评介·····	300
《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评介·····	303
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	308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	311
《敦煌汉文文献》评介·····	318
《写本时代(十世纪以前)的中国藏书》评介·····	325
《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评介·····	329
台北“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评介·····	334



## 目 录

---

《吐鲁番敦煌文献:丝绸之路的文明汇聚研究论集》评介 .....	345
《东亚古文书的历史学研究》评介 .....	352
《中古时期社邑研究》评介 .....	357
《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评介 .....	363

## 其 他

贝利教授与于阗语文献研究 .....	372
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侧记 .....	375
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 .....	379
入海遗编照眼明——潘重规《“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 题记》读后 .....	392
作者已刊论著编年目录 .....	404

## 图版目录

###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图 1:刚刚取出的藏经洞文献经帙合一的情形

图 2:斯坦因等从藏经洞搬出的成捆经卷

图 3:完整的贝叶本于阗文佛典(Ch. 00275)

图 4:卷轴装于于阗语佛典(Ch. c. 001)包首装饰画

图 5:伯希和在藏经洞中翻检藏经的情形

图 6:伯希和所获竹制经帙正背面

图 7:绘图本伪经《父母恩重经》尾部

图 8:完整的敦煌写经

图 9:完整的敦煌佛经尾部

图 10:斯坦因所获精美的捐制经帙

图 11:藏经洞发现的完整的敦煌画幡

### 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

图 12:小岛文书 A《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

图 13:小岛文书 B《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

图 14a - b:李盛铎旧藏《志玄安乐经》首尾

图 15:李盛铎旧藏《宣元本经》

图 16:李盛铎《班马字类附补遗》题记

图 17:李盛铎旧藏善本《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所钤

“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

## 图版目录

---

图 18a:《李木斋印谱》所钤“木斋审定”印

图 18b:《李木斋印谱》所钤“李盛铎印”印

图 19:李盛铎旧藏善本《碧云集》上的“麀嘉馆印”

图 20:李盛铎及李滂钤在所藏《子夏易传疏义》上的部分印章

图 21:李盛铎及李滂钤在所藏《医说》上的部分印章

### 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

图 22:《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

图 23:《敦煌秘笈目录》

图 24:《唐律》

图 25:《唐天宝六载敦煌郡龙勒乡籍》

图 26:《癸未年(983)十一月河西 百姓史喜酥买骡马契》

### 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

图 27:俄藏 Дх. 1728《楞伽师资记》残卷

图 28:俄藏 Ф. 261《历代法宝记》

图 29:英藏 S. 11014《历代法宝记》残卷

### 有关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

——积翠轩文库旧藏“略出本”校录

图 30:积粹轩文库藏《历代法宝记》(局部)

### 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

图 31:俄藏 Ф. 229 + Ф. 241 正面《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九二

图 32:俄藏 Ф. 229 + Ф. 241 背面《景德传灯录》卷十一

图 33:英藏 KK. II . 0238 正面《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九二

图 34:英藏 KK. II . 0238 背面《景德传灯录》卷十一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墨水城文献**

图 35: Дх. 1390《大威德炽盛光消灭吉祥陀罗尼》

图 36: Дх. 2158 背宣光二年(1372)案牍

图 37: Дх. 19003 历日残片

图 38: Дх. 19050 木笔书写佛经

图 39: Ф. 222《多闻天施食仪轨》(局部)

图 40: X2382 多闻天王唐卡

图 41: X2382 多闻天王唐卡局部(同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

图 42: 关于罗博罗夫斯基考察队的档案

图 43: 关于科兹洛夫考察队的档案

图 44: 关于奥登堡考察队的报告

**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

图 45: 罗振玉旧藏《刘子》残卷首部

图 46: 罗振玉旧藏《刘子》残卷尾部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

图 47: 上海博物馆藏《论语郑氏注》

图 48: 英国图书馆藏 S. 11910《论语郑氏注》

##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的藏经洞,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写本和艺术品。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这些资料的研究成果,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中古时代东西方文明的理解。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和原因,关系着我们对藏经洞出土资料的正确理解和分析,是敦煌学研究者长期关心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们对藏经洞资料的总体认识,也离不开我们对大约十一到十三世纪(宋元时代)西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了解,因而迄今还没有十分令人满意的解说。

### 一、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的几种假说

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封闭,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封存的原因,一是封存的年代,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迄今为止,学者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这两点提出种种解说,归纳起来,影响最大的说法仍然是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斯坦因和伯希和。

斯坦因根据他在洞中所藏一些包裹皮中发现的一批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块、带有木轴的残经尾、木轴、丝带、布包皮、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绢画残片、画幡木网架等等,认为这些东西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藏经洞就是堆放它们的处所。他还根据所见写本和绢画题记最晚者为十世纪末的情况,推测洞窟的封闭是在十一世纪初

叶<sup>〔1〕</sup>。其观点可以作为“废弃说”的代表。伯希和根据洞中无西夏文书，而藏汉文本及绢画、壁衣、佛像、石碑杂沓堆置，因而认为是1035年西夏人侵敦煌时为避外寇而仓皇封闭的<sup>〔2〕</sup>。有人称之为“避难说”。此后，藤枝晃教授采用“废弃说”，他认为废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印本佛典取代了卷轴装佛典，图书馆书架的重新布置导致原来的卷轴佛典的废弃，时间在1002年以后不久<sup>〔3〕</sup>。方广錫博士也主张“废弃说”，他提出的假设是在曹氏政

〔1〕 A. Stein, *Serindia*, II, Oxford 1921, p. 820. 按 *Serindia* (西域考古图记) 全称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共五卷, 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 有关斯坦因获取敦煌藏经洞宝藏的记录以此书最详。此外,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个人旅行记 *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两卷本, 伦敦1912年出版, 也有内容大致一样的记录。可惜以上两书尚无中译本, 国内学者常常引用的向达先生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或王竹书先生译《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 1935年), 所据原本为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 1933年伦敦出版。这是斯坦因在美国所作关于他三次中亚探险的概要讲演稿, 有关藏经洞的记载较上述两书要简单得多。Jeannet Mirsky, *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一书第14章, 摘录了 *Ruins of Desert Cathay* 所记斯坦因得到藏经洞宝藏的主要段落。此书已有田卫疆等人的中译本《斯坦因: 考古与探险》,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 虽有些地方有所误译(如将“贝叶本”译作“菩提”), 但可供参考。本文主要利用斯坦因的正式报告 *Serindia*, 辅以 *Ruins of Desert Cathay*。

〔2〕 P.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III, 1908, p. 506; 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 1935年, 7—8页。持伯希和说者有, L. Giles, *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 London 1944, p. 5; 苏莹辉《跋黑城所出西夏时写本佛教偈名卷子》, 《敦煌论集续编》, 台湾学生书局, 1983年, 231—240页; 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 《文物》1980年第6期, 61—62页。

〔3〕 Akira Fujieda,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Canberra 1973, p. 128; “Une reconstruc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de Touen-houang”, *Journal Asiatique*, CCLXIX, 1981, pp. 65-68; 魏英邦译《敦煌“藏经洞”的一次复原》, 《敦煌学研究》(《西北师范学院学报》增刊), 1984年10月, 96—97页。

权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结果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过时的文书、废纸、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封存在藏经洞中<sup>[1]</sup>。而另一些学者则沿着伯希和的思路,又提出1008—1010年备战西夏而封存说<sup>[2]</sup>、1094—1098年黑韩王朝威胁说<sup>[3]</sup>,以及在更晚的年代中找寻封闭原因,甚者认为晚到元朝<sup>[4]</sup>。本文对这两种看法提出质疑,并阐明自己的看法,目的是抛砖引玉,使有关藏经洞的讨论立足于通盘考虑敦煌藏经洞文献、文物以及当时历史背景的基础上。

## 二、藏经洞的原始面貌及后人扰动

探讨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首先应当尽可能地明了藏经洞所藏文献和文物的原貌。遗憾的是在斯坦因到来之前,没有详细的关于藏经洞发现时情形的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只是从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谢稚柳先生所撰《敦煌石室记》(无出版地,署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中,得到一些简略的报道:“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此光绪二十五年岁庚子四月二十七日事,盖宋时避西夏之乱秘藏于此,即世所传藏经洞也。”这里描述的藏经洞中经卷与经帙完好保存的情形虽较简

[1] 方广錩《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213—223页。

[2] 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340—357页。

[3] 殷晴《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文物》1979年第9期,6页。

[4]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主宋皇祐五年以后说,见同书,北平,1931年,3—4页;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主元末说;关百益《敦煌石室考略》主成吉思汗西征时说,见《河南博物馆馆刊》第1集,叶13;石璋如《关于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举莫高窟有庆历六年题记,以支持陈垣说,见《大陆杂志》特刊第2辑。

单,但与斯坦因所述大体相同,或为谢氏得自当地民众中流传下来的说法,因此应予充分重视。在藏经洞发现以后,王道士曾将其中一些精品作为标本,经肃州道台廷栋送给兰州的甘肃藩台,甘肃藩台根本不懂得这些写经的价值,命令将经卷原处封存,由王道士看管<sup>[1]</sup>。但王道士并没有全部封存,而是常常取出一些书法精美的写卷,送给达官贵人,以换取修缮莫高窟所需的费用。1903—1904年,金石学家叶昌炽任甘肃学台,敦煌县令汪宗翰曾送上藏经洞出土的《大中五年(851)洪辩告身牒碑》拓本、《乾德六年(968)绘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槃经》四卷、梵文写经三十一页等<sup>[2]</sup>。不久,叶氏又从敦煌文人王宗海处,获得《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一、《开益经》残帙、《于阗国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等<sup>[3]</sup>。叶昌炽建议甘肃藩台将所有古物运到省垣保存,但因运费无着,仍令敦煌地方官府原地封存。1904年,汪宗翰奉甘肃藩台衙门之命,将藏经洞文献和文物检点封存<sup>[4]</sup>。但这次封存也不彻底,仍陆续有写卷或绢画流出。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藏族小僧人手中初见敦煌经卷<sup>[5]</sup>;1908年,陆季良曾从汪宗翰手里获得后唐天成四年樊宜信造绢本《药师琉璃光如来像》<sup>[6]</sup>;同年,伯希和在乌鲁木齐清朝官员载澜处得到两件敦煌唐人写经<sup>[7]</sup>。斯坦因是第一位留下详尽记载的考古学家,他根

[1] *Serindia*, II, pp. 802, 803-804.

[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条。

[3] 《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五日条。

[4] 见汪宗翰在送给叶昌炽的绢画上所写的题记:“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后此画归乌程蒋氏,并印入《艺术丛编》第三册。参看卫聚贤《敦煌石室》,《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24页。

[5] *Serindia*, II, p. 802.

[6] 曹元忠《沙州石室文字记》序,收入《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刊。

[7] 秋山光和《伯希和调查团的中亚旅程及其考古学的成果》,《佛教艺术》第20号,1953年,64页。



据洞中包裹的放置情形,认为在他到来之前,藏经洞上层的原貌已被打乱,有许多包裹中的分类也已混淆<sup>[1]</sup>。但是,从斯坦因描述的情况来看,斯坦因所见到的藏经洞情形,仍然大体上保存了原本的一些状态。因此,我认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所记录的情形,应当是讨论藏经洞封闭原因的出发点。

《西域考古图记》第22章,集中记载了斯坦因在蒋孝琬的帮助下考察藏经洞的详细过程。斯坦因的报告大体上是按照时间先后加以叙述的,但他又做了某些归类。这里只能非常简要地按原书顺序概述一下他的报告的主要内容。第1节《藏经洞的首次开启》,记斯坦因先是看到一捆蒋孝琬偷偷拿到他帐篷中的汉文佛经包裹,然后是他见到的藏经洞情形,写本包裹塞满了洞窟,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里面。因此不可能在洞中检寻这些包裹,所以在藏经洞外的大窟(16窟)中进行。最初见到的包裹中的汉文经卷保存得十分完好,由于数量太多,斯坦因放弃了让蒋孝琬编目的计划。接着记藏文卷子、于阗文写本、杂纸包裹、大的幡画包裹等等。第2节《多种语言藏书室中的发现物》,叙述斯坦因接着看到的包有他认为是废物的一些包裹、梵文和于阗文的贝叶写本包裹、藏文贝叶写本包裹、回鹘文和粟特文写卷,以及这类杂包裹中发现的如尼突厥文摩尼教忏悔词,其中许多是完本。第3节《写本和艺术品的获得》,记他翻检藏经洞最里层的汉藏文卷子包裹的过程,并描写了挡在写本绢画包裹后面的壁画和洪辩碑的原来位置。最后是他与王道士谈判而攫取宝藏的经过。第4节《对藏经洞的进一步考察》,主要是讲述伯希和的收获以及他所听说的运送北京时的情况<sup>[2]</sup>。

根据斯坦因的记载,藏经洞中的几乎所有的材料原来都是分类包在两种包裹皮中的,一类是所谓“杂包裹”(mixed bundles 或 miscellaneous bundles),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回鹘文或粟特文写本卷轴及绢纸绘画、丝

[1] *Serindia*, II, p. 813.

[2] *Serindia*, II, pp. 807-830.

织品和上面提到过的各种斯坦因认为是废弃物的东西都装在这类包裹皮中；另一类是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regular library bundles), 总共有 1050 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 每包平均装卷子 12 个左右; 还有 80 个包裹装藏文卷子, 此外还有 11 个较大的藏文贝叶夹本包。斯坦因是在对藏经洞做完彻底的翻检以后作出上述统计的, 反映了他所见到的藏经洞的实貌。但斯坦因开始时是靠王道士和蒋孝琬的夜间偷运来一步步接触藏经洞材料的, 而且他的分类叙述也有碍于我们精确了解藏经洞的原貌。幸运的是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插图 200(图 1) 和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旅行记《沙埋契丹废址记》插图 194(图 2), 有两张汉文写卷刚刚移出藏经洞的照片<sup>[1]</sup>, 可以让人们一眼就看出这些汉文卷子整齐地一捆捆包着的, 其中一个包裹皮上还可以看见“摩诃般若海”五个字, 这正是依《开元录·入藏录》所写的经名和帙号, 这个包裹所包的应当就是“海”字号的佛典四十卷本《摩诃般若经》第二帙<sup>[2]</sup>。这两张照片确证了这些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正是分帙存放的佛经。

然而, 斯坦因当时不懂得汉文佛典在中古时代的图书馆中是分帙存放的, 也未详究为什么许多保存完好的文献或绘画都包好了放置在一起, 如他所列举的 69 叶的梵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Ch. 0079. a)、44 叶的于阗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Ch. 00275)(图 3)、长 1108 行的于阗文佛典合集(Ch. c. 001)(图 4)、十五英尺长的回鹘文摩尼教赞美诗(Ch. 0015)等精

---

[1] 这两张照片不难见到, 前者又见于 *Ruins of Desert Cathay*, fig. 188;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 86 图; 后者又见于 P.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l. 11; 杨汉章汉译本《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图版第 4 页。1990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第 1 卷也收录了这两张照片。

[2] 方广錩《八一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351 页据《敦煌吐鲁番文物》(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 1987 年) 一书转载的这幅照片, 正确地指出了“图面上是一帙帙包卷的经卷”, 并确定了“照片上的那帙是《摩诃般若经》第二帙”。遗憾的是他把这幅照片当作是伯希和所摄, 见所撰《敦煌经帙》(1992 年敦煌学术研讨会论文, 北京房山) 第 4 页, 从而忽视了它在研究敦煌藏经洞封闭问题上的价值。

品<sup>〔1〕</sup>,他在讨论藏经洞封闭时片面地强调了藏经洞中的一些残品,而忽视了他本人所看到和介绍给读者的大量完整的资料,从而得出废弃说的看法。斯坦因作为一个不懂汉文的西方考古学家,他当然不懂得中国古代的经帙制度,因而影响到他的结论的可靠性。但他以严谨的考古学方法,将他所获得的材料一一给予了以 Ch. (“千佛洞”的缩写)为字头的原始编号;他还用小罗马数字作为“正规包裹”的编号,使人可以得知藏品的原貌<sup>〔2〕</sup>。由于王道士对汉文写卷的兴趣较非汉文写卷及艺术品要大,所以,斯坦因尽可能多地取走了“杂包裹”,而只获得了 270 个装有汉藏文卷子的“正规包裹”<sup>〔3〕</sup>,这样就使得原本由 1130 个包裹所构成的正规藏书分散开来。遗憾的是,斯坦因为了尽快攫取藏经洞宝藏,放弃了让蒋孝琬随地编制汉文写本目录的计划,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有厚达 150 页的“千佛洞所获绘画、木刻品、丝织品及其他各种古物登记目录”和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龟兹文的登记目录,唯独没有所获汉文写本目录<sup>〔4〕</sup>。而且,当斯坦因敦煌

〔1〕 后来各种语言专家对这些文献的解读,进一步肯定了斯坦因从外观所确认的价值。Ch.0079. a 见 E. Conze, “Preliminary Note on a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0, pp. 32-36; Ch.00275 见 S. Konow, “The *Vajracchedikā* in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of Eastern Turkestan”,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 I, ed. by A. F. R. Hoernle (Oxford 1916), pp. 214-288, pls. V - XIV; Ch. c. 001 是由六种文献组成的密教经典集,见田久保周誉《敦煌出土于阗语秘密经典集之研究》(东京,1975 年)及 R. 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Tokyo 1992), pp. 21-22; Ch. 0015 见 A. von Le Coq, “Dr. Stein’s Turkish *Khuastuanifit* from Tunhu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1, pp. 277-314; 李经纬《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忏悔词〉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0 年第 3 期,57—78 页。

〔2〕 *Serindia*, II, p. 814, n. 2; p. 836, n. 13.

〔3〕 *Serindia*, II, pp. 824-825.

〔4〕 *Serindia*, II, pp. 937-1088 “List of paintings, woodcuts, textiles, and miscellaneous antiques recovered from Ch’ien-fo-tung”, pp. 924-925 “List of Sogdian and Turkish manuscripts from Ch’ien-fo-tung”; III, pp. 1432-1459 是 Hoernle 编的 “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s in Sanskrit, Khotanese, and Kuchean”.

收集品送达伦敦后,由于资助他此次探险的是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所以收集品又分散入藏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Museum)。更为不幸的是,入藏英博的美术品和入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非汉文文献仍保留了 Ch. 起首的原始编号,而原本可以反映经帙情况的汉文卷子包裹的原始编号,却被英博在编目整理时废弃了,代之以 S. 编号<sup>[1]</sup>。今天,在伦敦,汉文佛经写卷作为图书资料保存在英国图书馆,而包裹这些经卷的经帙,由于大都用丝锦制成,则被作为艺术品收藏在英国博物馆,使帙与经卷进一步分离,目前想恢复藏经洞汉文佛典经帙合一的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斯坦因记录的藏经洞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藏经洞的大体面貌。汉藏文佛典是分帙整齐地存放的,其他文字材料和绘画也都分类包在一起。这些主体内容很难被看作是废弃物,如完整地包在帙中的经卷,写于十世纪末叶首尾完整的一大批于阗文佛典,983 年绘制的精美观音像(Ch. lvii. 004),一大批完整的菩萨画幡(Ch. 0025 等)<sup>[2]</sup>,若笼统地被当作是废弃物,是很难理解的。

藏经洞经过斯坦因的一番折腾,在伯希和到来时已非原貌。伯希和说他所见到的情况是“洞中所弃,至为凌乱”,实是斯坦因等人翻检的结果,而伯希和却以此为藏经洞原状,因而得出是西夏来侵时僧人仓皇出逃时的样子。从这一点来看,伯希和提出的藏经洞封闭原因和年代是不足凭信的。伯希和的文字记录远较斯坦因简略,我们从中得知斯坦因记载过的那 11 大夹藏文佛典仍然原样未动,而其他各种文字的卷子和贝叶写

[1] *Serindia*, II, p. 814, n. 2.

[2] 这些精美的绘画,大部分发表在 *Serindia*, IV, pls. LVI - XCIX; A. 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f Tun-huang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 2 vols., London 1921; R.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3 vols., Tokyo 1982-1984.

本,大多残缺,但也不乏精品<sup>[1]</sup>。事实上,虽然伯希和的汉文水平远远高于斯坦因,但他也不懂中国古代图书分帙收藏的制度。伯希和初入藏经洞时,洞中大多数写本仍然是分帙放置的,这可以从伯希和那张著名的藏经洞留影中看出,即在他身后堆积的写本还包在帙中,而经他翻检后放置在一边的部分,则已经没有次序可言(图5)<sup>[2]</sup>。最遗憾的是伯希和将全部藏品翻检一遍时,明知不可能将所有藏品带走,故订立了几条选择标准,即只取背面有非汉语的卷子和带有题记的卷子,而一般他估计已入藏的普通汉藏文写经,则弃置未收。从大多数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伯希和的捡选受到了很高的评价<sup>[3]</sup>,巴黎所存敦煌文书的确在许多方面优于伦敦藏卷。但是,正是这些普通的佛典,才能反映藏经洞原本的经帙合一的情形,经过伯希和这遍全面无遗漏的捡选,藏经洞中的主体藏书佛典部分,就再也不能恢复原貌了。

伯希和的确是个行家,他不仅拿走了藏经洞留给今天研究者的文献精华,而且把斯坦因所遗的几乎所有艺术品和普通藏文佛典之外的非汉语文献,都带回到巴黎,其中包括他在最初的报告中就已提到的一件竹制经帙(图6)<sup>[4]</sup>。1909年,伯希和曾带这件经帙和其他一些文献精品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的士大夫们。罗振玉等人不仅抄录了大量文献材料,也记录下了这件经帙<sup>[5]</sup>。伯希和收藏品和斯坦因收藏品的处置有些类似,即六千余件写本全归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收藏,而二百多幅绘画、二十余件木雕、一大批绢幡、经帙以及各类丝织品,先是入藏罗浮宫,最

[1]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pp. 509-529; 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 6—27页。

[2] 图见 P. Pelliot,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tome 6, Paris 1924.

[3] 藤枝晃教授曾对伯希和这种简选写本的方法提出批评,见所撰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I", *Zinbun* 9, 1966, pp. 8-10.

[4] 《敦煌石室访书记》, 26页。

[5] 罗振玉《敦煌石室秘录》,《考古学零简》,商务印书馆,1923年,40页。王仁俊曾将此告身录入他编的《敦煌石室真迹录》,1909年刊。

后在1947年,全部美术品都入藏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sup>[1]</sup>。因此,研究文献的人很少注意收藏在集美的原本与文献混为一体的经帙或其他美术品,以致上面提到的那件竹制经帙里面裱糊的一件唐代告身文书,迄今似仍不为研究唐代官文书者所知。

据宣统二年(1910)十月二十三日的敦煌县档案记载,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王道士已将一些经卷,装成两个木桶,封钉坚固,中立木柱,安于佛殿,名曰转经桶。1910年,清朝学部电令甘督,将所余经卷悉数运到北京收藏。但敦煌县政府虽称“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但敦煌县官府草率从事,经桶原封未动,而且大量藏文卷子和夹板贝叶写经也不在取限。此次官府收取未尽,大量写本流散于当地民众手中<sup>[2]</sup>。而所谓转经桶,不过是王道士欺骗官府的把戏,我们可以想见他一定还窝藏了不少写经和绢画,以至于1911—1912年到敦煌的大谷探险队、1914年的斯坦因,都从王道士那里买到数百件敦煌写卷和一些绢画<sup>[3]</sup>。1914—1915年的奥登堡,也从当地收集了大量残卷<sup>[4]</sup>。因此,真正入藏北京图书馆的藏经洞材

[1] 参看 L. Fergère, “The Pelliot Collection from Dunhuang”, *Orientalism*, March 1989, pp. 41-42; 杨汉璋汉译文《伯希和在敦煌收集的文物》,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46页,图版29—30。

[2] 见卫聚贤《敦煌石室》一文及其所附敦煌县档案,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24—25,37—39页。当时,那些藏文写本已被移到另一个洞窟,迟到1919年才作出妥善保管,见上文40页所附敦煌县档案,这些藏文本后来主要归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敦煌研究院收藏,见敦煌县博物馆(荣恩奇整理)编《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1986年,541—542页;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59—63页。

[3] 吉川小一郎《支那旅行》(《新西域记》下卷所收)的有关记载,已摘入井之口泰淳《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探险队将来敦煌古写经》,《佛教学研究》第39、40号,1984年,181—183页;贺小平汉译文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58—66页;Stein, *Serindia*, II, p. 830.

[4] 斯卡奇科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1992年,109—117页;孟列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同上杂志,119—128页。

料,主要是些汉文写经,它们本是斯坦因、伯希和、王道士的“劫余”之物<sup>[1]</sup>,进而,这部分写卷在途中和进京后又经人为截取精华,而将普通佛典断为数段充数<sup>[2]</sup>。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图书馆藏卷往往一件写经断为十五、六截的残状<sup>[3]</sup>。这种人为造成的残损不完的情形,不是藏经洞藏卷的原貌,也不能作为所谓“废弃说”的根据<sup>[4]</sup>。

以上简要地概述了藏经洞宝藏流散的大致过程,力图从斯坦因最原始的考察报告中找寻藏经洞的原貌,由此确认藏经洞原本是分帙封藏着的大批佛典,同时也精心保存着许多信士供养的佛画,还有一些残纸和丝织品残片等。斯坦因以后,藏经洞原貌已乱,藏品经过多次分割,形成今天我们在各个收藏单位见到的敦煌残卷的样子。然而,这种今天的保存状态不是藏经洞的原貌,据此声称藏经洞中的材料都是废弃物,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 三、唐五代敦煌经藏的缺经情况

我们在批评持“废弃说”者忽视藏经洞内较为完整的经卷和艺术品的同时,也不否认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佛典残片和丝织品残块等今天的人看来应当废弃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是废弃物,这关系到我们对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各寺院的收藏情形的认识。斯坦因提出“废弃说”的时候,对唐宋时

[1] 借用陈垣《敦煌劫余录》的用语。

[2] 斯坦因记载了在路上遗失的情形,见 *Serindia*, II, pp. 829-830; 进京后的情况,见饶宗颐《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1000—1001页。

[3] 中田笃郎编《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京都朋友书店,1989年)53—155页有缀合文书一览;又,《敦煌大藏经》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敦煌大藏经》(台北,1989—1991年)各卷的校勘记,也有一些写本的缀合记录,可以看出北图藏卷被撕裂的情形。

[4] 北图藏卷的全貌,可参看方广錡《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1—12页。

期敦煌佛教寺院的情况可以说所知甚少,因为那时大多数汉文文书尚未作过研究。今天,经过学者们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们可以大致窥知当时寺院藏经以及其他供养具的收藏情况,从而可以对藏经洞中的这些残件给以一个比较圆满的解说。

唐代前期,敦煌佛教已很兴盛。武周时,莫高窟有千窟之多。吐蕃占领敦煌后,大力扶持佛教,寺院及僧尼数量大增。归义军继续了吐蕃时期崇佛的做法,佛教处于独尊的地位,敦煌佛寺也从吐蕃时期的十六座增加到十七、八座<sup>〔1〕</sup>。在这十余座寺院中,以龙兴寺最大,它是唐朝以来敦煌的官寺,位于沙州城内,临近州衙。不论吐蕃时期的都教授,还是归义军的河西都僧统,其治所都在龙兴寺中<sup>〔2〕</sup>。设立于莫高窟前的三界寺远离州城,是五代时期敦煌十七寺中较小的一个,它的创立远较龙兴、开元、灵图等大寺为晚,其藏经和其他供养具也无法与大寺相比。但无论是敦煌的大寺还是小寺,佛藏和供养佛像的残缺都是十分普遍的情况。

我们举大寺龙兴寺为例。P. 3432 是《吐蕃时期敦煌龙兴寺供养佛像佛经等历》,其中登录了龙兴寺所藏的佛像、佛经、衣物和法器等<sup>〔3〕</sup>。其中登录的一部大藏经,是按《大唐内典录·入藏录》的顺序排列的,依《内典录》,可知这部藏经有些帙不具足,有缺经情况<sup>〔4〕</sup>。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佛像画幡和经巾的记载,如“又小珠幡贰,不堪受用;又故金花幡叁,不堪受用”;“绯绢经巾,色绢裹,白练画缘,长两箭,阔壹箭半,不堪受用;又经巾壹,花罗表,红绢里,长壹箭半,阔叁尺伍,不堪受用;故黄绢额,长壹丈叁尺,不堪

〔1〕 参看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东方学报》(京都)第29册,1959年,287—290页;土肥义和《莫高窟千佛洞与大寺和兰若》,《敦煌的社会》(《讲座敦煌》第3卷),东京,1980年,355—362页。

〔2〕 龙兴寺应是唐中宗时奉敕设立的官寺,位于子城,见S. 1438书仪;其在敦煌佛教教团中的首要地位,可于S. 1947, P. 2879等文书中看出。

〔3〕 全卷录文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1979年,514—516页。

〔4〕 方广錫研究了此卷所记佛经部分,见所著《八一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96—106, 309—310页。



受用”〔1〕。这些已经不堪使用的佛像和经巾,仍然保存在龙兴寺中而不被废弃,根据下引敦煌文书和藏经洞出土幡画和经帙的古人修裱情形,它们等待的是修复,而不是废弃。

龙兴寺的缺经情况以后并未见好转,P. 3852 背记:“戊辰年九月七日,奉处分龙兴寺大藏经,准《入藏录》点勘经律论集传等,除见在,无者谨具数目如后:见欠经四百七十二卷;律共欠八十卷;论共欠三百一卷;集共欠一十四卷;贤圣传共欠二十一卷。经律论传集等都共欠八百八十八卷。”戊辰可能是大中二年(848)〔2〕,反映了吐蕃末年敦煌龙兴寺所欠佛典并未补足。

P. 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什物历》所记该寺佛像等供养具的情况也与龙兴寺类同:“又破碎珠幡贰,不堪受用。故破碎高离(丽)锦经巾壹,麴尘绢里,每面各长壹箭半。”“故破黄绫綳经巾壹,长叁箭,不堪受用。”“故破花罗经巾壹,不堪用。”“破碎生绢菩萨旛贰拾肆口。”〔3〕在这份什物历中,最不堪受用者,标明“次籍除”,即下次登录时除掉。所除者多为一般寺用日常生活什物,而大多数破碎的供养具从未废除。这反映了当年敦煌各寺对供养具的珍视,也说明不堪使用的佛像存于寺中是当时普遍的现象。

佛典的缺失直到宋初仍未改变,S. 2142《佛典目录》题记云:“大唐(宋)乾德二年(964)岁次甲子四月二十三日,经司僧政惠晏、法律会慈等点检《大般若经》两部,欠数较多,未得成就。同日,法律海詮请藏《大佛顶略咒本》一卷,法律会慈请藏细字《最胜王经》两卷,计一部。”此时敦煌佛教教团所属的经司都无法配全藏经,更不用说一些一般的寺院了。从吐蕃时期

〔1〕 侯锦郎研究了此卷所记佛像部分,他注意到了这些不堪使用的佛像,并且提醒人们这份寺院财产帐与藏经洞中的文物的相似性,见 Hou Ching-lang, “Tresors du monastère Long-hing à Touen-houang”,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Paris 1981, pp. 149-168; 耿昇汉译文《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77—95页。

〔2〕 方广錫《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129页。

〔3〕 全卷录文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59—582页。

(786—848)到五代宋初,敦煌各寺佛典的缺欠是普遍的现象,在敦煌文书中有许多这一时期的欠经目录、缺帙录、补写佛经目录、向中原乞经状等等〔1〕,说明了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

相比而言,较小的三界寺所藏佛典和幡画的情况更差。敦煌研究院藏0345号《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有如下题记:“长兴五年岁次甲午(934)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颙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应有藏内经论,见为目录。”据施萍婷先生研究,此卷是道真清理三界寺藏经的目录,北京图书馆新0329号《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则是收集修补佛经后的登录,其中也有同上题记,只是最后一句改为“应有所得经论,见为目录”;而S.3624是该目录的缮清本,惜仅存24行〔2〕。从记载较全的新0329所登录的藏经来看〔3〕,补充后的三界寺经藏仍然是部帙不全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道真修补的这部不全的藏经中,有一些正统佛藏排斥的三阶教经典、疑伪经和禅籍,如《大乘无尽藏

〔1〕 土肥玉和编《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II,东洋文库,1966年,33—55页著录了当时见到的这类文书;梅应运《唐代敦煌寺院藏经之情形及其管理》(《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2期,1970年,173—179页)、冈部和雄《敦煌藏经目录》(《敦煌与中国佛教》,《讲座敦煌》第7卷,1984年,297—317页)、J. Kyoto,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Manuscripts of Dunhuang: classification and method”, (《壬生台舜博士颂寿纪念佛教的历史与思想论集》,东京,1985年,17—70页)、方广錡《八一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等对此类文书都有称引论说,可以参看。

〔2〕 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敦煌研究院藏卷的部分图版刊布于敦煌研究院编《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与甘肃人民出版社合刊,1991年。

〔3〕 新0329号写本原为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其全卷照片载井之口泰淳等编《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探险队将来敦煌古写经目录》图版编,龙谷大学西域出土佛典研究班,1989年刊,图56—76;录文并研究见小田义久《敦煌三界寺的〈见一切入藏经目录〉考》,《龙谷大学论集》第434·435合并号,1989年,555—576页。

法》、《阎罗王受记经》、《八阳神咒经》、《父母恩重经》、《无量大悲教经》、《善恶因果经》、《历代法宝记》等。这个目录有助于我们理解藏经洞所含佛典的情况,即部帙不全,疑伪混杂<sup>〔1〕</sup>,如果用按《开元录》组织的唐五代寺院中完整规范的藏经来要求藏经洞藏品,当然就会认为它们是废弃物<sup>〔2〕</sup>,但当年的三界寺藏经本来就是如此地残缺不全和真伪混乱。敦煌佛教发展到五代,疑伪经大行,这是民俗佛教盛行的结果(图7)。道真并非学问很深的义学法师,S.3147就是“三界比丘道真受持”的伪经《阎罗王授记经》<sup>〔3〕</sup>,可见他将疑伪经入藏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用唐五代长安、洛阳一些皇家官藏的情形来要求处于穷乡僻壤的敦煌三界寺藏经。

道真的修补佛典工作在934年以后并未终止,S.5663《中论》第二题记:“乙未年(935)正月十五日,三界寺修《大般若经》兼内道场课念沙门道真,兼条修诸经十一部,兼写《报恩经》一部,兼写《大佛名经》一部。道真发心造《大般若》[袂]六十个,并是锦绉绫具全,造银番伍拾口,并施入三界寺;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壹,施入三界寺。道真造刘萨河和尚,施入番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花毡壹,已上施入和尚,永为供养。道真修《大般若》壹部,修诸经十三部、番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壹、经案壹、经藏一口、经布一条、花毡壹,以上施入经藏供养。”<sup>〔4〕</sup>可见道真不仅修补诸经,还造经帙,绘写佛像<sup>〔5〕</sup>。敦煌文书中有关道真的材料以S.4915《雍熙四

〔1〕 此目所列的三阶教经典、疑伪经和禅籍,大都已在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找到,参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东京,1927年;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1976;篠原寿雄与田中良昭编《敦煌佛典与禅》,东京,1980年。

〔2〕 按方广錫博士的“废弃说”正是用“在藏经洞内并不具足一部完整的《开元大藏》”为出发点的,而且他认为疑伪经“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作珍宝”而收藏,见《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217页,但这些看法与当时敦煌的佛教实情不相符合。

〔3〕 参看拙稿《九、十世纪归义军时代的敦煌佛教》,《清华汉学研究》创刊号,1994年。

〔4〕 录文参看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

〔5〕 题记中提到道真曾造刘萨河和尚像,藏经洞所出即有绢本刘萨河像,参看史苇湘《刘萨河与敦煌莫高窟》,《文物》1983年第6期,5—13页;R. Whitfield,“The Monk Liu Sahe and the Dunhuang Paintings”,*Orientalism*, March 1989, pp. 64-70.

年(987)沙州三界寺授菩萨戒牒》最晚,可以推知他的收集修补佛经的工作持续进行。S. 6225 一面写“三界寺比丘道真诸方求觅诸经随得杂经录记”,另一面也是道真手迹,写“集《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具全;又集《大般若经》一部,未全;《大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具全;《经录》一本”,这是道真收集佛经的简单随记,意思是说他集成了一部完整的《大般若经》,还有一部不全的《大般若经》及《大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等。又 S. 6191 也是道真所写:“杂《大般若经》,或有施主及官家缺袂号处,取添袂内,计十卷。”〔1〕这是说他续得的十卷《大般若经》已是多余的本子,如其他施主或官家藏经有缺,可以此补充。这些成果应是 934 年以后陆续取得的,说明了道真收集佛经的成绩,也告知我们他这样集合的佛典必然会有大量的副本。三界寺是个小寺,无法雇用大量写经生来抄写佛典,所以道真采用从各寺收集古旧佛典抄本修补集成的作法,藏经洞出土的一些非三界寺的写卷,应当就是这样从各处搜罗来的结果,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敦煌佛经写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出自不同时代、不同抄书手,有不同寺院的藏书印,其原因就是它们原本是集成的。另外,因为莫高窟是敦煌民众供养佛像和佛经的主要场所之一,所以,在三界寺中应当有相当数量的供养经和画。而且,我认为道真从各寺搜罗来的古坏经文,也作为有待修补的材料保存在三界寺,并最终进入藏经洞。斯坦因所见藏经洞中的残经废纸、木轴引首、经帙残片及丝带等,是作为修补佛经、经帙、绢画的材料而保存在那里的,它们对于敦煌的一些大寺可以说是废物,但对于三界寺来说,却不能说是废品。

在伦敦和巴黎所藏的敦煌写本中,还有相当一批残片实际上是揭自一些绢纸绘画和经帙经卷的,在伦敦,馆方把这些残片放在总编号的后面顺序给号,使得伦敦残卷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巴黎国立图书馆则将这些残片放在所揭自的卷子后面,编作 bis 或 piece 1, 2, 3……。这些残片本是古代僧人用来修复绢纸绘画和经帙经卷的,在藏经洞开启时并不存在,它们是一些完

〔1〕 这两件文书之属于道真,系据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

整文物的附着部分<sup>〔1〕</sup>。遗憾的是,揭出的这些材料越来越多,给人以藏经洞文献十分零乱残碎的印象,甚至成为“废弃说”的证据。

#### 四、藏经洞的主体佛典和绢画原本 应是三界寺的藏经和供养具

道真曾以沙州释门僧政的身份签发《辛亥年(951)腊八燃灯分配窟龕名数》<sup>〔2〕</sup>,似可证明道真所在的三界寺位于莫高窟前。除了上面提到的藏经洞文献和文物与三界寺藏经和供养具之间的种种联系外,敦煌写经中带有寺院标记(包括藏书印、寺名缩写等等)的写本,无疑以三界寺最多<sup>〔3〕</sup>。斯坦因推测三界寺藏书室的藏书应是藏经洞文献的主要来源<sup>〔4〕</sup>,藤枝晃也持这种看法<sup>〔5〕</sup>。

〔1〕 关于这一点,参看拙稿《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前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2〕 金维诺《敦煌窟龕名数考》,《文物》1959年第5期,收入《中国美术史论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326—343页;孙修身《敦煌石室〈腊八燃灯分配窟龕名数〉写作年代考》,《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209—215页。

〔3〕 戴仁(J.-P. Drège)编制了带有这些印记的敦煌各寺写经一览表,见所著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Paris 1991, pp. 238-245. 三界寺的件数占压倒的多数。

〔4〕 *Serindia*, II, p. 822.

〔5〕 Akira Fujieda, “Une reconstruc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de Touen-houang”, p. 67; 藤枝晃《敦煌学导论》,南开大学历史系,1981年,78—79页。戴仁上引书据他所统计的各寺印记,认为并非来自一个寺院。但他所举的带有印记的材料多是一些引首残片,这些似乎是属于道真搜罗来的古坏经文,尚未用于修补其他经卷的材料。方广錡《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则认为“在曹氏政权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清点后,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与废纸以及用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起来,封存到第17窟中”。从上节所举敦煌各寺什物的情形看,若把十七寺的残经和不堪使用的供养具全部封存在藏经洞,恐怕第17窟是装不下的,所以这一假说很难自圆其说。

藏经洞原本是归义军初期的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sup>〔1〕</sup>,大概是因为距三界寺寺址较近,故此在十世纪中叶渐渐成为道真收罗古坏经卷修补佛典的储藏所,放置佛典残卷和一些供养具。其中既有完整的藏经,也有绢画、法器乃至残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由道真管理的。

佛典和佛画无疑是藏经洞所存文献和文物的主体,它们原本是属于三界寺的财产。这里有五世纪初叶以来写的各种佛教典籍,有些虽然残缺,但在十世纪的道真眼里,它们无疑是珍贵的文献,就像今天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宋版书一样,虽然大都残缺不完,但却被精心地保存着。而许多十世纪末期所写的佛典和所绘的绢画,则更难说是废弃物了。这些文献和文物全都包好一起整齐地存放在洞中的情形,也不能使我们认为是一堆废弃物。如果说印刷术的发明带来的书籍形制的变化导致了写卷的废弃,则无法解释绢画和刻本本身的存在。况且,虽然有北宋颁给沙州刻本藏经的可能<sup>〔2〕</sup>,但即使这部藏经运到了沙州,也不会入藏三界寺。俄藏 F. 32A 记有:“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汜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入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sup>〔3〕</sup>说明迟至 1002 年,沙州官府仍在抄写卷轴式佛经,所以,藤枝晃教授的废弃说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人们根据现在在各国图书馆中所见到的情景,都笼统地说敦煌写本多为残卷,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韦陀(R. Whitfield)教授在《西域美术》一书的前面,刊布了南北朝隋唐写经的一些精品:S. 4367《道行般若经》、S. 81 梁天监五年(506)写《大般涅槃经》、S. 1427 北魏永平四年(511)写《成实

〔1〕 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 年 12 期,21—33 页。

〔2〕 按史籍只记有写本藏经赐给沙州,见《宋会要》蕃夷五瓜沙二州条:景德四年闰五月,“诏益州写金银字经一藏赐之”。尚未见颁赐刻本的记载。

〔3〕 此件清晰的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321—322 页。

论》、S. 2154 隋开皇九年(589)写《佛说甚深大回向经》、S. 2295 隋大业八年(612)写《老子变化经》、S. 4209 唐咸亨三年(672)写《妙法莲华经》<sup>[1]</sup>。在伦敦藏品中,有许多长达十米以上的佛经写卷(图8),不少是首尾完整的(图9)<sup>[2]</sup>。从当时三界寺的藏经情况看,要想奢望根据藏经洞出土写卷复原一部完整的《开元录》大藏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开元录》是当时三界寺藏经的主要依据,所以按《开元录》来点勘藏经洞写卷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敦煌大藏经》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敦煌大藏经》,是这种点勘藏经洞写经的一项成果<sup>[3]</sup>,使我们多少能够看出当年三界寺藏经的一些情况,但由于俄藏文献尚未全部影印出版<sup>[4]</sup>,而许多散藏文书还未公布,目前我们还无法全面明了藏经洞反映的三界寺藏经的详情。

由于大多数经帙被当作艺术品放在博物馆中,已经发表的一些精品都是作为研究花纹图案、经纬线等方面的材料而公布的<sup>[5]</sup>(图10),所以我们尚难了解经帙的全貌。保存在英国图书馆的一些纸质或麻布经帙,为了揭出粘在上面的文书材料,大都已经拆开,只保留了几件作为标本<sup>[6]</sup>。据

---

[1] R.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I, Tokyo 1982, pls. 1-6.

[2] 翟林奈(L. Giles)的目录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著录了写本的长度和首尾完整情况,可惜常常被人们忽略。

[3] 《敦煌大藏经》,共63册,前60册是汉文部分,台北前景出版社1989—1991年出版。

[4] 《俄藏敦煌文献》迄今出版了五册。

[5] 英国所藏已经发表的经帙见 R.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vol. III, Tokyo 1985, pls. 6-7, pp. 286-288 (Ch. xlviii. 001, Ch. xx. 006); 法国所藏,见 K. Riboud et G. Vial, *Tissu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es au Musée Guimet et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ission Paul Pelliot XIII)*, Paris 1970, pls. 1, 3, 4, 12, 30, 39, 43, 45, 87, pp. 3-26, 69-71, 145-155, 201-207, 221-228, 231-235, 369-370, 编号为 EO. 1200, EO. 1208, EO. 1209/1, EO. 3664, EO. 1199, EO. 1207, EO. 3663, MG. 23082, MG. 23083.

[6] 英图所藏经帙,参看方广錩《敦煌经帙》一文的简介。

称,北京图书馆藏有经帙34件<sup>[1]</sup>。这些经帙的存在,证明了藏经洞所藏写经是按帙存放的。但这些经帙到底有多少,尚有待我们去做系统的整理。

大多数研究藏经洞封闭的学者,往往忽视了大量绢纸绘画和丝织、刺绣等美术品的存在(图11)。上面已经提到过,在这些美术品中,不乏精美完整之作,令人看了都爱惜不已,当年敦煌的信士僧人怎么会将其废弃?据美术史家的考察,这些绘画品的年代大都为九、十世纪的作品,有些是接近十世纪末才完成的,它们作为三界寺的供养具尚未到“不堪受用”的程度。今天,我们很容易地从韦陀编三卷本《西域美术》(The Art of Central Asia)彩色图录中看到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美绘画<sup>[2]</sup>,也可以在即将出版的秋山光和先生等编二卷本《西域美术》彩色图录中看到集美博物馆藏的伯希和同类收集品<sup>[3]</sup>,这是持“废弃说”者不应回避的藏经洞文物。依我的看法,如果没有反佛的外力的促使,这些绢画是不会被封存的。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非汉语文献,一般认为藏经洞中的藏文写本一定是废物,因为藏人对敦煌的统治早在848年就结束了。但是,吐蕃对敦煌的长期统治,对敦煌佛教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像吐蕃高僧法成在吐蕃统治结束时,并未随吐蕃势力退走,而是听从曾跟从他念经的弟子张议潮的劝请,留

---

[1] 方广錩《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10页。又:1994年8月,笔者借参加敦煌学国际研讨会的机会,得以浏览一些敦煌研究院所藏文献和文物,其中包括两件麻布经帙。一件长宽为50×50cm,一角题“宝女所问经等帙 殷”;一件为48×49cm,一角题“正法念处经第三帙 美”。据《开元释教录略出》,《宝女所问经》正是千字文编号“殷”字号的第一部经;而“美”字号应是《正法念处经》第四帙,或系佛僧误写“四”为“三”。这两件经帙因为没有什么艺术价值而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所弃,辗转流传而最后为敦煌研究院收藏。我们也可以由此想到,一些被认为是无用的麻布经帙,或许早已不存在了。

[2] R.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3 vols., Tokyo 1982—1984. 又 R. Whitfield and A. Farrer,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90) 也收录了部分精美彩照。

[3] 《西域美术——集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东京讲谈社,1994年。该馆藏画的黑白图版及解说,见 *Bannières et peinture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es au Musée Guimet (Mission Paul Pelliot, XIV—XV)*, Paris 1974, 1976.



在敦煌讲经<sup>〔1〕</sup>,法成所使用的藏文经典不会马上就被废掉<sup>〔2〕</sup>。而且,乌瑞(G. Uray)和武内绍人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直到十世纪末,藏文仍然是河西地区的通用语言之一<sup>〔3〕</sup>。考虑到大量吐蕃、退浑、通颊等部落在敦煌的存在,似不能说在藏经洞封闭时这些藏文文献都已成为废弃物了。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其他语言在这里流行的情况也是一样。在敦煌,八世纪时曾有一个人数颇多的粟特人聚落<sup>〔4〕</sup>,吐蕃统治以后,由粟特人组成的从化乡已不复存在,但粟特人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才可能消失。所以,藏经洞里出有十世纪的粟特语文献是不足为奇的。回鹘、于阗文献的保存更容易理解,因为曹氏与甘州回鹘和于阗王国有姻亲关系,终十世纪,敦煌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和于阗王国间的往来不断,许多回鹘和于阗人长时期留在敦煌,许多回鹘、于阗文佛典或文书就出自这些人的手笔<sup>〔5〕</sup>。同时,归义军的僧俗民众也不乏懂得回鹘、

〔1〕 参看拙稿《九、十世纪归义军时代的敦煌佛教》,《清华汉学研究》创刊号,1994年,88—101页。

〔2〕 参看同上拙稿;方广錩《关于敦煌遗书北新八七六号》,《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敦煌专号,1991年,71—87页。

〔3〕 G. Uray, "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 *Journal Asiatique*, CCLXIX, 1981, pp. 81-901; idem, "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4<sup>th</sup>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Schlosse Hohenkammer-Munich 1985, München 1988, pp. 515-528; T. Takeuchi, "A Group of old Tibetan Letters Written under Kuei-i-chun: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Tibetan letters", *Acta Orientalia (Hung.)*, XLIV, 1990, pp. 175-190.

〔4〕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文化研究》1,1965年,49—92页。

〔5〕 拙稿《公元十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583—603页;又《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60—72页;又《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111—119页;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284—306页。

于阗文者,我们举几条属于十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材料。S. 5448《浑子盈邈真赞》云:“明闲礼则,传戎音,得顺君情;美舌甜唇,译蕃语,羌浑叹美。”浑子盈死于925年。P. 2991《张灵俊邈真赞》云:“杏坛流训,梵汉翻传。”灵俊卒于936年前后<sup>〔1〕</sup>。又敦煌研究院藏001号+董希文旧藏+P. 2629《归义军官府酒破历》(964年)中,记有“孔目官修西州文字”,“案司修甘州文字”,“供修甘州文字孔目官”,“案司修西川(州)文字”,“供修于阗文字孔目官”等<sup>〔2〕</sup>,沙州案司孔目官所修西州或甘州文字,即指回鹘文无疑,于阗文字则指于阗语。

总之,不论是汉文佛典,还是藏文文书,也不论是绢纸绘画,还是回鹘、于阗文献,我们如果把它们放在公元十世纪,而不是今天已被局限的目光里,我想藏经洞的主体材料不应是废弃物。根据以上的论说,我认为藏经洞的主体文献佛典和供养具,原是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

## 五、藏经洞封闭原因之蠡测

佛教教团将残经破像废弃掩藏起来,的确是佛教的传统作法。我们难以接受“废弃说”的原因之一,是藏经洞作为这样一种废弃方法的掩埋处所似乎太大了些,因为如果自五世纪以来的写经早已是废物的话,不应一总放在这个窟中,而是早就放在佛像中或其他什么地方了。1965年在莫高窟第125—126窟前地袱和第130窟底层壁画下岩洞等处发现的北魏唐代残刺绣、绢绘佛像和雕板捺印佛像等<sup>〔3〕</sup>,是属于这种废弃方式的废弃物。而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应当另有原因。

〔1〕 以上邈真赞文见饶宗颐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2〕 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142—155页。

〔3〕 敦煌文物研究所《新发现的北魏刺绣》,《文物》1972年第2期,54—59页;又《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文物》1972年第12期,55—67页。

上引俄藏 F. 32 号 1002 年的施入记是目前所知最晚的一件藏经洞出土文书,此前的纪年写本大体上持续不断,而此后有年代的写本迄今尚未发现。从现存写本年代的累计,可知藏经洞的封闭应在 1002 年以后不久,不应晚到伯希和提出的 1035 年西夏的到来<sup>〔1〕</sup>。伯希和时代,人们对西北历史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因此找了一些较晚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在经过多年来对唐宋时期西北历史的探讨之后,我以为最有可能促成藏经洞封闭的事件,是 1006 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一事。

从 1002 年往后,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首先就是 1006 年于阗佛教王国灭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sup>〔2〕</sup>。因为于阗与沙州的姻亲关系,970 年于阗国王曾致函其舅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求发兵援助抵抗黑韩王朝<sup>〔3〕</sup>。当于阗陷没后,大批于阗人东逃沙州,甚至远到青海<sup>〔4〕</sup>。在藏经洞中有一批相当完整的于阗文佛典,许多是 Viśa' Śūra (966—977) 和 Viśa' Dharma (978 年以后在位) 时写成的,如 Ch. 00274《佛本生赞》、Ch. i. 0021b《金刚乘文献》等,他们或许是写后不久,就在

---

〔1〕 斯坦因在写《西域考古图记》时,更强调公元十一世纪初叶封存说,见 *Serindia*, II, pp. 820, 827. 在封闭年代问题上,藤枝晃“Une reconstruc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de Touen-houang”,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610 页,方广锡《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第 34 届亚非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香港,1993 年 8 月),也都主张十一世纪初叶说。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一文对伯希和的说法反驳最有力。

〔2〕 参看华涛《喀喇汗朝王室族属问题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2—13 期,1989 年,107—116 页;又《萨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 年第 3 期,10—23 页。

〔3〕 H. W. Bailey, “Sri Viśa Śūra and the Ta-U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XI. 2, 1964, pp. 17-26.

〔4〕 北宋元丰元间的青唐羌首领阿里骨,原本是于阗人,见《宋史》卷四九二《外国传》。推测也是属于东逃的于阗人后裔。参看铃木隆一《青唐阿里古政权的成立与契丹公主》,《史滴》第 4 号,1983 年,35—50 页。

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下带到敦煌保存起来的,也可能就是逃难的于阗佛教僧人带来的〔1〕。于阗僧人所带来的伊斯兰东进的消息,要比信佛的西夏人到来的消息可怕得多,因为黑韩王朝是经过近四十年的血战才攻下于阗的,他们对于阗佛教毁灭性的打击〔2〕,应当是促使三界寺将所得经卷、绢画等神圣的物品封存洞中的直接原因。而由于黑韩王朝并未马上东进,所以,封存活动是主动而有秩序地进行的,并且在封好的门前用壁画做了必要的掩饰〔3〕,以致当事者离开人世后被人们长期遗忘。

在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的研究中,时常有人提出一些材料,来说明藏经洞的封闭要晚于伯希和提出的1035年。通观这些材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西藏、回鹘、西夏相关的材料,如罗斯(E. D. Ross)提到的元至正十年(1350)所写回鹘文佛典〔4〕,韩廷顿(J. C. Huntington)举出的西藏风格的绢画〔5〕。这些材料应当出自莫高窟北区的第464窟(伯希和编号181窟)。斯坦因、伯希和已经指出,在他们到来之前,王道士曾将别处发现的晚期材料放入藏经洞,伯希和还特别指出他在洞中见到的清光绪年间刊印的小本

〔1〕 参看拙稿《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118页。

〔2〕 关于这场残酷的战争对于阗的毁灭,参看殷晴《关于大宝于阗国的若干问题》,《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241—258页。

〔3〕 藏经洞门所在的第16窟甬道北壁壁画的年代,有宋初和西夏早期的不同说法。原画见《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118。贺世哲《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83—86页)考订为1002—1014年所绘,与本文结论略合。同时请参看西夏说的代表性观点: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294—295页。我倾向于前者的看法。根据一般的看法,西夏早期壁画与宋代曹氏晚期壁画有许多相似点,参看刘玉权上引文294页。

〔4〕 E. D. Ross 'Note to Legge, "Western Manichaeism and the Turfan Discover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3, p. 81.

〔5〕 J. C. Huntington, "A Note on Dunhuang Cave 17, 'The Library', or Hong Bian's Reliquary Chamber", *Ars Orientalis* 16, 1986, pp. 93-101.

道经,它们不能作为藏经洞封闭年代的证据<sup>[1]</sup>。虽然这一事实累经罗斯、罗那塔斯(A. Rona-Tas)、韦陀等人强调<sup>[2]</sup>,但仍有人时而忘掉这一点。

另一类则是确为出自藏经洞的汉文文书。谭真先生认为P. 3810《养生神仙粥食方》中,有“山药”一名,应是避宋英宗(1064年即位)讳而改“薯蕷”为山药<sup>[3]</sup>。毕素娟先生认为P. 2159背辽僧诠明著《妙法莲华经玄赞科文》是1006—1020年间传入敦煌的<sup>[4]</sup>。陈祚龙先生以为S. 4358《李相公叹真身》系抄自宋仁宗1031年所撰的《佛牙赞》(《佛祖统记》卷四五)<sup>[5]</sup>,李正宇先生持同样看法<sup>[6]</sup>。相对于数万件属于1002年以前的藏经洞文献,这几条证据显得十分孤单,而且,我们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关于P. 3810中的“山药”,虽然说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认定即“薯蕷”的讳改,但宋以前的医书许多已残缺不全,不能肯定山药不是“薯蕷”之外的另一种药材<sup>[7]</sup>。把辽僧诠明

[1] Stein, *Serindia*, II, pp. 828-829; P.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pp. 506, 529; 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 8, 27页; 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 351—353页; 刘永增《回鹘文写本与莫高窟第二藏经洞》, 《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 40—44页。最近出版的耿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380—390页, 详细记载了伯希和在这所元代窟及相邻的伯编182窟中进一步发现的元代文书。

[2] E. D. Ross, “The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3, pp. 434-436; A. Rona-Tas, “A Brief Note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Tun-huang Collections”, *Acta Orientalia (Hung.)*, XXI, 1968, pp. 313-316; R.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II, pl. 83, p. 347.

[3] 谭真《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 《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 36—39页。

[4] 毕素娟《辽代名僧诠明著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8—19期, 1992年, 133—139页。

[5] 陈祚龙《敦煌学园零拾》上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65—68页; 又《敦煌学林札记》上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年, 247—248页。

[6] 李正宇《敦煌遗书宋人诗辑校》, 《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47页。

[7]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IV, Paris 1991, p. 297 于此件年代未作考订。郑阿财《敦煌写本〈呼吸静功妙诀〉试论》(《敦煌学》第19辑, 1992年) 111页云, 此件抄写年代“恐怕为晚唐五代, 甚至晚到北宋初期”。

著作的传入敦煌放在 1006—1020 年间的根据,仅仅是因为史料记载统和、开泰年间辽与沙州之间往来不绝,并无实证。据考,说明此书完成于 965—1002 年间,995 年经敦煌往西天取经的僧道猷,曾把北京石壁沙门传奥的《梵网经记》带到敦煌<sup>[1]</sup>,也不排除他把说明著作于此时一并携来的可能性。宋仁宗的《佛牙赞》与《李相公叹真身》文字基本相同,当出一源,但《佛牙赞》的文字似更典雅,我以为其传抄关系正相反,即先有《李相公叹真身》,辗转又由佛教徒安在了宋仁宗身上了,如果先有宋仁宗《佛牙赞》,则敦煌抄本必然标明为宋仁宗诗,这样更具影响力,称《李相公叹真身》,反映了它来自民间,而且早于所谓宋仁宗《佛牙赞》的蛛丝马迹。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俄藏敦煌写本目录中著录了两件《景德传灯录》<sup>[2]</sup>,此书是 1004 年编成,敦煌学界也常有人以此为藏经洞最晚的写本之一<sup>[3]</sup>。按这两件写本,一件编号  $\Phi. 229b$  (M. 897),确为《景德传灯录》。这件写本的正背内容和行款格式,都与马伯乐著录的斯坦因在黑城(哈拉浩特)所获 KK. II. 0238(K)号写本相同<sup>[4]</sup>,根据最近英国图书馆寄来的照片,我发现英俄分藏的两件写本实为同一写本所撕裂的散叶<sup>[5]</sup>。故此件可排除于敦煌写本之外。另一件编号  $\Delta x. 1728$  (M. 2686),残存一纸下半十

[1] 北京图书馆藏收字 4 号写本正面为北京石壁沙门传奥述《梵网经记》,背面为《至道元年(995)道猷状》,参看拙稿《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961—962 页。

[2] 孟列夫等编《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 1 卷,353—354 页;第 2 卷,409—410 页。前者原卷图版载《俄藏敦煌文献》第四册,299—305 页。

[3] 如 A. Cadonna, “Il frammento manoscritto del *Jigde chuandeng lu* nel fondodi Dunhuang a Leningrado”, *Cina*, 17, 1981, pp. 7-33; 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之研究》,东京,1983 年,637—638 页。

[4] H. Maspé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p. 230.

[5] 拙稿《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论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 年,250—253 页,图版 XVIII—XIX。

行文字,俄藏目录在《景德传灯录》一名后加了问号<sup>〔1〕</sup>,1991年访圣彼得堡时,我也曾见到此件原物,确为敦煌文书,然审其内容,实为唐开元年间成书的早期灯史《楞伽师资记》净觉序的残文,与《景德传灯录》毫无关涉<sup>〔2〕</sup>。

总之,某些被认为是藏经洞出土的晚于1002年的材料,大多可以指出它们的其他来源或误解之处。

藏经洞的封闭问题涉及到历史、宗教、美术、语言、文学、考古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图对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提出一种解说,但绝不敢说这一问题已经解决。相反,笔者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希望相关学科的专家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自己所熟悉的材料作出具体的分析,以期通过藏经洞问题的研究,加深我们对藏经洞宝藏的认识。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7年,23—48页。增订本图版略作调整。)

---

〔1〕 戴密微对此卷比定已表示怀疑,但他未见原件文字,故不知为何书断片,见P. Demiéville, “Récents travaux sur Touen-houang”, *T'oung Pao*, LVI, 1970, p. 2, n. 1; 耿昇译《敦煌学近作》,《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2页,注①。

〔2〕 拙稿《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232—235页。

## 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

### 引 言

本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人小岛靖氏得到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两件写本,以“小岛文书”著称,一直被认为是李盛铎氏旧藏的敦煌出土唐代景教经典。前者完整无缺,计十八行,其中题记占三行,文曰:

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  
定传写教读  
开元八年五月二日

后者则系残卷,首残尾全,存三十行,其中题记占二行,文曰:

开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张驹  
传写于沙州大秦寺〔1〕

自两件写本刊布后,学界为之瞩目,举凡介绍敦煌景教文献、论述唐代基督教史之论著,多将这两件写本视为珍贵的原始资料,用以“修正补充”史书、碑石之记载,不提及者几鲜〔2〕。其间虽也有个别名家,对此两件写

---

〔1〕 佐伯好郎《清朝基督教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49年,1—24页。

〔2〕 参看梁子涵《唐代景教之文献》,《大陆杂志》第14卷第12期,1957年,395—396页;龚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0年,41—45页;刘伟民《唐代景教之传入及其思想之研究》;《联合书院学报》第1期,(转下页)



本疑惑重重,但也不得其解;缘因深信写本出自李氏旧藏,必为敦煌真品无疑<sup>[1]</sup>。

小岛氏所得的两件写本,是否果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景教文献?对此问题,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做一番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庶几有助于了结此历时半个世纪之悬案。梁启超先生有云:“史料以求真为尚。”<sup>[2]</sup>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于来历不清的“敦煌文书”的鉴定工作,势必渐渐提到议事日程,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笔者仅就“小岛文书”做一尝试,以期抛砖引玉,求得学界师长、同仁们的批评指正。

## 一、“小岛文书”的来历

小岛氏所得两件写本的最早刊布者,是日本专治景教的著名学者佐伯好郎博士。他把这两件写本作为最新发现的景教经典,专文加以解说,并附以照片,附录于1949年出版的《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4卷,即《清朝基督教之研究》。佐伯氏称这两篇经典是“距今六年前,即1943年2月及11月,畏友小岛靖君从故李盛铎氏之遗爱品中发现,由李氏的遗产继承人相让得到的”,并且说“同年末”,小岛氏把这两篇经典的照片“寄赠”给他。为了表示对小岛氏的

---

(接上页)1962年,52—54、57—59页;梁子涵《唐代景教译经考》,《大陆杂志》第27卷第7期,1963年,215页;孙巧兰《唐代景教传流考》,《新时代》第5卷第3期,1965年,34页;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33—34页;R. Mehlhose, “Nestorianische Texte aus China”, *ZDMG Suppl. I, Teil 2*, 1969, p. 444; 张奉箴《福音流传中国史略》卷一,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70年,150—155页。郑学稼《中国化的大秦景教》(《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5卷第10—11期,1972年),对唐代景教经亦有介绍,唯对小岛氏所得二写本却只字未提。

[1] 见羽田亨《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及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殘卷につて》,《东方学》第1辑,1951年,1—11页。该文已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1958年,292—307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7页。

敬意,佐伯好郎把这两篇经典命名为“小岛文书”,以 A、B 相区别(图 12、图 13)。又云“小岛文书 B”,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已被幸运地带到日本,而“小岛文书 A”,即《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的原件,却于 1945 年 9 月从天津撤退混乱之际,与小岛氏其他贵重物品一起被盗,业已去向不明<sup>〔1〕</sup>。

有关“小岛文书”的来历,迄今为止,我们所知仅此而已。此后发表的大量论及这两件写本的著作,对于写本来历的介绍,均本于佐伯氏的上述说法,没有任何修正和点滴补充。而佐伯氏之说,当然是依据小岛氏所言。由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关“小岛文书”的来历,迄今中外学界仅仅听到小岛靖的一面之词!

由于仅有此一面之词,其间的细节又一无披露。执此与李盛铎生平事迹及其藏书流散情形相较,对小岛氏所言的可信性,不由得不产生许多疑问。

按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为清末到民国时期天津的大藏书家<sup>〔2〕</sup>。因家中世代藏书,自己又辛勤收购,拥有大量珍本秘籍;更曾利用职权,攫取一批敦煌藏经洞出土写本精品,加之受赠的散件,李氏又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敦煌文书收藏家。不过,根据有关的传记,李氏“晚年境遇窘迫,其妾张淑贞又以木斋遗弃伤害罪诉之于天津法院,索赔五万金。李氏不得不同北平图书馆相商,要出卖他的藏书,因当时北平图书馆经费紧张而未成交。于是他就把几种宋版书抵押于北平一家书店,藉以偿还债务”<sup>〔3〕</sup>。1935 年,李氏更将家藏的一批敦煌写本精品,“以八万日金,售诸异国”,目录载于是年 12 月 15 日及 21 日的《中央时事周报》,计有 360 件

〔1〕 佐伯好郎《清朝基督教の研究》,1—24 页。

〔2〕 有关李盛铎的生平,见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北京,1940 年,166 页;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文献》第 3 辑;收入作者所编《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郑伟章、李万键《李盛铎与木犀轩》,见氏著《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但以苏精《李盛铎木犀轩》一文最详尽,见氏著《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年。

〔3〕 郑伟章、李万键上引文 220—222 页。

之多。其中第13件写本便是本文将一再提及的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1936年,李氏又继续求售,是年的《学觚》第1卷第7期便刊出《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编者并加按语云:“近闻李氏又有一批求售,虽数量较上次为少,且精美亦逊,但亦有重要者。特觅得其目,附载于此,以为国人之注意古籍者告。”〔1〕

李氏出售家藏敦煌卷子的事,当时有关部门已予以注意;1935年8月6日陈垣致胡适信,便是专门商讨此事:

适之先生著席:

今早九时辅仁有会,十一时基金会之约恐不能到。李氏藏敦煌卷,据来目,除大部分佛经外,可取者不过三二十卷。普通写经,精者市价不过百元,次者更不值钱,来目索价太昂,购买殊不相宜。鄙意只可抵押,抵押之数,可以到贰万元,惟应要求者一事,应注意者一事。据弟所知,李氏藏有世界仅存之景教《宣元本经》,此目并未列入,恐尚有其他佳卷。此目之外,应要求加入吾人所已知或已见过之稀有珍本。又来目不注行数及长短尺寸,此中伸缩力甚大,最易发生弊病,应注意本主或关系人不至将各卷割裂。鄙见如此,谨请公酌,原目并缴,顺候晨安。弟陈垣敬上。八月六日。〔2〕

从这封信,可知李氏之景教《宣元本经》已被列入追踪目录;而信中并无提及《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说明时人对此经并无所闻。

李氏卒于1937年2月4日〔3〕,当时的教育部为防李氏藏书外流,特派北图馆长袁同礼洽商购买李氏藏书,胡适、傅增湘、徐森玉、赵万里等精于古

〔1〕 以上两条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2〕 《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1990年,177页。

〔3〕 按李盛铎逝世年份,上引诸书所记不同,此据天津《大公报》民国二十六年(1937)二月五日第二版第一张所登李盛铎二月四日去世的讣告以及第六版第二张所发新闻稿《李盛铎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籍版本和敦煌写卷的专家，曾亲到李宅翻阅善本书<sup>〔1〕</sup>。不久，抗日战争爆

〔1〕 见《大公报》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第六版第二张所登《李木斋藏书当局拟全部收买》：“本市消息：前参议院议长李木斋于二月四日去世。闻李氏生前，藏书甚丰，且多宋元明版及海内孤本，当局拟全部收买云。”又《大公报》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三日第十版第三张所登《李木斋全部藏书政府正接洽收买，教部出价三十万元，李氏家属索六十万》：“本市特讯：今年二月四日，李氏在津市秋山街二百零一号私寓逝世。嗣后，某国方面，迭次拟以重价收买李氏全部藏书。李氏哲嗣多人，以不愿使之流传国外，迄未与对方商洽。最近教育部方面，拟以三十万元，全部收买。家属以李氏在世时，有债务二十五万元以上，善后事宜，诸待料理，提出六十万元之数。经教部派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与李氏家属李幼斋、李少斋、李少微等迭在北平接洽，胡适、沈廉士、董康诸人，亦从旁促成，极希望政府能全部接收，故意见已趋接近。李少微于昨晚由平返津，如无波折，袁氏定日内来津，视察藏书。闻全部藏书，最精华部分，为名家稿本、明版而为清代所禁者、抄本、宋版、日本刻本等等，共约五千种。而抄本及稿本，则占三分之一。全部藏书之半，现在新华银行抵押保存，秋山街李寓，已装箱者约四十大籍，未装箱者亦如之。”下列珍贵书目，无敦煌写卷。又《大公报》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三十日第六版第二张《李木斋藏书五千种政府收买条件接近》：“本市特讯：藏书家李盛铎于本年二月四日逝世后，其家藏珍籍五千余种，颇为外人所覬觐，屡次欲出重价收买。李氏家属以事关我国文化，不肯与之接洽。嗣后教育部拟以三十万元全部收买，其家属以李氏在世时，负债达二十五万元以上，而将来修墓立祠，整理遗著，及结束身后其他事宜，亦在在需款，曾提出六十万元之数，详情业志日前本报。现悉此事接洽，已见端倪。缘自李盛铎作古，藏书之保存问题，极为国内学术界所关切，故自教育部进行收买以来，各方面皆愿促成。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奉教育部命，特于本月十四日邀赵万里、傅增湘、徐鸿宝诸人，由平来津，与李氏家属李少微等，接洽此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亦于十五日赶来参加。经李宅将存于新华银行保管之藏书运回秋山街寓内，按照藏书目录，请胡适、袁同礼等检阅，至十七日始毕。胡、袁等发现珍贵文籍甚多，认为确有由国家接管之价值，对其家属现在之处境，亦极表同情，一再与教部电商结果，教部愿增拨十万，胡适并允负责交涉，再增二万元，总数为四十二万元。李氏家属则希望政府拨足五十万元，俾敷料理一切，故尚待继续商洽。闻胡适允于参加‘庐山茗叙’之便，向蒋委员长陈述，代为面恳，预期此事不久可得结果。李氏家属拟于议定之后，先在津市举行公开展览，然后再行起运。”胡适日记亦载此事，1937年5月26日条记：“守和（袁同礼）为李木斋家藏书事邀吃饭，客人为李氏三子：家浦（少斋）、家澹、少微，董授经先生（董康）。李家原索价八十万元，政府已许三十万元，现李家减至五十万元。今夜我提议以四十万元（转下页）

发,此事被暂时搁置。1939年末,由伪临时政府出款,将整批李氏书全部收购,交北京大学文学院典藏<sup>[1]</sup>,今归北大图书馆。既然李氏晚年已迫于经济因素,将其珍藏品大量出售,而身后遗属更迫不及待地求售全部藏书,小岛氏所得两件写本,若是真品,当最可索价,何以一直私藏不露,直待李氏卒后六年,即1943年2月,才被“发现”。这究竟是纯系偶然的机缘,抑或是其中有诈?

## 二、李氏旧藏的敦煌景教经典

李盛铎旧藏的敦煌景教经典,并非无案可稽。王国维1919年7月7日致罗振玉书信中,已经提及“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籍,闻之神往!《甘露二年写经》,君楚疑为苻秦时物,亦极有理。景教经二种不识但说教理,抑兼有事实,此诚世界宝籍,不能以书籍论矣”<sup>[2]</sup>。1923年,抗父发表《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在综述“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写书”时,对李氏藏景教经更有明确的报道:“子部则有《老子化胡经》(英、法俱有之),摩尼教经(京师图书馆藏一卷,法国一卷,英国亦有残卷,书于佛经之背),景教经(德化李氏藏《志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各一卷,日本富冈氏藏《壹神论》一卷,法国国民图书馆藏《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sup>[3]</sup>

(接上页)为折中之价。至席散时尚无成议。”六月十五日条记:“下课后,上车到天津,袁守和到站接我。晚饭后同到李木斋宅去看他的遗书。李氏兄弟子侄搬出他家善本书,赵斐云(万里)纪录,守和、徐森玉(鸿宝)与我同看。到半夜始散。”六月十六日条记:“早九点又到李宅看书,到十一点,赶快车回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566、568页。据以上公私记录,李盛铎死后,藏书没有打散,而是全部收购。而所有记录中,不见有关敦煌文书的记载,推测因此项价值最高,故李氏终前已售尽,用以抵偿债务。

[1] 上引苏精文27—28页。

[2] 王国维《观堂书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7页。

[3] 载东方杂志社编《考古学零简》(东方文库第71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12月,97—98页。

对于李氏所藏的景教经典,学界至为重视。日本羽田亨博士经人介绍、斡旋,于1928年10月7日,专程到天津英租界黄家花园,拜访了李盛铎。李氏遂将所藏的《志玄安乐经》原件出示给他,羽田氏做了录文,附考释于次年刊布<sup>[1]</sup>。该件已于1935年春售诸日本某氏,1957年出版的《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刊出其首尾两帧照片(图14a-b)。

至于抗父提到的《宣元至本经》,羽田氏称当时李氏将其放在上海,故未得见,“但据李氏所言,其经不过二、三十行文字耳,尚有长长的空白,已划好细栏;文末虽有结句,但是否为全卷之终结,则尚不明了。多半是抄至中途便作废了”<sup>[2]</sup>。1930年,李氏曾将该经展示给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陈氏抄录了前10行文字,提供给佐伯好郎研究。1934年,佐伯氏便将这10行文字刊布在《辅仁学志》,并加英译;编者的英文按语说明了录文的来历<sup>[3]</sup>。1935年,佐伯氏又将这10行录文刊于所著《景教之研究》一书中,但把10行经文误作11行,并称第12行以下已佚<sup>[4]</sup>。学界无缘得见,信以为然。1943年,佐伯氏在其《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1卷中,转载10行录文,并转述了亲睹过原件的陈垣对该写本的描述,称该件“与羽田博士见过的《志玄安乐经》同样是用黄麻纸书写,上下行间有细丝栏;其字体也与《志玄安乐经》同”<sup>[5]</sup>。该写本原件照片也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刊出,见该书图版七(图15)。从照片看,与当年李氏告诉羽田亨的情况完全一致,计有文字26行,前10行与佐伯好郎刊布的10行一字不差;写本划有细栏,末尾结句下空余二字格,似未抄完;从内容看,全卷亦未结束。与《志玄安乐经》的写本字

[1] 羽田亨《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に就いて》,《东洋学报》第18卷第1号,1929年。该文已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据称钱稻孙有汉译文载《清华周刊》,惜未得寓目。

[2] 《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272页。

[3] P. Y. Saeki, “The Ta-Ch’in Luminous Religion Sutra on the Origin of Origins”,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9, 1934, pp. 133-135.

[4] 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东京,1935年,736—742页。

[5] 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一卷,东京,1943年,380页。

体相同,陈垣所述无误。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照片上的这件写本应当就是1923年抗父所提及的《宣元至本经》。不过,这件抄本标题少一“至”字,仅作“大秦景教宣元本经”。抗父的报道之所以较原件多出一字,原因是不难解释的。早在1909年,罗振玉便将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中得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刊布<sup>[1]</sup>,而《尊经》中罗列的景教经典名录中,就有“宣元至本经”。这一点必为抗父所熟悉,故把“宣元本经”误作“宣元至本经”。有无“至”字,意思雷同,多一字更易理解,故学者取用后一名称,亦情理中事。

《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将李氏旧藏的《宣元本经》的照片刊出,纯属偶然的误会。编者显然是要刊出小岛文书B《宣元至本经》的照片,以配合该书所收入的有关论文,即《〈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残卷考释》,但却误取了《宣元本经》的照片。我们推测这张以前从未刊布过的照片,必是来自京都大学的羽田亨博士纪念馆。据此推测,《宣元本经》也像《志玄安乐经》那样,已流入日本,而羽田氏到晚年才得到照片,但未及研究便病逝了。

以往学者多依佐伯好郎的说法,认为小岛文书B《宣元至本经》,便是佐伯氏先已刊布的《宣元本经》10行的后半;原写本26行全部刊出后,这种观点当不攻自破。然而,尽管照片已在1958年发表,但只有榎一雄博士曾注意及此,并否定佐伯氏的说法<sup>[2]</sup>。而大多数研究者仍继续将两件写本混同为一,强拼在一起<sup>[3]</sup>。

上面所述,已将抗父所报道的李氏藏景教经典两种调查清楚,说明其与

---

[1] 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刻印本。影印本见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出版。

[2] K. Enoki, "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Medieval Time according to Recen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Sul Tema: L'Oriente Cristiano nella Storia della Civiltà*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1964, Nr. 62), Roma 1964.

[3] 例如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北京:知识出版社,1981年;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C. Y. Hsu, "Nestorianism and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XIV-1, 1986, pp. 67-68.

小岛文书断无关联。至于王国维书信中提到的李氏藏两种景教经,虽然没有道出经名,但无疑即抗父所报道者。按王氏称两种景教经“不识但说教理,抑兼有事实”,正好是《志玄安乐经》和《宣元本经》的特点,两经都是阐述教理,且有说教、听讲者名称和说教地点,以及其他一些细节描写。而小岛文书 A《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系赞美诗体,并不说教理;小岛文书 B《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虽言教理,却一无事实。更有卷末题记,最引人注目,李氏展示给羽田亨和陈垣的景教经典写本,均未言及有题记。因而我们可以断言,王氏所说之李氏所藏景教经典,即羽田亨、陈垣所见者,绝非小岛文书。

按敦煌藏经洞出土写本,虽数以万计,但其间景教经典与摩尼教经一样,极为稀少,故弥足珍贵。李氏作为大藏书家,博学多闻,当深知景教写本之贵重,若有所藏,必当与同道或高明者切磋探讨,其将《志玄安乐经》和《宣元本经》出示给羽田亨、陈垣诸学界巨擘,正是其藏书家本色的表现。而小岛文书若为李氏所藏,焉会一无所露,直待身后数年,方由外人来“发现”?于情于理,殊难解释。

其实,作为大藏书家的李氏,对自身收藏的敦煌写本当然也不会是一笔糊涂账。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李氏书”中,便有题为李盛铎编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稿本一册,凡著录敦煌写本 432 号,其中有“十三、景教志玄安乐经”、“四百三一、宣元至本经,首全”,但无小岛文书的任何记载。据李氏藏善本书《白虎通德论》中的李滂跋字体,推测此目是李滂所录。因此,此目应是李盛铎去世前收藏敦煌写本的全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三《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中的部分内容,就来源于此目。稿本目录明确证明李氏收藏的敦煌写本中,有《志玄安乐经》和《宣元(至)本经》,而无所谓小岛文书。

### 三、“李氏题记”剖析

言小岛文书为李氏旧藏,虽无案可稽,但论者却有“李氏题记”为证,使



人不由不信。

“李氏题记”最早由羽田亨刊布在其所写《〈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残卷考释》一文中。该文附有小岛氏提供给他的一件写本照片，其中《宣元至本经》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卷首有“李氏题记”三行，羽田氏已照录无误：

景教宣元至本经卅行开元年号  
此稀珍品乃裱经背者余所发现  
至足宝贵也

题记并无署名，但钤有李氏藏书印之一“麀嘉馆印”〔1〕。

羽田氏于文章中说明，早在1945年，天津的小岛靖就已将这两件写本的照片寄赠给他，但由于未睹原件，故迟迟不敢公开发表。而今因为佐伯氏已将两件写本刊出，他才不得不抱病撰写此文，提出自己的看法。羽田氏治学之谨严，于此可见一斑。小岛文书题记的年代，明显有悖史实，故羽田氏对这两件写本实际是持怀疑态度的，但碍于李氏“为斯道公认之权威”，有其题记，则不便直言。

对于“李氏题记”的可信性，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理由如次：

第一，正如榎一雄已经注意到的，佐伯氏1949年出版的日文著作《清朝基督教之研究》和1951年修订版英文著作《中国的景教文献和遗物》〔2〕，均刊出小岛氏提供给他的一件写本照片，其间不见有“李氏题记”〔3〕。佐伯氏在书中也只字未提“李氏题记”，似乎不知有其事。按小岛氏寄给佐伯氏照片，时在1943年末，比给羽田氏的时间早了两年。是提供给佐伯氏的照片没有拍题记，还是佐伯氏认为题记无关要旨而不予刊布和提及？可能

〔1〕 见羽田亨《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及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残卷につこて》，《东方学》第1辑，1951年，1—11页附图。

〔2〕 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51.

〔3〕 K. Enoki, *op. cit.*, p. 68.

性唯此两种,而前者的可能性自然比较大,因为佐伯氏不会不知道李氏题记的份量。若属前者,人们自然要问,小岛给佐伯的照片为何没有“李氏题记”,而两年后给羽田氏的照片却有?我们不能代替小岛氏回答问题。不过,我们查阅了佐伯好郎 1955 年出版的《中国景教衰亡史》,该书卷首图版,特刊出小岛文书照片两帧,颇为清晰,其中《宣元至本经》的照片显然是重新拍摄的,下注明该件“今寄托同志社”〔1〕。我们将其与羽田氏发表的照片比较,明显可以看出:《宣元至本经》写本背面有裱纸,卷尾裱纸上钤有“小岛”小型方印一方;卷首裱纸空白处,正是羽田刊照片上“李氏题记”的位置,却不见有任何字迹。细审羽田刊照片,“李氏题记”并非写在原件裱纸上,而是另用小纸片书写,粘于裱纸上的,这显然违反了书写题记的一般习惯。该写本至晚从 1955 年便已寄放在京都同志社大学图书馆。1963 年 3 月,榎一雄亲到该馆考察原件,也未见有“李氏题记”〔2〕。小岛氏所得写本是否确属敦煌真品,“李氏题记”可说是最权威的鉴定,而今却被揭去,这至少说明写本的拥有者对其可信性已有所怀疑。

第二,假如李氏生前认为《宣元至本经》“至足宝贵”而特加“题记”的话,那么《大圣通真归法赞》不也是“景教经典”,不亦有“开元年号”,虽仅十八行,但却是完完整整的一篇文献,其“宝贵”的程度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同一李氏,却何以一字不题,如此厚彼薄此?

第三,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核对了张玉范女史整理的《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的原稿本《李盛铎藏书书目提要》中大量的李氏亲笔字迹,深感所谓《宣元至本经》卷首裱纸上的“李氏题记”笔法拙劣,与李氏手迹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李氏题记”的真迹,羽田、佐伯、榎诸氏都无缘亲睹,遑论他人。

---

〔1〕 佐伯好郎《中国に於ける景教衰亡の歴史》,京都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刊行,1955 年。

〔2〕 K. Enoki, *op. cit.*, p. 68.

如今单从照片来定真贋，诚不足为证。但剖析“题记”的行文，却令人难以置信其出自一位清末翰林的大手笔。李氏的藏书题记，业经北京大学张玉范女史整理发表者，已有173篇〔1〕。笔者研读这些题记，深为李氏文笔之洗练、内容之简扼所折服（图16）。至于李氏书于敦煌写本上的题记，更是惜墨如金。以其《志玄安乐经》的题记为例，字仅一行：“丙辰秋日，于君归自肃州，以此见诒，盛铎记。”〔2〕我们几不可增删其一字。再看《宣元至本经》的“李氏题记”，岂可与此同日而语？第1行“景教宣元至本经卅行开元年号”十三字，便纯属废话，因写本明书“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卷”，而开元年号和行数，读者甫视写本，即可了然。至于第2、3行，意思表达得又多叠床架屋。只要把第2行的“稀珍品”改为“稀世珍品”，第3行的“至足宝贵也”，便可全删。如此蹩脚的题记，犹如小学生的作文，焉会出自李盛铎这位光绪十五年己丑科殿试一甲第二名的进士之手！

第五，《志玄安乐经》的李氏题记不仅署“盛铎记”，且钤以私章“李盛铎印”〔3〕，大藏书家谨严之学风，跃然纸上。而《宣元至本经》的“李氏题记”，不仅无署名，且不钤私印，而代之以“麀嘉馆印”这种藏书章，实为牛头不对马嘴。

此外，“题记”第二行的“此稀珍品乃裱经背者”一句，貌似行话，细思却有杜撰之嫌。以一页可书写三十行经文而有绰余的黄麻纸，用于裱经背，在敦煌文书中，恐极为罕见。笔者有幸接触英国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文书原件，所见裱经背者，均系零碎之小纸片，唯裱经帙，方用大块麻纸。此点苟作献疑，质之高明。

#### 四、“李氏”藏书印的考察

以往学者不敢怀疑小岛文书的真实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写本上

〔1〕 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 《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图版六。

〔3〕 同上注。

钤有“李氏”的藏书印。李盛铎藏有大量敦煌文书,早已为世人所熟知<sup>[1]</sup>。因此,凡钤有李氏印鉴的文书,自令人信为真品。然而,李氏死后,“传闻李盛铎的印记都流落在北平旧书店中,店主凡遇旧本,便钤上他的印记,以增高价”<sup>[2]</sup>。另外,藤枝晃教授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曾有人伪造李氏的印鉴,以倒卖所谓敦煌文书。他详细考察了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守屋孝藏搜集的“敦煌写本”,发现钤在上面的“李氏藏书印”字同而形异者竟有多枚,如“木斋审定”印有三种,“木斋真赏”印有四种,“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多达八种<sup>[3]</sup>!而就我们所知,李氏这些藏书印,每种仅有一枚,如“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我们可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看到李盛铎旧藏善本《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所钤真印的样子(图17)。所以我们可以判定,在这些写本上所钤的所谓“李氏藏书印”,有不少属于伪刻。

小岛文书上的“李氏”印记是否也是伪刻,有待专家鉴定。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有李盛铎辑《李木斋印谱》一册,系李氏所辑自己的部分印记,其中有“木斋审定”朱印(图18a)和“李盛铎印”白文朱印(图18b),可资参照。该馆所藏李氏善本书《碧云集》上,印有“麀嘉馆印”(图19),与李氏藏《志玄安乐经》和《宣元本经》上所钤印记相同。我们将《大圣通真归法赞》照片上的“麀嘉馆印”,与《通历》的真迹比较,发现字体不无差异:前者笔划较为粗圆;后者则细方,棱角分明。但既然原件已佚,也就无从作真正的鉴定了。因此,我们只好另觅新蹊,从李盛铎生前用印的习惯来考察小岛文书上的印记。

按李盛铎室名别号很多,有凡将阁、建初堂、甘露籥、庐山李氏山房、麀

---

[1] 关于李盛铎占有敦煌文书事,参看罗振玉《姚秦写本维摩诘经残卷校记序》、饶宗颐《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998—1007页。

[2] 上引苏精文28页注引恽如莘编《书林掌故续编》“古书作伪种种”条。

[3] 藤枝晃《“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について》,《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第7号,1986年。

嘉馆、古欣阁、俚青阁、两晋六朝隋唐五代妙墨之轩、蜚英馆、延昌书库、木犀轩等。由于有这么多斋号,也就有一批与之相应的藏书印。另外,还有私章“李盛铎印”四枚,分别为白文方印、篆书白文小方印、隶书白文小方印、隶书白文中方印,还有“木斋”朱文小方印、“李木斋跋”、“李木斋校”朱文方印;尚有“李氏家藏文苑”、“木斋审定善本”、“木斋真赏”、“木斋审定”等等<sup>〔1〕</sup>,计有二十多枚(图20、图21)。这就是说,种类应有尽有,李氏可以根据书的性质、价值及自己所做的工作性质,分别施印。

李氏在世时,当已注意到防止他人冒名伪造其印。因此,在诸如敦煌写本这样贵重的文献上,都钤以多枚不同的印章。试看《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所刊《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的原卷照片,其上所钤之印有:“敦煌石室秘籍”,照片残半,当为朱文大方印,钤于写本题目之上部;“木斋真赏”朱文小方印,钤于经题“教”与“宣”字中间的空隙处;“李盛铎印”白文小方印,钤于题目之下;“两晋六朝隋唐五代妙墨之轩”,钤于写本首端底部。

该写本还有李盛铎子“李滂”的白文小方印,说明其曾转由李滂收藏。而《志玄安乐经》上揭书虽仅刊出原卷之首尾部照片,但也可见印记多枚:卷首经题下有“木斋真赏”印、“李滂”印;卷末有“木斋审定”印、“麀嘉馆印”,李氏题记下则钤“李盛铎印”。

再比较一下小岛文书上的印鉴。《宣元至本经》的“李氏题记”下钤“麀嘉馆印”。该印又钤于写本卷末的题记之下;卷末题记之上,还隐约可见一小印,当系“木斋真赏”。在这样一个“至足珍贵”的写本上,仅仅钤这么两枚藏书印!《大圣通真归法赞》的情况类似,题目下钤“麀嘉馆印”,卷末上方钤“木斋真赏”印,下方还有一个甚为模糊的“木斋审定”印,仅此而已!

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小岛文书绝不是经李滂出让的,因为没钤其印鉴。至于其他李氏财产继承者有没有钤印的习惯,还有待调查。

〔1〕 参看上引郑伟章、李万健文218页。

## 五、从景教信仰看小岛文书

根据以上的考察分析,小岛文书为李氏遗爱品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而细察文书本身的内容,我们更发现有违反景教根本信仰之处。

“景教”一词,各家的解释虽有差别,但界定其为基督教的一宗,则咸无异议。基督教之宗派,虽不胜其多,但在对上帝的根本信仰上,则无二致:均相信上帝为世界万物的创造主,上帝主宰世界,上帝无形无体无相。唐代之景教,自然也不例外。是以《一神论》<sup>〔1〕</sup>写道:“一切万物,并是一神所作。可见者,不可见者,并是一神所造。”<sup>〔2〕</sup>《序听迷诗所经》<sup>〔3〕</sup>云:“无人得见天尊”<sup>〔4〕</sup>;“天尊容颜似风,何人能得见风”<sup>〔5〕</sup>,“天尊自有神威,住在一处。所住之‘处’,无人捉得”<sup>〔6〕</sup>。此处的“一神”、“天尊”,即系上帝之谓。在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上帝又被称为“无元真主阿罗诃”;在《景教三威蒙度赞》中,被称为“慈父阿罗诃”。“阿罗诃”,据学者们的研究,已确证为唐代来华传教师对上帝称谓的音译,相当于现代汉译圣经中的

---

〔1〕《一神论》写卷,据云出自敦煌藏经洞,后归日本富冈桃华所藏,为唐代景教的早期译经。羽田亨和佐伯好郎对该经做了奠基性的研究。前者有《景教经典一神论解说》,《艺文》第9卷第1号,1918年;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后者在其有关景教研究的多种日、英文著作中一再论及,可以上揭《景教の研究》625—671页为代表。

〔2〕此据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本,1931年版,行3—4。

〔3〕该卷亦被认为出自敦煌藏经洞,后归日本高楠顺次郎所藏,为唐代景教的早期译经。研究该卷的奠基性著作,系羽田亨《景教经典序听迷诗所经に就いて》,载《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京都,1926年;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该文有钱稻孙汉译本,载《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6号,1929年,433—456页。

〔4〕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本,行5—6。

〔5〕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本,行6—7。

〔6〕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本,行15—16。

“耶和华”〔1〕。《大圣通真归法赞》违背上帝无形无体相的信条，竟然用“皎皎玉容如日月”来形容阿罗诃〔2〕；而《宣元至本经》则称“法王善用谦柔，故能摄化万物，普救群生”云云，上帝处于与圣徒平起平坐的位置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岛文书的作者，实际上对唐代景教教义不甚了然。

根据我们的比较研究，《大圣通真归法赞》乃模拟《尊经》和《三威蒙度赞》写成。其题目系从《三威蒙度赞》衍化出来，以“大圣”取代“三威”，以“通真归法”替换“蒙度”，意思均无大别〔3〕；而首句“敬礼大圣慈父阿罗诃”，则是脱胎于《尊经》的首句“敬礼妙身皇父阿罗诃”；经文末三行的瑜罕难法王名及三部经名，更是直抄《尊经》文句。至于余下的其他诗句，所表达的意思也多与《三威蒙度赞》相类似。《宣元至本经》一名，当取自《尊

〔1〕“阿罗诃”为叙利亚语 Aloha 的汉字音译，意即上帝，相当于希伯来语的 Eloh 或 Elohim。自景教碑发现以来，许多研究者都持这种看法，应视为定论。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等英、日文著作，即以此传统观点解释该词。《史学杂志》第 52 编第 4 号，1941 年，473 页《佐伯好郎学位请求论文〈支那に於いて近頃発現せらなたる景教經典の研究〉（英文）审查报告》也肯定了这一解释。P. Pelliot et J. Dauvillier, *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 II. 1: La Stele de Si-ngan-fou, Paris 1984, p. 16 也采用同样看法。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1940 年，34 页曾引录李之藻将景教碑和基督教义的比较，认为“无元真主阿罗诃”即是“上帝耶和华”；周联华《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台北，1975 年，34—35 页将景教的词句与基督教的习惯用语比较，认为“无元真主阿罗诃”即“永生神耶和华”，“慈父阿罗诃”即“慈悲的天父耶和华”。

〔2〕佐伯好郎在《清朝基督教の研究》中，把该句解释为“耶稣的变貌，即显圣容”；把整篇赞文考证为“今日东西教会在称为‘耶稣变貌日’或‘耶稣显圣容日’的祭日里所唱赞美诗”（见第 54 页）；而在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1951) 中，把“通真归法”译作“the Transfiguration”（314 A 页）。此说实极勉强。按全诗所提到的“慈父阿罗诃”、“大圣法皇”、“大圣慈父”等，从行文意思看，均指上帝。而唐代景教文献对耶稣的称谓，如“弥师诃”、“翳数”、“大圣子”等，诗中全无。如是怎能说是对耶稣的赞诗呢？

〔3〕方豪《中西交通史》第 2 册，台北，1953 年，217 页云：“‘三威’即今称‘圣王’，言三位一体也。‘蒙度’者，仰望救赎也。”吴其昱先生肯定了这一看法，见所撰《景教三威蒙度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7 本第 3 分册，1986 年，413 页。

经》，但内容全与景教无关，纯系模拟，甚至赤裸裸地抄袭道家经典〔1〕。如此作品，怎能视作景教经呢？！

## 六、从唐代基督教史看文书题记

既然从内容看，小岛文书也不可能出自唐代基督教徒之手，那么，文书具有“开元年号”和“沙州大秦寺”等字样的题记，当系自撰无疑。

传入唐朝的基督教，其寺院最早称为波斯寺，至天宝四年（745），始改称大秦寺。对此，唐朝官方文献的记载十分明确。《唐会要》卷四九载天宝四载九月诏：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者亦准此。

证之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第十五行至十七行的记述，完全吻合：

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于是天题寺榜，额戴龙书；宝装璀璨，灼烁丹霞。睿札宏空，腾凌激日。

教内教外的记载如此一致，应是不争之铁案〔2〕。而论者由于小岛文书题

---

〔1〕 羽田亨在《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及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残卷について》中认为，该经“酷似《老子道德经》，有些句子直接抄自该经第六十二章”；就此，日本学者西胁常记更详加考证比较，见氏著《“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残卷について》，刊《禅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5号，1988年12月，京都，107—136页。

〔2〕 羽田亨在《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及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残卷について》中，最早对开元年间有大秦寺说提出质疑。最近，池田温教授从写本题记研究的角度，也认为题记系伪作，见所著《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1990年，289页，No. 813；292页，No. 826。榎一雄上引文力图把两写本产生的年代推到与景教碑同样的时代（781年前后），认为当时的景教徒为了把沙州大秦寺的历史提前到开元时代，故意在题记上署了开元五年和八年的日期。按781年正是景教在唐朝兴盛的时期，没有利用这种方法以壮大本教势力的必要，其说似不可取。



记的误导,竟信开元年间,甚至上溯开元之前,沙州便已有大秦寺。其实,倘若沙州早已率先称景教寺院为大秦寺,其他诸州也应同样流行,因为大秦寺的称谓显然比波斯寺一名准确高明,如此又何劳唐玄宗来下诏改名;沙州若果真早有大秦寺,在已刊布的大量开元及开元以前的敦煌出土公私文书中,却一无旁证<sup>〔1〕</sup>;特别是著名的《沙州图经》,将同为西亚来的祆神祠庙记录在案<sup>〔2〕</sup>,如果当地还有大秦寺,编者焉能视而不见?再者,被视为唐代景教早期译经的《一神论》,也仅言及与波斯、拂林的关系,并无大秦之谓<sup>〔3〕</sup>,若其教徒欲以其教之发源地名寺,如不用波斯寺名,则必用“拂林寺”;方顺理成章。因此,我们认为题记中的开元年间沙州大秦寺,实为子虚乌有。

## 余 论

观古今中外历史,伪造书画文物,以假乱真,长期蒙蔽世人者,其个案不胜枚举。就中国传统手工艺而言,这种贗造伪制,不过是雕虫小技之事。而小岛文书的制作者显然是这一行当中的高手:其字体摹仿唐写本,如此逼真,以致几十年来,未闻有人能指出其破绽;对于唐人的避讳习惯,制作者也显得颇为谙通,欲“因犯讳或避讳来断其为伪撰”,实亦不易<sup>〔4〕</sup>。文书的抄写

〔1〕 吴其昱上引文认为《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写本尾部所残半印,系“大秦寺”三字。笔者曾细察原件,确如吴氏说。按,据写本最后跋语中“唐太宗”一词,知为五代所写。是故,归义军后期,沙州当有大秦寺。

〔2〕 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74年。

〔3〕 《一神论》云:“喻如从此至波斯,亦如从波斯至拂林,无交界时节。”“为此自向拂林,寄悉在时。”“欲此诸王等圣主,谁向拂林,谁向波斯。”“所以一切拂林,如今并礼拜世尊。”

〔4〕 榎一雄上引文从避讳字来论证写本年代当晚于开元年间,可资参考。但唐人之避讳,并非如此严格,详参陈垣《史讳举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王叔岷《古书中的避讳问题》,《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7期,1989年,3—24页。

形式,虽不乏可疑之处〔1〕,但也难以就此遽定其真伪。不过,贗制者对于杜撰唐代景教文献、李氏题记等所需的背景知识,则远为不足,故我们不难发现其间之漏洞。根据这些情况判断,我们认为小岛文书很可能是某一或某些古董商人在李盛铎去世后伪造出来的。

综合本文所揭示的种种疑点,我们至少可以说:从严谨的科学态度出发,对于名为小岛文书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这两件写本,我们不能轻信其为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代景教文献,也不应在有关景教史或敦煌史的研究中无条件地引以为据。

附记:本文初稿系我们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英国图书馆访问期间所撰。在撰写和随后的补充过程中,蒙饶宗颐教授、池田温教授、张玉范女史、徐文堪先生等诸多鼓励帮助,刘方女史在北京代查大量资料;文成后,项楚先生、姜伯勤先生又惠予斧正,谨此向以上诸位衷致谢意!

(与林悟殊合撰,原载《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19—34页;收入本书时,把补记改入正文,增订本图版略作调整。)

---

〔1〕《大圣通真归法赞》对“大圣法皇”和“瑜罕难法王”采用平阙。据《唐六典》及敦煌发现的唐《天宝职官表》(P. 2504)所收《新平阙令》和《旧平阙式》(见 T. Yamamoto et al.,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A), Tokyo 1978, p. 45),唐人在草写表状笺启等公文书时,需依平阙之式,但“泛论古典,不在此限”,故敦煌发现之官私文书,多用平阙,而四部古籍、佛典、道经,则不用平阙,摩尼教经和已确认的景教经如《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均无平阙。《通真归法赞》的抄写格式,或许受到清代严格的平阙制度的影响。

## 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

作为敦煌写卷的伪造者,李盛铎不仅在中国非常有名,而且最近更名扬海外<sup>[1]</sup>。然而,迄今还没有人能够讲清楚李盛铎伪造写卷的细节,也没有人提出过任何直接的证据。本文尽可能地利用已发表的文献材料和笔者在海内外的调查结果,就有关李盛铎收藏的敦煌真本和所谓李盛铎所造的伪卷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不妥之处,尚乞方家指正。

### 一、李盛铎藏卷的来历

李盛铎(1858—1937),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人。1889年中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史馆协修。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京师大学堂总办。1898年署理使日钦差大臣。回国后历任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府丞,署理太常寺卿,考察宪政大臣。1905—1906年任驻比利时钦差大臣,获英国剑桥、牛津两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09年回国。1911年2月任山西提法使;11月晋布政使;12月署理巡抚。后袁世凯聘为总统府政治顾问,历任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参议院议长等。1920年以后退隐不问政事。

---

[1] Akira Fujieda,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I, *Zinbun*, 9, 1966; 藤枝晃撰,徐庆全、李树清译《敦煌写本概述》,《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101页,114页注[45]。Dalya Alberge, "Hundreds of fakes found in library's Chinese collection", *The Times*, Monday June 23 1997, 7.

李家累世藏书,多有秘籍。李盛铎出使日本时,得日本目录学家岛田翰之助,购得许多日本朝鲜古本。编有《木犀轩书目》、《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德化李氏行笈书目》,其藏书题记由后人编成《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sup>〔1〕</sup>。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1910年,当甘肃解送入京之敦煌写卷抵达北京后,先入甘督何彦升子鬯威(震彝)手。李盛铎是何鬯威岳丈,故得与何氏等一起截取佳品。敦煌学界的这种说法主要是受罗振玉的影响。罗振玉《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解残卷校记序》云:

明年(宣统二年,1910),由署甘督毛公(毛实君,庆蕃)遣员某运送京师,既抵春明,江西李君(李盛铎)与某同乡,乃先截留于其寓斋,以三日夕之力,邀其友刘君(刘廷琛)、婿何君(何鬯威)及杨君(?)、方君(方地山,尔谦),拔其尤者一二百卷,而以其余归部(清朝学部)。李君者富藏书,故选择尤精,半以归其婿,秘不示人。

岁壬戌(1922),予自海东移寓津沽,则何君已物故,乃尽得其所藏数十卷。<sup>〔2〕</sup>

其说可能来自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条:

时护甘督何彦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复悉为所留。其妇翁李盛铎,且分得唐人所写《礼注》、《书经》等,尤可宝贵。凡与何子相契者,无不得之,有分至数百卷之多者,故厂肆出售不绝也。<sup>〔3〕</sup>

此说虽起于稗史,但流传极广。饶宗颐《京都藤井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

---

〔1〕 关于李盛铎生平,参看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文献》第3辑;收入《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郑伟章、李万健《李盛铎与木犀轩》,《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苏精《李盛铎木犀轩》,《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2〕 罗振玉《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解残卷校记》,1927年。

〔3〕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78页。

记下了京中故老间的这则传说：

友人张虹闻诸故京老辈云：何彦升于宣统二年官甘肃藩司，代理巡抚，当其任内，适学部咨陕甘总督调取敦煌经卷，著何氏收购到京。抵京后何氏先交其子鬯威（名震彝）。时官中册数，报有卷数而无名称及行款字数，故一卷得分为二三，以符报清册之卷数。何鬯威为李木斋盛铎之婿，故菁英多归李氏及何氏，李之亲家刘廷琛与其亲友亦分惠不鲜。<sup>〔1〕</sup>

事实上，问题并不那样简单。罗继祖所得吴昌绶《松邻书札》中，有致张祖廉一札，信中云：

顷鬯威（何震彝）同年来，谓访公未值。有言托为代致，甘肃解经之傅委员，淹留已久，其事既无左证，又系风流罪过，今穷不得归，日乞鬯威为道地。弟闻事已了，堂宪本不深求，可否仰仗鼎言，转恳主掌诸君，给批放行？其批即由公交鬯威亦可。渠既相嘱，特为奉致，望径复之。<sup>〔2〕</sup>

信中颇多隐语，但可知甘肃押解敦煌经卷的傅姓委员有罪被留住，何震彝找张祖廉为其说项，希望把他放了。张祖廉时任学部总务司行走，所以何氏找他走后门。所谓傅委员名叫“傅宝书”，他和武相臣一起受命押解经卷入京<sup>〔3〕</sup>。

在1910年敦煌经卷从甘肃运抵北京后不久，日本京都大学派遣了内藤虎次郎等五名教员，前往北京调查敦煌文献，在清学部看到约七百卷写经。他们回国后作了一些报道，把一些写本全卷或部分的照片提供给松本文三郎氏研究。松本文三郎《敦煌石室古写经之研究》一文中列举了这些写经的名称和有年代写本的题跋<sup>〔4〕</sup>，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所提示的写经都是

〔1〕 《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1000页。

〔2〕 罗继祖《敦煌藏卷劫余小记》，《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又同作者《枫窗脞语》，中华书局，1982年，136页。

〔3〕 见周廷元《编目赘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稿本。

〔4〕 松本文三郎《敦煌石室古写经の研究》，《艺文》1911年5月—6月号；收入《仏典の研究》，东京丙午出版社，1914年，118—125页。Cf. M. N. Peri, “Une mission archeologique Japonaise”, *BEFEO*, 11, 1911, 172-186.

后来著录于《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详下)的李盛铎藏卷<sup>[1]</sup>。既然京大教员在学部看到的经卷后来到了李盛铎的手中,可知李氏等人实际上是在经卷入学部后才攫取到手的。李盛铎当时从国外回来,尚未外放,在学部任职;刘廷琛也是学部大臣,故此近水楼台,监守自盗。大概事情暴露,学部侍郎宝熙上告,所以扣住傅委员,以作替罪羊。但何氏还是怕事情扩大,所以托张祖廉说项放人。此事后果不明,很可能因为辛亥革命爆发,事情也就没人过问了。

现在看来,李盛铎更可能是从学部直接获得敦煌写卷的,他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所得多为佛经以外之四部典籍、景教文献及公私文书,数量质量均堪称私藏敦煌写卷第一家。试检《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就可知道他选择之精。因此,我们应当承认,李盛铎藏有直接来自藏经洞的真本写卷,而且他所得到的是一批精华。

## 二、李盛铎藏卷的去向

大概因为来历不光彩,李氏除自己研究外,很少将所藏卷子示人。他曾在自己所藏明嘉靖刻世德堂六子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一书上,写有如下题跋:

家藏有唐人写本,自“上善若水”起,至篇末,皆完具,当取校之。

辛酉(1921年)元日,盛铎。<sup>[2]</sup>

这是他本人使用所藏敦煌文书的例子。另外,罗振玉曾刊其所藏《唐律疏议》杂律下于《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中。日本羽田亨因徐森玉之介,于

---

[1]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已经对证出这种关系,唯未深究,见 Nos. 167, 222, 310, 520, 604, 625。另外,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和北京大学都藏有一批摄制年代很早的照片,与松本氏所记录的写卷大多相合,也是后来入了李家的写卷,但其上还没有后来钤上的李氏藏书印。

[2] 原书藏北大图书馆善本部,见《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27页。

1928年至天津李氏寓所,见到《志玄安乐经》、《道德经注》、《汉书》、《唐律》等四卷〔1〕。

正是因为李盛铎藏敦煌卷子非常有名,所以,叶恭绰于1921年11月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时,李盛铎与同为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大家的王树枏和罗振玉,都是主要的参加者〔2〕。辑存会的初衷,是想广搜海内外藏卷编目印行,因之有英法藏卷的翻译和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敦煌劫余录》的编印,但私家往往不愿意公布所藏,故此辑存会后来也就不见活动了。但李盛铎作为成员之一,其家藏敦煌卷子之精好,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了。1919年9月20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就说到:

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笈,闻之神往。甘露二年写经,君楚疑为苻秦时物,亦极有理。景教经二种,不识但说教理,抑兼有事实,此诚世界宝籍,不能以书籍论矣。〔3〕

说明当时的文人学者,已经知道李氏藏卷的一些情况。

李盛铎晚年因涉官司,藏卷始由子女分次售出。1935年12月15日及21日《中央时事周报》,刊有《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此目底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题《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见附录)〔4〕,审其笔迹,出自盛铎子李滂之手。此目共著录敦煌写本432号,李氏所藏精品都在其中。据报称,这批写本以八万元日金售诸日本,但迄今我们没有见过这批材料的原貌,似说明它们没有打散,因为其中的写卷没有出现在其他任何藏家

〔1〕《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1958年,272页。

〔2〕《叶遐庵先生年谱》民国十年十一月条,遐庵汇稿年谱编印会,181页。

〔3〕王国维《观堂书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7页。

〔4〕我推想《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四就是王重民先生雇人抄录的这个目录,但抄手不够认真,有不少错误。现据原稿本重录一过,作为本文附录发表,为进一步调查李氏藏卷的基础。我应借此机会感谢张玉范女史提醒我注意这份材料并予以发表。

的藏品中,但一直未曾公布,亦不知藏于何处。在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中,有一些羽田氏留下来的照片,我们把其上所钤李盛铎的印鉴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宋元善本书上的同一印鉴做了对比,再与上述目录勘同,可以判断出是摄自这批写本,表明这批写本售到日本时,羽田亨曾加以研究。

另外,《学觚》第1卷第7期载《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五据传抄本所载《李木斋旧藏敦煌名迹目录》第一部分,大多不知下落,只有后者中的几个写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同《索引》散录六所载《李木斋旧藏敦煌名迹目录》第二部分(据传抄本),现多已转归上海图书馆收藏<sup>[1]</sup>。叶恭绰《寄传庵敦煌图录序》:“金知李、刘二氏多佛经以外之典籍,偶露鳞爪,难窥其秘也。近年李、刘皆去世,所藏始分别散出,余首介绍‘中央图书馆’购入二百余卷。李所藏由家属析分各售,不复能聚。”<sup>[2]</sup>然而,据潘重规《“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和我本人1996年11月的亲自调查,台北藏卷中没有带有李盛铎任何印鉴的卷子<sup>[3]</sup>,这似与李氏收藏习惯不符,也说明叶恭绰所介绍的写卷并非李氏藏卷的真品或核心部分。

数年前,笔者和林悟殊先生为追踪小岛靖所获所谓敦煌景教文献的来历,曾详查李盛铎去世前后家中藏敦煌卷子出售于日本和善本书售诸北大图书馆的情况<sup>[4]</sup>,此不赘述。通过这番考察,我们倾向于认为,李盛铎所藏的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真品,即《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所著录者,已售诸日本某氏。至于此目之外的标明为李家藏卷者,不论标者是李家后人还是其他人等,或者带有李氏藏印的各种真伪藏卷,都难被视作李盛铎旧

[1] 见吴织与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93—107页;同上刊1986年第3期,89—101页所著录的相关条目。

[2] 张虹《敦煌图像徵考录》,香港弘道艺术院,1963年,5页。

[3] 潘文载《敦煌学》第2辑,1972年,1—55页。

[4] 林悟殊与荣新江《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香港《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学专号,1992年,19—34页;英文缩写本“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wo Nestorian Christian Documents Unearthed at Dunhuang from the Li Collection”,载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1.1, May 1996, 5-14.



藏的真敦煌写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氏的藏书印问题。从羽田亨所摄李氏真卷来看,李盛铎喜欢在藏卷上钤印,主要有“敦煌石室秘籍”、“两晋六朝隋唐五代妙墨之轩”、“李印盛铎”、“木斋审定”、“木斋真赏”、“麀嘉馆印”、“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等,除前两方为敦煌写卷专用外,其他印文都见于北大图书馆善本部的李氏善本书上。可惜的是北大在李盛铎死后收购其藏书时,没有把其印章一同购买。恽如莘《书林掌故续编》记载:

传闻李盛铎的印记都流落在北平旧书店中,店主凡遇旧本,便钤上他的印记,以增高价。<sup>〔1〕</sup>

李家的善本书有名,可以增值。李家的敦煌卷子更有名,因此也就有了大量印有李盛铎印的敦煌卷子出现。

藤枝晃先生,曾经对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敦煌写本上的“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做过细心的调查,发现同一印鉴有八种样子,再结合纸质和书法,全面否定这个收集品中大多数写本的真实性<sup>〔2〕</sup>。1990年他带我和Lancaster教授同访该馆时,曾明确表示只有上元二年(675)写的《妙法莲华经》一件是真品,其他皆为伪物。对此,池田温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也把大部分守屋收集品的纪年题记列为疑伪品<sup>〔3〕</sup>,但并非全部<sup>〔4〕</sup>。

### 三、所谓李盛铎藏卷的真伪判别

李盛铎家中有敦煌真卷,是引发牟利者托其名以造假的根源所在。李

〔1〕 转引自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28页。

〔2〕 藤枝晃《〈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について》,《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第7号,1986年,153—173页。

〔3〕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Nos. 28, 29, 58, 61, 76, 81, 93, 108, 112, 149, 171, 192, 197, 243, 275, 290, 289, 322, 441, 457, 460, 519, 642, 643, 769, 831, 916, 2034。

〔4〕 同上, Nos. 260, 308, 607, 639, 646, 695, 871, 1347, 1794, 2186。

盛铎印鉴的流失,为这种造假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造假者可以用真印印在伪卷上,也可以模造一个假印印在价值本不高的真卷上,以李家真卷的名来求得高价。从李家保存到李盛铎死后并连同善本书一起售诸北大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来看,如果那时已有伪卷的话,李盛铎及其子李滂是不会把伪卷混入其家藏真品中的。我们也找不到李盛铎本人造伪卷的直接证据,学界风传李盛铎家有造伪卷的作坊,主要依据实际是许多伪卷上多有李氏藏书印,但这并不能说明印是何时印上去的。

有关藏书家周叔弢的一段往事值得注意,因为他与李盛铎同在天津又同样有名。周叔弢子周珏良《我父亲和书》一文记:

1941年辛巳,在天津出现了一批颇像从敦煌出来的草书帖、书籍(如《论语》)、文书等等,往往还有李木斋的收藏印。他(指周叔弢)当时用大价钱买了近十种,后来仔细研究,看出是双钩伪制,并请赵万里先生看过,也认为不真。在看准了之后,他毫不犹豫,说这种东西不可留在世上骗人,就一火焚之,费了多少钱,毫不顾惜。

他在注文里又说到:

伪造敦煌藏品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当时天津有一陈某,听说是李木斋(盛铎)的外甥,见过李氏所藏的敦煌卷子。他精于书法,所以造了不少假东西卖钱。我曾见过一卷近一丈长的仿隋人写经,若不仔细看,几可乱真。……现在流传到海外的所谓索统写本《道德经》,从字迹上看来,也很可能出自此君之手。<sup>〔1〕</sup>

这个陈某叫陈益安。雷梦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宏雅堂条云:

陈益安,久居天津,原籍不详。陈是宏雅堂的常客,他对古旧书伪造上有两种技术特长:其一,仿唐人写经,其书体精美逼真。其做法是,

---

〔1〕 载《文献》第21期,171、175页;收入《周珏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298—299、303页。

用由敦煌盗出之唐人写经纸和旧墨及其书仿之,以假乱真程度实难查出破绽。其二,用印色钩摹藏书名家之印字框逼真。张曾售出过陈氏伪造唐人写经,京、津、沪受其骗者不少。周叔弢也曾买过几卷唐人写经,但周发现中有贗品,即将其烧掉。<sup>〔1〕</sup>

现在看来,托李氏名而造的敦煌伪卷,主要是出现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除周珏良文所举者外,1943年入手的小岛文书也是一明显的例子。周文注中提到的索统写本《道德经》,其真伪是迄今争论不休的一个著名写卷<sup>〔2〕</sup>。据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所见实物,卷后第一首跋文出自画家黄宾虹之手,写于“戊子”,即1948年,若真如周珏良所判断,是出自陈某之手,则造伪年代也是相符的。

敦煌写本的真伪鉴别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写经本身、题记和收藏印是三个应当分别考虑的因素,有的三者全是真的;有的写经是真,而题记、印章是假;有的印章是真,而写经是假;有的三者全是伪造。以上就李氏藏卷的真品和伪物加以分别,可以明确以下几点事实:第一,李盛铎曾从刚刚自甘肃押解入京的敦煌写经中取其菁华,因此其家藏有敦煌真品自无疑义,而且李氏本人是有名的藏书家,善于检选,故其所取敦煌写卷中不乏精品。第二,李氏去世前,为还债务,已将家藏最好的写本整批售出到日本,这批写本迄今似未分散,但也没有公布过。第三,李氏死后,其藏书印落入书商之手,一些书商把真印钤在假卷子上,借李氏名声以求高价。第四,由于李家藏有真品广为人知,而其出售写本一事又曾在报纸上广为宣传,所以最易为伪造贗

〔1〕《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1990年,67页。

〔2〕饶宗颐《吴建衡二年索统写本〈道德经〉残卷考证》,《东方文化》第2卷,1955年,1—71页;F. Mote, “The Oldest Chinese Book at Princeton”,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I. 1, 1986, 34-44;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1990年,72页, No. 16; 王素《西晋索统写〈道德经〉残卷》,《中国文物报》1994年4月3日第3版; W. G. Boltz, “Note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o Tan Manuscript of the *Lao-tzu*”, *BSOAS*, LIX. 3, 1996, 508-515.

品者钻空子,其做法之一就是伪造李氏印鉴,利用人们对李家藏品的信任来牟取暴利。基于以上认识,再来看一些散藏的收集品,我们不否认伪印的事实,但这还不能证明卷子本身也是伪造的。有些卷子纪年较早,使人颇感怀疑。但有些世俗文书,是今人很难伪造的。中日收购写卷者也多从书法角度着眼,所以造伪者多写佛经或四部书。

总之,从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来看,判别一个写卷的真伪,最好能明了其来历和传承经过,再对纸张、书法、印鉴等外观加以鉴别,而重要的一点是从内容上加以判断,用写卷本身所涉及的历史、典籍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它。我们不应轻易否定有价值的写本,也不能把学术研究建立在伪卷基础上。

### 附录: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

- 一 摩诃衍经第八 魏大统八年
- 二 维摩义记第二 甘露二年
- 三 十戒经 首尾全 至德二载
- 四 华严经第廿四 延昌二年 有蓝印
- 五 未曾有因缘经卷下 开皇十一年官书
- 六 妙法莲华经卷四 上元二年十月廿八日门下省群书公孙仁约写
- 七 妙法莲华经卷五 仪凤二年正月秘书省书手田玄徽写
- 八 解深密经卷七 贞观二十二年
- 九 妙法莲华经卷六 上元三年十一月群书手赵如璋
- 十 妙法莲华经卷一 证圣元年五月
- 十一 法苑行仪一卷 开皇廿二年五月僧光远行书
- 十二 金刚经一卷 咸亨三年五月左春房(坊)楷书吴礼写
- 十三 景教志玄安乐经
- 十四 论语三纸

- 十五 毛诗三纸  
十六 左传  
十七 礼记二纸  
十八 尚书  
十九 庄子让王篇  
二十 唐律  
二十一 口疑论第二 万岁通天元年 行书  
廿二 昌道文 同光三年五月  
廿三 三界寺受戒李憨儿牒 甲午年  
廿四 敦煌县龙勒乡户册 天宝八载  
廿五 仓夫令狐良嗣牒 天宝八载  
廿六 三界寺住奴戒牒 太平兴国八年  
廿七 史喜酥卖马文契 癸未年  
廿八 赵盐久卖田契 广顺二年  
廿九 开蒙要训一卷  
三十 王梵志卷一 辛巳年十月  
三十一 霄夜图序 背有武后字写经  
卅二 驿程记  
卅三 孔子见项橐  
卅四 牧群册 乙未年十月 有官印  
卅五 知马驼官日行簿 丙申年四月 有官印  
卅六 支应册 开元十六年  
卅七 算学  
卅八 十六国春秋 后录骈文  
卅九 孝子传 背写经  
四十 本草 背写历日  
四十一 戊寅年历日

- 四二 天文占  
四三 换鬚髮方  
四四 阴阳书 占鬼呼人第廿八 占狐鸣第廿九  
四五 妙法莲华经卷四 上元三年群书手马元礼写  
四六 妙法莲华经卷三 上元三年九月群书手王章举写 带轴一  
四七 金刚经卷 天祐三年四月写 董押衙持念  
四八 金刚经卷六 光化三年  
四九 琴谱  
五十 类书  
五十一 千字文  
五二 大云寺牒 雍熙五年十月  
五三 吴安君分家书 天复八年十月  
五四 墨印佛像  
五五 藏经目  
五六 佛经音义 背有太平兴国字  
五七 秦妇吟  
五八 天福九年具注历日签  
五九 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 李林甫撰 止有书名而书佚  
六十 诸星母陀罗尼 壬戌年正月廿七沙弥宝贞书  
六十一 文书勘印底簿 索贞固 有印  
六二 宋德子借布契 酉年九月十五 纯(纆)骨萨部落  
六三 神□(沙)乡百姓吴山子借麦契  
六四 李山卖屋契  
六五 □□寺历 癸未年十二月至甲申十二月都僧统大师字样  
六六 弟兄分家契稿 太平兴国九年 背大宝积经  
六七 法律理通等寺历  
六八 酒户张盈子记数簿

- 六九 雇人史章口种地契  
七十 道场布施簿  
七十一 目连传七字句小说 背有僧太上父叔状  
七二 十六国春秋 背道家疏  
七三 金刚经册 西川戈家真印本钞出 后阎罗王授记经  
七四 未画成佛像一纸  
七五 佛名释  
七六 比丘僧法邻道场疏 背衬施帐  
七七 书状稿  
七八 残经  
七九 八阳神咒经 残  
八十 佛名经残字  
八十一 残经疏  
八二 都僧统悟天(真)道场文 行书甚长  
八三 法门名义集序 前附普贤华严经五乘观门  
八四 佛说照明菩萨经 六朝人书  
八五 残经  
八六 佛说千手千眼经中卷  
八七 残梵网经  
八八 残法华经 纸腐  
八九 佛名经  
九十 大方广华严十恶经  
九十一 佛说八阳神咒经  
九二 菩萨戒  
九三 佛母经  
九四 唐三藏哭(奘)西天行记一卷 前另写经疏 背亦有  
九五 佛说长爪梵志请问经一卷 尾全

- 九六 佛说咒魅经一卷  
九七 佛说诸法本经一卷  
九八 佛说行七行现报经一卷 背有真言  
九九 胜幢臂印陀罗尼经一卷  
一百 经疏 尾全  
一百一 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五 卷首附有心经 存卷尾十一行  
百二 观音经 尾全  
百三 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五 存卷首数行 惟首有行签可宝也  
百四 观音经 尾全  
百五 观音经 尾全  
百六 观音经 尾全  
百七 观音经 尾全  
百八 大般涅槃经卷上 尾全  
百九 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三 首尾全 精写 唐初  
百十 大般涅槃经卷三十四 尾全 精写 唐初  
百十一 大般涅槃经卷三十六 尾全 精写  
百十二 大般涅槃经卷三十六 首尾全  
百十三 大宝积经卷一百十八 尾全  
百十四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尾全  
百十五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尾全  
百十六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尾全  
百十七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尾全  
百十八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尾全  
百十九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首尾全  
百二十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首全  
百二十一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尾全  
百廿二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尾全



- 百廿三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尾全  
百廿四 残妙法莲华经 首尾缺 (卷四)  
百廿五 残妙法莲华经 首尾缺 (卷四)  
百廿六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尾全  
百廿七 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尾全 卷中眉间有梵文一行  
百廿八 残妙法莲华经 首尾缺 六朝人精写 (卷四)  
百廿九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尾全  
百三十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首全  
百卅一 灌顶经卷第十一 尾全  
百卅二 般若波罗蜜光赞经卷第九 尾全  
百卅三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尾全  
百卅四 究竟大悲经卷第四 首尾全  
百卅五 沙弥尼离戒文 尾全  
百卅六 金光明最胜王经 首尾缺  
百卅七 首罗比丘经一卷 尾全  
百卅八 大佛顶经卷四卷五 卷四末起  
百卅九 残经卷 中有朱校一行  
百四十 删补随机羯磨 首尾全  
百四十一 金刚波若波罗经传外传中卷 尾全  
百四十二 首罗比丘经 尾全  
百四十三 十轮第四 尾全  
百四十四 异部宗轮一卷 尾全  
百四十五 持人菩萨经 第四品末起至第八品止 精写  
百四十六 贤劫经卷五 首尾全  
百四十七 金刚三昧经 首尾全  
百四十八 集一切福德经卷三 尾全  
百四十九 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尾全

- 百五十 残经卷 卷中有胭脂水渍一块
- 百五十一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之第二 京兆崇义寺沙门释道宣撰 一大厚册 共计九页 首尾全
- 百五二 父母恩重经 首尾全
- 百五三 四分戒本疏第二 尾全 背写有残经
- 百五四 因缘论开决记一卷 大乘四法经论一卷 大乘四法经一卷 首尾均全 背有草书残经疏
- 百五五 六根赞 十空赞 阿弥陀经赞 维摩赞 一卷 全
- 百五六 时非时经一卷 尾全
- 百五七 毗尼心一卷 尾全 (文与四分戒相似)
- 百五八 新杂卷一 尾全
- 百五九 大方等大集月藏经卷六 尾全 精写
- 百六十 思益梵天经卷二 尾全
- 百六十一 胜天大(王)般若波罗密经卷第三 尾全
- 百六二 大通方广经卷中 尾全
- 百六三 残经卷
- 百六四 佛说无量寿慈教经一卷 尾全
- 百六五 佛说灌顶普广菩萨愿往生十方净土经第十一 尾全
- 百六六 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第一 尾缺
- 百六七 思益经卷三 尾全
- 百六八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百六十九 首全
- 百六九 大方等集经贤护菩萨所问经卷二 首尾全
- 百七十 萨婆多毗尼 尾全 末有善一吟供养 一校竟二行 背有辨中边论第一 尾缺 晋人写
- 百七十一 残经卷
- 百七二 维摩诘所说经 首尾全 背有梵文二三字 又有寺历
- 百七三 维摩诘所说经 尾全 密行小字

- 百七四 大方广佛庄严经卷第卅 尾全
- 百七五 佛名经第十一 尾全
- 百七六 佛名经第十一 尾全
- 百七七 残经
- 百七八 六门陀罗尼经一卷
- 百七九 华严经卷五十 尾全
- 百八十 究竟大悲经第四
- 百八十一 佛名经 首尾缺 精写
- 百八二 诚实论义记卷四 尾全
- 百八三 瑜伽师地论卷第十一 尾全 有朱笔点句校字
- 百八四 诵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灵验记一卷 首尾全
- 百八五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一卷 尾全
- 百八六 大乘四法经一卷 首尾全
- 百八七 大乘五蕴论一卷 首尾全
- 百八八 佛说无量寿观经一卷 尾全
- 百八九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六手记初 首全
- 百九十 佛说阿弥陀经一卷 首尾全 油纸精写
- 百九十一 金有陀罗尼经一卷 首尾全 末题有薛淑二字似写经人  
又有梵字一行
- 百九二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 首尾全 首附有金光明经传
- 百九三 金光明经卷第三 尾全 末附有音义一行
- 百九四 药师经 尾全
- 百九五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九十 尾全 全卷下半截残
- 百九六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尾全 油纸书
- 百九七 劝善经一卷 首全 存二块
- 百九八 大吉祥天女经一卷 尾全
- 百九九 大灌顶经卷第七 尾全

- 二百 佛说灭十方冥经 尾全
- 二百一 佛说不增不灭经一卷 尾全
- 二百二 佛说阿难问事佛吉凶经 首全
- 二百三 佛说无量大慈教经一卷 尾全 首以六朝人写小字卷配全
- 二百四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六百 尾全
- 二百五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首尾全 背有地藏菩萨本愿经分身集会第二 首全
- 二百六 大乘入楞伽经卷第五 尾全
- 二百七 大智度经卅六 尾全
- 二百八 十地论初欢喜地第一 尾全
- 二百九 十地论初欢喜地第三 尾全
- 二百十 大智度论卷第十二 尾全
- 二百十一 佛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 首尾全
- 二百十二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廿一 尾全 精写
- 二百十三 佛本行集经卷 九 尾全
- 二百十四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一 尾全
- 二百十五 佛说八阳神咒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十六 佛说斋法清净经一卷 首尾全
- 二百十七 诸星母陀罗尼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十八 佛说延寿经一卷 尾全 首稍缺
- 二百十九 佛说回向轮经一卷 尾全
- 二百二十 佛说弥勒成佛经一卷 尾全
- 二百二十一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廿二 佛说要行舍身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廿三 佛说罪要行法经一卷 翻经三藏法师义净撰 首全 红阑
- 二百廿四 金刚陀罗尼经一卷
- 二百廿五 正法念处经卷二 后魏三藏菩提留支译 首全

- 二百廿六 佛母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廿七 沙弥五德十数一卷 附每十五日于大僧边乞欢喜文 前另  
写他经
- 二百廿八 残经卷
- 二百廿九 佛说要行舍身经一卷 尾全
- 二百三十 佛说父母恩重经一卷
- 二百三十一 中阿含经 首全 背面全写有轨仪
- 二百三二 阿弥陀经一卷 尾全
- 二百三三 佛说观世音三昧经一卷 尾全
- 二百三四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一 首全
- 二百三五 药师经 尾全
- 二百三六 佛藏经卷第四 尾全
- 二百三七 四分律卷第十三
- 二百三八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六 尾全 全卷下半截均  
缺
- 二百三九 大乘无量寿经 尾全 末有邓美二字 似为写经者
- 二百四十 观世音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四十一 佛说佛名经卷第十六 首全
- 二百四二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一 尾全
- 二百四三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廿四 首全
- 二百四四 佛说佛名经第三 首全
- 二百四五 佛名经卷第九 有尾
- 二百四六 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七十二 尾全
- 二百四七 新菩萨经一卷
- 二百四八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六 首全
- 二百四九 新菩萨经一卷
- 二百五十 诸星母陀罗尼经一卷 尾全

- 二百五十一 佛说佛名经残卷 缺首尾
- 二百五二 新菩萨经一卷
- 二百五三 救诸众生苦难经一卷
- 二百五四 佛说弥勒成佛经一卷 尾全
- 二百五五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 尾全
- 二百五六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六 七 八 不焘流水 由六尾起至八首止 有小字朱校
- 二百五七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三 四 由三尾起至四首止
- 二百五八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尾全
- 二百五九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六十 佛说八阳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六十一 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卷 首尾缺 诸天药叉护持品第廿二起至除病品第廿四止
- 二百六二 大方广佛华严经残卷 存十地品之一末起至十地品之二止
- 二百六三 究竟大悲经卷第二 首全
- 二百六四 佛说因果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六五 大般若经卷第一百九十四 尾全
- 二百六六 瑜伽师地论卷第十六 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首全
- 二百六七 佛说佛名经卷第二 首全 标题下绘有佛像着色
- 二百六八 维摩诘经卷上
- 二百六九 维摩诘经卷中 尾全 首稍缺
- 二百七十 维摩诘经卷下 尾全 首稍缺 中有朱笔校改
- 二百七十一 残经一卷 首尾缺 卷中题有义记卷五止字样
- 二百七十二 佛说无量寿观经卷第四 尾全 末有弟子钦识持五字一行
- 二百七三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 尾全 小字 存由第八品后半起至第十六品止
- 二百七四 残经

- 二百七五 摄大乘论无性菩萨释卷第七 尾全 首稍缺 精写
- 二百七六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一卷 尾全 末题有法圆勘三字一行
- 二百七七 维摩诘经卷下 尾全
- 二百七八 大乘入楞伽心经卷第七 尾全
- 二百七九 佛说无常经一卷 (亦名三启经)
- 二百八十 佛说教戒经一卷 尾全 背有张文彻王幸子等名字样
- 二百八十一 佛说像法决疑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八二 佛说要行舍身经一卷
- 二百八三 大般若涅槃经卷第十四 尾全
- 二百八四 大乘显实论一卷 尾全
- 二百八五 佛说法句经一卷 尾全
- 二百八六 大乘四法论一卷 背有唐中和四年 又维岁(次)丁未等字样
- 二百八七 佛说十想经一卷 小字小卷本 后附佛说戒想应法经一卷 尾稍缺
- 二百八八 劝善经一卷 末有贞元十九年正月廿三日下一行
- 二百八九 金有陀罗尼经卷 首全
- 二百九十 大般若第十会般若理趣分序 西明寺法律玄则制 卷首另写他经
- 二百九十一 佛说佛名经残卷
- 二百九二 佛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 首全
- 二百九三 大般涅槃经残卷 存佛母品八行
- 二百九四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七 残存九行
- 二百九五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廿四 尾全
- 二百九六 妙法莲华经残卷
- 二百九七 佛说佛名经残卷 首尾缺

- 二百九八 金刚般若经旨赞卷上 尾全
- 二百九十九 佛说摩利支天经一卷 前另写他经
- 三百 大般涅槃经卷廿一 首全 后半朱书补 背有大般涅槃经卷略抄要义
- 三百一 大乘入楞伽心经卷第七 尾全 细小密字
- 三百二 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一卷 尾全 (又题曰四部律并论要抄一卷)
- 三百三 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一卷 尾全
- 三百四 佛顶尊胜陀罗尼启请残卷 首全 背有归义军节度使等字
- 三百五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 前有经序 卷尾稍缺
- 三百六 莲华面经卷下 佛说无量大慈教经 旋风装 半页六行 每行廿五至卅字不等
- 三百七 念身经十 十一 十二卷 细小密字 日皆作~ 盖武后时人所书
- 三百八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 前有经序
- 三百九 维摩诘所说经卷上 尾全
- 三百十 维摩诘所说经卷下 尾全
- 三百十一 残经疏
- 三百十二 残经卷
- 三百十三 救□(诸)众生苦难经一卷
- 三百十四 新菩萨经一卷
- 三百十五 残经卷
- 三百十六 金刚经残卷
- 三百十七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五十六 首全
- 三百十八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八 存一页
- 三百十九 残经卷
- 三百二十 残经卷



- 三百二十一 残经卷  
三百二二 残戒律  
三百二三 残经卷  
三百二四 残戒律  
三百二五 残经卷  
三百二六 父母恩重经残卷 首尾缺  
三百二七 金刚经残疏卷  
三百二八 残羯磨文卷  
三百二九 残经疏  
三百三十 □□□□□□□□□□□菩萨说残卷 首稍缺 沙门玄奘  
奉诏译  
三百三十一 残经疏卷 有朱笔校字  
三百三二 残戒律卷  
三百三三 残经疏卷 草书 背亦有字  
三百三四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卷之上 尾全  
三百三五 小钞一本一卷 首尾全 前另有残戒律 尾全  
三百三六 佛说善恶因果经一卷 尾全  
三百三七 维摩诘经残卷 首尾缺  
三百三八 残经卷 字体与褚薛相似  
三百三九 残经卷  
三百四十 残法华经第三 首尾缺  
三百四十一 妙法莲华经残卷 存法师品第十  
三百四二 残经卷  
三百四三 残经卷  
三百四四 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存安乐行品第十四首  
三百四五 残经卷  
三百四六 残经卷

- 三百四七 残经卷  
三百四八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四 首全  
三百四九 残经卷  
三百五十 普门品残卷  
三百五十一 残经疏卷  
三百五二 无量寿宗要经 首尾缺  
三百五三 普门品残卷  
三百五四 残经卷 有朱笔校字  
三百五五 残经疏  
三百五六 残经卷  
三百五七 金刚经残卷  
三百五八 金刚经残卷  
三百五九 残经卷  
三百六十 残经卷  
三百六十一 金刚经残卷  
三百六二 金刚经残卷  
三百六三 金刚经残卷  
三百六四 残经卷  
三百六五 金刚经残卷  
三百六六 金刚经残卷 有朱笔点句  
三百六七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尾全  
三百六八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尾全  
三百六九 金刚经残卷  
三百七十 金刚经残卷  
三百七十一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经尾全  
三百七十二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尾全  
三百七三 残经卷

- 三百七四 金刚经残卷  
三百七五 金刚经残卷  
三百七六 金刚经残卷  
三百七七 金刚经残卷  
三百七八 金刚经残卷  
三百七九 金刚经残卷  
三百八十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三百八十一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背面有字  
三百八二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尾全  
三百八三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首全  
三百八四 残经疏 月藏经校功德品  
三百八五 维摩诘所说经 首全  
三百八六 维摩诘经卷第三 首全  
三百八七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 佛说天请问经一卷 佛说救护身  
命经一卷 普门品 首尾全 线装巾箱本  
三百八八 沙弥十戒文一卷 首稍缺 背面有题字云 患文 因缘  
论义文 小抄 各一卷 共在此内  
三百八九 普门品残卷  
三百九十 妙法莲华经残卷  
三百九十一 残经卷 背有祈雨咒 解恶梦咒 避鬼神咒 移云咒  
四季菩萨咒等真言  
三百九二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尾全  
三百九三 残经疏 背亦写有经疏  
三百九四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八十七 首全  
三百九五 残经疏 疏内有除睡咒 入定咒  
三百九六 思益梵天问经卷第二 首全 前有卷一末尾  
三百九七 残经卷

- 三百九八 妙法莲华经残卷  
三百九九 大般涅槃经残卷  
四百 残经卷  
四百一 妙法莲华经残卷 存法师品第十  
四百二 残经卷 似羯磨文  
四百三 残经卷  
四百四 妙法莲华经残卷  
四百五 妙法莲华经残卷  
四百六 无量寿宗要经残卷  
四百七 金刚经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尾全 末有悲田寺僧道元等敬写  
三跋  
四百八 阎罗王受记经 末有戊辰年七月廿八日十五□三写流传一行  
背绘有花卉  
四百九 胜天王般若经第七卷 首全  
四百十 残经疏 首尾缺  
四百十一 人集录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一卷 尾全 末有大  
隋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四月十五日在相州法藏寺撰  
四百十二 阿弥陀赞一本 往生极乐赞一本 宝鸟赞一本 归极乐去  
赞一本 西方极乐赞一本共一卷 前有他赞名佚去 末有  
显德六年岁次己未八月十日古三界寺沙弥福延写跋七行  
四百十三 残经  
四百十四 残经疏 存七行 有朱笔校字  
四百十五 佛说无量寿宗要经残卷  
四百十六 李福贞发愿文 雍熙二年岁次己酉七月十日  
四百十七 残经  
四百十八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五 尾全 末有菩萨戒弟子尼智行受持  
一行

- 四百十九 道行经卷第九 尾全 末有菩萨戒弟子尼智行受持一行  
四百二十 蜜多心经残卷 末有比丘僧宗一写经跋一行  
四百二十一 六门陀罗尼经一卷  
四百二二 净名经关中疏卷上一卷 末有朱书大唐咸通八年岁次丁亥  
三月七日说毕一行 又有此是明照本一行  
四百二三 残经卷一纸 首尾缺  
四百二四 金有陀罗尼经一卷 尾全 末有梵文题字一行  
四百二五 十空赞一卷 首全 背有字  
四百二六 佛说父母恩重经一卷 首尾缺  
四百二七 千字文一卷 首全 标题次行题千字文敕员外散骑侍郎周  
兴嗣次韵  
四百二八 金光明经卷第四 有尾  
四百二九 大般涅槃经卷第卅四 建始二年大且渠唐儿供养 苏仲祖  
写  
四百三十 大涅槃义记 正始三年阳平公主供养  
四百三一 宣元至本经 首全  
四百三二 汉书残卷 避世字

(英文本“The Li Shengduo Collection: Original or Forged Manuscripts?”为提交1997年6—7月伦敦“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学术研讨会”论文,后收入*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3), ed. by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62-83 + pl. 1; 中文本原载《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1—18页。)

## 追寻最后的宝藏

——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

迄今为止,收藏敦煌文献较多的英国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都以质量较佳的图版,公布了各自所藏的文献。一些收藏敦煌文献相对较少的单位,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浙江省图书馆等处,也都出版了所藏敦煌文献的图录,为敦煌学界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虽然还有一些敦煌文献的收藏单位和个人的藏品没有出版,但从数量和研究价值两方面来衡量,我们无疑可以说,原藏李盛铎而现藏日本某氏的李氏旧藏敦煌文献,应当可以说是敦煌文献的最后宝藏,读者只要略微翻检一下笔者整理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图 22)<sup>〔1〕</sup>,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如我们要研究传统的四部典籍,那么这里面的《论语》、《毛诗》、《左传》、《礼记》、《尚书》、《庄子·让王篇》、《汉书》、《十六国春秋》等等,是何等诱人的材料;如果我们研究敦煌俗文学作品,那么可以从这里看到《王梵志》、《孝子传》、《秦妇吟》、《目连传七字句小说》、《昌(唱)道(导)文》等名目;如果研究童蒙读物,这里则有《开蒙要训》、《类书》、《千字文》、《孔子见项橐》;

---

〔1〕 荣新江《鸣沙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115—143页。这实际上是《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4《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的底本,但学者一般只知道有后者,而不知有前者,其实我们在利用这一目录时,应当以《鸣沙集》的录文本为准。

如果研究科学技术史,这里的《天文占》、《戊寅年历日》、《本草》、《算学》、《天福九年具注历日签》,必定是珍贵的资料;如果研究数术,则可以从这里的《换须发方》、《阴阳书》(占鬼呼人第廿八、占狐鸣第廿九),获得新的材料;对于我们历史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唐律》、《驿程记》、户籍、帐历、牒状、契约等史料;从宗教研究的角度,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各类佛典,其中包括颇具研究旨趣的疑伪经,如《佛说照明菩萨经》、《首罗比丘经》、《八阳神咒经》等,还有稀见的三阶教经典《人集录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一卷,题“大隋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四月十五日在相州法藏寺撰”;至于李氏所藏的两种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则是已为学界广为熟知的事情了。

李盛铎确系高手,他从敦煌运至北京的藏经洞宝藏中,攫取到一批敦煌文献的精品。也正因为他的敦煌藏品既真且精,所以民国年间散在市场上的许多敦煌写卷,不论真伪,往往说是李氏旧藏,有的还有李氏的收藏印。事实上,李盛铎收藏的敦煌卷子早先恐怕并没有出售,直到李氏晚年因涉官司,藏卷始由子女分次售出,这就是我们在1935年12月15日及21日《中央时事周报》所看到的消息:李氏藏卷以八万元日金售诸日本,同时刊出的《德化李氏敦煌写本目录》,底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即上面提到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共著录敦煌写本432号<sup>[1]</sup>。

那么,李盛铎旧藏的敦煌写卷哪里去了?对于敦煌学研究者来说,这是一批需要追踪的宝藏。二十多年来,我走访国内外多家收藏单位,也看过一些私人藏品,却从来没有见过与《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上这432号写卷相似的原卷,这似乎说明李氏旧藏并没有打散,而是收藏于一个秘不示人的私家。

[1] 参看荣新江《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1—18页;收入《鸣沙集》,103—146页。英文本“The Li Shengduo Collection: Original or Forged Manuscript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Dunhuang Forgeries in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ed. by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1, pp. 62-83.

为了追寻李盛铎旧藏敦煌文书的下落,1991年2月13日,在高田时雄先生陪同下,我去郊外的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做了一次短暂的探访。我之所以想到要去这里,是因为我从《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中见到的景教《志玄安乐经》和《宣元本经》的照片上,钤有一些李盛铎的收藏印,其中有些是一般所谓李氏旧藏写卷上没有见到过的印鉴<sup>〔1〕</sup>。我在日本期间听说羽田亨先生去世后,他的善本书归杏雨书屋收藏,而普通书则捐献给京都大学文学部,收藏在由其本人住宅改建的“羽田亨纪念馆”中。所以,我是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敲开了羽田亨纪念馆的大门。

羽田亨生前从事敦煌研究所用的照片,的确仍旧收藏在这里,一共933张!我和高田先生快速翻检了一遍所有照片,确认其中印有李氏印鉴的写本,应当就是李盛铎收藏的敦煌文书。当时虽然没有带着任何有关李氏藏卷的目录,但照片中一件记载旅行日程的写本,让我想起《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中“驿程记”这个名字。我记录下照片上所有李盛铎及其子李滂的收藏印,并抄录了一些写本的目录和题记,还正式向京都大学文学部申请了包括“驿程记”在内的两件照片。我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因为京都大学方面认为这些李氏旧藏文书的收藏者不明,怕引起麻烦。我回国以后,把这些照片上所钤印鉴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宋元善本书和《李盛铎印谱》上的同一印鉴做了对比<sup>〔2〕</sup>,确认这些印鉴不假,并把抄录的一些目录和题记与《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勘同,判断出这些照片确是摄自李氏旧藏敦煌写本。在原卷公布之前,这是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李氏旧藏写卷原貌的资料,因此异常珍贵。而羽田亨先生是敦煌研究的大家,他兴趣广泛,因此所拍摄的写本正是具有多方面研究旨趣的材料。

我在1996年6月出版的《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一书关于日本收

〔1〕 《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1957年,第6—7图。

〔2〕 善本书上部分印鉴的彩色图片,见拙文“The Li Shengduo Collection: Original or Forged Manuscripts?”附图,1a-d;黑白图片,见《鸣沙集》,86—90页。



集品一章的最后,非常简要地提到了我在羽田亨纪念馆看到过部分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照片<sup>〔1〕</sup>。在提交1997年6月30日—7月2日英国图书馆举办的“20世纪初叶敦煌伪本研讨会”的论文《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中,我也提到了羽田亨纪念馆收藏的李氏旧藏敦煌文书的照片。《知见录》上的几行文字,为日本敦煌学权威、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先生慧眼相识,他依据这一线索,在1997年11月4日赴羽田亨纪念馆考察,抄录了其中属于李氏旧藏的敦煌文书《唐天宝六载敦煌郡龙勒乡籍》、《广顺二年(952)正月沙州百姓赵延久请田地簿》、《癸未年(983)十一月河西百姓史喜苏买骡马契》、《乙未年(995)十月归义军驼官李粉堆等就城角庄算会当宅群牧见行籍》、《丙申年(996)四月—八月归义军知马官阴章儿请判凭状及乙未年(995)十一月等归义军驼官马善昌、丙申年九月归义军驼官李粉堆请判凭状》,他在1998—1999年间发表文章,介绍研究了这些文书,通过与英、法等地收藏的相关敦煌文书的对比,池田先生认为这些“文书之真实性绝无疑义,纵然尚未见原件,其可靠性充分明显”。池田先生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唐代均田制、籍帐制以及归义军史的新资料,并揭示了李氏旧藏文书的真实性<sup>〔2〕</sup>。

同是在1998年,日本京都华顶短期大学的落合俊典教授从京都大学牧田谛亮先生手中,获得羽田亨的手稿本《敦煌秘笈目录》(图23),这份目录是羽田亨晚年委托给冢本善隆先生,冢本先生又委托给牧田先生的。该《目录》著录敦煌写本432号,与北大所藏《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432号完全对应,所不同的是羽田亨在过录李氏目录时根据原卷有所订正,

〔1〕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18页。

〔2〕 池田温《敦煌郡龍勒郷天宝六載籍の一断簡》,《创价大学人文论集》10,1998年,251—260页;同氏《李盛铎旧藏敦煌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1999年6月,29—56页。此外,池田先生还据羽田亨所藏照片,抄录发表了大谷探险队所获《天宝二年交河都市估案》的一些未刊文书断片,见所撰《盛唐物価資料をめぐって——天宝2年交河都市估案の断簡追加を中心に》,《シルクロード研究》创刊号,创价大学,1998年3月,69—90页。

并随手加了许多注记。落合教授在撰文介绍这本珍贵的《敦煌秘笈目录》时,指出李氏藏卷为日本某企业家收购,交京都大学校长羽田亨考察研究,调查尚未完毕,正值二战后期,为躲避空袭,这432号敦煌文献被运往兵库县多纪郡大山村西尾新平氏宅第的土藏中掩藏,战争结束后,运到那位企业家自己企业附属的研究机关中了。落合教授根据封筒内保存的书信所提供的线索,寻访到兵库县西尾氏的后人那里,弄清李氏藏卷在日本的辗转变迁过程,特别是指出李氏藏卷432号没有打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信息<sup>〔1〕</sup>。落合教授还指出,这位企业家在获得432号李氏藏卷后,委托羽田亨继续在市场上为其收购敦煌经卷,所获总计为736号,羽田亨分别编有《新增目录》(433—670号)和《短编及断简五十种》(671—736号)两种草目,加以著录<sup>〔2〕</sup>。随后,落合俊典在池田温先生论文的导引下,据羽田亨纪念馆所藏照片,抄录发表了李氏旧藏敦煌佛教典籍《佛说照明菩萨经》和《法花行仪》,并从佛教学的角度加以研究<sup>〔3〕</sup>。

在落合俊典公布羽田亨稿本《敦煌秘笈目录》之后一个月,方广錫博士提

---

〔1〕 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录”简介》,提交2000年6月21—25日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郝春文编《敦煌文献论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91—101页。

〔2〕 落合俊典《敦煌秘笈目录(第433号至670号)略考》,提交2002年8月北京理工大学举办“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论文,收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1月,174—178页。参看同氏《敦煌秘笈——幻のシルクロード写本を探して》,《华顶短期大学学报》第6号,2002年3月,15—19页。

〔3〕 落合俊典,“On the *Zhao-ming pu-sa-jing* Formerly in the Possession of Li Sheng-duo”,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6<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Canada, 2000. 8. 28(未见);又《李盛铎旧藏照明菩萨经探赜》,《香川孝雄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佛教学净土学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2001年3月,21—31页;又《李盛铎旧藏开元廿二年写〈法花行仪〉初探》,提交2001年11月京都大学举办“罗王二先生東渡九十周年記念——草創期の敦煌学”研讨会论文,收入高田时雄编《草創期の敦煌学》,东京知泉书馆,2002年12月,203—224页。参看林敏《李盛铎旧藏〈照明菩萨经〉解题·翻刻》,《仙石山论集》第1号,2004年,79—113页。

交给2000年7月25—26日香港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的论文,提到有一份用上海图书馆稿纸抄写的《日本羽田亨收藏李木斋(盛铎)旧藏敦煌遗书目录》(简称《羽田亨目录》),计23叶,著录428号,内容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三《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完全一样<sup>[1]</sup>。方氏认为“羽田亨收藏”显然是误传,但高田时雄先生则认为不论当时出资是谁,购买李氏藏卷的主谋者和实际运作者都是羽田亨,说是“羽田亨收藏”也不为过。高田先生还进而考证了《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羽田亨目录》和《敦煌秘笈目录》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北大所藏《李氏鉴藏目录》是原始记录,为售出之前的记载;《敦煌秘笈目录》是日本经手购买者抄录的稿本,这个目录由于某种原因而疏漏未记最后4件,后来发现而补记在尾页的纸背;《羽田亨目录》如名称所示应当抄于写本售与羽田亨之后,其制作年代也可能就在买卖成交后,但最后4件没有记录在案,所以成为428号了<sup>[2]</sup>。我没有见到《敦煌秘笈目录》和《羽田亨目录》的全部影印件,但我完全相信高田时雄先生的考证结果。

羽田亨纪念馆收藏的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的照片虽然只是这批宝藏的一小部分,许多文书也只是其中的局部,但仍然提供给学界许多研究素材,上面已经列举了池田温、落合俊典两位先生的贡献。由于这组照片渐为学界所知,迄今为止,已经有多位学者前往调查,收集自己研究的资料。如牧野和夫先生抄录了《孔子见项橐》<sup>[3]</sup>;东洋文库出版的山本达郎、池田温等编《敦煌

[1] 方广錩《呼唤〈羽田亨目录〉中的敦煌遗书早日面世》,“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2000年7月25—26日,香港大学中文系。又参看方广錩《呼唤〈羽田亨目录〉中的敦煌遗书早日面世》,《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6日。

[2] 高田时雄《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2004年,20—22页。参看落合俊典《李盛铎と敦煌秘笈》,《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2卷第2号,2004年3月,166—172页。

[3] 牧野和夫《敦煌藏经洞藏〈孔子项託相問書〉類の日本伝来・受容について》,郝春文编《敦煌文献论集》,280—281页。

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集》增补卷,据照片收录了《史喜酥卖马文契》、《赵盐久卖田契》<sup>〔1〕</sup>;新潟大学的岩本笃志先生刊布了其中的《十六国春秋》写本<sup>〔2〕</sup>;国学院大学土肥义和先生也在2004年3月走访羽田亨纪念馆后,兴奋地写下他的《〈羽田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献写真〉调查记》,作为“卷首语”,刊布在日本《唐代史研究》第7号上<sup>〔3〕</sup>。从土肥先生的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界对于这组照片的重视。

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机会重访羽田亨纪念馆,去阅读那些对我很有吸引力的照片上的文献。2005年12月16日,借应邀到京都大学文学部参加学术会议之机,在杉山正明先生的安排下,承志先生驱车带我去访问羽田亨纪念馆。原本是散叶的照片已经装订成册,并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即上面土肥先生文章提到的“羽田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献写真”,这样翻检起来颇为方便,也不容易散落。我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把所有照片全部翻阅一遍,主要记录了李盛铎旧藏文献的情况。不知是我的记录过于匆忙,还是真的如此,一些我在十五年前看过的照片并不在其中,按《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的序号,即有廿七《史喜酥卖马文契》(照片第836—837页)、卅四《牧群册》(第838—840页)、卅五《知马驼官日行簿》(第841—847页)、四百十六《李福贞发愿文》(第421页),不知何故。

这批宝藏中,还有一些重要文献尚无人问津,如《汉书》、《王梵志诗》、《秦妇吟》等等,希望有学者留心于此,加以整理研究。当然我们更加希望收藏这批宝藏的日本企业家,能够尽早将这批敦煌文献向学者开放,让学者能够看到李氏藏卷的庐山真面目。

〔1〕 Yamamoto, T. et al.,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Tokyo: Toyo Bunko, 2001, (A), p. 38, (B), p. 14.

〔2〕 岩本笃志《羽田纪念馆所藏“西域出土文献写真”766·767〈十六国春秋〉考——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をめぐって》,《西北出土文献研究》创刊号,2004年3月,5—39页。

〔3〕 《唐代史研究》第7号,东京,2004年8月,1—2页。

最后,为方便学者调查、整理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以下按《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顺序,将其中有研究的写本检出,在原目之下,提示前人的著录、研究所在,并提示羽田亨纪念馆所存相应写本的照片页码,以便研究者阅览时可以一步到位。

《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研究索引稿:

一 摩诃衍经第八 魏大统八年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55—80 页。尾钤“李滂”、“敦煌石室秘籍”、“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印。尾题:“大魏大统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佛弟子辰州刺史邓彦妻昌乐公主元敬写摩诃衍经一百卷。”

松本文三郎《敦煌石室古写经の研究》,《仏典の研究》,东京丙午出版社,1914 年,123—124、127 页。

罗福苾《古写经尾题录存》,《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叶 13b。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122 页, No. 222。

二 维摩义记第二 甘露二年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345—420 页。尾钤“李滂”、“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印。据照片,题记云:“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沙门静志写记。”

1919 年 9 月 17 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弟前日往看李木斋藏书,……其写经,甘露二年(当是高昌改元)……以上诸书颇可宝贵,恨不得与公共一览也。”(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470—471 页)同月 30 日,王国维回信:“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籍,闻之神往。甘露二年写经,君楚疑为苻秦时物,亦极有理。”(王国维《观堂书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 1 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37 页;收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473—474 页。前者系于 9 月 20 日,误。)

- 罗振玉《增订高昌麴氏年表》，《辽居杂著乙编》，1933年，叶4b。
- 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佛学书局，1937年，32页。
-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76页，No. 38。
- 王素《吐鲁番出土写经题记所见“甘露”年号补说》，《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244—252页。
- 三 十戒经 首尾全 至德二载
-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435—438页。首钤“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尾钤“李滂”、“敦煌石室秘籍”、“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印。据照片，题记云：“至德二载五月十四日吴紫阳……张仙翼……”
- 松本文三郎《仏典の研究》，125—126页。
- 四 华严经第廿四 延昌二年 有蓝印
-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24—54页。首钤“木斋审定”印，尾钤“李滂”、“敦煌石室秘籍”、“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印。题记：“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八月廿七日敦煌镇经生令狐崇哲所写经成讫竟，用纸廿四张，校经道人。”
- 松本文三郎《仏典の研究》，123页。
- 罗福苾《古写经尾题录存》，《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叶1b。
-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05页，No. 167。
- 五 未曾有因缘经卷下 开皇十一年官书
-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280—307页。尾钤“李滂”、“敦煌石室秘籍”、“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印。题记云：“开皇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经生韦师写，兴国寺僧行矩校，学士张绍、文学江溢。”
- 松本文三郎《仏典の研究》，124页。
- 罗福苾《古写经尾题录存》，《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叶15b。
-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43页，No. 310。
- 六 妙法莲华经卷四 上元二年十月廿八日门下省群书公孙仁约写
- 松本文三郎《仏典の研究》，125、127—128页。
-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222—223页，No. 604。

- 七 妙法莲华经卷五 仪凤二年正月秘书省书手田玄徽写  
松本文三郎《仏典の研究》,125 页。  
罗福苕《古写经尾题录存》,《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叶 8a。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230—231 页, No. 625。
- 八 解深密经卷七 贞观二十二年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312—338 页。尾钤“木斋真赏”、“李滂”。据照片,为卷二。题记:“贞观廿二年十一月一日菩萨戒弟子苏土方发心愿渐转写诸经论等。”又有译场列位。  
松本文三郎《仏典の研究》,124—125、126—127 页。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92 页, No. 520。
- 十一 法苑行仪一卷 开皇廿二年五月僧光远行书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498—515 页。尾钤“李滂”、“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据照片,“法苑”当作“法花”。又题记云:“开元廿二年五月廿四日永安寺僧光达写记之。”则《李目》作“开皇”误。  
落合俊典《李盛铎旧藏开元廿二年写〈法花行仪〉初探》,提交 2001 年 11 月京都大学举办“羅王二先生東渡九十周年記念——草創期の敦煌学”研讨会论文,收入高田时雄编《草創期の敦煌学》,东京知泉书馆,2002 年 12 月,203—224 页。
- 十三 景教志玄安乐经  
羽田亨纪念馆现无此件照片,但 1957 年出版的《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第六图刊出首尾照片各一帧,首钤“木斋真赏”、“少微”印,尾钤“木斋审定”、“麀嘉馆印”,后有跋语:“丙辰秋日,于君归自肃州,以此见诒,盛铎记。”下钤“李盛铎印”。  
1919 年 9 月 20 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就说到:“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笈,闻之神往。景教经二种,不识但说教理,抑兼有事实,此诚世界宝籍,不能以书籍论矣。”  
羽田亨《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に就いて》,《东洋学报》第 18 卷第 1 号,

1929年;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1957年,270—291页。

林悟殊与荣新江《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香港《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学专号,1992年,19—34页;收入荣新江《鸣沙集》,65—102页。

林悟殊《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1—4页;收入作者《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146—155页。

十七 礼记二纸

十八 尚书

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条:“时护甘督何彦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复悉为所留。其妇翁李盛铎,且分得唐人所写《礼注》、《书经》等,尤可宝贵。”

二十 唐律

东洋文库存有旧照片(图24),有“木斋审定”印。

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东方学会,1925年。

泷川政次郎《西域出土の唐律残片について》,《法学协会杂志》第48卷第6号,1930年;收入《律令の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31年。

冈野诚《西域発見唐開元律疏断簡の再検討》,明治大学《法律论丛》第5卷第4号,1977年。

Yamamoto, T. et al.,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Legal Texts*, Tokyo: Toyo Bunko, 1978-1980, (A), pp. 30-31, 112-114; (B), pp. 28-32.

廿二 昌道文 同光三年五月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458—461页。尾铃“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李滂”印。据照片,题记云:“同光三年乙丑岁五月十五日开元寺律师善愿。”



廿三 三界寺受戒李憨儿牒 甲午年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454—455 页。首钤“李滂”印,尾钤“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印。据照片,具体受戒时间为“甲午年正月廿八日”。

廿四 敦煌县龙勒乡户册 天宝八载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832—833 页。尾钤“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印(图 25)。实为天宝六载户籍。

池田温《敦煌郡龍勒郷天寶六載籍の一斷簡》,《创价大学人文论集》第 10 号,1998 年,251—260 页。

录文及图版见 Yamamoto, T. et al.,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Tokyo: Toyo Bunko, 2001, (A), p. 36; (B), p. 41.

廿五 仓夫令狐良嗣牒 天宝八载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826—827 页。首钤“李滂”、“木斋审定”印,尾钤“敦煌石室秘籍”、“李盛铎印”印。据照片,应是天宝三载六月文书。

廿六 三界寺住奴戒牒 太平兴国八年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456—457 页。首钤“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印,尾钤“李滂”印。据照片,受戒时间为“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八日”。

廿七 史喜酥卖马文契 癸未年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836—837 页。首钤“李盛铎印”、“李滂”印,尾钤“敦煌石室秘籍”印(图 26)。

池田温《李盛铎旧藏敦煌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40—46 页。

录文及图版见 Yamamoto, T. et al.,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Tokyo: Toyo Bunko, 2001, (A), p. 49; (B), p. 44.

廿八 赵盐久卖田契 广顺二年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834 页。首钤“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

印,尾钤“李滂”印。

池田温《李盛铎旧藏敦煌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1999年6月,35—40页。

录文见 Yamamoto, T. et al.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Tokyo: Toyo BunKo, 2001, (A), p. 38.

廿九 开蒙要训一卷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770—775页。首钤“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印。

三十 王梵志卷一 辛巳年十月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814—821页。首钤“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李滂”印。据照片,题记云:“辛巳年十月六日金光明寺学郎汜员宗写记之耳,张延受书卷。”

三十一 霄夜图序 背有武后字写经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768—769页。首钤“木斋真赏”、“李盛铎印”、“李滂”印。据照片所示文字,实为杂占文字。

卅二 驿程记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835页。钤“李盛铎印”二方。

高田时雄《书评:敦煌汉文文献》,《东洋史研究》第52卷第1号,1993年6月,124—125页。

卅三 孔子见项橐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746—747页。尾钤“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印。

牧野和夫《敦煌藏经洞藏〈孔子项託相问书〉類の日本伝来・受容について》,郝春文编《敦煌文献论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280—281页;又《孔子项託相问书〉の世界——敦煌写卷の断簡一紙——俄罗斯科学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孔子项託相问书〉

斷簡と京都大學内陸アジア研究所(羽田亨紀念館)藏〈羽田亨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獻寫眞所收寫眞〉一葉との關係について》,《实践国文学》第63号,2003年,17—25页。

卅四 牧群册 乙未年十月 有官印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838—840页。

池田温《李盛铎旧藏敦煌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47—51页。

卅五 知马驼官日行簿 丙申年四月 有官印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841—847页。

池田温《李盛铎旧藏敦煌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51—56页。

卅六 支应册 开元十六年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872—876页。首钤“敦煌石室秘籍”印,尾钤“李滂”、“李盛铎印”、“木斋审定”印。据照片,此为开元十四年至十八年帐历。

卅七 算学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870—871页。钤“李滂”、“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印。

卅九 孝子传 背写经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748—754页。首钤“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印,尾钤“李滂”、“木斋审定”印。

汤谷佑三《新出敦煌孝子伝資料と変文の關係——羽田紀念館所藏〈西域文獻資料寫眞〉所收孝子伝資料をめぐって》,《纪要同朋大・佛教文化研究》第23号,2003年,87—104页。

四十 本草 背写历日

《新修本草》,冈西为人《本草概说》(创元社,1983年)书前图版6刊出写本首部33行照片,卷首有“敦煌石室秘籍”、“木斋真赏”(?)印。

岩本笃志《唐朝の医事政策と〈新修本草〉——李盛铎将来本序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史学杂志》第114编第6号,2005年,36—60页。

[补:其首部上方之部分残片尚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作“临2371”号,笔者曾将其与《本草概说》所刊图版之缀合结果告之日本友人岩本笃志,岩本氏后到国图考察原件,并撰写下述论文。岩本笃志《唐〈新修本草〉编纂と“土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断片考》,《东洋学报》第90卷第2号,2008年,1—31页。]

七二 十六国春秋 背道家疏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766—767页。首钤“敦煌石室秘籍”印。

岩本笃志《羽田纪念馆所藏“西域出土文献写真”766·767〈十六国春秋〉考——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をめぐって》,《西北出土文献研究》创刊号,2004年3月,5—39页。

八四 佛说照明菩萨经 六朝人书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10—13页。首钤“敦煌石室秘籍”印,尾钤“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印。

落合俊典,“On the *Zhao-ming pu-sa-jing* Formerly in the Possession of Li Sheng-duo”,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6<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Canada, 2000. 8. 28(未见);又《李盛铎旧藏照明菩萨经探赜》,《香川孝雄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佛教学净土学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2001年3月,21—31页;林敏《李盛铎旧藏〈照明菩萨经〉解题·翻刻》,《仙石山论集》第1号,2004年,79—113页。

九六 佛说咒魅经一卷

松本文三郎《仏典の研究》,165—167页,但不能确定指此卷。

百卅七 首罗比丘经一卷 尾全

百四十二 首罗比丘经 尾全

松本文三郎《仏典の研究》,162—163页,但不能确定是否指此二卷中哪一件。

百九二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 首尾全 首附有金光明经传

松本文三郎《仏典の研究》,169—172页。

四百十六 李福贞发愿文 雍熙二年岁次己酉七月十日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421 页。

四百二九 大般涅槃经卷第卅四 建始二年大且渠唐儿供养 苏仲祖写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209—229 页。首钤“敦煌石室秘籍”印，尾钤“木斋真赏”、“李滂”、“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印。据照片所示尾题，实为卷三十三。又题记云：“建始二年岁次庚辰敦煌太守弟子大且渠唐儿所供养经。”

四百三十 大涅槃义记 正始三年阳平公主供养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 234—261 页。尾钤“李滂”、“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印。据照片，题记云：“正始元年十月九日因州阳平公主寺道人道咏写讫。”

四百三一 宣元至本经 首全

羽田亨纪念馆现无此件照片，但见于 1958 年出版的《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第七图，首钤“敦煌石室秘籍”、“李盛铎印”、“李滂”、“两晋六朝隋唐五代妙墨之轩”印，而“木斋真赏”朱文小方印钤于经题“教”与“宣”两字中间的空隙处。据照片，题目中没有“本”字。

P. Y. Saeki, "The Ta-Ch'in Luminous Religion Sutra on the Origin of Origins",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9, 1934, pp. 133-135.

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东京，1935 年，736—742 页。

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一卷，东京，1943 年，380 页。

林悟殊与荣新江《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香港《九州学刊》第 4 卷第 4 期敦煌学专号，1992 年，19—34 页；收入荣新江《鸣沙集》，65—102 页。

林悟殊《敦煌遗书〈大秦景教宣元本经〉考释》，《九州学刊》第 6 卷第 4 期，1995 年，23—30 页；收入作者《唐代景教再研究》，175—185 页。

四百三二 汉书残卷 避世字

羽田亨纪念馆藏照片第723—736页。首钤“李盛铎印”、“敦煌石室秘籍”、“木犀轩藏书”，尾钤“李滂”。此为《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列传》。

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所刊《汉书匡衡张禹孔光传》残卷或许就是此卷。

（附记：本文校对时，收到张娜丽女史寄赠所撰《羽田亨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献写真〉について》，载《お茶の水史学》50，2006年12月，对羽田亨纪念馆所藏照片有全面介绍，读者可参考。）

（2006年8月18日定稿，载刘进宝、高田时雄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15—32页。）

## 敦煌写本辨伪示例

——以法成讲《瑜伽师地论》学生笔记为中心

随着大量敦煌写本的刊布,特别是保存在各地的小收集品的陆续公布,其中的伪本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这是关系到敦煌研究的根本问题,根基不牢,则大厦将隳。笔者二人在利用敦煌文书研究中古史的同时,亦曾关注敦煌写本的真伪问题,且略有论说。今以法成弟子听讲《瑜伽师地论》时所做笔记上的年代题记为主要分析对象,来看看写本题记的真伪问题,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为今后的敦煌写本辨伪工作提供帮助。

关于大番国三藏法师法成在归义军初期于沙州开元寺讲《瑜伽师地论》一事,上山大峻先生做过非常透彻的研究,并厘清了法成的几个弟子分别记录的笔记本所在,他非常谨慎地提示了英、法、俄以及中国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笔记本上有年代的题记,而在注释中指出其他小收集品中有年代的写本还需要据实物来加以验证<sup>〔1〕</sup>。后来,上山大峻教授又发表了《我是如何来确信大谷收集品中含有伪卷的》,据现藏北图的原大谷探险队所获《瑜伽师地论分门记》一真题记笔体之不同,认为有两件可能是伪卷<sup>〔2〕</sup>。显然,上山先生已经发现了问题,只是迄今尚未见到他的全面调查结果。笔者二人近年来一直进行沙州归义军写本的编年工作,因此也不

---

〔1〕 上山大峻 1990,110—111,220—221,239—241 页。

〔2〕 Ueyama Daishun, "How I Came to be Convinced That the Otani Collection Contains Forged Manuscripts", Susan Whitfield ed.,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316-320.

得不处理这些《瑜伽师地论》笔记本的系年问题〔1〕。当我们把目前所见有年代的写本按年代先后排列起来时,问题就更加明显。

我们知道,自大中九年(855)三月份开始,法成在沙州开元寺讲《瑜伽师地论》,直到大中十三年末或大中十四年初去世为止,大约一个月一、二卷,听讲弟子有智慧山、谈迅、福慧、法镜、一真、洪真、明照、恒安等,部分弟子听讲《瑜伽师地论手记》与《瑜伽师地论分门记》的笔记本在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下来〔2〕。既然是一个人讲,大家一起听,则进度是一样的,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讲完,应当在不同的笔记上有大体相同的时间记录。但目前所见到的《瑜伽师地论》笔记本的年代却并非如此。以下按年代顺序一一分析之。

## 一、大中九年岁次乙亥(855)

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瑜伽师地论》卷一题记:“大中九年三月十五日,智慧山随学听。”〔3〕目前所见法成讲《瑜伽师地论》笔记以此卷最早,其所记时间与上山大峻先生所推法成开始讲经的时间基本吻合。此卷为丹麦商人于1915年初在敦煌所得,应当是比较可信的。但以下凡智慧山的题记多为散藏写卷,伪本颇多,也让我们对本卷保留态度。

上海图书馆藏117号《瑜伽师地论》卷十题记:“上元元年十月三日说竟,沙门洪真手记讫。”〔4〕不论是高宗上元元年(674)还是肃宗上元元年

〔1〕笔者在一篇书评中曾触及这一问题,但限于书评体例,未加详论。参看荣新江《评〈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27—328页。

〔2〕上山大峻1990,219—240页。

〔3〕彼得森(Jens O. Petersen)撰,荣新江译《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136页;池田温1990,补18,554页。

〔4〕《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41页;第4册,叙录23页;吴织、胡群耘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续)》,《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89页(旧编133号);池田温1990, No. 888, 305—306页。



(760),都不可能是法成讲经、洪真记录的年代,而且字体优雅,也不似其他洪真笔迹,作伪之迹明显,不待详辩。

上海图书馆藏 155 号《瑜伽师地论》卷十二题记:“大中九年后四月十五日,苾芻僧智惠山。”<sup>[1]</sup>如果以一个月一、两卷的讲经速度来看,从三月十五日到闰四月十五日,似乎无法讲到第十二卷。而且,后面有大中九年十月沙弥一真听讲卷七的记录,特别是 S. 6670 是无可置疑的大中十年正月讲卷十三的记录,则此处大中九年闰四月中旬讲卷十二的题记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七题记:“大中九年十月,沙弥一真书记。”<sup>[2]</sup>此卷为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得自敦煌,来历应当是可靠的。从时间上看,若以丹麦藏卷一的三月十五日为起点,则十月份讲到卷七,大体上是一个月一卷的速度,可以成立。

## 二、大中十年岁次丙子(856)

S. 6670《瑜伽师地论》卷十三题记:“丙子年正月廿四日十三卷终。”据卷末题名,此为比丘福慧本<sup>[3]</sup>。S. 6670《瑜伽师地论》卷十五题记:“丙子年四月十三日终。”此为接着上面卷十三而抄写的,末尾有“比丘福慧记”<sup>[4]</sup>,为听卷十五毕后所写。以上两个年代题记,因系写于斯坦因得自

[1]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3册,400页,彩色图版8;第4册,叙录29页;吴织、胡群耘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107页(旧编131号);池田温1990, No. 1873, 406页。

[2] 罗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国学丛刊》卷九,1914年,叶21a;上山大峻1990, 239页;池田温1990, No. 1901, 413页。

[3] 《敦煌宝藏》250册,136页;上山大峻1990, 220页;池田温1990, No. 1903, 413页。

[4] 《敦煌宝藏》250册,157页;上山大峻1990, 220页;池田温1990, No. 1903, 413页。

敦煌的写本上,而且与讲经的速度吻合,因此可以确定无疑,并成为我们讨论其他写本年代的一个基点。

上海图书馆藏 171 号《瑜伽师地论》卷廿一题记:“大中十年四月廿三日记。”〔1〕上面一条材料表明,法成在本年四月十三日讲完卷十五,按照法成的讲经速度,似乎不可能在十天之后就讲到第二十一卷,因此这条题记也是大可怀疑的。

山本悌二郎旧藏《瑜伽师地论》卷卅三题记:“大中十年六月三日,苾芻僧智惠山随听学记。”〔2〕

山本悌二郎旧藏《瑜伽师地论》卷卅四题记:“大中十年六月六日,沙门智惠山听学书记。”〔3〕

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卅九题记:“大中十年六月十三日,沙门智惠山书记。”〔4〕

山本悌二郎旧藏《瑜伽师地论》卷卅七题记:“大中十年六月廿一日,苾芻僧智惠山。”〔5〕

以上四卷,三卷是山本氏旧藏,一件是橘瑞超得自敦煌,它们的内容从卷三十三到三十九,但题记所示的时间却都是大中十年六月,如果是随听的

---

〔1〕《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4册,73页;第4册叙录32页;吴织、胡群耘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续)》,89页(旧编132号);池田温1990, No. 1905, 414页。

〔2〕池田温1990, No. 1906, 414页。据此,题记录文初见于《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6页。

〔3〕池田温1990, No. 1907, 414页。据此,题记录文初见于《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6—7页。

〔4〕罗振玉《日本橘氏将来敦煌写本目录》,叶21b;池田温1990, No. 1908, 414页。图版见井之口泰淳等编《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探险队将来敦煌古写经目录》图版编,龙谷大学西域出土佛典研究班,1989年刊,图36。

〔5〕池田温1990, No. 1909, 414页。据此,题记录文初见于《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7页。

笔记,那和法成讲经的速度是相矛盾的。据下引 S. 5309《瑜伽师地论》卷三十题记,比丘恒安在大中十一年六月廿二日听法成说卷三十毕,则在此之前的这几件题在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三十七后面的题记,都变得让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了。其中三卷山本氏旧藏应是辗转得到的,本身就有疑问,而大谷旧藏一般来说比较可靠,但也不排除题记是后人添上去的。我们看这四个卷子的题记用语比较相像,这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些题记本身的真实性的怀疑。

三井八郎右卫门藏《瑜伽师地论》卷廿二题记:“大中十年十月廿三日,比丘恒安随听写记。”〔1〕这个卷子现在收藏在三井文库,曾经施萍婷先生整理鉴定〔2〕。近年来,赤尾荣庆先生等重新调查,对此卷的真伪提出质疑〔3〕。笔者没有见到原卷,对整个卷子没有发言权,但从题记来讲,如果我们从本年正月廿四日所写 S. 6670《瑜伽师地论》卷十三作为判断的标尺,那么十个月后讲授到卷二十二,恰好符合法成的讲经速度。从本文所着眼的题记年代顺序来说,三井文库的这件写本及其年代存在着真实性的可能。三井文库所藏敦煌写卷的主要来源,是甘肃督军张广建的旧藏,而张广建的藏卷又大多数来自王道士赠送给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的那批写卷,其中不乏精品〔4〕。

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廿三题记:“大中十年十一月廿四日,苾芻恒安随听抄记。”〔5〕如果仍然按照一个月讲经一卷的速度来看,这个题记也

〔1〕 池田温 1990, No. 1911, 415 页, 图 149。据此, 题记录文初见于《第二十五回大藏会展观目》, 东京, 1939 年。

〔2〕 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三井文库所藏敦煌遗书》, 《敦煌研究》1993 年第 2 期, 88 页。

〔3〕 见赤尾荣庆编《敦煌写本の書志に関する調査研究——三井文庫所蔵本を中心として》, 研究报告书, 京都, 2003 年, 27 页。

〔4〕 参看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57—59 页。

〔5〕 罗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 叶 21b; 上山大峻 1990, 239 页; 池田温 1990, No. 1912, 415 页。

没有问题。

### 三、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857)

S. 735《瑜伽师地论》卷廿八题记：“大中十一年五月三日，明照听了记。”〔1〕这件斯坦因所获写本的题记，成为我们讨论其他题记真实性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

S. 5309《瑜伽师地论》卷三十题记：“比丘恒安随听论本。大唐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六月廿二日，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沙州开元寺说毕记。”〔2〕这条题记表明到大中十一年六月下旬，法成讲完第三十卷。这一点也可以从下面一条题记中得到印证。

S. 3927《瑜伽师地论》卷三十有两条题记，前面一条为：“大中十一年四月廿一日，苾芻明照写。”〔3〕根据 S. 735 的题记，法成五月初才讲完卷二十八，所以这里写在卷三十后的四月二十一日的题记，应当只是明照抄写卷三十而准备听讲的记录，所以题记只说是“写”，而听讲完毕的记录在后面：“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六月廿三日，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沙州修多寺说毕。”〔4〕这条题记较 S. 5309 卷三十的题记晚一天，不过可以认为是同时的记录，只是两个学生整理的速度不一致而已。

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一题记：“丁丑年七月十日说毕，沙弥一真随听本。”〔5〕此为大谷探险队在敦煌所得，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作新

〔1〕 上山大峻 1990, 220 页; 池田温 1990, No. 1915, 415 页; 施萍婷 2000, 25 页。

〔2〕 上山大峻 1990, 221 页; 池田温 1990, No. 1917, 416 页; 施萍婷 2000, 163 页。

〔3〕 上山大峻 1990, 220 页; 池田温 1990, No. 1914, 415 页; 施萍婷 2000, 119 页。

〔4〕 上山大峻 1990, 220 页; 池田温 1990, No. 1914, 415 页。

〔5〕 罗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叶 21b；《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探险队将来敦煌古写经目录》图版编，图 34；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敦煌劫余录续编》，叶 128b—129a；上山大峻 1990, 239 页；池田温 1990, No. 1918, 416 页，图版 34。

0232。从时间上讲,从六月下旬讲完卷三十,到七月上旬讲完卷三十一,符合法成讲经的正常速度,再将这个题记的时间和以下各卷的时间结合起来考虑,不应有疑。

中国国家图书馆冬字 72(北 7199)《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题记:“大中十一年八月三十日说毕记。”此为洪真笔记本<sup>[1]</sup>,是清学部自敦煌直接调运来的写本,应当没有问题。

Дх. 1610《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四题记:“大中十一年九[月]七日,比丘张明照随听写记。”<sup>[2]</sup>此为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得自敦煌得残卷,时间、卷数正好与冬字 72 号写本衔接,可以信任。

书道博物馆藏卷(散 0880)《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五题记:“大中十一年十月六日,比丘明照就龙兴寺随听写此论本记。大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十日,三藏和尚于开元寺说毕。”<sup>[3]</sup>明照是龙兴寺的僧人,所以他是在龙兴寺整理听讲笔记的,后面一句表明卷三十五是十月十日讲完的,和上面两条衔接。

#### 四、大中十二年岁次戊寅(858)

中国国家图书馆闰字 98(北 7205)《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一题记:“戊寅年后正月廿二日说卅一卷手记竟。”背书“沙门洪真本”<sup>[4]</sup>。此卷亦为清学部自敦煌直接调运来的写本,应当没有问题。

俄藏 Ф. 70《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二题记:“寅年闰正月廿二日,龙兴寺沙门明照随听写。”<sup>[5]</sup>此为俄国探险队所得。这里只说是随听的时间,据

[1] 《敦煌宝藏》第 104 册,483 页(不清楚);上山大峻 1990,220 页。

[2] 孟列夫 1999,II,308 页;上山大峻 1990,220 页;池田温 1990, No. 1919,416 页。

[3] 池田温 1990, No. 1920,416 页。

[4] 《敦煌宝藏》第 104 册,559 页;上山大峻 1990,220 页;池田温 1990, No. 1921,416 页;施萍婷 2000,409 页。

[5] 孟列夫 1999I,354 页;上山大峻 1990,221 页。

上面一条闰字 98 写本题记,正月二十二是讲完四十一卷、开讲四十二卷的时间,所以这里是明照在开讲时所作的记录,或者是准备记录底本,时尚未讲毕。Φ. 70 下面还有一条题记:“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五日,三藏和尚于开元寺说毕。”〔1〕这是卷四十二讲完的时间,与闰字 98 所记卷四十一讲完的时间间隔刚好是一个月多一点。

中国国家图书馆新 1200《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三题记:“大唐大中十二年二月十日,沙州龙兴寺沙门明照于开元寺随听写记。”〔2〕这里可能像 Φ. 70 前面一条题记一样,是随听或者准备记录底本的时间,不是卷四十三讲完的时间,因为二月二十五日才讲完上一卷。

山本悌二郎旧藏《瑜伽师地论》卷四十四题记:“大中十二年四月一日,沙门智慧山随听学记。”〔3〕此卷包括卷四十四—四十六,据王三庆著录,其各卷中题:“瑜伽论第四十四卷竟”、“瑜伽论第四十五卷分门记,智慧山”、“瑜伽论第四十五卷分门竟”、“瑜伽论第四十五卷分门初,僧慧山分门记”,第十五叶背有“沙门智慧山”之题名,这些看来似乎不像是伪题。上面曾提到同一旧藏中的其他三件写本,题记似乎都有问题,但这一卷的题记从年代上来讲,和上面的 Φ. 70 二月二十五日讲完四十二卷,以及下面 S. 5730 五月十三日讲完卷四十五,都恰好相符。当然究竟是否可靠,我们仍需谨慎判断,因为智慧山的题记大多数都有问题。

S. 5730《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五题记:“大唐大中十二年岁次戊寅五月十三日于(下缺)。”〔4〕虽然写本下残,推测可能是讲卷四十五毕的记录。

〔1〕 孟列夫 1999I, 354 页;上山大峻 1990, 221 页;施萍婷 1996 a, 55 页。

〔2〕 《敦煌劫余录续编》,叶 129 a;上山大峻 1990, 242 页;池田温 1990, No. 1922, 416—417 页。

〔3〕 上山大峻 1990, 241 页;池田温 1990, No. 1924, 417 页;王三庆《日本所见敦煌写卷目录提要(一)》,《敦煌学》第 15 辑,1990 年,94 页。原著录于《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8 页。后归唐招提寺收藏,见《唐招提寺古经选》119 页图版,104 页解题。又,题记中“随听学记”,池田温作“随听策记”,王三庆作“随听受记”。

〔4〕 施萍婷 2000, 180 页。

中国国家图书馆称字3(北7210)《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七题记:“寅年六月十一日,比丘明照写记。”〔1〕

中国国家图书馆菜字25(北7212)《瑜伽师地论》卷四十八题记:“大中十二年六月一日说毕,比丘明照本。”又题:“大中十二年八月五日,比丘明照随听写记。”〔2〕

上面两个卷子是属于清朝学部直接调自敦煌藏经洞的卷子,应当没有问题。但明照的三条题记却让人难以理解。照理说六月一日已经说毕卷四十八,怎么到八月五日还在听讲。而另一卷又说六月十一日写卷四十七,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我怀疑卷四十八的第一条题记“六月”应当是“八月”的误写,该卷背面还有明照的题记:“大中十二年八月二日,尚书大军发,讨蕃开路。四日上磧。”如此,则明照在八月一日听讲完毕,八月二日记录张议潮出兵,八月五日整理笔记完毕。

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题记:“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苾芻智慧山。”〔3〕

富冈谦藏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三题记:“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苾芻智慧山记。”〔4〕

如果菜字25所记六月一日刚刚说毕卷四十八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在同月十一、十三日说完卷五十二和五十三,所以从题记年代顺序来看,这两条题记大可怀疑,虽然一件是大谷探险队得自敦煌,一件也早在1916年就在京都大藏会上陈列。

〔1〕《敦煌宝藏》第104册,583页;上山大峻1990,221页;施萍婷2000,486页。

〔2〕《敦煌宝藏》第104册,592页;池田温1990, No. 1927, 417—418页;施萍婷2000, 505页。

〔3〕罗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叶22a;上山大峻1990, 239页;池田温1990, No. 1925, 417页。

〔4〕池田温1990, No. 1926, 417页。据此,本卷最早著录于《第二回大藏会陈列目》,京都,1916年,48页。

## 五、大中十三年岁次己卯(859)

书道博物馆藏《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题记：“大唐大中十三年己卯岁正月廿六日，沙州龙兴寺僧明照，就贺跋堂，奉为皇帝陛下，宝位遐长；次为当道节度，愿无灾障，早开河路，得对圣颜。及法界苍生，同沾斯福。随听写毕。”〔1〕据上引 D<sub>x</sub>. 1610 写本，明照姓张，或许是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宗亲。上举菜字 25 写本背面，有他大中十二年八月二日关于张议潮出征凉州的记录，而此处则是他在听写《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时，为大中皇帝及出征在外的府主祈愿〔2〕。这些内容后人是无法伪造的，所以这个卷子题记所记录的法成讲经的时间，应当是可靠的，虽然它距离上一年六月讲完卷四十八已经半年以上了，考虑到此时法成已垂垂老矣，半年多只讲了四卷已经是非常不简单的了。

S. 6483《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五题记：“大中十三年岁次己卯四月廿四日，比丘明照随听写记。”〔3〕这是法成讲《瑜伽师地论》的最晚的可靠记录。

书道博物馆藏卷(散 0882)《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题记：“大中十三年龙兴寺僧明照随听写。八月五日，于开元寺三藏和尚法成说毕。”〔4〕这条题记不仅时间与其他卷子不合，而且文字顺序和词汇都不似明照所书，其为伪题无疑。

敦煌写本中有不少写本群是有相互关联的次序的，我们可以逐渐地建立起这些序列，并按照可以确定的年代、卷数、笔记等内涵，来区分序列中混

〔1〕 图版见《书苑》第 7 卷第 2 号，图版 50。上山大峻 1990，240—241 页；池田温 1990，No. 1928，418 页，图 155。

〔2〕 参看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150 页。

〔3〕 上山大峻 1990，221、230 页；施萍婷 2000，202 页。

〔4〕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333 页。



人的伪本,本文仅就法成讲经的笔记本有年代的题记加以讨论,希望为辨伪工作提出一项可行的方法。本来,作伪者希望用添加年款的方法来赢利,但由于他们不懂得敦煌卷子之深奥所在,还是露了马脚。当同一类写本有规则的年代记录陆续发表以后,可以帮助我们从正常的年代序列中剔除那些可能是后人添加的题记。这是我们辨别写本真伪可以利用的方法之一。但笔者在此特别要声明的是,本文的讨论,只限于上述写本的题记,而不希望关联到写本本身。有不少写本题记是假,但写本是真,我们剔除题记后,可以把这个写本放在它原本所处的位置,不必受到题记年代的牵连而不得其所。

**本文所用缩略语:**

池田温 1990 =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

孟列夫 1999 I,II = 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下,袁席箴、陈华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上山大峻 1990 = 上山大峻《敦煌仏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

施萍婷 2000 = 施萍婷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与余欣合撰,原载《敦煌学·日本学——石塚晴通教授退職纪念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65—74页。)

## 有关敦博本禅籍的几个问题

敦博本禅籍是指敦煌市博物馆藏 077 号禅籍(简称敦博本)。这部敦煌所出册子本禅籍共包含五种文献,即:

- (1)《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 (2)《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 (3)《南宗定邪正五更转》;
- (4)《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
- (5)《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部禅籍的校理工作,现就有关的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虽然敦博本禅籍的全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刊布,但禅学界早就知道这个本子的价值,因为其所抄录的五种禅宗文献,几乎均较敦煌所出其他抄本要好,被视为所谓“善本”。然而,前人对这五种禅籍的其他写本已经有过详尽的整理和研究,这为我们今天校录敦博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应当指出,由于前人主要是从禅学的角度来整理这些敦煌文献,对于它们作为敦煌写本的一些特性往往不太属意,这反而成为我们今天校理这部禅籍的重要着眼点。从“敦煌学”的角度,以“敦煌学”的方法来整理这部禅籍,是我们的目的与手法。正如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从曹溪到敦煌本《坛经》的传承,而重点分析敦煌各本的关系;又如我们坚持按敦煌写本原行一字不改地录文等等,都是在贯彻把这部禅籍作为敦煌文献加以研究的主导思想。

## 一、敦煌禅籍的发现与研究

在讨论敦博本之前,有必要对本世纪敦煌禅籍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限于篇幅,这里着重介绍上面五种文献的先行研究成果。

1900年敦煌藏经洞宝藏发现以后不久,一些比较精美的写本就开始在西北一带流散开来。1907、1908年,斯坦因和伯希和闻风而至,将写本菁华大宗攫取到手,带回伦敦和巴黎。1910年,清政府令当地官员将所余运回北京,由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收藏,但执事者既未将所余尽数运京,又不负责任,监守自盗,结果是又让此后几年内来寻宝的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的奥登堡及再访敦煌的斯坦因获取到不少写卷;而从敦煌到北京,途中流散亦不在少数,使得以后公私藏品仍颇为可观。

这些在藏经洞内封存了八百多年的古代写本中,包括一些十分珍贵的古佚禅籍。伯希和在藏经洞中检选材料时,就注意到禅宗史籍。在他写给法国远东学院的报告中,曾提到所得佛典重要者,有《历代法宝记》二本和《传法宝记》残本<sup>[1]</sup>。1916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前往伦敦,调查收集古逸未传佛典,其中包括几种禅籍。1922—1923年,矢吹氏第二次往伦敦调查资料,获得照片六千余枚,构成后来《大正新修大藏经》古逸经典的素材。其中1928年出版的《大正藏》第48卷,刊布了矢吹氏找到的《六祖坛经》(原编号S.377,现编号S.5475)的录文。1930年,矢吹氏又将图版发表于《鸣沙余韵》。由于《大正藏》的录文欠佳,因此,《鸣沙余韵》的图版对于学者来讲就更形重要。

1934年,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合作出版《敦煌出土六祖坛经》,用宋元时代的各种刊本,校订《大正藏》刊布的敦煌本,而且为了与兴圣寺本加

---

[1] P.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l'Extrême-Orient*, VIII, 1908; 此据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号,1935年,11页。

以对比,将全书分为57节。铃木与公田二氏的这个校本影响极大,成为以后一些校本的底本。此后,宇井伯寿于1941年发表《坛经考》<sup>〔1〕</sup>,也校录了敦煌本《坛经》,并用大小字区分其所考订出的慧能(敦煌本皆作惠能)说法部分和神会等附加部分,而且编制了敦煌本和大乘寺本、兴圣寺本、德异本、宗宝本的增减对照表。

到了六十年代,出现了两个敦煌本《坛经》的英译本。一个是1963年出版的陈荣捷译本<sup>〔2〕</sup>,另一个是阎波尔斯基(Philip B. Yampolsky)的翻译<sup>〔3〕</sup>,后者包括作者在日本时所作的汉文录文,校录中得到入矢义高、柳田圣山等禅学家的帮助,因此其校本颇有水平。柳田圣山本人则将《六祖坛经》译成日文<sup>〔4〕</sup>。

1976年,柳田圣山编辑出版了《六祖坛经诸本集成》,将敦煌本、兴圣寺本、天宁寺本、大乘寺本、高丽传本、明版南藏本、明版正统本等11种《六祖坛经》全部影印出来<sup>〔5〕</sup>,极便学人参考。1978年,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的《慧能研究》出版,在资料篇中对照校录了敦煌本、大乘寺本、兴圣寺本、德异本、宗宝本《六祖坛经》,使读者可以对各种本子之间的增减关系一目了然。此后不久,由于找到了最接近惠昕本的真福寺本,石井修道撰写长篇论文《惠昕本〈六祖坛经〉之研究——定本的试作及其与敦煌本的对照》<sup>〔6〕</sup>,作为其

〔1〕 载《第二禅宗史研究》,1941年,东京:岩波书店出版。

〔2〕 Wing-tsit Chan, *The Platform Scripture*,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3.

〔3〕 Philip B. Yampolsky,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4〕 柳田圣山《禅语录》(《世界の名著》续三),1974年,东京:中央公论社,93—179页。

〔5〕 此后发现的较为重要的《六祖坛经》抄本,除敦博本之外,还有真福寺本,见石井修道《伊藤隆壽氏発見の真福寺文庫所蔵の〈六祖壇經〉の紹介》,《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0号,1979年,74—111页。

〔6〕 《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1号,1980年,96—138页;同杂志第12号,1981年,68—132页。

复原惠昕本的参考,全文校录了敦煌本。

此外,1981年和1983年,郭朋先生分别出版了《坛经对勘》和《坛经校释》<sup>〔1〕</sup>;1983年出版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1990年出版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中,分别收有佛教学者和汉语研究者的《坛经》校录本。近年来,有关此本的校录成果,还有韩国金知见的《校注敦煌六祖坛经》<sup>〔2〕</sup>,校记以双行小注形式夹在文中,文字不多,其详细的校勘记尚未见到;法国学者凯瑟琳·杜撒莉(Catherine Toulssaly)所作的译注和汉文录文,虽十分简略,但许多地方较前人有所进步<sup>〔3〕</sup>。

长期以来,S.5475《六祖坛经》一直被认为是敦煌的“孤本”,同时又是一个错误极多的“恶本”,所以,虽经学者们反复校正,仍不圆满。事实上,属于敦煌本系统的抄本并不仅此一件。早在1926年,叶恭绰撰《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经典》中,著录了一件大谷探险队所获《南宗顶(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密(蜜)多(衍文)经》<sup>〔4〕</sup>,就是另一件敦煌本《六祖坛经》。此本迭经《昭和法宝总目录》第1卷所收《大连图书馆旅顺博物馆藏大谷光瑞氏将来敦煌出土经典目录》、《新西域记》卷下附录《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著录,知为册子装,共45叶,首尾完整,且有显德伍(六)年己未岁题记,遗憾的是现已不知所在<sup>〔5〕</sup>,只有首尾两帧照片最

〔1〕《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1年;《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

〔2〕载金知见编《六祖坛经的世界》,汉城:民族社,1989年,1—34页。据这部论集中的有关文章,知道韩国还有李能和《敦煌唐写本坛经·坛经读诀》,京城:金鸡山房刊,不详年代;性彻编译《敦煌本坛经》,海印寺藏经阁,1987年刊,均未得寓目。

〔3〕Catherine Toulssaly, *Sixieme Patriarche: Sutra de la Plate-form*, Paris 1992.

〔4〕《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6年12月出版;改编本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四《敦煌遗书散录》,散0179号,商务印书馆,1962年,317页。

〔5〕详见尚林、方广錫、荣新江合撰《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1991年3月京都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刊。

近才在龙谷大学图书馆发现,由井之口泰淳等发表<sup>[1]</sup>。我们期望将来能够找到这个完本。

《六祖坛经》的另一个敦煌抄本,是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冈字48号。此卷正面书《无量寿宗要经》,背有《坛经》残本。虽然早在1931年出版的陈垣编《敦煌劫余录》中,就著录此卷“背写《六祖坛经》数段”(第498叶正面),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34年来北平图书馆查访敦煌禅籍的铃木大拙失之交臂<sup>[2]</sup>,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略而不书,直到1986年9月台北出版了黄永武编《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在北京图书馆新编号8024(即冈字48号)下,抄录了该卷背面的尾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才又引起日本禅学家的注意。田中良昭撰《敦煌本六祖坛经诸本之研究——特别介绍新出之北京本》,校录此本残存的约占《坛经》三分之一的文字,并介绍了它作为卷子本的价值<sup>[3]</sup>。在以上三本《坛经》中,北图藏本文字最为整洁,可惜半数以上文字未抄,与斯坦因本无法做全面校正。

此外,在甘肃、内蒙发现的西夏文佛典中,也有《六祖坛经》的译本。1932年,罗福成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中,发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译文》。1938年,川上天山考证此六叶残本是1070年在敦煌翻译的,文字与敦煌本(斯坦因本)完全一致<sup>[4]</sup>。此后,西田龙雄发现大谷探险队所获的一叶,可以和上述北京图书馆藏卷相缀

---

[1] 井之口泰淳、白田淳三、中田笃郎共编《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探险队将来敦煌古写经目录(图版)》,1989年3月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刊,图版113—114。据同时找到的旅顺博物馆编于二、三十年代的《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稿本,《坛经》目下,记有“首尾写”,知当年只拍了首尾的照片,见小田义久、中田笃郎编《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第壹分册,1989年9月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刊,37页。

[2] 此行调查的结果,铃木大拙编为《敦煌出土少室逸书》和《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1935—1936年出版。

[3] 《松ヶ岡文庫研究年報》第5号,1991年,9—38页。

[4] 川上天山《西夏語訳六祖壇經について》,《支那佛教史学》第2卷第3号,1938年;收入柳田圣山编《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一书。

合<sup>〔1〕</sup>。据史金波先生的调查,同一抄本的其他散叶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日本天理图书馆等处,他认为西夏文本与敦煌本相近但不相同,其所据汉文底本是现已失传的另一本子,最近,史金波先生将已见到的十二叶西夏文本译成汉文发表<sup>〔2〕</sup>。

在矢吹庆辉发现《六祖坛经》后四年的1926年,胡适趁参加庚子赔款会议之便,到伦敦和巴黎查访禅宗史料,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神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P. 3047、P. 3488),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发现神会的《顿悟无生般若颂》(即《显宗记》),1930年据此校订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并撰《荷泽大师神会传》,置于卷首。胡适的发现,引发了铃木大拙对敦煌禅籍的重视。1934年,铃木大拙来北平调查禅籍,找到了寒字81号《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影印校录在1935—1936年所编印的《敦煌出土少室逸书》和《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两书中,补充了胡适收集的神会著作之不足。其录文又载于《禅思想史研究第三》一书中。

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对禅学研究贡献至巨<sup>〔3〕</sup>,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将四卷《遗集》译成法文,并据P. 3047、P. 3488原件,校正了胡适录文的错误<sup>〔4〕</sup>。同时,谢氏还用他找到的P. 2045号写本,校定了《遗集》的《定是

---

〔1〕 见《西域文化研究》第4卷《中央アジア古代語文献》别册,京都法藏馆,1961年,图版41;参看西田龙雄《西夏译华严经》第1册,京都大学文学部,1975年。

〔2〕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61—162页。参看史金波等编《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版372并330页解说;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90—100页。

〔3〕 参看柳田圣山《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载作者所编《胡适禅学案》,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年;楼宇烈《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六祖坛经的世界》,81—96页。

〔4〕 Jacques Gernet, *Entretiens du Maître de Dhyāna Chen-houei du Ho-tsö* (668—760), Hanoi 1949, 2e ed., Paris 1977。胡适曾把谢和耐的校订成果,用朱笔过录到自存本《神会和尚遗集》上,此本已由台北胡适纪念馆于1968年影印为新版《神会和尚遗集》。

非论》部分〔1〕,并把同一写本上所抄的《坛语》和《五更转》部分,提供给 Liebenthal。Liebenthal 则把这两种文献译成英文发表〔2〕。1958年,胡适在此基础上,发表《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用 P. 2045 和寒字 81 号校录出《坛语》,附录 P. 2045 的《五更转》,又据 P. 2045、P. 3047、P. 3488,校录出完本《定是非论》〔3〕。收入 1968 年新版《神会和尚遗集》的胡适校录本,几乎成为此后人们研究神会时依据的定本。后来,篠原寿雄、中村信幸、田中良昭均以此文为底本,把《坛语》和《定是非论》译成日文〔4〕。

上举《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 2 卷第 4 册中收录有《坛语》和《定是非论》的录校本,因为是以胡适初校本为底本,所以不全。相对而言,晚出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所收这两种文献,分别是以 P. 2045、P. 3047 与 P. 2045 拼合的敦煌写本照片为底本,以《神会和尚遗集》为校本,较有可取之处。

《南宗定邪正五更转》是宣扬禅宗的一首歌辞,由于其形式属于曲子词中定格联章一路,因此,禅学家之外,它也是曲词家们整理研究的对象。

〔1〕 J. Gernet, "Complément aux entretiens du Maître de Dhyāna Chen-houei",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l'Extrême-Orient*, XLIV. 2, 1954, 453—466.

〔2〕 W. Liebenthal, "The Sermon of Shen-hui", *Asia Major*, new series, III. 2, 1952, 132—155.

〔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9 本, 1958 年, 828—857 页; 又收入新版《神会和尚遗集》和《胡适禅学案》。

〔4〕 篠原寿雄《荷沢神会のことば——訳注〈南陽和上頓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語〉》,《驹泽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31 号, 1973 年, 1—33 页; 同作者《荷沢神会のことば第 2——訳注〈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驹泽大学《文化》创刊号, 1974 年, 101—170 页; 《文化》第 2 号, 1976 年, 79—124 页。中村信幸《〈南陽和上頓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語〉翻訳》,《驹泽大学大学院佛教学研究會年報》第 8 号, 1974 年, 137—146 页; 同作者《南陽和上頓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語(译注)》,《大乘佛典·中国日本篇》第 11 卷第 II 册《敦煌》, 东京: 中央公论社, 1989 年, 87—114 页; 田中良昭《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译注)》, 同上书 203—250 页。



1937年,许国霖《敦煌杂录》发表了露字6号《五更转》和咸字18号《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名称不同,内容却是一样的。1954年,任二北《敦煌曲校录》又校录了S.2679、S.4634、S.4654、S.6923(二首)。如上所述,此曲抄在P.2045《坛语》之后,1958年胡适校录《坛语》时,曾附录此文。两年以后,胡适更在《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一文中,立《神会和尚的五更转曲子》一节,分别校录了S.2679、S.6083、S.6923、S.4634以及P.2045、咸字18号、露字6号。此后,幻生《敦煌佛经卷子巡礼》、川崎ミコリ有校本〔1〕。而任二北(半塘)又将其《校录》一书发展为《敦煌歌辞总编》,其下编1443页以下录有此辞,参校本增加了S.6083、P.2045、P.2270。

除敦博本之外,净觉《注心经》的写本目前只找到一件,即S.4556,这是竺沙雅章在1954年发现而于1958年刊布的〔2〕。此后不久,吕澂先生据向达先生的手抄本(即敦博本),校录发表〔3〕。柳田圣山在《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附录中,合两本校出目前来说最好的本子。以上前人所取得的成绩为我们校录未刊的敦博本禅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陆续找到的有关写卷,都是我们用作校勘的材料。我们所能补充的新资料,只有S.7907《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残卷,这是本文作者之一荣新江1991年在英国图书馆编S.6981以下文书时发现的。

## 二、敦博本的传存与研究

现藏敦煌市博物馆的077号禅籍,在《坛语》之前的空行中,有原藏者

---

〔1〕 幻生《敦煌佛经卷子巡礼》,台北,1981年,225—241页。川崎ミコリ《修道偈II——定格联章》,《敦煌仏典と禪》(《讲座敦煌》第8卷),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264—265页。

〔2〕 竺沙雅章《浄覚夾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について》,《佛教史学》第7卷第3号,1958年。

〔3〕 吕澂《敦煌写本唐释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附说明)》,《现代佛学》1961年10月号,32—38页。

的简短题记一行,文曰:“民国廿四年(1935)四月八日,获此经于敦煌千佛山之上寺,任子宜敬志。”按上寺在莫高窟南端,与题为“雷音禅林”的中寺邻接。知任子宜先生是1935年在莫高窟当地获得这部文献的。由伯希和检取藏经洞宝藏,将珍本携之而去的情形推测,这件比较完整的重要禅籍,应当是早已流传出来的藏经洞出品,原本可能藏在住持上寺的喇嘛手里,这里的喇嘛曾将一卷藏经洞写本出示给1907年3月初访敦煌莫高窟的斯坦因,此时斯坦因尚未从王道士处获取到大批藏经洞宝藏<sup>[1]</sup>。

1943年,向达先生奉北京大学之命,参加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考查,在任子宜先生家获见此本,首先发现了这部禅籍的学术价值。在翌年9月完稿的《西征小记》一文中,向达先生对此本做了简单的描述和考证:

又梵夹式蝶装本一册,凡九十三叶,计收《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及神秀门人净觉注《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凡四种,只《定是非论》首缺一叶十二行,余俱完整。未有比丘光范跋云:

遗法比丘光范幸于末代获偶真詮。伏睹经意明明,兼认注文了了。授之滑洫,藏保筐箱,或一披寻,即喜顶荷。旋妄二执,潜晓三空,寔众法之源,乃诸佛之母。无价大宝,今喜遇之;苟自利而不济他,即滞理而成吝法。今即命工雕印,永冀流通。凡(小字:下缺约一叶)

光范《跋》缺一叶,不知仅刻《心经》一种,抑兼指前三者而言。任君(子宜)所藏,当是五代或宋初传抄本,每半叶六行,尚是《宋藏》格式也。《南宗定是非论》,英、法藏本残缺之处可以此本补之。《南阳和上语录》首尾完整,北平图书馆藏一残卷。《六祖坛经》,可与英法藏本互校。净觉注《心经》,首有行荆州长史李之非序,从知此注作于开元十五年。净觉乃神秀门人,书为《大藏》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

[1] 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 London 1912, pp. 29-30.

窥一二。四者皆禅宗之重要史料也。〔1〕

这里的介绍和考证虽然有些差错,如称《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称《六祖坛经》有法国藏本等,但考虑到向先生是在当时敦煌当地无书可覆的情况下写这些文字的,小小的失误可以原谅,而向先生首发之功实不可没。

事实上,向达先生的上述描写是取自他当年所作录文本中的题跋。有幸的是,向先生的录文本经过五十年的岁月,今天仍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并将很快出版〔2〕。从向先生的抄本中的题跋得知,他在1943年和1944年两次到敦煌,曾先后将这部禅籍抄过两遍,现在整理出版的是第二次的抄本,其原委具见该抄本最后二页的总跋文中,现具引如下:

右敦煌任君子宜藏石室本禅宗史料,计《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六祖坛经》及神秀门人净觉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四种。原为梵夹本,作蝴蝶装,高三二·二公分,广一一·七公分,存九十三叶,每半叶六行,行字数不等,格式与宋藏略同,首尾大约各缺一叶。未有比丘光范跋,谓“命工雕印,永冀流传”云云。不知为雕印四种,抑仅指净觉《心经》而言,惜有缺叶,不知原本雕于何时,唯据写本字体及书写格式推之,最早当不能过于五代也。《南宗定是非论》胡适之据英法藏本校印于《神会和尚遗集》中,而俱有残缺,不及此本。《坛经》胡氏亦有校本。南阳和上即神会,《坛语》北平图书馆藏一残卷。净觉《注心经》则为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以略窥一二,治禅宗史者之要典也。

去岁居此,曾从任君假录副本,今春至江津内学院,吕秋逸先生见而悦之,因以奉贻。五月重来敦煌,即谋更写一本,卒卒未暇。七月杪,

〔1〕 原载《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22页;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368—369页。

〔2〕 向达校录《敦煌余录》,将由荣新江整理出版。

移居莫高窟，日长昼永，因从任君复假原书，重事移录，今日写毕，略记数语，以识因缘，并以志任君之高谊云尔。卅三年(1944)八月十三日，觉明居士谨记于敦煌莫高窟。

这显然是同年九月完稿的《西征小记》之所本。所记胡适校《坛经》、《定是非论》有英藏本等亦有误，但向先生对这部禅籍价值的判断，对当时所能公布的有关敦煌禅宗史料的掌握，以及视手中秘籍为学术公器，将自己辛苦所抄慷慨赠人，这些都令我们景仰。他的初录本现不知所在，仅以我们整理的第二次录文本来看来，向先生一笔一划地抄录了全部五种文献，蝇头小楷，极为工整。每篇后有短跋，记抄写时间。其中《坛经》后有跋云：

《大正藏》第四十八卷亦收此经，所据为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石室本。兹取《大正藏》本与此对勘一过，其有异同，朱书于旁，日本人校语，间采一二，记于书眉。今日勘一遍。卅四年(1945)二月一日，觉明居士谨记于四川李庄寓庐。

可见，向先生一回到四川，就着手校订。另外，向先生还据《神会和尚遗集》校订了《定是非论》。应当说，对敦博本禅籍第一个进行全面研究的人，是向达先生。只是由于此后不久即有抗战胜利，复员搬家，解放初期向先生又重点研究中西交通史，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使向先生始终未得以有时间把他的校订工作做完，而抄本也就一直没有面世。如上所述，1961年《现代佛学》10月号刊出的吕澂先生《敦煌写本唐释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附说明)》一文，就是据向先生的抄本，而柳田圣山的合校本，也得益于向先生的抄本。

至于原本，自向达先生著录后学界一直不知所在。柳田圣山曾经根据向先生的记录四处查访，也没有结果。事实上，此本后来入藏于敦煌县(今改为市)博物馆。敦煌县博物馆编(荣恩奇整理)《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著录：

〇七七(一〇一七七)《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波若波罗蜜经》

蝴蝶装,首尾残。麻纸,纸质较厚。纸高三二·二厘米,宽二三·四厘米,每四至六张纸叠在一起,中间对折,穿绳为一叠。残册现存九叠,九十三页,用绳穿连,成为高三二·二厘米,宽一一·七厘米,厚一八厘米的小册子。每页均双面书写,每面六行,行二二一二六字。乌丝栏高二九·五一三〇厘米,栏宽一·六一一·九厘米。

此册内容包括:

1.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
2. 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3. 南宗定邪正五更转。
4.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若波罗蜜经。
5. 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时代:宋。<sup>〔1〕</sup>

这里虽然未提向达先生的著录,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此即向先生所记任子宜旧藏本,使我们得知这个珍贵的写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下设的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派本文作者之一邓文宽前往敦煌,与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摄影师杨术森一起,在荣恩奇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将包括这部禅籍在内的敦煌市博物馆藏卷摄回。以后我们即开始对这五种禅籍加以整理,但由于参考文献不足,工作进展较慢。直到近年,海外研究文献的收集有了长足的进步,才将整理工作全面铺开。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杨曾文先生也获得此册禅籍照片一份,先是在1987年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上,简要报告了《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坛经〉、〈定是非论〉等文献的学术价值》<sup>〔2〕</sup>,后来又在

〔1〕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583—584页。

〔2〕 《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43—47页;后收入《中日佛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08—116页。

1989年韩国出版的《六祖坛经的世界》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敦博本〈坛经〉的学术价值》,与斯坦因本对比,稍微详细地说明了敦博本在校勘和研究《坛经》流传范围及流行时间上的价值。文末附有敦博本《坛经》首尾照片,应当是敦博本原貌首次公之于众,使人们得以见到此千载秘籍的真面目。此外,杨先生近刊《〈六祖坛经〉诸本的演变和慧能的禅法思想》一文中,也充分利用了他对敦博本的研究成果<sup>〔1〕</sup>。还应提到的是,上节介绍的田中良昭日译本《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也利用了杨曾文先生提供的敦博本照片,因此较早期日文译本完备。1993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杨曾文先生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即敦博本的校录与研究。

### 三、敦博本的年代及其构成形式

根据我们对原件的观察,结合上述前人的描述,我们可以对敦博本的外观具有更为详细的认识。而写本外观的正确认识,对于判定写本的年代以及推断写本的缺叶,都有重要的帮助。

敦博本是册子本形式,大约每五叶(folio)叠在一起对折,使一叶变成二页(page),现存九叠,计93叶,用绳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册子。每页六行,有界栏。每行22至26字,字体工整。从书法判断,前四种文献,即《定是非论》、《坛语》、《五更转》、《坛经》,是出自一个书手;《注心经》一种,字体不如前者舒展,颇为紧凑,有魏碑之风,双行小注细密紧严,字体工整,一笔不苟,是另一人所书。虽然字体有所不同,知道出自两人手笔,但五种文献是原本就装订成册的,构成一个整体。

首页文字始于《定是非论》之“辩邪正,定是非,此间有卅余个德法师为禅师作证义在”,前有残缺。根据P. 3047保存完整的《定是非论》首部,所缺约一千二百余字,以每页6行,行24字计,前面所缺约有九页,而不

〔1〕《中国文化》第6期,1992年,24—37页。

是向达先生所推测的一页 12 行。九页也就是五叶，正好构成对折的一叠，所以说，敦博本前面应当是缺了一叠五叶，而不是一页。尾页有比丘光范的跋，未完而残。既然已写到了跋语，向先生推测以下仅失一页，当距事实不远。

根据研究敦煌写本形制的专家考查大批册子本而得出的结论，这种书籍形式是介于经折装和包背装之间的一种形态，流行于九、十世纪<sup>〔1〕</sup>，在敦煌来说，即吐蕃统治中后期和归义军时期。在九、十世纪的范围内，对比其他同类资料，参考敦煌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推测出敦博本的大致年代。

在敦博本所收的五种禅籍中，以《坛经》最能说明问题。如上所述，除敦博本外，已知的敦煌抄本《坛经》还有三件。

一是 S. 5475，为蝴蝶式册子装，与敦博本相同。此本的发现者矢吹庆辉在《鸣沙余韵解说》中称全部有 46 叶，系据其所拍照片统计，与原件略有不同。据翟林奈(L. Giles)《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的记载，总共有 52 叶，每叶长宽 27 × 11 厘米，中间对折，第 1、2、44 背、45 正、49、50 叶空白无字<sup>〔2〕</sup>。

二是北京图书馆冈字 48 号，为卷子本，写于张良友抄《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卷子背面，首尾俱残，始于敦博本《坛经》第 119 行“为妄念故，盖覆真如”之“念”字，终于敦博本第 288 行“尘劳即是鱼鳖”句，下衍出“即是海水”，后又写“烦恼”二字，涂去，再下接书尾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此本首尾文字前后有余白，但起讫均破句，知抄者并不明文义，也说

〔1〕 Fujieda Akira,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I", *Zinbun*, No. 9, 1966, pp. 25-26; 藤枝晃《文字の文化史》，岩波书店，1971 年，187—191 页；新版，1991 年，197—199 页；翟德芳、孙晓林译本《汉字的文化史》，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 年，96 页；J. -P. Drège, "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ed. M. Soyamié, Genève-Paris 1979, pp. 17-28, pls. I-IX.

〔2〕 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p. 152.

明此本虽书于卷子背面,但抄自散乱后的册子本或无疑义。

三是旅顺博物馆旧藏本,也是蝴蝶装册子本。现存首尾照片,首页为《坛经》开头,尾题“蜜藏经一卷。显德伍年己未岁三月十五日(以下模糊不识)”。据《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记载,此册子本总共有“四十五枚”,即45叶,对折成90页,每页8行,行22字左右,共约15840字。可见《坛经》之后抄录的是《蜜藏经》,并非《蜜藏经》是《坛经》的一部分。对照首尾叶照片的文字,当出一人之手,因此“显德伍年己未岁三月十五日”的年代,也是这件《坛经》的抄写年份,唯显德五年是戊午,己未是显德六年(959)。

单从形制来讲,北图本虽是卷子,但源于册子本,因此现存四件《坛经》抄本都可以视为册子本。其中北图本写于《无量寿宗要经》背,这部经典在吐蕃时期极为流行,张良友其人还抄有多本,均属吐蕃时期无疑<sup>[1]</sup>。照常理讲,写在背面的《坛经》应当距吐蕃时期不远,或可推测是成于归义军张氏时期。旅博本有年代,在十世纪中叶。比较而言,敦博本最为整洁,旅博本与斯坦因本较乱,文字、书法皆不佳,大概出于十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这样的印象,也是我们从写本中的方音差异上看出来的。

早年,罗常培先生曾据敦煌写本汉藏对音《千字文》(P. 3419 = P. t. 1046)、《大乘中宗见解》(Ch. 9. ii. 17 = C. 93)、《阿弥陀经》(Ch. 77. ii. 3 = C. 130)、《金刚经》(Vol. 72b + Vol. 73 + C. 129)以及保存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撰成《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总结出一些吐蕃占据陇西时期(763—857年)的西北方音特征,并且和兰州、平凉、西安、三水、文水、兴县的现代西北方音做了比较<sup>[2]</sup>。由于材料的限制,今天看来,罗先生对于敦煌文献的年代及其所代表的西北方音区域的认识,都不免受到局限。

[1] 参看上山大峻《敦煌仏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437—456页;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389页。

[2]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上海,1933年。



此后有不少学者利用敦煌出土的俗文学材料,来补充或订正罗先生的结论<sup>〔1〕</sup>。近年,利用更多的汉藏对音资料研究同一问题的高田时雄先生,出版了《敦煌资料所见之中国语言历史的研究——九、十世纪的河西方言》一书,补充了汉藏对音资料《天地八阳神咒经》(P. t. 1258)、《法华经普门品(观音经)》(P. t. 1239)、《南天竺菩提达磨禅师观门》(P. t. 1228)、《道安法师念佛赞》(P. t. 1253)、《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 t. 448)、《法华经普门品》(音注本,P. t. 1262)、《寒食篇》(P. t. 1230)、《杂抄》(P. t. 1238)、《九九表》(P. t. 1256)以及于阆文、粟特文转写汉字资料,他依据敦煌的历史和各本的方言特征,认为这些资料应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金刚经》、《阿弥陀经》、《八阳经》、《观音经》、《寒食篇》、《杂抄》接近此类;第二类是《菩提达磨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赞》、《般若心经》、《普门品》近之;而《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则具有独自的特征。从方音上讲,第一类代表了唐朝的标准语,也即以长安话为基础的方言,第二类是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方言。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吐蕃统治敦煌以前,由于唐朝完善的行政制度的贯彻,敦煌地区的文献是以标准语为规范的。自787年吐蕃占领敦煌以后,一方面由于异族的统治使唐朝的规范意识淡薄,一方面受藏语的影响,本地方言渐渐抬头。《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吐蕃传》记:“文宗时(827—840年),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改。”就反映了这种情形。到848年张议潮起义,851年建立归义军政权后,作为极具独立性的河西小王朝首府,敦煌地区的河西方言得到充分的发展。除了汉藏对音材料外,敦煌俗文学

〔1〕 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193—217页;松尾良树《音韵資料としての〈太公家教〉——異文と押韻》,《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17号,1979年,213—225页;同作者《敦煌写本に於ける別字——〈韓擒虎話本〉斯2144を中心に》,《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18号,1979年,246—258页;张金泉《唐民间诗韵》,《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51—297页。

作品以及与敦煌交往的于阗、回鹘人在敦煌所写的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文书,均有明显的河西方言特征〔1〕。

高田氏不用泛泛的“西北方音”概念,而用河西方言,以及他对这些方音材料的年代考订,均较前人精细。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研究结论,排除前人所总结的西北方音特征中不符合河西方言的部分。具体而言,总结我们统计的四种敦煌《坛经》抄本中的方音现象,方音混同在敦博本和北图本中比较少见。相反,在斯坦因本中却大量出现。如止、遇二摄的混同普遍存在,“于”作“衣”、“依”,“起”作“去”,“与”作“汝”,“如”作“于”,“以”作“与”,“如”作“而”,“之”和“知”作“诸”,“虽”作“须”等等。根据高田氏书中所列第一类的《金刚经》、《阿弥陀经》、《八阳经》和第二类的《道安法师念佛赞》、《般若心经》中的“诸”字,藏文注音均为“ci”,可知这是当时整个西北地区的方音特征〔2〕。作为河西方言最显著的特征,是在敦博本和北图本中的宕、梗二摄字的鼻音韵尾-ng,在斯坦因本中均脱落,如“迷”作“名”,是梗摄清韵词尾脱落的结果;又如“听”作“体”,“定”作“第”,“星”作“西”,“令”作“礼”等,都是梗摄清韵音变的结果。此外,如声母“端”、“定”互注和以“审”注“心”,韵母“侵”、“庚”互通,这些唐五代河西方音特有的语音现象,我们都在《坛经》抄本中找到了实例,从而对这些写本的文字差别获得了语言学的认识,也为我们正确地校理它们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坛经》四本中,旅博本仅存一页,可比材料太少。其他三本的关系,大体而言,敦博本与北图本接近,极少明显的河西方言特征;斯坦因本的河西方言特征却极为明显。结合敦煌的历史,斯坦因本应当产生于十世纪,即河西方言占主导地位的曹氏归义军时期。而敦博本和北图本应产生于九世

〔1〕 高田时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国語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年。参看Takata Tokio,“Le dialecte chinois de la région du Hexi”,*Cahiers d'Extrême-Asie*, No. 3, 1987, pp. 93-102;梁海星译《九—十世纪河西地区汉语方言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45—50页。

〔2〕 上注引高田书312页。

纪后半。这种考订是和我们上面所说北图本正面的年代、册子本形制的大体一致等等因素相吻合的。另外,写本本身也透露出它们的先后关系,如敦博本第227行,有四字距的空格,应是书手略而不抄的四字;到了北图本,就只有一字格了,说明这个不懂《坛经》文义的书手,也不明此处含义,故此只留一字格;斯坦因本此处没有空格,说明更晚时期的抄手见到的本子已完全略而不空了。还有敦博本第8行“本官范阳,左降迁流岭(卜)南”一句中的“岭”字,写好后又加删除符号(如“卜”字),表明其所据原本有此字;但斯坦因本此处没有此字,也说明它的抄写晚于敦博本<sup>[1]</sup>。虽然敦煌所出《坛经》均属于一个抄本系统,但它们之间却看不出直接的转抄关系。由于不是短期内抄成的,说明其时敦煌已有不少《坛经》抄本流行。从册子本的形制来说,它们均属于私人图书,但似乎并不那么神秘。

以上利用四种《坛经》写本的对比,推测敦博本禅籍抄成于张氏归义军时期。其他几种文献中,除残片和没有年代特征的抄本外,P.2045卷子本抄有《定是非论》、《坛语》、《五更转》,次序和敦博本一致,据上山大峻先生考证,大致抄写于吐蕃时期<sup>[2]</sup>。P.3047也是卷子本,抄有《定是非论》,背面是吐蕃统治时期的杂文书,其中包括《吐蕃辰年七月寺户张昌晟取面等历》<sup>[3]</sup>,其正面所写当距此不远。S.4556《注心经》,卷子装,纸质甚佳。这些写本应当早于敦博本,而以P.2045与之最为接近。

从敦博本的册子装来看,它是私人所用的个人图书,而不是属于某个寺院的图书馆。至于它的来历,也不是没有迹象可寻。最后一页有光范跋文,称:

遗法比丘光范,幸于末代,获偶(遇)真诠。伏睹经意明明,兼认注文了了。授(受)之滑纳,藏保筐箱,或一披寻,即喜顶荷,旋忘二执,潜

[1] 参看邓文宽《敦煌本〈六祖坛经〉书写符号发微》,《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

[2] 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411页。

[3] 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1990年,402页。

晓三空,寔众法之源,乃诸佛之母。无价大宝,今喜遇之。苟自利而不济他,即滞理而成吝法。今即命工雕印,永冀流通。凡(下缺)

杨曾文先生正确地指出,这篇跋文只是《注心经》的跋,而不包括其他四种抄本。光范得到《注心经》的地点“滑汭”,据杨先生的考证是在洛阳东北的滑州治所白马(滑台)<sup>〔1〕</sup>,可以推知光范是洛阳一带的和尚,他命工雕印《注心经》的地点,也应在洛阳附近。敦博本《注心经》并非光范原印本,而是抄自光范印本,也就是说抄自来源于洛阳一带的印本,抄书手工作认真,把正文之外的跋也一字不丢的抄了下来,这在敦煌文书中还有其他例证<sup>〔2〕</sup>。如上所述,虽然《注心经》及其跋文的字体与前四种文献的笔迹不同,但它们订成一册,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光范的跋文虽然不包含前四种文献,但也透露出同样来自洛阳一带的可能性。洛阳是神会“广开法眼”的地方,人称荷泽大师就是因为他他在洛阳荷泽寺创立了荷泽宗<sup>〔3〕</sup>。敦博本所含的文献,第一种《定是非论》是开元二十年(732)神会在滑台大云寺无遮大会上攻击北宗的记录,第二种《坛语》是神会在南阳时期(720—745年)著作,第三种《南宗定邪正五更转》一般认为也是神会所作<sup>〔4〕</sup>。关于敦煌本《坛经》的来历说法不一,但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是神会或神会一系的僧人增补而成,因此才有神会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因此可以说,敦博本《坛经》前四种文献,无一不与神会有关,而且大多与洛阳牵连。《注心经》的作者净觉,是北宗神秀、玄曠的弟子,《注心经》是属于北宗禅的文献,何以出现在这部神会系禅籍的后面?对此,可以做出两种解说。

第一种可能是,正如柳田圣山教授所考证的那样,神会宣传的般若主义思想、以菩提达摩为南宗的主张,甚至传衣付法的原型,实际多来自净觉的

〔1〕 《六祖坛经的世界》,36页。

〔2〕 参看舒学(白化文)《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叙》,《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294—299页。

〔3〕 见洛阳新出土的《神会塔铭》,《文物》1993年第3期,67页。

〔4〕 新版《神会和尚遗集》,452—480页。

《注心经》<sup>〔1〕</sup>。特别是《注心经》李知非序所称“古禅训曰：宋太祖之时，求那跋陀罗三藏禅师以《楞伽》传灯，起自南天竺国，名曰南宗”，这可能是敦博本禅籍编者之所以将《注心经》与神会系著作合编的原因。事实上，净觉所谓“南宗”，不是神会所说的“南宗”，而是指从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以来的北宗禅。

第二种可能是，正如饶宗颐教授指出的那样，八世纪末曾在沙州滞留的神会弟子摩诃衍所讲的“大乘顿悟”说，本质上是融合南北宗而成的<sup>〔2〕</sup>。姜伯勤先生据敦煌邈真赞写本所记一些敦煌高僧“南能入室，北秀升堂”或“灯传北秀，导引南宗”，论证了归义军初期敦煌地区南北宗调合的景象<sup>〔3〕</sup>，这和上山大峻先生指出的此后敦煌禅籍兼具南北宗的内容一点正相符合<sup>〔4〕</sup>。因此可以说，敦博本禅籍的构成也是南北二宗调合的产物，这种可能性与敦煌的历史更相符合。

#### 四、敦博本的价值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敦博本的价值。

从文献学上来讲，敦博本的《坛经》、《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和《坛语》三种重要的禅籍，都是现存敦煌写本中的精抄本，是我们今天整理和利用这三种禅籍最重要的依据。

敦博本禅籍使我们可以判定出其他敦煌写本中河西方音的特征，从而可以大体理清敦煌本《坛经》等文献的抄写地域和年代。

〔1〕 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書の研究》，京都，1968年，112—113页。

〔2〕 饶宗颐《神会门下摩诃衍之人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合问题》，《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705页。

〔3〕 姜伯勤《论禅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5—17页。

〔4〕 上山大峻上引书427页。

敦博本的册子本形态,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晚唐五代时敦煌禅籍在禅僧或民众中流传的情形,它们似乎主要是由私人使用的书籍。

敦博本五种禅籍抄在一起的构成形式,反映了当时敦煌或北方一些地区的禅法思想,它很可能是南北二宗调合的产物。

(与邓文宽合撰,原载《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5—16页。)

## 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

敦煌文献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其中保存了一大批已佚的禅宗典籍。敦煌禅籍的研究成果,已经使我们对唐代佛教史和思想史有了新的认识。近年来,在周绍良先生指导下,与邓文宽学长合作整理敦博本《六祖坛经》和神会文献,已辑成《敦博本禅籍校录》书稿。今值周先生华诞,谨就平日所辑敦煌禅籍中灯史类资料而为学者所遗漏者,略做整理考释,以为先生八十寿庆。

### 一、《传法宝纪》(S. 10484)

此书是杜朏在唐玄宗初年(713年左右)撰写的一部北宗灯史,早已佚失。

1930年,矢吹庆辉氏在《鸣沙余韵》中做了介绍。1932年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古逸部,校录了P. 2634文字<sup>〔1〕</sup>。1933年,矢吹氏在《鸣沙余韵解说》中,也对此本做了解说,并引述了穴山孝道氏《关于〈传法宝纪〉》一文观点。1939年,宇井伯寿氏也据此本做了校录,收在所著《禅宗史研究》中。此本首完尾残,存53行,行21—22字不等,首题云:“传法宝纪并序 京兆杜朏字方明撰。”<sup>〔2〕</sup>

1936年,神田喜一郎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发现了P. 3559《传法宝纪》全本,先是在其1938年自刊的《敦煌秘籍留真》中,发表了首部的图版。

---

〔1〕 《大正藏》第85卷,1291页。

〔2〕 《敦煌宝藏》第123册,52—53页。

1942年,神田氏撰写了《关于〈传法宝纪〉的完帙》一文,附上所有图版,发表于《积翠先生华甲寿纪念论纂》中<sup>[1]</sup>。翌年,白石虎月氏据全本校录,收在《续禅宗编年史》附录三。1967年,柳田圣山氏在《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一书中,据上述两本做了校录,并有注释和解说。另外,1971年,柳田氏还在《初期的禅史》第I卷中,发表了全卷的录文和译注。P. 3559是与《修心要论》、《大乘心行论》、《圆明论》等初期禅宗文献一起抄写的,首题作“传法宝纪并序京兆杜拙字方明撰”,尾题为“传宝纪七祖一卷”<sup>[2]</sup>。这个长卷利用的是《天宝十载(751)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来写的<sup>[3]</sup>,正面的年代为此长卷的产生年代提供了上限,即最早不会超过760年。

此外,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P. 3858为《僧传残卷》(存释弘忍、释法如两传)。柳田圣山氏据以判定为《传法宝纪》,并请法国的戴密微氏做了调查确定。此卷首尾俱残,起道信篇“未堪闻大道”(柳田圣山《初期的禅史》(I)380页2行),终法如篇“犹固让之垂”(同上书390页4行)<sup>[4]</sup>。

除日本学者的上述成果外,1986年,美国马克瑞(J. R. McRae)氏在所著《北宗与早期禅宗的形成》一书中,有本书的英译<sup>[5]</sup>。

1991年,笔者应邀到英国图书馆编斯坦因所获敦煌残卷目录,发现S. 10484也是《传法宝纪》。此件四边均残,长宽不过5.5×13.7厘米,残存三行文字<sup>[6]</sup>,内容如下:

1 〇〇〇 氏少为儒博闻尤精诗易知世〇〇〇

[1] 此文后收入《神田喜一郎全集》III,京都同朋舍,1984年,420—426页。

[2] 此卷现已并入P. 3664,见《敦煌宝藏》第129册,506—532页。

[3]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263—281页。

[4] 《敦煌宝藏》第131册,315页。

[5] John R. McRae, *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1986.

[6] 拙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文献残卷目录(6981—1362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159页。



2 □□□ 达摩大师□□□

3 □□□ 师言能以身□□□

相当于柳田氏《初期的禅史》(I)365页1—2行的部分文字。此卷字体整洁,书法颇佳,第1行“世”字缺笔,显然为唐人所写。对比上述三本,字体与形制和P.3858最为相近,或原为同一写本的不同部分。若果然如此,则此卷的其他残片将来也可能还会发现。此本虽然残缺过甚,也没有什么校勘价值,但它提供了现存敦煌《传法宝纪》两残本间的关联情况,对于我们理解敦煌禅籍的面貌,还是有帮助的。

南宗僧人神会(684—758)在开元二十年(732)滑台大云寺无遮大会上,曾激烈地攻击北宗僧人普寂在嵩山“立七祖堂,修《法宝纪》”的做法<sup>〔1〕</sup>,可见此书在当时影响之大。但比较敦煌写本中保存的两种北宗灯史,《传法宝纪》不敌《楞伽师资记》的数量,这反映了开元以后《传法宝纪》的重要性日益减弱。

## 二、《楞伽师资记》(Дх. 1728/M. 2686)

此书是稍迟于《传法宝纪》成书的又一部北宗灯史,也早已失佚。迄今为止,学者们已经在敦煌写本中,找到七件《楞伽师资记》写本,其中两件可以缀合,共代表了六个写本系统。

1926年,胡适先生在伦敦巴黎访求禅籍,发现了S. 2045、S. 4272、P. 3436三件,交朝鲜学者金九经氏校订。1931年,金氏在北平刊出《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此三本中,S. 2045首尾俱残,始于净觉序“目中各出一五色光舍利”(柳田氏《初期的禅史》(I)57页1行),终道信篇“铸想玄寂令心不”(同上书260页1行)<sup>〔2〕</sup>;S. 4272首尾俱残,始菩提达摩篇“不倚不著”

〔1〕 《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82年,289页。

〔2〕 《敦煌宝藏》第115册,584—593页。

(同上书 133 页 3 行),终粲禅师篇“即文字语言徒劳施設也”(同上书 167 页 4 行)<sup>〔1〕</sup>;P. 3436 首残尾完,始序“之知岂”(同上书 57 页 5 行),至全书尾终<sup>〔2〕</sup>;三本相加,除首部序文略残外,基本恢复了全书面貌。

与此同时,矢吹庆辉氏把 S. 2054 的图版,收入 1930 年出版的《鸣沙余韵》图版 75—76(1)。1932 年,《大正藏》据矢吹氏发表的图版,校以金氏刊本,录入《大正藏》第 85 卷。1935 年,金氏又在沈阳出版了《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修订本,收入《董园丛书》。其后,直到 1954 年,篠原寿雄氏利用上述三本及金刊修订本,做《楞伽师资记校注》,对《大正藏》本多所校正<sup>〔3〕</sup>。

1962 年,田中良昭先生据王重民先生所摄 P. 3294 和 P. 3537 照片,撰《关于敦煌新出伯希和本楞伽师资记二种》一文,据前者补充了净觉序前部约二百字,又指出后者是接在 S. 4272 前的部分残卷<sup>〔4〕</sup>。今检图版,P. 3294 首尾残,存 32 行,始于净觉序“每至披览”(同上柳田氏书 52 页 3 行),终“覆寻生死只为”(同上书 68 页 2 行)<sup>〔5〕</sup>。P. 3537 首尾亦残,始于求那跋陀罗篇“文传为道者”(同上书 112 页 2 行),终菩提达摩篇“达解三空”(同上书 133 页 3 行)<sup>〔6〕</sup>。

同是在 1962 年,《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了 P. 3703 和 P. 4564 两件写本也是《楞伽师资记》。但当时学者们一般都见不到原件或照片,直到 1971 年,柳田圣山氏在《初期的禅史》(I)中,据以上所有七件写本,做了精心的校录和译注,书前还刊出 P. 3703 的尾部和 P. 4564 全部。在已经发现的《楞伽师资记》中,只有最后找到的这两件有书题。P. 3703 首残,自弘忍篇“缘

〔1〕《敦煌宝藏》第 35 册,155—156 页;《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六卷,12 页。

〔2〕《敦煌宝藏》第 128 册,312—320 页。

〔3〕《内野台岭先生追悼论文集》,东京,1954 年,132—164 页。

〔4〕田中良昭《敦煌新出ペリオ本楞伽師資記二種について——特に淨覺序の首次を補う》,驹泽大学《宗学研究》第 4 号,1962 年。

〔5〕《敦煌宝藏》第 127 册,358 页。

〔6〕《敦煌宝藏》第 129 册,8—12 页。

多且向心中看一字”(同上书 287 页 2 行),至全卷终,尾题作“楞伽师资记一卷”〔1〕。P. 4564 仅存 5 行,有首题曰“楞伽师资记并序”〔2〕。

此外,1968 年,上山大峻氏发现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著录的 No. 710(2),实为《楞伽师资记》的藏文译本,并做了转写和研究〔3〕。其后,1982 年,西冈祖秀氏又发现普散《目录》No. 704 也是此书藏译断片〔4〕。

以上是迄今所知的汉藏文《楞伽师资记》的写本情况,但它们还不是此书敦煌本的全部。

孟列夫(L. N. Men'shikov)氏等编《亚州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笔记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著录了两件《景德传灯录》,一件是 Φ. 229B (M. 897),笔者利用斯坦因黑城所获 KK. II. 0238(k)号写本,确证其为黑城(哈拉浩特)所出〔5〕。另一件是 Дх. 1728 (M. 2686)号,《目录》在所标《景德传灯录》的名称后,加了一个问号,表示不能肯定〔6〕。戴密微(P. Demiéville)氏在关于俄藏《目录》的书评中,对此比定已经表示怀疑,但他无法见到原件文字,故不知当为何书〔7〕。1991 年 7 月,笔者有机会走访列宁格勒

〔1〕 《敦煌宝藏》第 130 册,75—76 页。

〔2〕 《敦煌宝藏》第 133 册,499 页。

〔3〕 上山大峻《チベット〈楞伽師資記〉について》,《佛教学研究》第 25、26 合并号,1968 年,191—209 页;参看冲本克己《〈楞伽師資記〉の研究——藏漢テキスト校定および藏文和訳》(1)(2),《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 9 号,1978 年,59—87 页;《禅文化研究所纪要》第 11 号,1979 年,1—28 页。

〔4〕 西冈祖秀《チベット訳〈楞伽師資記〉の新出断片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 31 卷第 1 号,1982 年。

〔5〕 拙稿《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6 年,250—253 页。

〔6〕 L. N. Mens'ikov et al., *Opisanie Kitaiskij Rukopisei Dunhuangskogo Fonda Instituta Narodov Asii*, II, Moscow 1967, pp. 409-410.

〔7〕 P. Demiéville, “Récents travaux sur Touen-houang”, *T'oung Pao*, LVI, 1970, p. 2, n. 1.

(今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得以检看原物,确定其为《楞伽师资记》净觉序的残文,与《传灯录》毫无关涉<sup>[1]</sup>。

此件前后上部均残,即只存一纸的下半截,长宽为 20.5 × 14.6 厘米,黄麻纸,有界栏,计存 10 行文字,今移录如下(图 27):

- 1           □去有因。今逢正法
- 2           □惟,非小人之所□(解)。生生尽命
- 3           □事之足下。去大足元年,□(在)□(于)
- 4   □禅法,开示悟入,似得□(少)□(分)。每呈心
- 5           □诚。和上随顺世间,奄从化往。所以
- 6           □上讳曠俗姓王,太原祁人也。
- 7           □东山忍大师传灯弟子也。大
- 8           □忽然两目中各出一五色舍利,
- 9           □帝景龙二年,有敕召
- 10           □归依,一心承事。两京来

此本字体工整,书法略带隶意,持与上述诸本对比,和 P. 3537 + S. 4272 最相似,很可能原是一个写本。若据他本补此本上缺部分,可知其每行 23—26 字不等,与 P. 3537 + S. 4272 每行 23—28 字大体相同。此件首行为不见于其他写本的佚文,惜所存文字不多,净觉序尚缺几行文字。

至此,我们总共有八号汉文写本,大约代表六个抄本系统。比较而言,《楞伽师资记》的抄本较《传法宝纪》为多。在这些写本中,只有 P. 3703 背抄有文字,系扶风窦良器撰《释迦牟尼如来涅槃会功德赞并序》。窦良器,又名良骥,是吐蕃统治敦煌后期至归义军初期的瓜沙文人<sup>[2]</sup>。从字体来

[1] 笔者在《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1994 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敦煌莫高窟,1994 年 8 月)和《俄藏敦煌文献考察纪略》(《学术集林》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 9 月,265—266 页)两文中曾提到这一比定结果,唯未做详述。

[2] 李正宇《敦煌文学的作者队伍和传播途径》,《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94 页。

看,大多数《师资记》的写本,已远不如唐人写经,如 S. 2054、P. 3436,应属吐蕃和归义军时期产物无疑。显然,《师资记》盛行的年代,似略晚于《传法宝纪》,所以,成都净众宗的僧人,把对北宗的攻击,集中在净觉的《师资记》上<sup>[1]</sup>,而不是开元时期更为流行的《传法宝纪》,看来不是偶然的。

### 三、《历代法宝记》(Φ. 261, S. 11014)

此书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净众宗、保唐宗的灯史著作,大约撰成于大历九年(774)六月三日保唐寺僧无住示寂以后不久。因为书后附有《大历保唐寺和上传》,明标“大历”年号,表明成书年代最晚不过大历十四年(779)。

此书已知有八件写本。1928年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卷,以矢吹庆辉氏发现的 P. 2125 为底本,校以 S. 516,做出全卷录文。1930年,矢吹氏把 S. 516 的图版发表在《鸣沙余韵》中,并在1933年出版的《鸣沙余韵解说》中,做了提要说明。1935年,金九经氏据以上两本移录为《校刊历代法宝记》,刊于沈阳出版的《董村丛书》中。按, S. 516 首部前12行下残,存首题“历代法宝记”(按,“歷”字敦煌写本皆作“曆”,系通用字),尾部完整,题为“历代法宝记一卷”。背有字一行:“历代法宝记,又名师资血脉传。”字上有旧式数码,字体和数码都表明是斯坦因的秘书蒋师爷所写,非唐人遗墨<sup>[2]</sup>。P. 2125 首尾完整,首题“历代法宝记,亦名师资血脉传,亦名定是非摧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亦名最上乘顿悟法门”。尾题“历代法宝记”<sup>[3]</sup>。

此后,1957年出版的翟林奈(L. Giles)《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

[1] 见敦煌本《历代法宝记》,柳田圣山《初期の禅史》(II),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59—60页。

[2] 《敦煌宝藏》第4册,231—252页;《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223—239页。

[3] 《敦煌宝藏》第115册,130—142页。

记目录》，著录S. 1776 背为《历代法宝记》<sup>〔1〕</sup>。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P. 3717 为“历代法宝记一卷（开端残缺数行）”。1969年，田中良昭氏编《敦煌禅宗资料分类目录初稿》（I），除上面提到的四件外，又找到S. 1611、S. 5916、P. 3727 各本<sup>〔2〕</sup>。1973年，近藤良一氏撰《关于〈历代法宝记〉的诸写本》一文，指出S. 1611 和S. 1776 是同一写本的断片，并详细对比了P. 2125、S. 516、P. 3717 三件较完整的卷子<sup>〔3〕</sup>。1976年出版的柳田圣山氏《初期的禅史》（II），即《历代法宝记》的译注，在解题中除提到上述七本外，还有日本石井光雄积翠轩文库藏本，总计八件，但因当时条件的限制，柳田氏在做校录和译注时，仍未能见到P. 3717 和石井本。

在这些写本中，S. 1611 只存一纸，抄《历代法宝记》璨禅师篇，自“随朝第三祖”（柳田氏《初期的禅史》（II）82 页 1 行），至“薛道衡撰碑文”（同上书 83 页 6 行）。后有杂写两行，背面也有杂写<sup>〔4〕</sup>。S. 1776 存两段，第一段抄弘忍篇，自“唐朝第五祖”（同上书 92 页 1 行），至“闾丘均撰碑文”（同上书 93 页 2 行）。第二段抄能禅师篇部分文字，自“唐朝第六祖”（同上书 98 页 1 行），至“众皆奔凑众中有”（同上书 99 页 5 行）。背面为《显德五年（958）十一月十三日某寺判官与当寺徒众就库交割什物历》。正面第一段后，有小字云：“颂唐朝第五祖弘忍禅师叙，并寺僧家具数目单，后汉显德五年。”<sup>〔5〕</sup>也是蒋师爷手迹。S. 1611 和 S. 1776 两件字体相同，形式相类，当出同一书手，年代在归义军曹氏时期。

P. 3727 写本包括许多散叶，抄有《付法藏因缘传》、《维识大师无著菩萨

---

〔1〕 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p. 276, No. 7963.

〔2〕 《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 27 号，1969 年，16—17 页。

〔3〕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 21 卷第 2 号，1973 年，313—318 页。

〔4〕 《敦煌宝藏》第 12 册，206 页；《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3 卷，107 页。

〔5〕 《敦煌宝藏》第 13 册，405—407 页；《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3 卷，144—146 页。

本生缘》、《圣者泗州僧伽和尚因缘》、《寺门首立禅师赞》、《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史和尚刺血书经义记》、《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刘萨诃和尚因缘记》、《大唐义净三藏赞》等,在本卷最后,抄有一段《历代法宝记》,自“梁朝第一祖”(同上书 67 页 1 行),至“萧梁武帝遂造碑记”(同上书 69 页 4 行)。在以上因缘或赞文背面或就在纸面空白处,写有几件官文书草稿,其一为《广顺五年(955)正月都知兵马使吕富延等状》,可以作为这件抄本的年代下限〔1〕。

S. 5916 首题“汉法内传 远依历代法宝记内略取些字”,存 4 行,系抄录《历代法宝记》中《汉法本内传》部分文字,自“后汉明帝永平三年”至“太史傅毅对曰”(同上书 35 页 6—7 行),以下未抄。此本严格说来不是《历代法宝记》,而是它的摘抄本〔2〕。

柳田氏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以为 P. 3717 是开端略残的佳本。实际上,此本并非完本。其首部 7 行残,第一行只有副题“亦名”二字,写本第一纸至“三千大千世界之”(同上书 40 页 11 行)而止,下缺,但不知是原本如此还是馆方修复时所致,此纸现与下一纸黏合,第二纸始于四祖信禅师篇的“大师遥见蕲州黄梅破头山”(同上书 86 页 3 行),以后抄至卷尾而止,尾题“历代法宝记一卷”〔3〕。

石井光雄积翠轩文库所藏《历代法宝记》从未全部刊布,1942 年出版的《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中,发表了其中 14 行的图版,并附有解说,称:

(国宝)历代法宝记 一卷 一轴

唐写,敦煌出。每行二十数字(不等),字面高约七寸四分,每纸(长约一尺三寸四分)二十八行,残存墨附十叶(及末四行),首尾

〔1〕 Cf.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IV, Pairs 1991, pp. 218-224.

〔2〕 《敦煌宝藏》第 44 册,569 页。

〔3〕 《敦煌宝藏》第 130 册,163—177 页。

缺……背面有修补,纸幅约八寸六分。

图版所见文字,自“云生则有欲”(同上书 129 页 14 行),至“至宝应元年五月忆白崖”(同上书 143 页 1 行),其间文字多有省略<sup>[1]</sup>。1976 年,日本每日新闻社编印的《重要文化财》第 19 卷上,曾刊出此卷首尾两帧照片,并题“《历代法宝记》残卷(敦煌出土),一卷,东京滨田德昭,16.1×420.9cm,唐代”,知其时此卷落在东京人滨田德昭手中。审其照片,起自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篇“告远公曰手作拳”(同上书 68 页 3 行),至绥州禅林寺僧兄弟一节的“是名智者亲近处”(同上书 251 页 3 行)。此件下落,柳田氏《禅籍解题》说“现东洋文库藏”<sup>[2]</sup>,同作者《初期的禅史》(II)又称不知所在<sup>[3]</sup>,后人也都说下落不明<sup>[4]</sup>。据说,滨田氏的部分藏品现分售给东洋文库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但仍有一部分在东京的古书店中。

除了上述八件写本外,我们今天又可以补充两种《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其实,第一种早在 1963 年就已著录在孟列夫等所编的《亚州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册中,即 Φ. 261(M. 1514)号写本残卷,但此目没能比定出残卷的名字,而且只提供首尾两行文字,因此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略。1994 年 10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 5 册,发表了此卷图版(图 28),并正确地比定为《历代法宝记》<sup>[5]</sup>。此卷首残,始于距开首不远的“无名晚年开释卷”(同上书 54 页 5 行),至“北齐朝第二祖”(同上书 77 页 1 行)止,以下纸有余白,但未抄写。现将此卷所存文字录出,再做讨论。

1

□□□□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日映众

[1] 川濑一马编《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京都临川书店覆刻版,1981 年,图 20,11 页。

[2] 禅籍俗语言研究会编《俗语言研究》第 2 期,147 页。

[3] 《初期の禅史》(II),32 页。

[4] 田中良昭《敦煌の禅籍》,《禅学研究入门》,东京大东出版社,1994 年,50 页。

[5] 《俄藏敦煌文献》第 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42—43 页。



- 2                   □□□或作声闻,或作[转]轮圣王,或作魔王,或  
3 作国[王]大臣居□□□作大力鬼神、山鬼[神]、河神、江神、海神、主  
  日神、主月神、  
4 昼神、夜神、主火神、主水神、一切苗稼神、树神及诸外道,作种种方  
  便,助我释迦如  
5 来,化道众生。按《大般若经·陀罗尼品》云:尔时舍利子白佛言:  
  世尊,如是般若  
6 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佛涅槃后,何方兴盛?佛言:舍利子,如是般  
  若婆罗  
7 蜜多甚深经典,我涅槃后,从北方至东北方,渐当兴盛,彼方多有安  
  住大乘  
8 诸苾芻、苾芻尼、乌波索迦、乌波斯迦,能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  
  多,深心信乐。  
9 又佛告舍利子:我涅槃后,时后分后五百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10 于东北方大作佛事。按《付法藏经》云:释迦如来灭度后,法眼付  
11 嘱摩诃迦叶,迦叶付嘱阿难,阿难付嘱末田地,末田地付嘱商那和  
  修,商那和  
12 修付嘱优波鞠多,优波鞠多付嘱提多迦,提多迦付嘱弥遮迦,弥遮  
  迦付  
13 嘱佛陀难提,佛陀难提付嘱佛陀蜜多,佛陀蜜多付嘱胁比丘,胁比  
  丘付嘱富  
14 那耶奢,富那耶奢付嘱马鸣,马鸣付嘱毗罗长老,毗罗长老付嘱龙树,  
15 龙树付嘱迦那提婆,迦那提婆付嘱罗睺,罗睺付嘱僧迦耶舍,僧伽  
  耶舍付  
16 嘱鸠摩罗驮,鸠摩罗驮付嘱闍夜多,闍夜多付嘱婆修槃陀,婆修槃  
  陀付  
17 嘱摩拏罗,摩拏罗付嘱鹤勒那,[鹤勒那]付嘱师子比丘,师子比丘

- 付嘱舍那婆斯已,故从
- 18 中天竺国人(来)向罽宾。国王名弥多罗掘,其王不信佛法,毁塔寺,煞害众生,奉事
- 19 外道末曼尼及弥师诃等。时师子比丘故来化此国王,其王无道,自手持利剑,口云:若
- 20 是圣人,诸师等总须诫形。时师子比丘示形,身流白乳。末曼尼、弥师诃等被形,
- 21 死如凡人,流血洒地。其王发心归佛,即命师子比丘弟子。师子比丘先付嘱舍那婆斯
- 22 已,入南天竺国,广行教化,度脱众生。王即追寻外道末曼弟子及弥师诃弟子
- 23 等,得已,于朝堂立架悬首,举国人射之。罽宾国王告令诸国,若有此法,驱
- 24 令出国。因师子比丘,佛法再兴。舍那婆斯付嘱优婆掘,优婆掘付嘱须婆蜜[多],
- 25 [须婆蜜多]付嘱僧迦罗叉,僧迦罗叉付嘱菩提达摩多罗。西国廿九代,除达摩
- 26 多罗即廿八代也。有东都沙门净觉师,是玉泉神秀禅师弟子,造《楞伽师
- 27 资血脉记》一卷,妄引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为第一祖,不知根由,或乱后学,云是
- 28 达摩祖师之师。求那[跋]陀自是译经三藏,小乘学人,不是禅师。译出四卷《楞伽经》,非
- 29 开受《楞伽经》与达摩祖师。达摩祖师自廿八代首尾相传,承僧伽罗叉。后惠可大师亲于
- 30 嵩山少林寺问达摩祖师,承上相传付嘱,自有文记分明。彼净觉师妄引求那

- 31 跋陀,称为第一祖,深乱学也。《法华经》云:不许亲近三藏小乘学人。求那跋陀三藏
- 32 译出四卷《楞伽经》,名《阿跋陀宝楞伽经》。魏朝菩提流支三藏译出十卷,名《入楞伽经》。
- 33 唐朝则天时,实叉难陀译出七卷,名《入楞伽经》。已上尽是译经三藏,不是禅师,
- 34 并传文字教法。达摩祖师宗徒禅法,不将一字教来,默传心印。梁朝第一祖
- 35 菩提达摩多罗禅师者,即南天竺国王第三子。幼而出家,早禀师氏,于言下
- 36 悟。阐化南天,大作佛事。是时观见汉地众生有大禅性,乃遣弟子佛陀耶舍二
- 37 人往秦地,说顿悟教法。秦中大德乍闻狐疑,都无信受。被摈出,逐于庐山东
- 38 林寺。时有法师远公,问曰:大德将何教来?乃被摈也。于是二婆罗门申子[手]告远
- 39 公曰:手作拳,拳作手,是事疾否?远公答曰:甚疾。二婆罗门言:此未为疾,烦恼即
- 40 菩提,即为疾也。远公深达,方知菩提烦恼本原不异。即问曰:此法彼国复从谁
- 41 学?二婆罗门曰:我师达摩多罗也。远公即深信已,遂译出《禅门经》一卷,具明大小
- 42 乘禅法,西国所传法师者,亦具引在《禅经序》上。二婆罗门译经毕,同日灭度,葬
- 43 于庐山,塔庙见在。达摩多罗闻二弟子汉地弘化,无人信受,乃泛海而来至梁
- 44 朝。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和上曰: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达

- 摩大师答：不将一字
- 45 教来。帝又问：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大师答曰：并无功德。答曰：此
- 46 乃有为之善，非真实功德。武帝凡情不悦，师乃辞帝出国，北望有大乘气。
- 47 大师来至魏朝，居嵩高山，接引群品六年。学[人]如云奔如雨聚（骤），如稻
- 48 麻竹苇，唯可大师得其髓。其时魏有菩提流支三藏、光统律师，于食中著毒，饷
- 49 大师。大师食讫，索盘吐蛇一升。又食，著毒再饷。大师取食讫，于大条石上坐，毒出石裂。
- 50 前后六度毒大师，大师告诸弟子：我来本为传法，今既得人，久住何益。遂传一领
- 51 袈裟，以为法信印可。语惠可曰：我缘此毒，汝亦不免此难。至第六代传法者，命如悬
- 52 丝。言毕，遂因毒而终。每常自言：我年一百五十岁，实不知年几也。大师云：唐
- 53 国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得我髓者惠可，得我骨者
- 54 道育，得我肉者尼总持也。葬于洛州熊耳山。时魏聘国使宋云，于葱岭逢
- 55 大师，手提履一只。云问：大师何处去？答：我归本国。汝国王今日亡。云即自书记
- 56 之。云又问大师：大师去后，佛法付嘱谁人？答：我去后卅年，有一汉道人，可是
- 57 也。宋云归朝，旧帝果崩，新帝已立。云告诸朝臣说：大师手提一只履，归西国，

58 言汝旧国王亡,实如所言。诸朝臣不信,遂发大师墓,唯有履一只。

59 萧梁武帝造碑文。西国弟子般若蜜多罗,唐国三人:道育、尼总持等,唯惠可承衣得法。

北齐朝第二祖(下未抄)

此卷第15行有明显的脱文,第59行“武帝造碑文”至“承衣得法”为小字,头一字“萧”用大字系误书。此卷颇有校勘价值,试举一例:如第48—49行柳田本作“时有菩提流支三藏、光统律师、著毒餽。大师食讫,索盘吐蛇一升”。“著”字上缺“于食中”,“餽”下缺“大师”,故此误解文意,标点亦错。其他文字稍胜处,读者一比即知,此不赘述。

另外,此本字体与上述诸本中的P. 3717最像,有些特征也一致,如纸高P本是27.5厘米,Φ本是28厘米,每行字数在26—30间不等;在“某朝第几祖”后,一般空一字格;两字间往往有补字;在记某一祖的一段末尾,都用双行小注形式写最后一、二句;祖与祖之间不分段别行,而是紧接书写。这些特征的一致性,表明两者原是一个书手所抄,俄藏本应插入P. 3717第一纸的后面。但这种考订,与上述《传法宝纪》、《楞伽师资记》新出残片的归属推论一样,将来都应据原卷加以检验。

第二种《历代法宝记》的新材料,也是笔者1991年在英国编目时看到的。S. 11014是属于佛典引首残纸,仅存书名部分一长条,长宽为3.8×28厘米,一边有细木轴,一边残断,背存书题大字曰(图29):

#### 历代法宝记

书名上有波浪形记号。此实为某一卷《历代法宝记》开首一叶的背题,标示卷中的内容,此纸在卷首,翻来翻去,最易脱落。按S. 10858—11280号之间,几乎全是这种引首,形制相同<sup>〔1〕</sup>。但其他大多数是普通佛经,而此为禅宗典籍。

〔1〕 参看拙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6981—13624)》,26页。

在《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一文中,笔者曾申论藏经洞中的一些残卷是三界寺道真从各寺收罗来的,有的已经修整完毕,有的还是残缺不全,像上述残片,若不是斯坦因、奥登堡之流的人为破坏,就应当是原本如此的待修复写经。道真的佛学水平并不太高,在他所编的《长兴五年(934)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中,不仅有疑伪经,还有禅籍。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是,该卷第59行列有“历代法宝记一卷”〔1〕,即我们现在讨论的这部禅籍。所以,上述敦煌《历代法宝记》写本中,应当有一卷是原本属于道真《三界寺入藏经目录》中的书。由此笔者连带想到,近时有的学者认为敦煌禅籍残卷是宗密所编禅藏的组成部分〔2〕,从上述《历代法宝记》在敦煌三界寺与其他一切经一起入藏的情况看,敦煌似没有单独的禅藏。说者还认为宗密编禅藏是吐蕃统治敦煌时(781—848年)传入的,而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禅源诸论集都序》是这一禅藏的组成部分〔3〕。但事实上,敦煌本《都序》,迄今只发现台北所藏的这一件〔4〕,其写本先抄《都序》,后列宗密论著目录,最后有明确的题记:“广顺二年三月十日,从京来汉大师智清本

〔1〕 此件原为大谷探险队所得,今藏北京图书馆,图版见井之口泰淳等编《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探险队将来敦煌古写经目录》(图版),京都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1989年,62页;录文见小田义久《敦煌三界寺の〈見一切入藏經目錄〉について》,《龙谷大学论集》434·435合并号,1989年,560页。

〔2〕 方广錫《禅藏与敦煌禅籍》,《禅学研究》第2辑,1994年,103—105页。

〔3〕 同上,109—111页。

〔4〕 此件著录于潘重规《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敦煌学》第2辑,1975年,51页。此文刊布后,引起许多学者对敦煌本《禅源诸论集都序》的注意,田中良昭有《敦煌本〈禅源諸論集都序〉の残卷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5卷第1号,1976年,107—112页;又《敦煌本〈禅源诸论集都序〉残卷考》载《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37号,1979年,51—71页;冉云华有“A Study of Ta-ch'eng ch'an-men-yao-lu: Its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载《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533—547页;又《敦煌本〈禅源诸论集都序〉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载《敦煌学》第12辑,1987年5—12页;后者收入作者《中国佛教文化研究论集》,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161—174页。

上,抄写《大乘禅门要录》一卷。”〔1〕表明《都序》的传入敦煌,是晚到952年的事了,距吐蕃统治敦煌至少已经百年以上。因此,所谓敦煌本禅藏的说法是难以苟同的。

以上整理介绍了四件新发现的早期禅宗灯史著作的敦煌残卷,并简要探讨了新出写本和以前发现的写本之关系,以期为我们今后全面整理这些灯史著作打下基础。

(原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1997年,231—244页。增订本补图版一幅。)

---

〔1〕 图版见潘重规编《敦煌卷子》第3册,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6年,1237—1241页。

## 有关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

——积翠轩文库旧藏“略出本”校录

### 一、《历代法宝记》文本研究史

《历代法宝记》是记载剑南地区的保唐宗(净众宗)的一部禅宗灯史,所记主要是无相和无住两位禅师的禅法,以及这支禅宗派别的历史。该书大约撰成于大历九年(774)六月三日保唐寺僧无住示寂以后不久,篇幅颇长。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早已失传,使我们对早期禅宗历史,特别是四川地区禅宗的发展史,不甚了然。所幸敦煌藏经洞开启后,学者们陆续在敦煌写本中,发现若干《历代法宝记》的写本,并做了一些校录和研究。

以下先提示经过学者们研究的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编号和主要研究成果:

(1) S. 5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1 卷(1928 年)以此为参校本。矢吹庆辉《鸣沙余韵》(1930 年)刊布图版,并在《鸣沙余韵解说》(1933 年)中做了提要。金九经据以作《校刊历代法宝记》,刊入《董园丛书》(1935 年)。柳田圣山《初期的禅史》(II)(1976 年)录文并译注。

(2) S. 1611:田中良昭《敦煌禅宗资料分类目录初稿》(I)(《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 27 号,1969 年)比定。近藤良一《关于〈历代法宝记〉的诸写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 21 卷第 2 号,1973 年)指出 S. 1611 和 S. 1776 是同一写本。柳田圣山《初期的禅史》(II)(1976 年)亦利用此本。



(3) S. 1776 背: 翟林奈(L. Giles)《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1957年)首次著录<sup>[1]</sup>。柳田圣山《初期的禅史》(II)(1976年)亦利用。

(4) S. 5916: 田中良昭《敦煌禅宗资料分类目录初稿(I)》(1969年)比定。柳田圣山《初期的禅史》(II)(1976年)利用。

(5) S. 11014: 仅存题目。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6981—13624)》(1994年)著录。荣新江《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录文。

(6) P. 212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卷(1928年)以此为底本校录。金九经《校刊历代法宝记》(《葦园丛书》,1935年)、柳田圣山《初期的禅史》(II)(1976年)均利用。

(7) P. 3717:《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首次著录。

(8) P. 3727: 田中良昭《敦煌禅宗资料分类目录初稿》(I)(1969年)比定。柳田圣山《初期的禅史》(II)(1976年)利用。

(9) Φ. 261:《俄藏敦煌文献》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刊布图版并比定。荣新江《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1997年)录文并研究。

到目前为止,对于《历代法宝记》文本的整理主要是依据以上九件写本。柳田圣山《初期的禅史》(II)的录文,是依据除P. 3717、Φ. 261两本之外的所有文本做成的,并做了日文翻译和详细的注释,因此一直是学者利用这部著作时的依据。但他的录文不是在严格意义的校勘基础上做成的,也没有校记,因此文字取舍和校勘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在整理Φ. 261时,因为该卷只是个残本,所以做了部分文字的校录,限于体例,也未出校记。因此,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经过仔细校勘的本子发表出来。据我所知,郝春文教授编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将发表以

[1] 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p. 276, No. 7963.

S. 516 为底本的释文,他采用 P. 2125(甲本)、P. 3717(乙本)、S. 5916(丙本)、P. 3727V(丁本)、S. 1611(戊本)、S. 1776V(己本)六个本子作参校本,而且所有异文均出校<sup>[1]</sup>,颇便学者对比研究。

笔者一直留意敦煌所出早期禅宗灯史的传存、整理和研究,现仅就近年所见石井本《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略做介绍如下。

## 二、石井光雄积翠轩文库旧藏本简介

1942年出版的《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著录了当时日银总裁石井光雄所藏敦煌卷子,其中有:

(国宝)历代法宝记 一卷 一轴

唐写,敦煌出。每行二十数字(不等),字面高约七寸四分,每纸(长约一尺三寸四分)二十八行,残存墨附十叶(及末四行),首尾缺。……背面有修补,纸幅约八寸六分。

该书图 20 发表了其中 14 行的图版,文字自“云生则有欲”(柳田上引书 129 页 14 行),至“至宝应元年五月忆白崖”(同上书 143 页 1 行),较《大正藏》本文字多有省略<sup>[2]</sup>。在此之前的 1932 年,石井光雄曾将自己所藏的另一件被日本定为“国宝”的敦煌写本《神会语录》,交由铃木大拙整理,并用玻璃版全部影印出版,题为《敦煌出土神会录》,对初期禅宗史的研究给予极大的帮助<sup>[3]</sup>。可惜的是,石井所藏的《历代法宝记》却一直没有在学界露出它的全部尊容。

[1] 承蒙郝春文教授以所做释文见示,特此致谢。笔者应郝春文教授之邀,也参与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校订工作。

[2] 川濑一马编《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京都临川书店覆刻版,1981年,图 20,11 页。

[3] 参看柳田圣山最近的解说,见《柳田圣山集》第一卷《禅仏教の研究》著者解题,京都法藏馆,1999年,675—676页。

1976年,日本每日新闻社编印的《重要文化财》第19卷上,曾刊出此卷首尾两帧照片,并题:“《历代法宝记》残卷(敦煌出土),一卷,东京滨田德昭,16.1×420.9cm,唐时代。”表明其时此卷已经落在东京人滨田德昭手中。审其照片,起自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篇“告远公曰手作拳”(同上书68页3行),至绥州禅林寺僧兄弟一节的“是名智者亲近处”(同上书251页3行)。

关于此件的下落,1974年柳田圣山氏撰《禅籍解题》时说:“现东洋文库藏。”〔1〕1976年,同作者在《初期的禅史》(II)中,又称不知所在〔2〕,所以柳田氏在做校录和译注时,未能见到石井本。直到1994年,田中良昭氏撰《敦煌の禅籍》,也说下落不明〔3〕。据说,滨田氏的部分藏品现分售给东京的东洋文库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但仍有一部分在东京的古书店中没有售出,不知这件“国宝”级的《历代法宝记》现在何方。

### 三、石井本《历代法宝记》录文

笔者多年来一直以追踪调查敦煌写本为己任,对于流散而不知所在的写本,也注意了解其照片或录文的传存情况。笔者有幸从友人处得见石井本《历代法宝记》全部复印件(图30),写本虽首尾俱残,但仍保存285行之多,可以为校勘这部禅籍提供极大的帮助。

正如我们在《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所附图版所见到的那样,和《大正藏》本比较,这个本子上的文句往往有所缩略,因此只用出校记的方式不易明了全卷的情形,现将全部文字用繁体字过录于下,以便学者对比研究。至于详细的校勘,则别详他文。

〔1〕《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36B《禅家语录》II《附录》;此据殷勤汉译文,载禅籍俗语言研究会编《俗语言研究》第2期,京都,1995年,147页。

〔2〕《初期の禅史》(II),32页。

〔3〕《禅学研究入门》,东京大东出版社,1994年,50页。

(前殘)

- 1 告遠公曰：“手作拳，拳作手，是事疾否？”遠公□□
- 2 “此未爲疾，煩惱即菩提，是即爲疾。”遠公□□
- 3 來不異。即問曰：“此法彼國復從誰學？”對□□
- 4 遠公既深信已，遂譯出《禪門經》一卷，二婆羅門譯經畢，同日□(滅)
- 5 度，葬於廬山，塔廟見在。達摩多羅聞二弟子漢地弘化，無人
- 6 信受，乃泛海而來。至梁朝，武帝出城躬迎，昇殿問和尚曰：“從
- 7 彼國將何教法，來化衆生？”達摩答曰：“不將一字教來。”□□
- 8 帝又問：“朕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大師答言：“並無功
- 9 德。此乃有爲之善，非真實功德。”武帝凡情不測(測)，乃辭出
- 10 國。北
- 11 望有大乘氣。遂來至魏朝，居嵩山，接引群品六年，學如雲
- 12 奔，唯可大師得其髓。其時魏有菩□□
- 13 食中，前後六度被毒，臨終，遂傳□(袈)□□
- 14 能禪師，六代傳法，具在別傳。□(自)□□
- 15 事相去(法)則。後因晉石勒時，佛圖澄弟子□□
- 16 門，作僧尼軌範、佛法憲章，受戒法則，條爲□□
- 17 二曰常六時禮懺，三曰每月布薩悔過，事相威儀、法事咒願讚歎
- 18 等，出此道安法師。近代蜀僧嗣安法師，造《齋儀》兩卷，現今
- 19 流行。
- 20 《楞伽經》云：“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錯亂。若見於自心，則是無
- 21 爲諱。”
- 22 又云：“若依止少法，而有少法起；若依止於事，此法則便壞。”
- 23 又云：“隨言而取義，建立於諸法；以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
- 24 《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 25 求我，

- 22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思益經》云：□□□
- 23 若稱讚毀辱，其心不動，是名佛隨教。□□□
- 24 佛語。比丘，云何應受供養？答言：於法無所□□□
- 25 爲世法之所牽者。誰人報佛恩？答云：依□□□
- 26 《禪門經》云：“坐禪觀中，見佛形像，卅二相，種種□□□
- 27 現自在，皆是自心顛倒，繫著魔網。於空寂滅法中□□□
- 28 事，即爲虛妄。”《楞伽經》云：“如是種種相，墮於外道見□□□
- 29 “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
- 30 《金剛三昧經》云：“我不入三昧，不住坐禪，無生無行，不動不禪，是無生禪。”
- 31 《思益經》云：“不依止欲界，不住色無[色]，行如是禪定，是菩薩遍行。”
- 32 《維摩經》云：“維摩詰訶舍利弗林間宴坐，訶須菩提大迦葉不平等。”
- 33 《轉女身經》云：“無垢光女訶天帝釋，汝聲聞□□□
- 34 《決定毗尼經》云：“菩薩乘人，持開通戒；聲聞□□□
- 35 《藥師經》云：“佛訶阿難，汝聲聞人，如盲如聾，□□□
- 36 《佛藏經》：“舍利弗，如來在世，三寶一味，我滅□□□
- 37 《大佛頂經》云：“汝等聲聞，得少爲足。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妄言證聖。天
- 38 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入阿鼻獄。”所以如
- 39 來傳金闍袈裟，令摩訶迦葉於雞足山，待彌勒世尊下生
- 40 分付。今惡世時，學禪者衆。我今達摩祖師，亦傳袈裟，表
- 41 其正法，令後學者，有其稟承也。 能禪師於忍大師授
- 42 得法已，常於山林，或在蘄(新)州、韶州，十六七年在俗，亦不說法。後至
- 43 南海制止寺，遇印宗法師講說《涅槃經》，惠能亦在坐下。時印

- 44 宗法師問衆聽人：“汝惣見風吹幡竿，上□□□
- 45 見動。或言見風動，或言幡動，不是風動，□□□
- 46 不定。惠能在坐下立，答法師言：“自是衆人妄想□□□
- 47 是幡〔動〕，法本無有動不動。”法師聞說，驚愕忙然，不知是何言。  
言：“居
- 48 士從何來？”能答言：“本來不來，今亦不去。”法師下座，延惠能就  
房，子
- 49 細借問。惠能一一具說東山佛法及有付囑信袈裟，印宗法
- 50 師見以（已），頭面頂禮，便請爲和上，印宗自稱弟子。即與能禪師  
剃頭披〔衣〕，
- 51 禪師傳忍大師法門，喻若真金，並自受菩薩戒。印宗法師共
- 52 大衆送能禪師歸曹溪，接引群品，廣開禪法，天下知聞，曹
- 53 溪佛法，最不可思議。 後時大周立， 則天至□□□
- 54 年，使往再請能禪師，不來，請達摩祖師傳□□□
- 55 朕於內道場供養。能禪師分付 敕使袈□□□
- 56 郎中張昌往資州得（德）純寺請詵禪師赴京，在內□□□
- 57 請神秀諸禪師四人，亦同供養。則天本請諸大德，緣西國有
- 58 三藏婆羅門，則天偏敬重之。其劍南詵禪師當有疾，思念
- 59 歸鄉，爲關河岨遠，心有少憂。其邪通婆羅門云：“此與彼何  
殊，禪
- 60 師何得思鄉？”詵問云：“何以知之？”答云：“禪師但試舉意看，  
無有
- 61 不知。”詵又云：“去也看。”想身著俗人衣裳，於西市曹門看望。
- 62 其三藏云：“大德僧人何得著俗衣裳市中而看。”又云：“看去
- 63 也。”想身往禪定寺佛圖相輪上立。三藏又云：“僧人何得登高
- 64 而立。”詵又：“赭回好好，更看去也。”即當處依法想□□□
- 65 於三界內尋覓，竟不可得。婆羅門遂生敬仰，頂□□□

- 66 足，白言和上：“不知唐國有大乘佛法。”云云。則天見三藏[ ]
- 67 師，問諸大德：“有欲否？”神秀等四僧皆言無欲。則天問詵禪
- 68 師：“有欲否？”詵恐不放歸，答言：“有欲。”則天答云：“何得有欲？”
- 詵答
- 69 云：“生則有欲，不生則無欲。”則天言下大悟。又三藏歸依詵和
- 上，
- 70 則天亦倍加敬重。詵因便奏請歸鄉，敕賜新幡(翻)《花嚴經》一
- 部，繡
- 71 像等，及將達摩祖師信袈裟。則天云：“能禪師不來，此上代袈
- 72 裟，亦奉和上將歸，永為供養。”後詵禪師滅度，至長安二年六
- 73 月，命處寂禪師承法及付袈裟云。其處寂禪師，俗姓唐，
- 74 於資州德純寺，化導衆生廿餘年。至開元廿四年四月，密遣
- 75 家人王鎰喚海東無相禪師，付法及信袈裟訖，至其年五
- 76 月廿七日夜半子時，奄然坐化。 劍南淨衆寺無相禪師，俗姓金，
- 77 新羅王之族，家代海東。削髮辭親，浮海西渡，至唐國。尋師
- 78 訪道，周遊涉歷，乃到資州德純寺，禮唐和上。〔和上〕有疾，遂
- 不
- 79 出見。便然一指供養。唐和上知其非常人，便留左右。二年後
- 80 居天谷山，卻至得(德)純寺。密付信衣與金和上，金和上得信衣，
- 遂〔居〕
- 81 天谷山石巖下，草衣節食，食盡滄土。後章仇大夫請開禪
- 82 法，居淨衆寺，化度衆生廿餘年。至寶應元年五月，憶白崖
- 83 無住禪師。密使工人董璿：“將吾信衣及餘衣一十七事，密送
- 84 與無住禪師。”囑訖，至五月十九日，著新淨衣，至夜半子時，儼
- 85 然坐化云云。金和上每年十二月、正月與四衆受緣，處高座說
- 86 法。先教引聲念佛，盡一氣，絕聲停念訖，說云：“無憶，無念，
- 87 莫妄。無憶是戒，無念是定，莫妄是惠。此三句語即是惣持。

- 88 一切衆生依無念者，是孝順之子。著文字者，是不孝之子。一  
89 切衆生無明酒醉，不信自身見性成佛。又《起信論》云：‘心真  
90 如門，心生滅門。無念即是真如門，有念即是無(生)滅門。’云云  
91 又云：‘水不離波，波不離水。波喻妄相念，水喻佛性。’又云：‘棄  
麻金，金喻  
92 涅槃，麻喻生死。’此三句：念不起是戒門，念不起是定門，念不起  
[是]惠  
93 門，即是戒定惠具足，過去未來現在恒沙諸佛皆從此門入。  
94 若更有別門，無有是處。”東京荷澤寺神會和上，每月爲人說法，  
95 破清淨禪，立如來禪，立知見，立言說，爲戒定惠，不破言說，云：  
“正  
96 說之時即是戒，正說之時即是定，正說之時即是惠。說無念法，  
97 立見性。”云云。會和上在荊府時，有西國[迦]葉賢者等廿餘人，向  
會  
98 和上說法處問：“上代信袈裟和上得否？”答：“不在[會]處。”卻問：  
“賢者等  
99 從何處來？”迦葉答：“從劍南來，盡是金和上弟子。”會問：“汝金和  
100 上教道如何？”迦葉答：“無明頭出，般若頭沒，若無明頭沒，般若  
101 頭出。有念猶如鏡面(背)。”和上叱之：“莫說此閑言語，汝是婆  
羅門  
102 種，計合利根，乃是尿床婆羅門。”會和上云：“汝劍南說禪師，  
103 不說了教。唐禪師是說弟子，亦不說了教。唐師弟子趙法  
104 師是(是法師)，陵州王是律師，已(巴)西來是法師，益州金禪師  
說了教  
105 亦不得。雖然不說了教，佛法只在彼處。”云云。劍南大曆保唐  
106 寺無住和上，鳳翔郿縣人，俗姓李，於朔方信安王下舍官，尋  
107 師訪道。忽遇白衣居士陳楚璋，不知何處人，時人號爲維摩



- 108 詰化身，說頓教法門。和上當遇之日，密契相知，默傳心法。
- 109 和上得法已，一向絕思斷慮，事相並除。三五年間，白衣修行。至
- 110 天寶年已後，遂往太原，禮自在和上。說淨中無淨想，即是真淨
- 111 佛性。聞法已，心意決然。諸師云：此法棟梁，便與削髮披衣。至
- 112 天寶八年，受具戒已，便辭諸師，向五臺諸處遊歷。至天寶十
- 113 載，從西京卻至靈州，居賀蘭山二年。忽有商人曹瓌禮拜，問和
- 114 上曾到劍南，識金和上否？答云：“不識。”瓌云：“和上相貌一似
- 115 “居士從劍南來，彼和上說何教法？”答云：“說無憶、無念、莫妄。
- 116 當聞已未識，今呈和上。”和上聞說豁然，遙與金和上相見。至德
- 117 二年，遂于豐甯軍使楊含璋處出得行文，便歷州郡。至乾
- 118 元二年正月，到成都淨衆，逢安乾師，引見金和上。和上見，非常
- 119 歡喜。其時正是受緣之日，當夜隨衆。只經三日三夜，金
- 120 和上每日於大衆中唱言：“緣何不入山去，久住何益？”無住和上
- 121 默然入山云云。同住道逸師習誦禮念，和上一向絕思斷慮，入自
- 122 證境界。道逸共諸同住小師白和上云：“逸諸同住，欲得六時
- 123 禮懺，伏願聽許。”和上語道逸等：“此間糧食並是絕緣人般
- 124 運深山中，不能依法修行，欲得學狂，此並非佛法。”和上引
- 125 《佛頂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同法界，無念即
- 126 是見佛，有念即是生死。若欲得禮念，即出山。平下大有寬
- 127 閑寺舍任住。若欲得同住，一向無念，任住。”道逸師不從，便
- 128 辭出，至益州淨衆寺。先見空上座等，說山中無往禪師不
- 129 行禮念，只空閒坐。空等聞說，倍常驚愕：“豈是佛法。”領道
- 130 逸師見金和上，具說無住不行禮懺，豈是佛法。金和上叱空、
- 131 道逸等向後：“此法與我同，非汝所知。”云云。後金和上喚一信士
- 132 董璿，將袈裟一領，人間罕有，呈示璿：“此是則天皇后與說和上，

- 133 誥和上與唐和上，唐和上與吾，吾今傳付將與無住禪師。此衣久遠已來保愛，
- 134 莫遣人知。”語已，悲淚哽咽：“此衣嫡嫡相傳付，弩(努)力弩(努)力。”即脫身
- 135 上袈裟、覆膊、裙衫、坐具，共一十七事。“吾將年邁，此物汝密送
- 136 與無住禪師。”云云。至寶應五月十五日，遙付囑訖。至十九日，取新
- 137 淨衣，沐浴。至夜半子時，儼然坐化。後副元帥杜相公至劍
- 138 南，具論金和上德行，滅度後，聞有無住禪師。至永泰二年
- 139 九月內，光祿卿慕容鼎專使、縣官、僧道等，就白崖山請和
- 140 上，傳相公諸高班等請，頂禮願和上爲三蜀蒼生，作大橋
- 141 梁。殷勤苦請，所將幡花寶輿不受，步步徐行。欲出山之
- 142 日，茂州境內，六迴震動，山河吼，蟲鳥鳴。百姓互相借問：“是何
- 143 祥瑞？”滿路唱言：“無相和上去，無住和上來。”云云。後無住禪師到
- 144 所居安置訖，諸官白云：“相公等欲謁和上。”和上云：“來即從他來。”押
- 145 衙等云：“相國貴重，應須出迎。”和上答：“不合迎，迎即是人情，
- 146 不迎即是佛法。”語次，相公入院，見和上容儀不動，儼然安
- 147 祥。相公頓身下階，作禮合掌，問信起居。諸官見已，戰懼
- 148 失色。見相公坐定言笑，和上說法。相公合掌叩額，問和上：“因
- 149 何至此？”答言：“投金和尚。”又問和尚：“說何教法？”和尚答：“說
- 150 教法。”又問：“何者是頓教法？”和尚云：“無憶，無念，莫妄。”相公問：
- 151 “此三句語爲是一，爲是三？”和尚答：“是一不三。無憶是戒，無念是

- 152 定，莫妄是惠。念不起戒門，念不起定門，念不起惠門，無念  
153 即是戒定惠具足。”相公又問：“既一妄字，爲是亡下女，爲是  
154 忘(亡)下心？”和尚答：“亡下女。”“有證處(據)否？”和尚答：  
“有。”即引《法句經》云：  
155 “說諸精進法，爲增上慢說，若無增上慢，無善無精進。  
156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  
157 相公聞說，白和上：“見庭樹否？”和尚答：“見。”相公又問：“向後  
牆外有  
158 樹，見否？”和尚答：“見。非論前後，十方世界悉見悉聞。”“庭前  
159 樹上鷓鳴，和尚聞否？”和尚答：“此見聞覺知，是世間見  
160 聞覺知。《維摩經》云：若行見聞覺知，是即見聞覺知，  
161 法離見聞覺知。無念即無見，無念即無知，爲衆生  
162 有念，假說無念，正無念之時，無念不自。”又引《金剛三昧  
163 經》云：“尊者大覺尊，說生無念法。無念無生心，心常生不  
[滅]。”  
164 又《維摩經》云：“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常求無念實相智惠。”  
165 《楞伽經》云：“聖者內所證，常住於無念。”《佛頂經》云：“阿難，  
166 汝覲舉心，塵勞先起。”又云：“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思益  
經》云：  
167 “云何一切法正，云何一切法邪？若起心分別，一切法邪。若不  
以心  
168 分別，一切法正。無心法中，起心分別，皆是邪。”《楞伽經》云：  
169 “見佛聞法，皆是自心分別，不起[見]者，是名見佛。”相公聞說，  
頂  
170 禮，深加敬重云云。時有無盈法師、清原法師，僧中哲者，在  
171 衆坐。和尚引《佛頂經》云：“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  
172 倒，業[種]自然，如惡人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

- 173 乃至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眷屬，皆由不  
174 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家(嘉)饌，縱經塵  
175 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已來，生死根本，則汝今  
176 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二者無始菩提涅槃，  
177 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情無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  
178 由失本明，雖終日而行，不自覺，枉入諸趣。”和尚又說：“一切  
179 衆生，本來清淨圓滿，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含識，共同  
180 清淨。爲一念妄心，即染三界。爲衆生有念，假說無念，無念  
181 若無，無念不自。無念即無生，無念即無滅云云。心生即種種法  
生，  
182 心滅即種種法滅。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  
183 正無念之時，一切法皆是佛法，無有一法離菩提者。”  
184 又云：“因妄有生，因妄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是  
185 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和尚說已，儼然不動。  
186 諸官聞說，合掌恭敬，若有所須，專著人祇承和上。和上云：  
187 “修行般若波羅蜜，百無所須。”又云：“汝但辦心，諸天辦  
188 供。辦何等心？辦不求心，不貪心；辦不愛心，不染心。梵天  
189 不求，梵天自至。果報不求，果報自至。”又云：“知之(足)大富  
貴，  
190 少欲最安樂。”清原法師作禮，白和上言：“小師一聞法已，疑  
191 調頓除，願慈悲攝授。”和上言：“然。”無盈法師踞傲，凜然色  
192 變。和尚問無盈法師：“識主客否？”無盈答引諸法相，廣引文  
193 義。和上云：“法師不識主客，強認前塵，以流注生滅心，自爲  
194 知解。猶如煮沙，欲成嘉味，終不可得，只是自誑誑他。  
195 《楞伽經》云：‘隨言而取義，建立於諸法，已彼建立故，  
196 死墮地獄中。’”無盈聞說，側身偏坐。和上[問]法師：“無記有幾  
197 種？”法師答言法師答(衍三字)：“異熟無記，變易無記，工巧無

記，威

- 198 儀無記。”和上又問：“何者是有記？”法師答：“第六意識是有記。”  
199 和上云：“第六意識是顛倒識，一切衆生，不出三界。都由意不  
200 生時，即超三界。剃頭削髮，不學有記，不可學無記。今  
201 時法師，盡學無記，不信大乘。云何是大乘？內自證不動，  
202 是無上大乘。我無上大乘，超過於名言，其義甚明瞭。愚  
203 夫不能覺，覺者覺諸情識空寂無生，名之爲覺。”無盈聞  
204 說，杜口無詞。和上云：“無記有二種。一者有覆無記，二者無覆  
205 無記。第六意識至眼等五識，盡屬有覆無記。第六已至  
206 八識，盡屬無覆無記。並是強名言之。又第九識，是清淨  
207 識，亦是妄立。”和尚引《楞伽經》云：“八九種種識，如海泉波浪，  
208 習氣常增長，盤根堅固依。心隨境界流，如鐵於瓷（磁）石，  
209 如水瀑流盡，波浪即不起。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  
210 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得無思相法，佛子非聲聞。”  
211 無盈聞說，唯稱不可思議。和尚又問：“《楞伽經》云：以楔出楔，  
其  
212 義云何？”無盈答：“譬如楔木，先下大楔，即下小楔，令大楔出。”  
和上  
213 言：“既小楔出大楔，大楔雖出，小楔還在，云何以楔出？”法師更  
214 無詞敢對。和上即解楔喻衆生煩惱楔，假如來言教楔，  
215 煩惱既無，法師（即）不自，譬如有病，然與處方，病若得愈，  
216 方藥並除。然今法師執言教法，如病人執方而不服藥，  
217 不捨文字，亦如楔木中。《楞伽經》云：“譬如以指指物。小兒觀  
指，  
218 不觀於物，隨言說指，而生執著。乃至盡命，終不能捨文  
219 字之指。”和上又問三寶四諦、三身義。法師更不敢對云云。  
220 時有東京體元師，問和尚是誰弟子，是誰宗旨？若答是

- 221 佛宗旨，是佛弟〔子〕。和上云：“削髮披緇，即是佛弟子，何用問  
222 師宗旨。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有疑任問。”體元毀  
223 言：“希（昔）言劍南不起心禪師，打人云不打，嗔人云不嗔，有  
224 施來受言不受。體原不解此事。”和上答：“修行般若波羅  
225 蜜，不見報恩者，不見作恩者，已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  
226 佛法，亦不滅受。無住從初發心，迄至於今，未曾受人一毛髮  
227 施。”體元聞說，量（良）久不語。問和上：“解《楞伽經》否？”和上  
228 答言：“解  
229 是不解。”諸官云：“和上但說，何用相詰？”和上答：“若說恐諸  
230 官不信。”官人答言：“信。”和上云：“我若具說，或有人聞，心即  
231 狂心（心字衍）亂，狐疑不信。”即引《楞伽經》云：“愚人樂妄說，不  
232 聞真  
233 實慧；言說三苦本，真實滅苦因；言說即變異，  
234 真實離文字；於妄相（想）心境，愚生二種見；不識心及緣，  
235 即起二妄想；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云云。和上又引《思  
236 益經》云：“云何一切法正，云何一切法邪，若以心分別，即一切法  
237 邪；  
238 答（若）不以分別，一切法正。無心法中，起心分別，並皆是邪。”  
239 時有義淨、處默師問和上禪門，不會，遂卻問義淨：“解  
240 何經論？”答：“解菩薩戒。曾為僧講。”和上問：“戒以何為體？  
241 以何為義？”義淨無詞可對，便出穢言：“非我不解，直為試  
242 汝，似你禪，我嫌不行。”處默連聲：“我嫌你鈍不作，我嫌  
243 悶不行，我嫌懶不作，我慵嫌（嫌慵）不入。”和上語諸僧：“如如之  
244 理，具一切智。我無上大乘，超過於名言。愚夫不覺不知。  
無住與諸闍梨說一緣起。有聚落，於晨朝時，有孩  
子啼哭聲，鄰人聞就看，見母嗔打。鄰人問：何為打？母云：  
尿床。鄰人叱母：此子幼稚，何為打之！又聞一啼哭聲，鄰人

- 245 就問，見一丈夫，年登卅，其母以杖鞭之。鄰人問：緣何打？  
246 母云：尿床。鄰人聞說，言：此漢多應故尿，直應須痛打。  
247 只如此等類，譬如象馬攏悞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  
248 骨，然可調服。”和上再爲說法：“欲求寂滅樂，當學沙門  
249 法，無心離意識，是〔即〕沙門法。諸闍梨自言我是佛弟子，  
250 不肯學沙門法，只言慵不作，是野干之類。佛有明  
251 文：未來世當有身著袈裟，妄說有無，毀壞我正法，  
252 譬如以手指物，愚癡凡夫觀指不觀於物，隨言說指而  
253 生執著，乃至盡命，終不能捨文字之相。隨言而取義，建  
254 立於諸法；以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諸官、僧聞已，忙（茫）然  
255 失色，辭去。西京勝光寺僧淨藏來投和上，和上問淨藏：  
256 “學何經論？”答：“曾看《維摩》章疏，亦學坐禪，是太白宗旨。”  
257 和尚即爲說法：“無意是道，不觀是禪。不取亦不舍，境來  
258 亦不緣。若看章疏，即是想念喧動；若學太白宗旨，坐  
259 禪即是意相（想）攀緣。若欲此間住，一生來所學盡不  
260 得在心。”問淨藏：“得否？”答：“得。願和上慈悲攝授。”即再爲  
261 說法：“一物在心，不出三界，有法是俗諦，無性第一義，  
262 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云云。隴州開元寺知一師來投  
263 和上。和上問：“是誰弟子？”答：“是覺和上弟子。”和上云：“說汝  
自  
264 修行地看。”知一師即呈本師教云：“看淨。”和上即爲說  
265 法：“已無垢垢（衍一垢字）淨，云何看淨。此間淨由不立，因何有  
〔垢〕。看  
266 淨即是垢，看垢即是淨。妄想是垢，無妄想即是淨。  
267 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無念即是無垢，無念即無淨。”云云。  
268 知一師聞說，言下即悟，便爲弟子，不離左右。有法輪師，  
269 解《涅槃》章疏，博學聰明，傍視無人，自言第一。故就山門，

- 270 共和上問難。和上問：“法師解何經論？”答：“解《涅槃經》。”和上問：
- 271 “和上云何解《涅槃經》？”法師即引章疏。和上說云：“非是《涅槃
- 272 經》，此並是言說。言說三苦(界)本，真實滅苦因；
- 273 言說即變異，真實離文字。高貴得(德)王菩薩同(問)世尊：
- 274 云何名大般涅槃？佛言：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和(如)上(上字衍)是法相，名
- 275 大涅槃。云何將言說妄想以為涅槃，若如此說，即不解，云何道
- 276 解？”法輪師聞說，無詞敢對。和上云：“有法是俗諦，無性第
- 277 一義，解即是繫，聰明是魔施設，無念即無繫，無念是涅槃，
- 278 有念是生死，無念是聰明，有念是暗鈍，無念即無彼，
- 279 無念即無此，無念即無佛，無念無衆生，般若大悲智，
- 280 無佛無衆生，無有涅槃，佛亦無佛。若明此解，是真解
- 281 者；若不如此解，是着相凡夫。”法輪師聞說，啓顙歸依：“小師
- 282 傳迷日久，今日暗眼再明。”綏州禪林寺僧兄弟二人，並
- 283 持《法華經》，時人號為“史法華”。兄弟投和上，兄名一行，弟名
- 284 [惠明，持]《法華經》，日誦□(三)遍”。和上問：“《安樂行品》：
- 一切諸佛，
- 285 [空無所有，無有常住，亦]無起滅，是名智者親近處。”
- (后残)

可以看出，这个本子是从 S. 516 等所代表的《历代法宝记》的原本简化而成的，其中常常用“云云”表示省略。也有些省略是随文删掉一些词句，有时使文词更加顺畅。从行文顺畅来看，这个本子可以视作全本《历代法宝记》的“略出本”。

经与上述敦煌诸本相校，本卷的一些优点无疑将对校勘此卷大有帮助。有些不同，如“近代蜀僧嗣安法师，造《斋仪》两卷，现今流行”一句，他本《斋仪》做《斋文》，“两卷”做“四卷”，也是值得琢磨的问题。



《历代法宝记》保存了许多唐代四川宗教史和政治史的资料。因此,这部书的整理必将有助于我们对许多方面问题的探讨。

(附记:感谢韦闻笛女士提供材料、林世田先生校订录文。)

(2002年2月10日初稿,8月7日改订。原载《戒幢佛学》第2卷中日敦煌佛教学术会议专辑,岳麓书社,2002年12月,94—105页。)

## 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年代下限,是关系到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的重要问题。1963年出版的孟列夫(L. N. Men'shikov)等编《亚州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著录了两件重要的写卷。一件是Φ. 32A(M. 1696)《咸平五年(1002)五月十五日敦煌王曹宗寿与夫人汜氏造经帙记》,是目前所知有明确纪年的最晚一件藏经洞文书〔1〕。另一件是Φ. 229B(M. 897)《景德传灯录》,因为《景德传灯录》是东吴僧人道原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撰成的,经过其进上、修改、颁行、传写,年代一定更晚,所以《目录》的编者把它看作是更晚的写本〔2〕。一般人们也都据此认为这件《传灯录》是最晚的一件敦煌文书〔3〕。然而,大都数学者是根据《目录》来断定的,而没有见过原件。据我所知,真正见过原件的非俄国学者似乎只有日本的冈部和雄教授和意大利的卡多那(A. Cadonna)先生,但他们都是以研究禅宗典籍或其语言为目的,前者没有对于写本的来源问题发表看法,后者仍然是把它作为敦煌写本来处

---

〔1〕 L. N. Men'shikov et al., *Opisanie Kitaiskij Rukopisei Dunhuangskogo Fonda Instituta Narodov Asii*, I, Moscow 1963, pp. 683-684.

〔2〕 同上, p. 7。陈铁凡编译《苏联藏敦煌卷简目》(一),《中央图书馆馆刊》新8卷第2期,1975年,53页。

〔3〕 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の研究》,东京大东出版社,1983年,637—638页;同作者《敦煌の禅籍》,《禅学研究入门》,大东出版社,1994年,53页;刘进宝《敦煌学述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84页。

理的〔1〕。

1991年7月,我有幸走访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在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两位先生的关照下,看到了这件盼望已久的《景德传灯录》写本。该写本已由俄国学者将其与Φ.241缀合,其正面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九二(图31),首尾俱残,存304行,每行17字,楷体,与唐朝写经相差无几。《目录》著录为63号,年代定为“八至十世纪”。背面先写《景德传灯录》(图32),首残尾完,存371行,行23—27字不等,正文大字,双行小注,有朱笔记号或涂改。尾题作“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一”,题下有墨印一方,文曰“李醜儿/宅经记”。《传灯录》后空两行,接写《大悲心陀罗尼启请》,首存尾残,存59行,依大字计,每行约16字〔2〕。写本原为卷子本,后折成折本形式,是按背面写本折叠的,即字体清秀的《传灯录》每六行一折,字体粗大的《大悲心陀罗尼启请》每五行一折;而没有考虑正面《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间距,折线往往在一行文字的中间。由此可以确定,《传灯录》晚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抄写年代。

北宋时期的敦煌写本,一般字体不佳,纸张也比较粗糙,完全不似这件《传灯录》这样清秀整洁。而且归义军后期敦煌本地所写的佛教文献,往往是些小本的通俗佛经、疑伪经、禅籍等,像《传灯录》这样的长卷也不多见。考查时虽然无书可案,但从外观和内容所得到的直接感觉,总以为它不像是敦煌写本。若是藏经洞所出,也是从其他地方写好后流传到敦煌的。回国

〔1〕 冈部和雄《レニングードの東洋学研究所を訪ねて》,《驹泽大学大学院佛教学研究會年報》第14号,1980年,9—10页;A. Cadonna,“Il frammento manoscritto del *Jingde chuandeng lu* nel fondo di Dunhuang a Leningrad”, *Cina*,17,1981,pp. 7-33,pls. 1-3.

〔2〕 同注〔1〕孟列夫《目录》,pp. 42-43,322,353-354. 史睿氏为笔者翻译了有关这件写本的俄文注记,谨此致谢。现全卷已收入《俄藏敦煌文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91—307页。

后,笔者仍然时时留心于此,陆续找到一些证据,现在可以比较肯定地说,这件写本不是敦煌所出,而是柯兹洛夫(P. K. Kozlov)在黑城(哈拉浩特)所发掘到的,今举证如下。

《景德传灯录》尾题下所钤“李醜儿宅经记”,《目录》误“醜”字为“西鬼”二字,所以未能特别予以重视。笔者根据友人府宪展先生的提示,在确定为柯兹洛夫黑城所获文书中,找到了同一印迹,此即俄藏TK. 186《注心要法门》。孟列夫编《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No. 227 著录此件云:

227(原藏录号TK-186)《圭峰兰若沙门宗密注顺宗皇帝所问心要法门华严疏主清凉国师澄观答》

《大正藏》中未收入的作品和注释,包括澄观(737—838)答唐顺宗(805年)和宗密(780—841)的注释。

木刻本,经折装,全件。纸白色,涩滞,厚0.09—0.11毫米,宋体字。(十二世纪前二十五年)宋版本。包括两部分:

一、版画。三折面,一纸,栏面28×20.5厘米,单栏。画中小桌上放着香炉,右边坐一僧人,站一侍者。左边坐着皇帝,站一官员。版画刻印精细。

二、著作和注释的正文。第1—4纸均四折面,第5纸二折面。页码在各纸右栏上。第1行是版画题词:“清凉答顺宗”。折面10.5×28厘米,栏面10.5×21厘米,单栏。此刊本的版画被分成两部分,下面是正文和小字双行注释,上面是注释结构示意图,正文面5行,行10字。有首题和尾题。尾题:“注心要法门”。正文结尾有加了标题《心要法门颂》的五言诗。尾题下面是黑底阴文的施主题名:“善友施”,尾题上方盖有书主人的长方形淡紫色印章,4×5厘米,双栏,内为双行楷体:“李醜儿/宅经记”。

封皮表面为黄纸,里面糊了一张汉文文书(草体)的纸。封皮上有印下的书签:《注清凉心要》,黑底阴文,双栏。

此件包含“李醜儿宅经记”印的尾部图版,刊于同书图版五<sup>[1]</sup>。细加对比,两件文献后所钤印迹完全相同。印有同一所有者印记的图书,在交通不太发达的古代,似不会在当时就分散在敦煌和黑城两地。

我们之所以详细引出孟列夫关于《注心要法门》的叙录,是想更多地了解这部文献的写本状况。这部书是著名的禅僧圭峰大师宗密注释其老师澄观所撰《心要法门》的著作,收入《续藏经》第103册。宗密是华严宗第五祖,也是荷泽神会的传人<sup>[2]</sup>。我们知道,《景德传灯录》也是一部重要的禅籍,看来李醜儿是一个禅宗信徒,他似乎专门收藏与禅宗有关的文献。因此,从内容上也可以说明现在分为敦煌和黑城两种编号下的这两件文献的密切关系。据孟氏的《叙录》,《注心要法门》刻成于公元十二世纪的前二十五年。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没有如此晚的刻本,所以,如果我们把两者归到一处,合理的选择只能是黑城,因为黑城遗址的年代跨越了整个宋元时代。

从写本的形式来说,《传灯录》这种折本形式的书,是黑城出土文献中的常见形式,据孟列夫上引《叙录》前言的统计,总共有176件<sup>[3]</sup>,占俄藏所有黑城汉文文献的三分之一强。敦煌地区的折本,是在吐蕃的影响下出现的,而且绝大多数是藏文文书。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虽然也有折本书流行,但大多数是疑伪经、戒律、经疏和陀罗尼<sup>[4]</sup>,像这种把

---

[1] L. N. Men'shikov, *Opisanie Kitayskoy chasti Kollektzii iz Khara-khoto (Fund P. K. Kozlova)*, Moscow 1984, pp. 266-267, p. 481, pl. 5; 王克孝汉译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89页,图版第5页。

[2] 参看冉云华《宗密》第1章《宗密生平与著作》和附录《宗密传法世系的再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1—56,287—303页。

[3] Men'shikov, *Opisanie Kitayskoy chasti Kollektzii iz Khara-khoto (Fund P. K. Kozlova)*, p. 88; 王克孝汉译本,56页。

[4] J. -P. Drège, “Les accordeons de Dunhuang”,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III, Paris 1984, pp. 195-204, pls. xxiv-xxx; 耿昇译载《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577—589页。

《大般若经》废掉而抄写《传灯录》的作法,在缺少经本的敦煌似乎很难想像。

更重要的证据是在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 KK. II. 0238(k)号写本,由马伯乐(H. Maspéro)整理发表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中,编为 No. 599。此件正面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九二,存5行,行17字;背面是《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一,存11行,行21—23字不等。马伯乐氏定前者为唐朝写经,而后者则为宋或金朝写本<sup>〔1〕</sup>。马伯乐氏的书中没有收载这件写本的图版。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第55册所收碎片104—105,有不十分清楚的照片<sup>〔2〕</sup>。最近,笔者收到英国图书馆中文部吴芳思博士(Dr. Frances Wood)寄来的该件清晰照片,可以据之做更详细的考查。

写本正面首残(图33),存四行正文和一行尾题,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九十二”,后有五行余白;背面尾残(图34),存正文十行和一行首题,曰“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一”,前有一行未写。正背的字体与俄藏写本完全相同,折本的方式也一模一样,即按《传灯录》写本六行为一折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两者是同一写本。由于《传灯录》有双行小字,不易统计精确的字数,笔者计算了《大般若经》俄藏和英藏部分之间所缺字数,按每行十七字计算,应缺十四行半,而中间正好有一段的末尾,当有不足一行的部分空白,也就是说,共缺十五行。从俄藏写本正背来看,一般是背面《传灯录》的六行,约相当于正面《大般若经》的五行。所以,俄藏和英藏写本之间,正好少了三个折叶,这种缺失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

斯坦因收集品有写在原卷上的原始考古学编号,即 KK. II. 0238. k。所

〔1〕 H. Maspé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p. 230.

〔2〕 《敦煌宝藏》第5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361—363页。

谓 KK. II,指的是哈拉浩特(Khara-khoto)古城西面的一个寺院遗址,旁有被毁的佛塔。1908年,柯兹洛夫曾在此掘得大批写本、绘画和各种古物〔1〕。1914年,斯坦因在柯兹洛夫的报告的指引下,也发掘了这一遗址,同样获得了一批西夏文、汉文、藏文文书和考古艺术品,尽管不如柯兹洛夫所获得的材料完整〔2〕。由此我们不难推测,这件长卷的主要部分先是被柯兹洛夫掘得,余下的一小部分为斯坦因获取。如果柯兹洛夫发现时是首尾完整的全卷的话,则目前不知所在的三折叶有可能还会发现。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俄藏所谓敦煌本《景德传灯录》是出土于哈拉浩特古城西寺院遗址(斯坦因编号 KK. II)的黑城文书,以它作为敦煌藏经洞最晚的文献是错误的。

俄藏敦煌文献中混入黑城文书并非仅此一件,孟列夫编《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时,曾把原编在敦煌文献中的下列材料,订正为黑城所出,它们是:Φ. 214、249、308、311、312(1)、315、327、337、Дх. 591、1339、1403、2158、2823、2828、2957、3185、10279、10280号〔3〕,其中大多数曾经著录于《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1、2卷,而且上列所有Φ编号文献,仍被收入《俄藏敦煌文献》第四、五册,我们相信编者当然知道这是黑城出土物,但在他们的叙录出版之前,这种处理方法很容易将读者引入歧途,以为它们都是敦煌藏经洞的文献。

除了孟列夫氏所考订的材料外,《俄藏敦煌文献》刊布的Φ. 317、335、360三件印本佛典或版画也像是黑城出土物。另外,Φ. 221 + 228 + 266《大

〔1〕 参看罗福苾《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期,1930年,1—6页。

〔2〕 A. Stein, *Innermost Asia*, I, pp. 446-452, 472-498; III, figs. 257—258; IV, pls. 17, 22. 参看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0年,7—23页;收入《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87年,254—275页。

〔3〕 Men'shikov, *Opisanie Kitayskoy chasti Kollektzii iz Khara-khoto (Fund P. K. Kozlova)*, Nos. 173、236、296a、199、296b、188、236、220、204b、346、350、348、211a、333、368、204a、334;参看王克孝汉译本相应编号注记。

乘入藏录》，据背面文献内容，也应是黑城文献〔1〕。

因此，我们在利用俄藏敦煌文献时，应当时时留意所用资料是否为黑城出土。

我们判定俄藏《景德传灯录》不是敦煌写本，目的是说明它在敦煌文献编年、藏经洞封闭年代等问题上没有任何价值。但它作为一件古代抄本，仍然具有校勘等方面的作用。按《大中祥符法宝录》卷二十著录《景德传灯录》：

景德中，有东吴僧道原，采摭成编，诣阙献上。乃诏翰林学士左司谏知制造杨亿、兵部员外郎知制造李维、太常丞王曙同加刊定，勒成三十卷。大中祥符四年（1011）诏编入藏。

俄藏本无千字文号，版式与一般宋元版佛典不同，且有修订痕迹，都表明其抄写年代较早，在今后整理《景德传灯录》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现它的更大价值。

还应提到的是，俄藏《目录》还著录了另一件是《景德传灯录》，即 Дх. 1728 (M. 2686) 号，残存一纸的下半截，共十行文字。《目录》在所标《景德传灯录》的名称后，加了一个问号，表示不能肯定。此件经笔者 1991 年检看原物，确为敦煌出土，但审内容，实为唐朝开元年间成书的早期灯史著作——《楞伽师资记》净觉序的残文，与《传灯录》毫无关涉。此别详他文，此不赘述。

（原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1996 年，251—253 页。增订本补图版二幅，以资对照。）

〔1〕 方广鎔《俄藏〈大乘入藏录卷上〉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 年第 1 期，72—82 页。



##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

### 一、引言

由于种种原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敦煌文献”(Ф.和 Дх.编号)中,混入了一些原本是柯兹洛夫(P. K. Kozlov)考察队从黑水城带回的汉文文献,这些文献有些已经被主持编纂俄藏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的孟列夫(L. N. Men'shikov)先生发现,近年来也不断有学者指出其中个别文献原本来自黑水城,但由于一些文献已经丢失了原始编号,迄今还没有人把它们分辨出来。这样的情况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是研究敦煌的学者会不经意地把黑水城文献当作敦煌藏经洞文献来作为研究依据,这样当然会错误地把年代较晚的黑水城文献当作敦煌文献来处理,所得结论常常出现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黑水城文献的学者不知道俄藏敦煌文献中保存着和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同组的文献,因而在研究中会遗漏若干重要的黑水城文献。而据我考察的结果,混入“敦煌文献”的黑水城文献有些是内容较长的重要文献。

本文在整理前人已经指出的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的基础上,从年代、内容、写本形态等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判定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并对比黑水城文献来探讨这些文献的价值所在,希望能为今后黑水城汉文文献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

自1992年开始,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大型

图录计 17 册,刊布了 Ф. 1—366 号和 Дх. 1—19092<sup>〔1〕</sup>,影印俄藏全部“敦煌”资料。此项工程的完成,给学术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可谓功德无量。一般来说,弗路格(Флук)整理的 366 卷较完整写本和 Дх(俄文“敦煌”缩写)编号的文献,都是奥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探险队所获的敦煌汉文文献,但是这 19000 多号的“敦煌文献”中,其实包含着许多中国西北其他古代遗址发现的汉文文献,包括彼得洛夫斯基(N. F. Petrovsky 1837—1908)从和田购买到的丹丹乌里克出土汉文文书,特罗特科夫(N. N. Krotkov 1869—1919)购买的吐鲁番地区出土文献,柯兹洛夫从黑水城发掘的西夏时期的汉文文献,它们大多数是早年整理者把俄国从中国西北地区不同遗址所获少量汉文文献归并到较多的“敦煌汉文文献”当中的结果。

## 二、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

就编入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而言,有些已经由主要负责敦煌、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工作的孟列夫先生发现,并在《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中加以著录<sup>〔2〕</sup>,其中部分再次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献》<sup>〔3〕</sup>;有些则是后来的研究者根据内容而判断出来的。吴其昱先生曾指 Дх. 9585—10150 号是奥登堡于 1909 年购自黑水城等地,非敦煌所出<sup>〔4〕</sup>,但这一说法似乎没有得到整理俄藏敦煌文献者的响应。

---

〔1〕 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1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 年。

〔2〕 L. N. Men'shikov, *Opisanie Kitayskoy chasti Kollektzii iz Khara-khoto (Fund P. K. Kozlova)*, Moscow 1984; 王克孝汉译本《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年。以下引用汉译本。

〔3〕 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4〕 吴其昱《列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汉学研究》第 4 卷第 2 期,1986 年,74 页。

现将前人已经提示和我们考证认为的黑水城文书列在下面,以便研究黑水城文献的学者采览〔1〕:

Φ. 123A《增一阿含经》,刻本,前有扉画护法神王像。从版式和刻工之细致,应当是黑水城文献。见《俄藏黑水城文献》6,69页。竺沙雅章2003,23页认为是辽《契丹藏》本断简。

Φ. 204A《增一阿含经》,刻本。版式与Φ. 123A《增一阿含经》刻本相同,应当是一个印本的不同残片,同样来自黑水城。见《俄藏黑水城文献》6,69页。竺沙雅章2003,23页亦认为是辽《契丹藏》本断简。

Φ. 181(1)太平兴国六年法进于澄净师所受菩萨戒文,(2)《法苑珠林》摘抄。见府宪展1996,85页。

Φ. 214《亲诵仪》,尾题:“天庆丙辰三年(1197)十二月廿五日写勘了。”按,天庆为西夏桓宗年号。孟列夫《叙录》,No. 173;府宪展1996,86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70—72页。

Φ. 221 + Φ. 228 + Φ. 266 正面抄有三种文献:(1)《八种粗重犯堕》,见方广錡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60—63页;(2)《常所作仪轨八种不共》,题“吉祥形鲁割造”;(3)《大乘秘密发起》,当为译自藏文的密教经典。吉祥形鲁割又见Φ. 315《黑色天母求修次第仪》及其他黑水城文献。背面为《大乘入藏录》卷上。见方广錡《俄藏〈大乘入藏录卷上〉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1期;收入作者《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下,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233—263页;府宪展

〔1〕 以下文献的图版,均已按编号顺序收入《俄藏敦煌文献》,故此不一一给出页码。参考文献所用缩略语如下:府宪展1996 = 《敦煌文献辨疑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84—95页;金滢坤2003 =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城文书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敦煌学》第24辑,2003年6月,61—82页;孟列夫《叙录》 = 孟列夫著,王克孝汉译本《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竺沙雅章2003 = 《黑水城出土の遼刊本について》,《汲古》第43号,2003年6月,20—27页。部分名称的拟定,参考了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教文献续考》,见《宗舜法师文集》,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戒幢教育网,2005年。

1996, 85—86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72—87 页。

Φ. 222《多闻天施食仪轨》,从内容看,应当是据藏文文献翻译或编译的密教经典,与 Φ. 234 内容有重复,但文字不同。《俄藏敦煌文献》拟题“多闻天陀罗尼仪轨”,实际上原卷有标题,作《多闻天施食仪轨》和《天王烧事仪轨》。

Φ. 229 + Φ. 241《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九二,背为(1)《景德传灯录》卷十一,(2)《大悲心陀罗尼启请》。见荣新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论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250—253页;府宪展 1996, 86—87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87—104 页。

Φ. 234《多闻天施食仪轨》,首尾残,《俄藏黑水城文献》6, 104—105 页。参照 Φ. 222,应当是《多闻天施食仪轨》。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教文献续考》已经从内容上加以论证,见《敦煌研究》2004 年第 5 期, 93 页。

Φ. 249 + Φ. 327《金刚亥母修习仪》。孟列夫《叙录》,No. 236;府宪展 1996, 87—88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06—108 页。

Φ. 308 佛像印本。十四世纪中期刻本。孟列夫《叙录》,No. 296a;府宪展 1996, 88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09 页。

Φ. 311《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尾题:“皇建元年(1312)十二月十五日,门资宗蜜沙门本明依口刹门标授中集毕。皇建二年六月十五日,重依观行对勘定毕,永为真本。”按,皇建为西夏襄宗年号。孟列夫《叙录》,No. 199;府宪展 1996, 88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10—126 页。

Φ. 312(1)佛经刊本附图,其上所绘僧人有题名“楞严大师”,孟目疑为 1132 年的宋刊本。孟列夫《叙录》,No. 296b;府宪展 1996, 88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26 页。

Φ. 315《黑色天母求修次第仪》,孟列夫《叙录》,No. 188;府宪展 1996, 89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27 页。

Ф. 317A《佛说长阿含经》卷五刻本。府宪展 1996, 89 页疑为黑水城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6, 127—128 页。竺沙雅章 2003, 24 页认为是辽《契丹藏》断简。

Ф. 33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府宪展 1996, 89 页疑为黑水城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6, 128 页。

Ф. 337《佛说竺兰陀心文经》, 刻本, 尾有施印题记:“元丰六年(1083)三月 日施。”此处之元丰为宋神宗年号。孟列夫《叙录》, No. 220; 府宪展 1996, 89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29—130 页。

Ф. 360 版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府宪展 1996, 90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30 页。

Ф. 362A(1)《星占流年》, (2)《大一切成就母永修仪》, 尾题“师资相录仪”。府宪展 1996, 90 页。

Дх. 591《众生心法图》。孟列夫《叙录》, No. 204b; 府宪展 1996, 90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31 页。

Дх. 1236《推神龟走失法》第二等,《俄藏黑水城文献》6, 132 页。

Дх. 1336(TK140)《佛说三十五佛名经》, 刻本。

Дх. 1339 元至正二年(1342)粮谷历, 背面为宣光二年(1372)六月呈文。按, 宣光为北元昭宗年号。孟列夫《叙录》, No. 346; 府宪展 1996, 91—92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32—133 页。

Дх. 1390《大威德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 上栏为炽盛光佛版画(图 35)。府宪展 1996, 92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33 页。按, 炽盛光佛信仰在西夏时期非常流行, 亦可佐证这件插图本陀罗尼经的西夏属性, 参看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2 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01—148 页; Kira Samosyuk, “The Planet Cult in the Tangut State of Xi Xia - The Khara-Khoto Collection, State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5, 1997/98, 353-376.

Дх. 1403 元皇庆元年(1312)刑房大赦令, 孟列夫《叙录》, No. 350; 府宪

展 1996, 92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34 页。

Дх. 1445 礼佛文,《俄藏黑水城文献》6, 134 页。

Дх. 1447《金光明最胜王经》善生品第二十一,刻本。府宪展 1996, 93 页疑为黑水城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6, 135 页。

Дх. 2158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呈文,背为宣光二年(1372)案牒(图 36),孟列夫《叙录》, No. 348;府宪展 1996, 93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35—137 页。

Дх. 2822 蒙学字书,《俄藏黑水城文献》6, 137—146 页。

Дх. 2823 佛教名词问答,十二世纪末写本。孟列夫《叙录》, No. 211a;府宪展 1996, 93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47—149 页。

Дх. 2828 西夏乾祐二年(1171)材植交纳帐册。孟列夫《叙录》, No. 333;府宪展 1996, 93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50—159 页。

Дх. 2875 刻本佛经。

Дх. 2876 刻本佛经。

Дх. 2877 西方三圣捺印。

Дх. 2878 为天曹地府说法版画,《俄藏黑水城文献》6, 160 页。

Дх. 2957 + Дх. 10280 西夏光定十三年(1223)十月初四日杀了人口状,按光定为西夏神宗年号。孟列夫《叙录》, No. 368;府宪展 1996, 93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60—161 页。

Дх. 3143 佛在鹿野苑说法图版画,《俄藏黑水城文献》6, 161 页。

Дх. 317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本。

Дх. 3185 密宗经典,内容为说性空之法。孟列夫《叙录》, No. 204a;府宪展 1996, 93—94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6, 162 页。

Дх. 3249 刻本佛经。

Дх. 4076 刻本佛经。

Дх. 6306—Дх. 6311, Дх. 6313, Дх. 6314, Дх. 6318, Дх. 6319 刻本佛经。

Дх. 7221 刻本佛经。

- Дх. 7850 刻本佛经。
- Дх. 7867 刻本佛经。
- Дх. 7898 刻本佛经。
- Дх. 7899 刻本佛经。
- Дх. 7927 刻本佛经。
- Дх. 7929 刻本佛经。
- Дх. 8119 刻本佛经。
- Дх. 8122 刻本佛经。
- Дх. 8270 华严三圣版画。《俄藏黑水城文献》6,162 页。
- Дх. 8591, Дх. 8596 刻本佛经。
- Дх. 9108 刻本佛像。
- Дх. 9218 刻本佛经。
- Дх. 9222, Дх. 9230 刻本佛经。
- Дх. 9240(见 Дх. 9177) 刻本佛经。
- Дх. 9241(见 Дх. 9225) 刻本佛经。
- Дх. 9746 刻本佛经。
- Дх. 9796 刻本佛经。
- Дх. 9963 刻本佛经。
- Дх. 10279 文书残片。孟列夫《叙录》, No. 334; 府宪展 1996, 93 页; 《俄藏黑水城文献》6, 163 页。
- Дх. 10462 刻本佛经。
- Дх. 10467《中庸章句传》。此与黑水城文献时代吻合。
- Дх. 11471 佛画扉页。
- Дх. 11472A. B. 佛画扉页。
- Дх. 11500, Дх. 11501, Дх. 11503 佛典扉画。按, 下举从 Дх. 11500—Дх. 11581 号之间的各种印本佛典和扉画, 和已经确定的黑水城刻本、扉画相同或类似, 应当都是出自黑水城。

Дх. 11504, Дх. 11571, Дх. 11573, Дх. 11576—11578, 刻本佛典。

Дх. 11572, Дх. 11576 刻本扉画, 护法神王像。

Дх. 11579 捺印千佛。

Дх. 11580 佛典扉画。

Дх. 11581《金刚经》卷首版画。

Дх. 12211 文书, 提到“亦集乃路”, 为黑水城文书无疑。

Дх. 12238 元代达鲁花赤启, 见金滢坤 2003, 75 页。

Дх. 12255 西夏文残片。

Дх. 16714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提举司文状, 见金滢坤 2003, 66—67 页。

Дх. 16798 佛典, 刻本; 背面小字文书, 当为黑水城文书。

Дх. 16833 正背面同 Дх. 16798。

Дх. 18990—Дх. 19092 从内容和性质来看, 可能都是黑水城文献, 而且它们集中放在俄藏敦煌文献编号的最后, 也有助于这样的看法。以下只提示有明显标志的一些编号:

Дх. 18990 背面为西夏文文献, 当为黑水城文书。

Дх. 18992 元亦集乃路总管府防贼禁约令, 见金滢坤 2003, 72—73、77—78 页。

Дх. 18993 西夏光定十二年(1222)契约, 见金滢坤 2003, 63—64 页。

Дх. 18995 元至顺年间文书, 见金滢坤 2003, 73 页。

Дх. 18996 契约, 提到“亦集乃”。

Дх. 18999《百字咒忏悔仪》。

Дх. 19000 佛典, 其中有《杵偈》。

Дх. 19001, Дх. 19003—19005 历日残片(图 37)。

Дх. 19002 西夏文残片。

Дх. 19022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支物历, 见金滢坤 2003, 69—70 页。

Дх. 19042 元至正二十一年残帐, 见金滢坤 2003, 70 页。



- Дх. 19043 西夏乾祐廿四年(1184)文书,见金滢坤 2003,65 页。
- Дх. 19050 佛经,木笔书写(图 38)。
- Дх. 19053 元代残文,见金滢坤 2003,74—75 页。
- Дх. 19067 辽圣宗统和二年(984)牒及判,见金滢坤 2003,62—63 页。
- Дх. 19068 元至顺元年(1330)前后赐楚王、魏王什物历,见金滢坤 2003,71—72 页。
- Дх. 19070 元至元二年(1265)、三年吏礼房文书,见金滢坤 2003,65—66 页。
- Дх. 19071 元代状及判,见金滢坤 2003,73—74 页。
- Дх. 19072 元至正三年(1343)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见金滢坤 2003,68—69、79 页。
- Дх. 19073 元泰定二年(1325)残状,见金滢坤 2003,68 页。
- Дх. 19076 元代便物历,见金滢坤 2003,76 页。背面为西夏文。
- Дх. 19077 元至正二十一年帐,见金滢坤 2003,70—71 页。背面为西夏文残片。
- Дх. 19078 西夏文残片。
- Дх. 19086 藏文残片。
- Дх. 19088—Дх. 19090 捺印千佛像。
- Дх. 19091—Дх. 19092 捺印千佛像。

### 三、判断俄藏“敦煌文献”中黑水城文献的几个方法

总结前人和我们对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的认识,可以归纳出判断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的几个方法,在此提出来以便大家指正:

第一,我们一般所说的敦煌文献,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 17 窟)出土的文献,它们主要是从五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叶的写本文献。黑水城文献

则主要是西夏到元朝时期黑水城一带流行的文献和行用的文书。按照我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考察,我认为封闭的时间应当在1006年前后,原因大概是与敦煌归义军统治者联姻的于阗李氏统治的佛教王国被信奉伊斯兰教的疏勒黑韩王朝灭亡,导致了敦煌藏经洞的封闭。而过去流行的1036年因为西夏攻击敦煌而导致藏经洞的封闭的说法,因为从1002—1036年间藏经洞没有任何带有明确纪年的文献而显得有些证据不足<sup>〔1〕</sup>。如果我对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的看法成立的话,那么俄藏敦煌文献中明显属于1006年以后的写本和刻本文献,应当主要是混入的黑水城文献。

第二,敦煌文献的内容主要反映了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敦煌地方流行的经典和使用的文书,除了吐蕃统治时期有些地方特征外,各个时代流行的书籍和中原地区大体相同,而敦煌的公私文书则更容易从内容上看出不同时代的特征来<sup>〔2〕</sup>。黑水城文书从典籍方面有中原和西藏两方面的影响,流行的经典主要是中原的普通藏经和西藏的密教经典,而文书则多是黑水城当地的西夏、元朝、北元时代的文书,也有部分是和宋朝战争时所掠的宋朝文书档案。从世俗文书方面来看,敦煌和黑水城文书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但典籍类中的一般佛教经典有的难以区分,除非是明显属于后弘期的西藏密教经典的汉译本<sup>〔3〕</sup>,那是敦煌藏经洞所没有的资料。

第三,敦煌藏经洞虽然出土了一些刻本文献,但除了极个别从外地流入的正规佛经,如四川流入的咸通九年(868)刻本《金刚经》外,大多数刻本都是小本、单叶的陀罗尼、佛画、日历、药方之类,没有较长的佛典,刻工

〔1〕 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3—48页。

〔2〕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相关部分。

〔3〕 参看沈卫荣《序说有关西夏、元朝所传藏传密法之汉文文献——以黑水城所见汉译藏传佛教仪轨文书为中心》,提交“古代欧亚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2005年7月25日,收入《欧亚学刊》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159—179页;又《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23—34页。

也明显带有初期印刷品的拙朴一面<sup>〔1〕</sup>。而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许多较长的佛经刻本,如《佛说竺兰陀心文经》、《增一阿含经》等,还有不少佛经的扉画或插图,刻工都很精美,它们大多数是从宋朝传入西夏的大藏经的断片。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印本的内容和刻工两方面,来判断是否为黑水城文献。

第四,敦煌和黑水城都有大量写本文献,使用的书写工具有毛笔和木笔之别。敦煌吐蕃统治时期开始有木笔写经,归义军时期也有,但一般不用来书写重要的经典。黑水城文书则有许多典籍都是用木笔书写,字体细瘦,一眼看上去,和敦煌写本有所不同。另外,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的写本形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不过这需要具体分析,个案处理。

第五,俄藏敦煌文献中有部分写本可以与其他黑水城考古发掘品加以对证,由此判断系黑水城文献,笔者曾经将 Φ. 229 + Φ. 241 与斯坦因(A. Stein)第三次中亚探险于黑水城所获 KK. II. 0238(k)号写本对照,两者都是正面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九二,背面为《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字体、形制等都完全相同,因此判定为同一写本的不同残叶<sup>〔2〕</sup>。我想还有不少同类的资料可以和斯坦因收集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品加以对证,目前斯坦因收集品的非佛经文献均已出版<sup>〔3〕</sup>,而内蒙古文物考古所也曾出版《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sup>〔4〕</sup>,可惜二者都不是所藏黑城文献的全部。

由于俄藏敦煌文献是一个“大杂烩”,我们从中分辨黑水城文献时,还

〔1〕 参看菊竹淳一《敦煌の仏教版画》,《佛教艺术》第101号,1975年;马德《敦煌版画的背景意义》,《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1—6页;王怡、邹晓萍《敦煌版画艺术的风格特点》,同上刊期,32—35页。

〔2〕 荣新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论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250—253页,图版XVIII—XIX。

〔3〕 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①②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4〕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科学出版社,1991年。

应当注意两点,一是敦煌莫高窟北区也曾出土过一些汉文、回鹘文、藏文、西夏文文献,其外型和内容都和黑水城文献相近。我们知道俄国探险队在莫高窟北区做过工作,但是否在俄藏敦煌文献中混有莫高窟北区的文献,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比定,但我们应当注意出自北区文献的可能性。二是俄藏敦煌文献中确实混有吐鲁番出土文献,而吐鲁番文献的时间跨度很长,也包括十一世纪以后的高昌回鹘和元朝时期的文书,以及这段时间陆续从宋朝、西夏、元朝传入的写本和刻本文献,如 Дх. 17015—17435 之间就是特罗特科夫所获吐鲁番出土的刻本佛典,其中包括元朝燕京弘法寺刻印的《弘法藏》残片<sup>[1]</sup>,俄藏敦煌文献中这些晚期的刻本佛典,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来自黑水城的资料。

#### 四、Φ. 222《多闻天王施食仪轨》与 X2382 号唐卡

为了说明俄藏敦煌文献中黑水城文献的价值,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上述 Φ. 222《多闻天王施食仪轨》的第二部分(22—39行)文字如下(图 39)<sup>[2]</sup>:

唵,咩室啰(此三字旁写:外色勒)末耶,萨末哩末日啰,末日啰,三麻耶拔,吽。钵和唵咩□□□□(旁写:外□□□□)。来时便验者,或空中有衣钵声,或壁面上生火炎(焰),或自己恐怖毛竖心战口,或傍人依前所现时,其咒莫念。

当尊天王黄色,一面二臂,右手执七宝幢,左手鼠狼袋,乘青师子,请在莲花心中。

[1] 府宪展《〈俄藏敦煌文献〉科罗特阔夫收集品的〈弘法藏〉和高昌刻经活动》,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328—342页。

[2] 《俄藏敦煌文献》4,282页。笔者参考了李小荣先生的录文,谨此致谢。

八施碍各乘白马,住八叶上:

东面梭(?)末捺[施碍],黄色,右手执宝珠。

南面圆满施碍,赤黄色,右手执净瓶。

西面宝珠施碍,白色,右手火焰珠。

北面马主施碍,黑色。右手执钩。

东南角尽知施碍,赤色,右手执刀。

西南角参巴拔你施碍,青黑色,右手执枪。

西北角五尖施碍,黄白色,右手执宝楼。

东北角唧弥布怛里施碍,白色,右手执傍牌。

八施碍左手尽执鼠狼袋,吐七宝,乘白马,各随侍从,每一亿,各执种种器械。

想之,然后作五供养。天王等各各舌上出光,随光吃食,想之,念《天王并八施碍真言》:“唵,咩室啰末捺野(旁写:外色嘞瓦捺野莎诃)!唵,梭抹捺野!唵,布噜捺巴怛啰野!唵,末你巴怛啰野!唵,呱咧啰野!唵,三巴啰拔捺野!唵,乌怛悉怛捺野!唵,钵唧割野!唵,唧媚怛哩野!”此等尾上悉添“末哩伊捺渴渴渴咽,渴咽领乙,”念此真言三遍,乃至受法乐自性。

次后八亿鬼神等各各舌上出[光],饮残甘露时,除“渴渴渴咽”等字尾上添“莎诃”二字,念五七遍,鬼神等尽皆饱满。然后所求誓愿,悉皆[满足]。

求之已,念《奉送真言》:“唵,斯啰巴捺莎诃。”诵此咒时,令光散。各各[还]本官。

Φ. 222 这里所说的施食仪轨,在中原传存的汉译有关毗沙门天王的经典和仪轨中未见记载,应当是西夏时期从藏文佛典翻译而来,为我们研究西夏的毗沙门信仰和相关的仪式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我们对这篇文献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探险队同样从黑水城获得的一幅唐卡,绘制的正好是多闻天王和他的八大眷属以及随从。这件唐

卡现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 X2382,谢继胜先生在《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一书中,对这幅唐卡做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sup>[1]</sup>,为我们对比图像和文本提供了依据。据考,这幅唐卡绘制于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Φ. 222《多闻天王施食仪轨》的译作时间可能略早于这幅唐卡,因为文字要较画面简单一些,但属于同一时代,可以相互印证则毫无疑问。

下面就按照 Φ. 222《多闻天王施食仪轨》(简称《仪轨》)叙述的图像顺序,结合 X2382 号的彩色图版(图 40)<sup>[2]</sup>,在谢继胜先生的基础上,对这幅唐卡上的图像加以补充说明。

主尊天王藏文作 *nam thos sras/nam thos kyi bu*,意为“多闻子”,汉文佛典多译作毗沙门天王。他作为本尊神时,称作 *Jambala*,藏文转写作 *dzam bha la*,意思是“财神”、“宝藏神”。画面上身形“多闻天王为黄色身形,右手持能够满足信众一切愿望的胜幢,右(左)手持棕色的吐宝兽,身穿盔甲,跨坐于狮身之上。狮子的身色为蓝色,但鬃毛和尾毛都是绿色”<sup>[3]</sup>。据《仪轨》,其右手所持为七宝幢,左手则是鼠狼袋,与胜幢和吐宝兽意思相同,但更为准确。《仪轨》记所骑狮子的颜色为青色,与画面上的颜色更为贴近。

多闻天王周边八个方位上的武士,《仪轨》称作“施碍”,是代表世界八方的八大马王(*rta bdag*),也是夜叉头领。他们左手尽执吐宝兽(鼠狼袋),乘白马,与《仪轨》所记相合。至于每人身形的颜色和手持物则各不相同。下面左列为《仪轨》文字,右列是谢继胜先生的描述:

[1]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45—153页。

[2] 见 M. Piotrovsky (ed.),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Ith Century)*, Electa: Thyssen-Bornemisza Foundation, 1993, No. 55.

[3] 以下引号中文字,均为摘自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146—151页的相关部分。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

东面楼末捺施碍,黄色,右手执宝珠。	褐色身形,右手持金瓶,是东方的宝藏神(Jambhala)。
南面圆满施碍,赤黄色,右手执净瓶。	黄色身形,右手托上置太极球的金盘,是南方的满贤夜叉(Gang ba bzang po/Pūrṇabhadra)。(图41)
西面宝珠施碍,白色,右手火焰珠。	白色身形,右手持金色托盘,上置闪耀火焰的蓝色宝石,是西方的善宝(Nor bu bzang po/Manibhadra)。
北面马主施碍,黑色。右手执钩。	蓝色身形,右手持剑,是北方的毗沙门化身丑身王(Kubera)。
东南角尽知施碍,赤色,右手执刀。	棕色身形,猫头,右手持月牙刀,是东南方的正知夜叉(Yang dag shes/Sañjaya)。
西南角参巴拨你施碍,青黑色,右手执枪。	蓝色身形,右手持长矛,是西南方的荒居夜叉(vBrog gnas/Ātavaka)。
西北角五尖施碍,黄白色,右手执宝楼。	绿色身形,头戴野猪面具,右手持金底楼阁佛塔,是西北方的五娱夜叉(lNgas rtsen /Pāñcika)。
东北角唧弥布怛里施碍,白色,右手执傍牌。	白色身形,右手持剑,是西(东)北方的妙聚夜叉(vJam po vkhyil pa/Mrdukuṇḍalin)。

其中,《仪轨》北方施碍身形黑色,手持钩,与画面上作蓝色,右手持剑略有不同。东北方施碍右手持傍牌,画面上则持剑。南方施碍右手执净瓶,画面上托金盘。东南方施碍身形赤色,而画面上是棕色。东方施碍身形黄色,画面作褐色,不过此处画面似有破损,所以原本也可能就是黄色;而右手持宝珠,画面上是一金盘上托宝珠,而不是金瓶。西南方施碍身形青黑色,与画面十分符合,而不是蓝色。看来,多闻天周边的八位施碍,绘画者有一些改动,这在文本和图像之间是常见的现象。不过《仪轨》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幅唐卡,还是有很多帮助的。

八大马王的旁边,都有一位没有坐骑的随从,肩负着各种财宝,这和《仪轨》所说八施碍各随侍从,各执种种器械也是相同的。

对于《仪轨》和唐卡的具体对证和分析,我们还是留给艺术史家去仔细研究。这里想说明的是,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说明

同时期绘制的唐卡,这或许比后期的藏文文献更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唐卡原本是挂在黑水城的寺院当中,寺中的僧人们手捧着《仪轨》一类的文献,观相念诵,修习教法。

现在的黑水城已经荒芜,但是,从黑水城出土的大量文献以及精美的唐卡,我们不难看出,当年这里曾经是交通枢纽、政治核心和军事堡垒,更是一个文化传播的中心,连接起西夏和中原、西藏、回鹘乃至更遥远地区(波斯、叙利亚)的文明。

(2006年8月20日初稿,提交9月15—19日在额济纳旗召开的“黑水城历史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12月12日改订,收入《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534—548页。增订本补图版若干。)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

### 前 言

汉唐时期的西域(古代新疆)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绿洲王国,它们分分合合,渐渐形成几个主要的文明中心,如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焉耆、楼兰(今若羌)、高昌(今吐鲁番)等。这些绿洲王国都位于丝绸之路的干道上,是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转运站,所以每个城镇都呈现出丝路城市特有的多元文化特征。同时,由于西域地区人种和民族成分复杂,各地区宗教、文化的面貌又具有各自的特色。

然而,由于公元 10 世纪以后西域地区的人种渐渐突厥化,宗教渐渐伊斯兰化,加上弥漫的尘沙和松软的土质等自然力的作用,使往日西域多元文化的面貌逐渐消失,或湮没于沙海之中,或弃置于荒山野岭。法显、玄奘记载的壮丽寺宇不复存在,鸠摩罗什、实叉难陀修学讲经的道场亦无从凭吊,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端。

1840 年以后,列强的炮舰轰开了中国沿海的大门,曾经出现“康乾盛世”的清帝国,这时也已衰败不堪。到了 19 世纪末,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长江南北瓜分领土,新疆也为占领印度的英国和占据中亚的沙皇俄国所覬觐。为了争夺新疆和扩大在新疆的势力范围,英、俄两国纷纷派出各种探险队进入新疆,攫取军事情报。1890 年 Bower Manuscripts 的发现,更引发了西域古物收集的热潮,随之而来的便是西方各国纷纷进入新疆从事考古发掘的时代。

## 一、俄国考察队的调查活动

由于俄国版图与新疆比邻,在中亚的地理考察方面,俄国早早地走在西方各国的前面。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N. M. Przhevalsky 1839—1888)自1870年至1885年曾四次考察中亚地区,足迹遍及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注意到新疆的文化遗物〔1〕。

自1893年开始,俄国陆续派出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发掘古物,包括:

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V. I. Roborovsky 1856—1914)和科兹洛夫(P. K. Kozlov 1863—1935)率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中亚考察队在新疆考察,获得一些回鹘文和波斯文写本。罗博罗夫斯基撰有考察的初步报告和考察队纪要〔2〕。

1898年,俄国科学院克列门兹(D. A. Klementz 1848—1914)率队考察吐鲁番,他们考察了高昌故城,发掘阿斯塔那墓地,测绘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在那里,他们发现许多带有中亚婆罗谜文和回鹘文题记的壁画,还带回了梵文和回鹘文的印本佛典〔3〕。

1906—1907年,科卡诺夫斯基(A. I. Kokhanovsky)率考察队再访吐鲁番,获得梵文、汉文、藏文、蒙文、回鹘文、粟特文写本、印本佛典和世俗文书,

---

〔1〕 N. M. Przhevalsky, *Iz Zeisana Cherez Khami v Tibet i na Verkhov'ya Zheltoi reki*, St. Petersburg 1883.

〔2〕 V. I. Roborovsky, "Predvaritelny otchyot ob ekspeditsii v Tsentralnuyu Asiyu V. I. Roborovskogo v 1893-95 gg.", *Izvestiya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XXXIV, pp. 1-59; V. I. Roborovsky, *Trudy ekspeditsii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po Tsentralnoy Azii, sovershonnoy v 1893-95 gg. pod nachalstvom V. I. Roborovskogo*, St. Petersburg 1899.

〔3〕 *Nachrichten u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n Jahre 1898 ausgeru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 St. Petersburg 1899.

还有摩尼教文献。这些材料先是交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后转归亚洲博物馆收藏<sup>[1]</sup>。

与此同时(1906—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M. M. Berezovsky)率考察队到库车地区考察,他们走访了库木吐拉、克孜尔等石窟,其发现品包括梵文写本、汉文印本、回鹘文汉文双语文书、回鹘文婆罗谜文双语文书、婆罗谜文所写汉语文书、龟兹文写本等。

1907—1909年,科兹洛夫(P. K. Kozlov)率考察队发掘了西夏古城哈拉浩特(Khara-khoto/黑城),获得数以千计的西夏、汉、藏、蒙文材料和几千件文物,这些文献和文物以其完整性而有别于俄国其他收集品,数量也相当庞大。科兹洛夫此行的考察报告是《蒙古、安多、哈拉浩特死城》<sup>[2]</sup>。

1909—1910年,奥登堡率领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主要目的地是吐鲁番盆地。在那里,他走访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那、伯孜克里克、胜金口等遗址,做了部分发掘。此外,奥登堡还到过焉耆的七格星和库车的苏巴什、森姆塞姆、克孜尔尕哈、库木吐拉、克孜尔等遗址。他此行的收获极多,但回国后只写了一篇题为《1909—1910年俄国突厥斯坦考察》的简报<sup>[3]</sup>,语焉不详。他至少应获得相当多的梵文写本残卷和一些回鹘文文书<sup>[4]</sup>。

1914—1915年,奥登堡率俄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队前往中国,此行主要

---

[1] See S. F. Oldenburg, "Kratkaya opis sostavlennogo d-rom Kokhanovskim sobraniya drevnostey iz Turfana", *Melange asiatique*, 13, 1907-1908, pp. 127-140.

[2] P. K. Kozlov, *Mongolia i Amdo i myortvy gorod Khora-Khoto: kspeditsiya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v nagornoy Azii P. K. Kozlova, pochotnogo chlena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1907-1909 gg*, Moscow & St. Petersburg 1923. 有王希隆、丁淑琴的汉译本,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S. F. Oldenburg, *Russkaya Turkestanskaya Ekspetsiya 1909-10*, St. Petersburg 1914.

[4] 回鹘文书见 S. Y. Malov, *Uigurskiye rukopisniye dokumenty ekspeditsiyi S. F. Oldenburga*, Leningrad 1932.

目的地是敦煌。奥登堡是大宗攫取敦煌写本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但却不是收获最少的一人,据说他们发掘了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的堆积物,因而获得一万余件文献资料和许多脱落的壁画以及一百余件绢纸绘画、雕塑,又从当地居民手中收集了大约二百件较为完整的写卷。奥登堡本人的简要记述有《千佛洞》一文〔1〕。

1909—1911年和1913—1914年,由拉德洛夫(W. W. Ladloff 1837—1918)发起,由马洛夫(S. Ye. Malov 1880—1957)率领的考察队,对新疆和甘肃进行了两次考察。他们在甘肃酒泉文殊山,获得清代抄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在吐鲁番地区,收集到当地出土的一些回鹘文世俗文书;在米兰,获得57件古藏文木简文书;此外,还有一些写于纸本和木简上的梵文残片。

此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1903年离任为止,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 1837—1908)持续不断地收集新疆和田、库车等地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其中包括写在桦树皮上的犍陀罗语《法句经》。1898—1918年间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科夫(N. N. Krotkov 1869—1919)、1904—1909年继彼得罗夫斯基出任喀什总领事的科洛科洛夫(S. A. Kolokolov)、1908年俄国驻库尔勒领事吉雅科夫(A. A. Dyakov)等人,都多少不等地收集到一些西域写本,这些文献大多转交给圣彼得堡的亚洲博物馆收藏。

## 二、俄国考察队对西域研究的意义

包括俄国上述考察在内的各国的西域考察,为揭示新疆古代的西域文

---

〔1〕 S. F. Oldenburg, “Peshchery tysyachi budd”, Vostok, II, 1922, pp. 57-66. 最近用中文发表的斯卡奇科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和孟列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有稍为详细的记录,两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1992年,109—116,119—128页。

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包括考古艺术品和文献等。一百多年来各国学者对这些收集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里仅列举以俄国探险队的收获为主的研究成果对于西域研究的贡献:

1. 于阗是丝路南道的大国,在大乘佛教的东传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彼得罗夫斯和马洛夫收集的和田出土的大量梵文、佉卢文写本佛教文献,为研究西域佛教提供了重要素材,也为中国佛教典籍的来源提供了探索的根源,如犍陀罗语《法句经》、梵本《法华经》等。他们还收集了古代于阗人所使用的于阗语文献,其中不仅有大量 5—8 世纪的佛教典籍,还有许多世俗文书,记录了 8—9 世纪于阗本民族的历史。与 8 世纪于阗语文书同时的大批汉文文书、佛典的发现,记录了唐朝安西四镇中于阗镇的情况,反映了当地胡汉双重管理体制和汉文化的流行状况。

2. 龟兹、焉耆是汉唐间丝路北道的大国,在文化上属于“吐火罗语”流行范围的文化圈。这一地区是俄国探险队考察的重点,他们对七格星等佛寺遗址和龟兹石窟及其中的塑像、佛教壁画的记录,成为今天研究北道佛教艺术的重要参考材料。大量属于小乘佛教的梵文经典被发现,表明这里与南道的于阗有着不同的佛教传播背景。属于西支印欧语言之一的吐火罗语文献的发现,为印欧语言和印欧人种的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其中龟兹流行的吐火罗语 B 方言,既有佛典,也有世俗文书,为研究 7 世纪前后的龟兹王国提供丰富的材料。而焉耆流行的吐火罗语 A 方言,主要是佛典,其中如《弥勒会见记》剧本,是回鹘文同名剧本的原本,表明焉耆、龟兹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3. 高昌所在的吐鲁番盆地,历史上曾经是车师王国、高昌郡、高昌王国、唐西州和西州回鹘的所在地,出土文献更加丰富多彩。俄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过数量不多的汉文文书,与其他各国考古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一起,使我们对从高昌郡,经高昌国,到唐朝、西州回鹘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大大超越传统文献记录的内容。他们还发现了许多摩尼教伊朗语文书,表明摩尼教在高昌回鹘时期盛行的情况。早期粟特语文书的发现,表明了粟特人

的到来及其在高昌地区经营商业的情况。他们对佛教石窟和寺院的考察,与文献相结合,可以使我们描绘从高昌王国到回鹘时代佛教在吐鲁番的流传及其特征。

### 三、俄国考察队与中国官府的交涉

一百年后,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丰富多彩并具有如此重要学术价值的古代文物和文献是如何被探险队带走的呢?当时的清朝或民国的中国官府就这样任由外国考察队随意掠夺自己的文物吗?

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考察队的报告往往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出版了《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一书(乌鲁木齐,2001年),根据我1995年在该馆的调查,这本书收集的材料只是有关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的很少一部分,有关俄国探险队的材料更少,但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地方官府和这些外国考察队之间的一些交涉过程,以及地方官府对于外国考察队的安排情况。

在上面这本书中,发表了一组有关1893—1895年俄国罗博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考察队的档案,这些档案大多是新疆各地官府之间通报考察队的护照、行进路线和进出境情况的(图42—43),其中有不少内容是转述上面一封来件的内容,这里就不抄录原文,略去重复的内容,只把相关的内容摘要录出,部分重要的文句则在引号中引述原文<sup>〔1〕</sup>:

1893年9月16日,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准俄国驻京大臣来函,称“有俄官罗孝罗斯科(Roborovsky)同廓泽罗伏(Kozlov),随带跟役十一名,拟往新疆、甘肃、四川等省游历,以广学问,请发护照”。清政府

〔1〕 以下有关罗博罗夫斯基探险队的档案,均见《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101—102页。

将缮就的护照经顺天府交罗孛罗斯科,称“凡遇中国设官地方,一体遵  
悉查验放行,惟禁地及为民情不协处所,不得任意前往”。

其实,就在同日,吐鲁番直隶厅同知彭绪瞻得喀喇沙尔厅来文,说罗博  
罗夫斯基(罗柏罗斯期)同武员一人,随从十一名,已经“由喀布齐实沟一带  
前往托克逊地方”,因此发出护票,命令“该洋人所到之处,妥为保护”。

同年 10 月 10 日,彭绪瞻给新疆巡抚陶模报告:称该俄人未走大路,于  
八月廿六日由山路到托克逊。又称“该俄人在托于廿八日来见,据称,住托  
壹、贰日即由山路往鲁克沁,至鲁停息数日即赴哈密,由敦煌径往西藏游历,  
再行回俄”。他已派役人护送前进,并饬鲁克沁回部郡王派人护送出  
境。随后在 10 月 23 日,彭绪瞻给哈密府、镇西府下文,请两地官员“俟俄官罗孛  
罗斯科(罗博罗夫斯基)等到境,派役保护施行”。

12 月 3 日,继任的吐鲁番直隶厅同知朱冕荣报告陶模:罗博罗夫斯基  
于十月二十日启程赴哈密,科兹洛夫(廓泽罗伏)则赴罗布泊地区,鲁克沁  
郡王分途派人护送前进。

由此可见,罗博罗夫斯基考察队是以“游历”的名义来新疆考察的,目  
的只是“以广学问”。因此,清朝政府给予护照,地方官府还派役保护送  
行。至于他们在吐鲁番等地的具体考察活动,以及收集古物的行径,地方官  
府似乎并不知晓。

新疆档案馆还发表了一份有关民国三年(1914)各国来新疆游历人员  
的简报,其中包括有关奥登堡所率俄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队的记录(图 44):

俄国博士额登布格(S. F. Oldenburg)、画工都定(S. M. Dudin)、工  
师毕仍伯格(V. S. Birkenberg)、舆图秀才司米诺夫(N. A. Smirnov)、图  
绘罗谟伯格(B. F. Rombeg),随带马兵八名,持外交部护照,赴甘肃敦  
煌考查古迹。三年六月廿六日由塔城苇塘子卡入新疆境,是日抵塔城,  
七月七日到乌苏,十三日到绥来,十五日到昌吉,十六日到迪化,二十六  
日到阜康,三十一日到孚远,八月一日到奇台,十五日到哈密,即由该县  
护送出境入甘肃。查额登布格居留敦煌外,其画工都定等四人于十一

月十六日复由安西入新疆哈密,廿六日到奇台,廿七日到孚远,十二月一日到阜康,二日到迪化,七日到昌吉,十日到绥来,十三日到乌苏,十八日到精河,廿四日到伊犁,由尼堪卡出境讫。前后据各县详报前来,均称格外保护,该游历亦无测绘暨各项交涉。俟额登布格抵境,再行详报。〔1〕

据此,新疆官府对于奥登堡(额登布格)考察队的每一步行踪都很清楚,但是就是不知道考察队来做什么。这里已经提到奥登堡等一行是到敦煌考查古迹,但结论最后还是把他们看作是来“游历”,而且没有做“测绘”等工作。我们从档案中列举的奥登堡考察队中有画工、工程师、地图测绘员、绘图员,把这样一批人看作是来“游历”,显然是民国地方官吏的渎职。事实上,奥登堡考察队是一支学术和技术准备都非常充分的考察队,最近才出版的他们对敦煌莫高窟的测绘、临摹、拍照以及详细的文字记录〔2〕,表明他们不仅做了“测绘”,而且做了迄今为止都没有人做过的详细记录。参加过奥登堡两次中亚考察队的杜丁(都定)所撰写的《中国新疆的建筑遗址》,最近也出版了中文本,从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其对新疆焉耆七格星和吐鲁番古代遗址测绘的情形。

从清末、民初新疆地方政府的档案来看,当地官府对于外国考察队都加以保护,似乎给这些考察队的活动赋予了某些看似“合法”的性质;而外国考察队又多是以“游历”的名义,来掩盖自己攫取古物的目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对于这样大量的古物流失不能不感到心痛,对于地方官府的渎职不能不感到痛恨。不过,当时的中国连皇家宫殿和园林都无法保护,更何况遥远的新疆沙漠中的破纸片呢!

〔1〕 以下有关罗博罗夫斯基探险队的档案,均见《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301页。

〔2〕 《俄藏敦煌艺术品》*Dunhuang Art Relics Collected in Russia, I-VI*, eds., by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and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92-2005.



历史已经过去百年,曾经的恩恩怨怨早已烟消云散,可喜的是近年来中俄两国学者密切合作,已经把俄藏敦煌文献和艺术品、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刊布出来,相信今后的合作,也将把新疆出土的文献和艺术品陆续整理公布。

(2008 年 1 月 8 日完稿, *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ed. by I. F. Popova, St. Petersburg: Slavia, 2008, pp. 219-226 发表俄、英文本时略有删改。)

## 狩野直喜与王国维

——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早期敦煌学史上,日本的狩野直喜和中国的王国维两位先生之间的学术交往,可谓一段佳话,为我们今天发展中日学术交往树立了楷模,值得我们今天回味。

狩野直喜(1868—1947),字子温,号君山。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作为文部省留学生到北京留学,遇到义和团事件,被围两个多月后回国。1901年秋他到上海,在江南地区逗留了三年,没有见到王国维,只是从友人藤田丰八那里听到过这位聪颖的学生的名字〔1〕。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礼堂、观堂。1902年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因脚气病发作,于同年夏天归国。至此两人都曾到过对方国家,但还没有因缘相见。

1900年在中国西北甘肃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促成了这两位学者的相识。

我们知道,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代写本,最初是由一个叫王道士的人看管。1907年,来敦煌考古的英国斯坦因(Aurel Stein)攫取到大批写本和艺术品,捆载而西。第二年,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接踵而至,也获取了一批藏经洞的宝藏。1909年9月,伯希和携部分所获敦煌写本及文物精华,从法国远东学院所在的河内到北京,一面购书,一面把这些新发

---

〔1〕 狩野直喜《王静安君を憶ふ》,《艺文》第拾八年第八号,1927年。此据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341页。

现的文书展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往观并抄录，王国维也随同前往参观，但没有从事抄录和考订工作。年末，罗振玉和蒋斧据所抄录的文书编印《敦煌石室遗书》，王国维帮助校理，用力最多〔1〕。十一月，藤田丰八寄来英国地学协会杂志，中间有斯坦因中亚考察演说，王国维译成汉文，名《中亚细亚探险记》，收入《敦煌石室遗书》附录《流沙访古记》中。然其时王国维正在研究宋元戏曲，对敦煌写本兴趣不大。他在本年完成的《录曲余谈》中说道：“今秋观法人伯希和君所携敦煌石室唐人写本。伯君为言：新得明汪廷讷《环翠堂十五种曲》，惜已束装，未能展视。此书已为巴黎国民图书馆所有，不知即《淡生堂书目》著录之《环翠堂乐府》否也。”〔2〕可见，王国维此时更关心的是伯希和买到的明人曲本，而不是唐人写本。

通过罗振玉和在北京开书店的日本人田中庆太郎，伯希和发现敦煌古书的消息很快传到京都，引起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的重视。1909年11月28—29日，在京都大学的史学研究会，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拓本、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的相关学者加以讲说，其中狩野直喜讲《老子化胡经》，内藤虎次郎讲《西州志》、《唐太宗温泉铭》，富冈谦藏讲《尚书·顾命》等，滨田耕作讲敦煌壁画和雕刻，羽田亨讲《摩尼教残卷》，桑原鹭藏讲《景教三威蒙度赞》〔3〕，可以看出京都的学者不仅对敦煌新材料十分关注，而且关心的范围也较广泛。其中，狩野所关心的《老子化胡经》，是中国佛道关系史上重要的佚籍。

当时京都大学的学者们，正在锐意创立新的实证主义的中国学，所以相当重视敦煌的新材料。1910年8月，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内藤虎次郎教授和富冈谦藏、滨田耕作讲师等一行五人赴北京，调查甘肃运京的敦煌写卷，他们总共翻阅近七百余卷，几乎全为佛经，所获不多。他

〔1〕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

〔2〕 《王国维遗书》第16册。

〔3〕 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东京二玄社，1960年，19页。

们把所见到的佛经一一做了目录,并拍摄了部分照片。大概因为他们五位对佛经不感兴趣,所以只有小川在《北支那旅行概报》中,附带记录了所见敦煌石室遗书的情况〔1〕,而所见比较重要的佛典,则由松本文三郎做了研究〔2〕。

然而,对于狩野直喜来说,此行的最大收获,恐怕要属第一次结识了王国维。因为两人当时都在研究元代戏曲,所以经常见面,有不少共同语言。王国维后来曾说起他们的交谈:“夜阑促坐闻君语,使人气语回心胸。”〔3〕狩野直喜也曾回忆到这段往事:“当时我打算研究元杂剧,在京都大学也已经开始讲授这门课,恰巧王静安君与我相似,也作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著述《曲录》和《戏曲考原》。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会面王君,听了关于元杂剧研究的谈话,觉得非常有意义。当时《大阪朝日新闻》计划南极探险,整个社会都很关注。小川博士每一次见到中国人的时候就讨论南极北极的问题,我则跟王君一直谈中国戏曲的南曲北曲。所以我们呆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中国朋友对比南北极与南北曲两个话题,他们似乎把这事看成一个笑话。”〔4〕狩野等人在北京逗留了约五十天,可以想见他们两人谈得有多么深入,多么投机。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两家一起东渡日本,居住在京都大学附近,与京大学者常相往还,切磋学术。王国维受罗振玉和京都学派的影响,也由于政治形势的改变,抛弃原来所治哲学和文学,转向经史考据方面,留意甲骨、金文、汉简、敦煌材料。在京都期间,王国维受到狩野直喜的种种关照,两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应当更加频繁。1912年9月,狩野直喜将往欧

〔1〕 载《地学杂志》第266号。

〔2〕 《敦煌石室古写经の研究》,收入《仏典の研究》,东京丙午出版社,1914年,118—172页。

〔3〕 《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见《观堂集林》卷二十四,《王国维遗书》第四册。

〔4〕 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342页。

洲游学,王国维做七古长诗赠之,题为《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其中说道:“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1〕给予狩野极高的评价。诗中还说此时两人的学术交往:“四方蹙蹙终安骋,幡然鼓棹来扶桑。扶桑风物由来美,旧雨相逢各欢喜。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狩野也说在这五六年间,他们俩常常来往〔2〕。1916年2月,王国维归国,狩野到车站话别。这些都可见两人交谊甚笃。

1912年9月,狩野直喜赴欧洲,做学术旅行,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地调查抄录英、法、俄国在敦煌、黑城和中国西北其他地区所获得的出土文献材料,他是第一位赴欧洲考察敦煌卷子的日本学者,也是首位揭示俄藏黑城出土文献的东方学者〔3〕。1912年10月20日,狩野就以《海外通信》为题,把在圣彼得堡的所见所闻报告给京都的同仁〔4〕。他此行虽然所获资料有限,而开拓之功至伟。回国后,他就自己的研究兴趣,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1915年,狩野直喜撰《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除了判定P. 3310(旧编号,现编号P. 3315)为陆德明《尚书释文》写本外,又依据写本上的朱点,辩后人理解为朱书之误,还摘要提示了古写本的校勘价值〔5〕。狩野曾把自己的抄本送给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惜因为时间所限,狩野的抄本不全〔6〕。1916

〔1〕 见《观堂集林》卷二十四,《王国维遗书》第四册。

〔2〕 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343页。

〔3〕 参看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と敦煌古書》,《敦煌学五十年》,106—107页。

〔4〕 原载《艺文》第4年第1号,全文录入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と敦煌古書》,《敦煌学五十年》,107—111页。

〔5〕 《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载《艺文》第6年第2号,1915年2月,1—12页;又《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正误》,《艺文》第6年第3号,1915年3月,94—96页;收入作者《支那学文藪》,京都弘文堂书店,1927年,138—150页。此文有江侠菴汉译文,载《先秦经籍考》(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105—116页。

〔6〕 罗振玉《雪堂校勘群书叙录》卷下,1916年,516叶;王国维1916年7月19日致罗振玉信,载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120页;《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105页系在同年8月18日。

年7月间,王国维和罗振玉往来信件中之所以谈起狩野的这个抄本,是因为该年7月,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国使馆武官而经过上海,将这卷《尚书释文》照片出示给沈曾植和张元济等〔1〕。张元济后将此卷影印入《涵芬楼秘笈》(1918年出版),王国维时已从京都回到上海,得以见其真迹,肯定写本的学术价值〔2〕。与上海的中国学者见到此惊人秘籍原貌的同时,狩野直喜也获得了该卷的影本,立刻给在京都的罗振玉看。罗振玉觉得原本黯淡,恐上海的影本不够清晰,所以也把它印入自己编的《吉石盒丛书》中(1916年出版)。事实上,伯希和在同年发表了《古文尚书与尚书释文》,刊布了该卷的图版〔3〕,这大概是中日学者得以看到该卷照片的根源所在。

1916年,狩野氏撰《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1—2),利用英、法所见《唐太宗入冥记》、《秋胡戏妻故事》、《伍子胥小说》等唐末五代抄本,指出元代以后兴盛的俗文学,早在唐末五代就已萌芽。又据《孝子董永传》、《季布歌》等韵文资料,把元明清三朝盛行的戏曲的萌芽,也追溯到唐末五代〔4〕。1920年,王国维在狩野直喜研究敦煌俗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撰《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5〕,指明敦煌俗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篇文章显然受到狩野直喜上文的直接影响。

狩野直喜自1906年开始到1928年止,一直主持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讲座”,共22年。又从1908年始,在京都大学主持“中国文学史”讲座,先后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清朝文学史”等,对于自己所抄录的敦煌文献,大概无暇研究,只写了一些短文,如1929年所撰《唐钞本文选残篇跋》〔6〕。

〔1〕 见王国维1916年7月27日致罗振玉信,同上书,95—96页。

〔2〕 《王国维全集·书信》,105页。

〔3〕 P. Pelliot, “Le Chou king en caractè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2, 1916, pp. 123-177, pl. 20-25.

〔4〕 《艺文》第7年第1、3号,1916年1、3月,104—109、95—102页。

〔5〕 署名“静庵”,《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商务印书馆,1920年4月,95—100页。

〔6〕 《支那学》第5卷第1号,1929年3月,153—159页。

他无私地把自己辛勤抄录的敦煌资料,提供给罗振玉、王国维研究。

1919年,王国维据狩野在英国所录敦煌文献做跋文若干,计有:《职官书》(S. 1880)、《食疗本草》(S. 76)、《灵棋经》(S. 557)、《佚名书(唐代残史书)》(S. 2506)、《大云经疏》(S. 6502)、《老子化胡经》(S. 1857)、《秦妇吟》(S. 692)、《云谣集杂曲子》(S. 1441)、《小说(唐太宗入冥记)》(S. 2630)、《敦煌县户籍》(S. 514)、《宋户籍》(S. 4175, S. 4172),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许多方面,是王国维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sup>[1]</sup>。1924年(甲子)6月10日,罗振玉子罗福葆编定《沙州文录补》,其中英国藏卷皆系罗福葆录自狩野直喜抄件,而部分抄件后附有王国维的上述跋语。

这种主动地提供学术资料,在当时日中敦煌学研究者中间,是相互的,也是非常主动的。王国维也曾把据伯希和照片手抄印制的陆法言《切韵》三种,寄赠给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和长尾甲,信云:“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陆法言《切韵》三种,今夏伯希和以景片寄罗君许,以一时未能景印,手间曾手抄一部,即以付印,今已印成,寄上三部,一请察收,其二本请转交 狩野、长尾两先生。”<sup>[2]</sup>

1924年初,王国维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由乌程蒋氏资助出版,因收入仅可度岁,王氏赠书无多,日本只寄两部。他1924年1月22日给蒋汝藻的信说:“弟有两部寄日,一赠京都狩野大学长,一赠内藤教授。”<sup>[3]</sup>这或许也是对狩野学恩的一点报答吧。又,1月30日给内藤虎次郎信说:“上海友人蒋君孟蘋为维印文集,时阅二年,顷方告成,谨以一部奉呈台教,又一部

[1] 这些跋文已收入《观堂集林》卷二一及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王国维跋文不具写本编号,此据王重民《叙录》补。

[2] 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信,载《清华汉学研究》第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1—2页。参看葛兆光《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佚札跋》,同上,4—7页。有关关西大学所藏有关内藤湖南的资料,详见大庭脩《蔵書を通じてみた内藤湖南の学問》,内藤湖南先生显彰会编《湖南》第17号(内藤湖南生诞130周年纪念特集),1997年,12—26页。

[3] 《王国维全集·书信》,381页。

寄狩野先生处,未及作函,请晤时代为问好。尊体康复,甚盼与君山先生再作西游如庚戌年故事,想不难付所望也。”〔1〕庚戌即1910年,看来王国维在二十多年以后,仍然清楚地记着当年与狩野讨论南曲北曲的事情。

与内藤湖南和罗振玉相比,狩野直喜和王国维是比较单纯的学者型人物,两人交谊颇深,而且对待学术的看法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取用敦煌的资料来研究相关的问题,但又都不局限在敦煌学的范围里。他们在学术上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不仅在敦煌学史上是开山之人,而且在其他许多领域里,也都开风气之先。

王国维对日本学术,特别是京都的中国学发展给予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王国维自杀后,京都学人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中感到这种影响〔2〕。即使是狩野直喜的学生辈,仍然感受到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仓石武四郎氏曾说:“我去了京都以后,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王国维先生和罗振玉先生的影响。还有敦煌的出土文物,这在东京虽然也有一些,但还没有达到造成一定影响的程度。”〔3〕日本学术界曾大力收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比如他研究词曲的抄校本二十多种,即经罗振玉家和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手,归东京东洋文库收藏〔4〕;他的一些古籍校本,以及他本人的《观堂集林》初版的校订本,现在则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5〕。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之间以敦煌作缘而进行的学术交往,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中日两国敦煌学界交往的楷模。温故知新,不禁使我想起一件事,值得

〔1〕《王国维全集·书信》,385—386页。

〔2〕这些文章集中收在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

〔3〕《学問の思い出:倉石博士を囲んで》,《东方学》第40辑,1970年;广中智之、刘琮汉译文,载荣新江、朱玉麒编《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待刊。

〔4〕李庆《在日本新发现的王国维词曲研究资料》,《学术集林》卷十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6—20页。

〔5〕本次研讨会后,承蒙大谷大学图书馆馆长长沙加户弘先生等的安排,我们得以拜观这些珍贵资料,谨此致谢。



借此机会谈一谈。从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敦煌学界盛传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曾经在天津南开大学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京都。”这引起中国许多先生的不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的交往。事实上,据我询问当时参加演讲会的几位中国学者,都说这是南开大学某位先生介绍藤枝先生时的话。但不论这句话是否为藤枝先生所讲,在八十年代初,说这样的话是没有大错的〔1〕。到了今天,相信不会有哪位日本学者再讲这样的话。去年时值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笔者受日本东方学会邀请,参加在东京召开的第45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敦煌吐鲁番专题组,发表有关敦煌藏经洞的论文,似乎已经说明日本东方学界对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所取得成绩的看法。笔者愿意借此机会,呼吁中日两国的敦煌学者,抛弃宿怨,回首九十年前北京、京都、上海间的学术交往,继承王国维和狩野直喜留给我们的文化交流遗产,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开拓敦煌学的新领域,迈向敦煌学的新境界。

(附记:为行文方便,本文所有敬语从略,特此说明。)

#### 参考文献:

狩野直喜《支那学文藪》,京都弘文堂,1926年。

吉川幸次郎《狩野君山先生と支那の学人》,《吉川幸次全集》第17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243—245页。

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と敦煌古書》,《敦煌学五十年》,东京二玄社,1960年,103—120页。

狩野直禎《狩野直喜》,江上波夫编《東洋学の系譜》,东京大修馆,1992年,97—107页。

---

〔1〕这段话的意思,我曾在纪念藤枝先生的文章中写过,但该文《藤枝晃教授与敦煌学研究》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发表时,因为有些先生的反对而删除。该文的全文已收入笔者的《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

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刘寅生、袁英光《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袁英光《王国维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二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987年。

孙敦恒、钱竞编《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陆庆夫等《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袁英光《王国维与敦煌学》，《中华文史论丛》1998年第1辑，245—268页。

张弓《王国维与敦煌典籍研究》，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369—377页。

严绍璁《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桑兵《国学与汉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日文译本载高田时雄编《草創期の敦煌学》，东京知泉书馆，2002年12月，47—55页；中文本载《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123—128页。）

# 惊沙撼大漠

## ——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

1942—1944年间,向达先生曾两次赴敦煌考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由于战乱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向达的考察成果未能得到及时、完整的刊布,有些现在已经散佚。然而,向达的两次敦煌之行,在敦煌学史上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约十年前,笔者奉周绍良先生之命,整理向达先生当年在敦煌所辑《敦煌余录》,因而涉猎了其四十年代敦煌考察的有关文献,随之发现向达的西行,不仅涉及当时的北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等合作单位的关系,也与大体上同时在敦煌考察的张大千一行、王子云所率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和以常书鸿为首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的事情。此处仅对向达两次敦煌之行的过程,略加整理,然后简要介绍他的考察成绩,包括他的未刊稿本——《敦煌余录》,并总结向达敦煌考察的意义。

### 一、向达第一次敦煌考察经过

#### 1. 考察记录

有关向达第一次敦煌考察,他的《西征小记》一文略有记述,但其重点在学术考察的结果,而非考察之过程<sup>〔1〕</sup>。幸好还有向达在考察期间写给

---

〔1〕 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1—24页;收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337—372页。

住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博物馆研究员曾昭燏先生的29封书信,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已经发表<sup>[1]</sup>。这些信自1942年9月22日至1943年5月16日,内容几乎包含向达的整个考察过程,加上他1942年11月5日致李济、傅斯年信<sup>[2]</sup>,以及1943年3月9日致王重民信<sup>[3]</sup>,从中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这次考察的详细经过<sup>[4]</sup>。此外,中研院史语所保存有向达两次考察敦煌往来信函,笔者2002年9月访问该所时,承蒙黄宽重、陈弱水先生慨允抄录,得以补入本文初稿,使得考察经过情形更加清晰,在此对黄、陈两位所长表示衷心感谢。以下主要根据上述文章和书信,按时间先后概述向达第一次考察过程,但重点放在学术方面。

## 2. 考察经过

早在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人在写给胡适(时在美国)的信中,谈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实途径有四,其第三点“在现状之下酌量举办少数之学术事业”,其中即有“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sup>[5]</sup>。次年,北大方面即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西北考察事宜进行磋商,向达自告奋勇要求参加<sup>[6]</sup>。当1942年春中央研究院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北大即派向达参加。4月中旬,西北史地考察团在重庆组成,成员如下: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任团长,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李承三任总干事,北大教授向达任历史组主任,李承三兼任地理组主任,同济大学教授吴静禅

[1] 载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1—58页。

[2] 附载于致曾昭燏信中,同上注引杂志,15—19页。

[3] 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28—330页。

[4] 以下叙述凡出自《西征小记》及致上述诸位书信者,除引文外,不再一一注出。

[5] 《胡适往来书信集》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03—504页。

[6] 1943年3月5日向达致曾昭燏信,《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34页。

任植物组主任,史语所劳榦为历史组组员兼文书,史语所石璋如为历史组组员兼会计,地理所周廷儒为地理组组员兼事务。随后分配工作,并印制全团名单及职衔。5月4日,全团抵达兰州,各组分别进行工作。向达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且有家口需要安置,又得先到重庆,再转兰州,所以未能按时到达。向达离开昆明之前,北大历史系主任姚崇吾先生主持茶会,为他送行<sup>〔1〕</sup>,足见北大方面对向达西北之行的重视。

作为历史组组员的劳榦和石璋如,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派遣,于1942年4月1日从李庄出发,随团经重庆,转兰州,于6月15日抵达敦煌,19日到千佛洞。自当月20日开始,至9月20日结束,石璋如对莫高窟所有洞窟逐窟进行了测绘、拍照;劳榦则负责记录。7月16日至8月9日,两人又前往玉门关、阳关两关之外调查、试掘。9月22日离开敦煌,转往黑河流域调查<sup>〔2〕</sup>。向达因安排家口等事务,于劳、石离敦两日前的9月20日,方才抵达重庆,自史语所借得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地图部分<sup>〔3〕</sup>,随即转乘飞机,又因飞机延误两日,至25日方自重庆飞抵兰州。

在兰州,向达拜会了慕寿祺(少堂)、张维(鸿汀)。关于此时的计划,9月26日向达自兰州致曾昭燏信中说道:“劳、石二君有信来,敦煌工作大致告一段落,留抄题记一事,待达结束。……达拟在此稍稍准备过冬用具,并参观私人所藏敦煌遗物及附近古迹,然后西行,独游河西一带,至敦煌留月余日,即行东归。所注重者,仍在将来考古工作之可能程度,以及工作站之选择诸项,希望于此等事先献刍蕘。”在同一封信后9月29日的补记中,向达说:“参观兰州私人收藏一事,因无有力者介绍,颇为不易,拟俟河西漫游归来后,再作计较。”<sup>〔4〕</sup>27日,向达于河声书店购得回鹘文刊本残经十三

〔1〕 见何兆武《方回是谁?》,《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第8版。

〔2〕 关于劳、石二位的考察情况,详参邢义田《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劳榦先生的汉简因缘》,《古今论衡》第8期,2002年,43—62页。

〔3〕 1942年9月24日向达致傅斯年信,史语所档案。史语所藏书信一般无年月,年份多为笔者推补。

〔4〕 《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4页。

叶,聊以安慰急于看到敦煌写卷的迫切之情。

1942年10月1日,向达搭乘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经理沈君怡的汽车,西行至武威,旅次间寄书一封给傅斯年、李济,报告行程及计划<sup>[1]</sup>。2日,参观武威罗什、大云、清应等寺及民众教育馆,考察出土墓志、明器,并发现敦煌千佛洞所出木塔,记录已佚于阆国王从德供养之银塔。3日,自武威至张掖。4日,游南门外天主堂,晤常德辅(Joachim Zacher, S. V. D.)神甫。5日下午至酒泉,知劳、石二人已于一周之前前往金塔、毛目一带,本拟与他们同访居延的计划遂落空。6日致信傅斯年、李济,告未遇劳、石二人,自拟西行敦煌<sup>[2]</sup>。8日即继续搭乘原车西进,经玉门至安西。9日晨发安西,午抵敦煌。下午四时启程赴千佛洞,晚八时至,宿于中寺。

次日,向达与西北史地考察团地理组成员、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以及张大千会面,并由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卢善群导游,浏览莫高窟。在10月11日给曾昭燏的信中,向达谈及他初见莫高窟的感受:“六朝诸窟,素朴庄严,李唐诸窟,雍容华丽。唐窟诸供养女像最佳,面容丰满,仪态万方,几欲拜倒,真可称为国宝!唯风水侵蚀,流沙壅塞,洞窟淹没者,与年俱增,保护之举,正不宜缓耳。”<sup>[3]</sup>

向达先以两日泛览全窟,然后计划逐窟记录。14日,在给曾昭燏信中,告莫高窟题记所见吐蕃官制及妇女装束,并要人抄录原田淑人《唐代女子化妆考》,以便对照。

10月17日,向达与考察团地理组同人吴印禅、周廷儒及卢善群等,由敦煌至南湖一带。18日,考察西千佛洞、寿昌城址。19日,至南湖西古董滩等地,探寻阳关故址。20日,晨四时至南湖店,再至西千佛洞考察,晚回敦煌。22日,在给曾昭燏信中,在说到抵达西千佛洞时,他如此写道:“瞻礼北

[1] 1942年10月1日向达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2] 1942年10月6日向达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3] 《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9—10页。

朝遗迹，徘徊不忍去。”〔1〕其对敦煌石窟的情感，绝非普通参观者所备也。

10月23日，向达回到莫高窟。其后即浏览诸窟，一一考察，并做详细记录。至11月初，向达已考察全窟之三分之一，有感于张大千一行任意勾勒、剥离壁画，他竟三日之力，写成《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建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管理。11月5日，他致信史语所李济、傅斯年，汇报西行考察情况，并谈及千佛洞保护一事。同日又致曾昭燏信，谈张大千之破坏壁画行为及千佛洞之保护问题，并寄所撰文章，请傅斯年推荐发表。向达在致曾昭燏的信中写道：“最近骝先先生（教育部长朱家骅）来电，嘱暂留此，不必亟返，西北工作，尚待继续，正拟明年计划云云。达拟在此再留三月，将千佛洞逐窟作一详细记录，于每一窟之壁画塑像名目、保存情况、前人题记等一一备录，整理藏事，往安西万佛峡一游，再访布隆吉遗存洞窟，然后东归酒泉，以待后命。”〔2〕给李济、傅斯年信中亦言及此：“目前计划，拟普看三遍，将各窟壁画、塑像保存情形，供养人题识诸项，逐窟详予纪录。……至于千佛洞目前最迫切之举，为亟应收归国有，交由学术机关负责管理。”〔3〕向达所撰《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经傅斯年推荐，用方回的笔名，于同年12月27—30日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

12月初，向达考察莫高窟诸窟已近两遍。由于离开兰州时并未打算在敦煌过冬，所以对当地冬季之寒冷显然准备不足，随身仅有在兰州时向科学教育馆借的一件出差用老羊皮大氅，实难备御严冬。而且经费不能按时汇寄，考察必备之专业用纸、墨等材料不济，部分工具即便有钱在敦煌亦无法购得。“西北苦寒，生活极为寂寞”〔4〕，但向达仍以曾文正公“扎硬寨，打死仗”之精神自勉，继续考察洞窟，并勘察敦煌城东南唐人墓地，还建议史语

〔1〕 10月22日向达致曾昭燏信，《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12页。

〔2〕 10月22日向达致曾昭燏信，13页。

〔3〕 10月22日向达致曾昭燏信，17页。

〔4〕 1943年1月13日向达致曾昭燏信，出处同上，24页。

所夏鼐(作民,即作铭)先生来时发掘。

此外,向达还乘无法进窟考察之暇,借抄敦煌当地留存的有价值的敦煌文书。12月29日,向达自张大千处借抄敦煌邓秀峰藏《逆刺占》毕。30日,抄录《逆刺占》背《毛诗文王之什诂训传》毕,并写题记。1943年1月10日,又从张大千手中借得敦煌某氏藏《采华违王上佛授决号妙华经》录副毕。又应中央研究院月报之约,于16—21日写成《西征小记》初稿,于22日寄曾昭燏,同时还寄有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剝损略表》。一月底、二月初,借抄敦煌文人任子宜先生所藏敦煌石室出禅宗典籍五种,即《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定邪五更转》、《六祖坛经》及净觉注《多心经》。23日,又抄录任子宜藏《文选》写本毕。此外,还自窠萃五抄本过录了敦煌祁氏所藏《寿昌县地境》。3月24日录得任子宜所藏道真《见一切入藏经目录》。

与此同时,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北大学术领导人,也在商讨向达的敦煌之行及下一步的敦煌考察计划。1943年1月17日,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持向达来信访北大秘书长兼史学系教授郑天挺,商议北大文科研究所发展事宜,拟以敦煌为抗战期间历史研究之唯一途径<sup>〔1〕</sup>。汤用彤随即在19日致胡适信中,汇报了向达西行考察成果,称其在敦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sup>〔2〕</sup>。2月下旬,向达接到汤用彤回信,“谓北大有与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在西北设立历史考古工作站之意云云”<sup>〔3〕</sup>,并连续接到李济、曾昭燏来信,于是在27日及3月2日致曾昭燏信及3月1日致傅斯年、李济信中,都详细陈述下一步西北考察时所应注意的问题,尤以图书为重,并力荐夏鼐主持其事<sup>〔4〕</sup>。

2月6日,向达曾给敦煌驻军官佐讲《西北在国防上之地位》。8—9

〔1〕 郑天挺 1943年1月17日《日记》,见郑天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载同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2页。

〔2〕 《胡适往来书信集》中,553—554页。

〔3〕 见1943年2月28日向达致曾昭燏信,出处同上,30页。

〔4〕 1943年3月1日向达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日,在敦煌城西南五里岷州庙中,发现六朝经幢,其上有汉文和婆罗谜文经文,已残为两段,遂拓四、五份,一寄曾昭燏,一寄在印度的周达夫先生,请他找人翻译其上的印度文字。

2月16日,向达因接朱家骅、叶企孙电,拟定个人工作计划,以考察河西陇右佛教艺术史迹为主,至夏天止,用航空快函复信。3月13日,向达致书傅斯年、李济,介绍前往重庆之敦煌县长,希望为下次考察提前接洽<sup>〔1〕</sup>。又致书曾昭燏,表示因人事复杂,决意东归。30日,接李济复信,劝向达勉为其难,再做坚持,并告夏鼎夏初即可来西北。

3月14日,向达搭乘油矿局便车,考察了敦煌西北长城沿线的大方盘城(河仓城)、小方盘城(玉门关)遗址,往返六日。4月19日,向达又随敦煌驻军考察两关,从敦煌往南湖,夜宿西千佛洞。20日抵南湖。21日下午,自南湖北行八十里,宿卷槽北。22日,北越戈壁,宿小方盘城。23日上午看西湖,下午东归,夜宿大方盘城。24日返敦煌。此次考察,前后往返计六日。两次考察期间,向达曾就玉门关所在问题进行过考证。

24日向达外出考察归来,接朱家骅、叶企孙、傅斯年电及汤用彤信,告已商定北大与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合作西北考察事宜。5月1日,向达致书曾昭燏,告考察榆林窟及东返计划。9日,再致书曾昭燏,忧虑敦煌古迹保存之前景。

5月10日,向达与卢善群同行,乘油矿局车由敦煌至安西。12日往榆林窟,途中抵破城子考察,夜宿民家。13日,继续往榆林窟,经下洞(小千佛洞)到榆林窟。14日,开始逐洞考察记录。约21日,考察结束,返回莫高窟<sup>〔2〕</sup>。

7月初自敦煌东归。12日自安西乘油矿局汽车东行,14日至酒泉,20

〔1〕 1943年3月13日向达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2〕 由于现存的向达致曾昭燏信仅至5月16日止,所以向达余下的行程无详细记录可依。

日抵兰州,26日赴重庆。

### 3. 考察中的困苦

向达在敦煌莫高窟,前后居住凡九月。他初次敦煌考察的成果,因为大多是在第二次敦煌考察之后方才最终完成,所以留待下文专门讨论。此处不能不提及的是他第一次考察时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因为惟有如此,方可体会他所取得的成就之不易。

向达遇到的困苦之一来自考察团内部。

1941年5月10日向达致傅斯年信中,记录了他对敦煌考察的热情:“〔敦煌〕调查一事,自知学力不足,难期良果,唯冀以勤补拙,或可不至宝山空还。至于史语所之与北大研究所,气息相通,有同一体,固可不分彼此,在达个人亦只求能少尽绵薄,庶几不负诸公宽厚见爱之意,为北大抑为史语所,个人毫无成见,区区此忱,想荷赞同。目前达所顾虑者,内人小儿辈俱在此间,乏人照料,如去西北,非将彼等送回湖南不可,而路途辽远,盘川之费,所储万不足以应此需。日昨同锡予先生商量,拟将行笈所有书籍抄本,出售或抵押三千元,使家人辈回里有资,冻馁无虞,庶几彼时可以轻身就道,一意孤征。”〔1〕由此足见向达敦煌考察之决心。1943年3月5日致曾昭燏的信中,向达也曾谈到他来西北考察的初衷:“前年达在滇向北大方面及孟真(傅斯年)、济之(李济)先生自告奋勇,愿作西北之行,始意不过欲以个人之经历,促研究院、博物院及北大通力合作,在西北为历史考古之学另辟一工作地方,一方面可以消纳许多新起人才,一方面因此为中国中古史、交通史,以及域外史之研究,另奠一合理的基础,进而与欧洲学者在中亚之历史考古研究取得联系,以提高吾国历史考古学学者在国际学术上之水平与地位。……区区之意,既为北大及孟真、济之先生所采纳。……是以去春考察团组织就绪,一电见召,欣然就道,万里孤征,曾不返顾。”然而,问题出在:“所不幸者,西北史

〔1〕 1941年5月10日向达致傅斯年信,史语所档案。

地考察团之组织,虽出自研究院与博物院,而历史组则为两者与北大合作之事业。而达之来,亦为代表学校,并非以个人资格参加,此种情形,最少北大方面,有此谅解。惜乎考察团自组织以至出发,于此点未尝正式声明;历史、考古两组中人,于此中经过,尤其未能明了。”〔1〕在向达看来,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史语所劳、石两位,以向达迟迟不到为由,先行赴敦煌考察,在向达到来之前,结束莫高窟的测量和拍照,并且在酒泉与向达擦肩而过,更重要的是没有给向达留下考察必备的经费和材料〔2〕,使得向达在考察中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苦,不仅工作受扰,身体亦备受寒冬冻馁之厄。

从北大方面来讲,向达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如上引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人给胡适的信,说明早在1940年底,北大即有考察敦煌之意。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胡适的信中,更详细地谈到向达西行之事:“觉明(向达)此次以北大教授名义,参加中央西北考察团,其薪津由北大付,此外稍寄去小款,自不够应用。然觉明于交通阻塞之秋,万里长征,所获已不少。实物例如收得回鹘经文一卷,为国内所无。其在敦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比之伯希和记录多约百余。盖觉明精力过人,而相关学识之富,并为国内首选,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实最合宜。”〔3〕这些话或许是有针对性的。向达的确是当时学界中敦煌学研究之权威,他曾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等书,又曾至伦敦英国博物馆调查敦煌写本,于敦煌史地、文献都有所研究,汤用彤的说法并非虚言。而向达之作为北大与中研院及中央博物院的正式合作者,也是确定的〔4〕。然而,据石璋如所记1942年4

〔1〕 1943年3月5日向达致曾昭燏信,《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34—35页。

〔2〕 史语所档案中有一封劳榘、石璋如解释为何没有与向达会面及向达取用经费困难缘由的信。

〔3〕 《胡适往来书信集》,553—554页。

〔4〕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记事》中就记载:“当前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的时候,本所也参加合作。八月向达先生由昆明起身,九月到兰州,十月抵达敦煌。”原载《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7卷第1号,1950年;此据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3卷(1937—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40页。

月在重庆印制的考察团全团名单及职衔,向达名下却被写作“西南联大教授由中央博物院聘请”〔1〕,而整个印发材料中没有“北京大学”字样,这印证了向达后来发现的问题确实存在。

原本在1938年春,北大和史语所都迁到昆明,傅斯年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李济代理史语所所长。1939年5月,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兼任主任,郑天挺任副主任。向达为文科研究所导师之一,与同在昆明的傅斯年、李济相当熟悉。有人说,当时的“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史语所形同一家”〔2〕。1940年秋冬,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李庄,文科研究所改由汤用彤任主任。在1941年度史语所第一次所务会议上,曾经决议聘向达为该所第一组专任研究员。史语所上报院部的函件称:“查向君治隋唐史多年,且精于敦煌之学,其在史学上贡献之大,具详本所所务会议中之提案。”〔3〕由于北大不放人,所以在1942年8月改为通讯研究员,史语所报院部的函件称:“向君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此次既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前往敦煌,本院似应予以名义,较为妥当。”〔4〕从当时北大与史语所的关系及向达与傅斯年的私交来看,傅斯年、李济等人当然不会反对北大参加考察团,史语所还特别因为向达参加考察团而给予通讯研究员名义。1941年11月8日傅斯年致向达信,曾谈到请向达去敦煌考察之事:“去敦煌事,已与济之先生谈好,决请先生于明年四月前往,同行者有吴禹铭(金鼎)、劳榘、夏鼐诸氏(或不全去),或有徐旭生先生,但他们工作不在敦煌,在敦煌者,只兄一人。”〔5〕可见傅斯年对向达的信任。因此,问题不是出在北大和史语所之间,而是出在具体

〔1〕 石璋如《莫高窟形》(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6年,自序,1页。

〔2〕 郑克晟《郑天挺先生与史语所》,杜正胜、王汎森主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418—420页;又见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79—80页。

〔3〕 史语所致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函,无年月,史语所档案。

〔4〕 1942年8月13日史语所致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函,史语所档案。

〔5〕 1941年11月8日傅斯年致向达信,史语所档案。

实施过程当中。向达最后考察之真实境遇,显然实非主持其事者始料所及。

向达遇到的困苦之二则是来自考察团之外。

在向达于1942年10月9日到达敦煌时,画家张大千一行和画家王子云所率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已在那里。向达所居的中寺,与张大千等居住的上寺隔壁,而王子云一行则住在距离稍远的下寺。

1941年5月底,张大千携夫人及次子张心智到敦煌。自6月初开始编号、记录、临摹,并略做发掘,获《张君义告身》等文书。10月5日,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等陪同下,视察河西,来莫高窟参观。张大千陪同参观,其考察活动遂得到于右任的支持。12月,张大千经榆林窟,回到青海西宁。1942年3月上旬,张大千率张心智、五位藏族喇嘛画师等人,携带所购的绘画用品,由西宁出发,沿河西走廊,于中旬抵达敦煌。随后开始在莫高窟大规模地临摹壁画。8月,张大千招知交谢稚柳、门人肖建初及家属数人前来敦煌帮忙。11月初,又招门人刘力上自成都前来协助。12月底,张大千、谢稚柳等至西千佛洞考察,进行编号、记录。1943年5月初,张大千一行离开敦煌。到安西榆林窟,进行编号、记录、临摹。6月下旬,离开榆林窟,返回兰州<sup>[1]</sup>。张大千等在莫高窟,总共临摹壁画近三百幅,并撰有《漠高窟记》一书<sup>[2]</sup>。谢稚柳亦成《敦煌艺术叙录》一书<sup>[3]</sup>。

由王子云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共12人,考察范围从河南、陕西至甘肃、青海。其中从1941年10月到1943年春,断断续续在莫高窟工作过两年半,有时为四个人,有时两人。他们也是以临摹为主,但摹

[1] 有关张大千在敦煌的事迹,主要依据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上,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166—236页。

[2] 此书迟至1985年4月才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题作《张大千先生遗著漠高窟记》。

[3] 此书于1955年11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7年7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又出版新一版。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一版。按,秦孝仪在给《张大千先生遗著漠高窟记》所写的序中,指谢稚柳书系抄袭张大千之作。但从当时张、谢二人的关系看,两人应当是同时考察,相互切磋,一起记录,只是后来分别出版而已。

绘的方法与张大千不同,王子云说:“我们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考察团绘制了一幅长 5.50 米的千佛洞全景写生图卷,摹绘壁画一百余幅,拍摄照片 120 张,还做了一册千佛洞现状的文字记录〔1〕。这篇文字记录由何正璜发表在 1943 年 5 月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第 3 卷第 10 期敦煌特辑专号上,名为《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是最早发表的有关莫高窟的内容总录,著录洞窟计 306 窟〔2〕。

向达到来的第二天,就由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卢善群导游参观莫高窟,以后卢君还陪向达走访南湖,考察榆林窟,表明向达与他们的关系相当不错。但向达对于张大千一行的做法,却难以苟同。在 1942 年 11 月 5 日给傅斯年、李济的信中,向达指出:张大千“盘据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或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因此,向达感到“至于千佛洞目前最迫切之举,为亟应收归国有,交由学术机关负责管理”〔3〕。在同一天致曾昭燏的信中,他也讲到:“唯近日在此耳目闻见,深觉目前千佛洞最急迫之事,为收归国有,正式在此设立管理机关,此实为刻不容缓之举。”因此,向达撰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实际上是有的放矢。

〔1〕 参看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36—44页。参看王芑《1941年王子云率团考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173—175页。该文介绍了1990年代在西北大学文博资料室发现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选集》的情况。笔者1998年8月曾往西北大学博物馆参观这部《选集》,其中确有不少珍贵照片,如向达在武威所见敦煌千佛洞所出木塔,即在其中。

〔2〕 此文又收入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59—86页。

〔3〕 《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17—18页。

其实早在向达之前,就有人告发张大千擅自剥离敦煌壁画。具体所指的是张大千陪同于右任参观张编第20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30号)时,曾揭掉表层的宋代壁画,露出盛唐时画的乐庭瓌及夫人太原王氏供养人像。对于此事,从张大千自己早年的记录来看其并不以为意,他说:第20窟“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1〕。所以向达的指责是有根有据的。但由于张大千与当时的军政要人关系密切,虽然多次有人告发他破坏敦煌壁画,但时至今日,对其行为之评价仍然是毁誉参半〔2〕。在此,我们不想纠缠于张大千的问题〔3〕,只想指出:作为学者的向达和作为画家的张大千,在考察敦煌壁画时,在保护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而从当时已经具有的文物常识来说,正如向达所指出的那样,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率尔从事,徒然损坏遗迹,见讥识者,而于学术曾无补益也(斯坦因之讥橘瑞超,可为殷鉴)”〔4〕。因此,张大千的行为虽然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却违背了基本的保护文物法则和学术道德,不能兼容于学者。上引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胡适信中也说到:“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鬻(于右任)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5〕可见,从40年代的向达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贺世哲,

〔1〕《漠高窟记》,44—45页(完稿于1943年2月);又罗新之、刘君礼辑录《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西南印书局,1944年5月)也有同样说法。后者转引自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上,200页注20。

〔2〕最新的争论参看李永翘《还张大千一个清白——关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案的调查报告》,《丝绸之路》1997年第2期,5—12页;贺世哲《对张大千“不曾破坏敦煌壁画”之质疑》,《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176—180页。

〔3〕实际上,关于此问题的澄清,向达寄给曾昭燏的《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剝损略表》十分重要,惜不知现存何处,似亦无人查找。

〔4〕1943年5月9日向达致曾昭燏信,《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11—12合期,51页。

〔5〕《胡适往来书信集》中,553—554页。

从学术的立场出发,都是难以容忍张大千剥离壁画的行为的。

傅斯年推荐的向达文章,于1942年年末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虽然用的是笔名“方回”,但人们通过傅斯年案语所说“此君乃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的话中,当然可以看出是谁。大约1943年2月中旬,向达接曾昭燏寄来该文油印本一份<sup>〔1〕</sup>,又接陈叔谅剪寄《大公报》所刊该文,均随即转赠敦煌县陈冰谷县长备案。大概此后不久,张大千即得知此事或见到《大公报》上的文章,双方关系随之颇为紧张,后方朋友多为向达担忧,怕张大千人多势众,向达吃亏<sup>〔2〕</sup>。3月中下旬,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长,电文如下:“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sup>〔3〕</sup>这封电报的来头,恐怕也和向达的文章有关。当3月下旬常书鸿等到达敦煌时,也告诉向达教育部曾致电张大千,请其离开。直至最后,两人在榆林窟考察中仍有不愉快的遭遇发生。

向达在敦煌的后半段,由于缺少接济和帮手,与得到军政商界要人支持的张大千一行,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其时时受窘的情状可想而知,这从他给曾昭燏的信中不时流露的牢骚情绪中也可以看出。

向达书信涉及的一些人事矛盾,今日读来,已成历史,是非评判自有人论说。我们只需从中体会向达当年在敦煌时所受严寒、饥饿、匪患、人事之种种困难,因而益可见其取得成绩之不易。

---

〔1〕 按,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向达此文的油印本,当与这里所提到者相同。持与《大公报》的刊本对照,油印本中一段点名直陈张大千剥离壁画的段落,在《大公报》发表时删掉。笔者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提供此油印本的复印件,他是在查找傅斯年档案时找到的。

〔2〕 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台北时报公司,1983年)181页记载张、向两人曾为争论敦煌艺术来源问题,“不仅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于拍桌子要打架的情形都有”!(转引自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上,210页)争论学术问题可以面红耳赤,大概不至于要打架。由此看来,后方友朋的担心不是没有来历的。

〔3〕 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上,217页。



## 二、向达第二次敦煌考察经过

关于向达第二次敦煌考察,他本人没有发表详细的考察记录,只有点滴信息散见于《西征小记》和《记第二次从敦煌归来》两文中<sup>〔1〕</sup>。幸好与向达同行的夏鼐先生有《敦煌考古漫记》,详细记载了从出发到敦煌考古的过程<sup>〔2〕</sup>;阎文儒先生也有《河西考古杂记》,可与夏记相互补充<sup>〔3〕</sup>。本文即依据夏、阎两先生的记载,但仅限于向达参加考察的部分内容。

在第一次考察期间,向达在严寒的冬季心绪最糟的时候,曾极力推荐夏鼐作为第二次敦煌考察的负责人,他只是从旁帮忙而已。但向达是个有强烈事业心的学者,当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任命他为考古组组长时,他又义无反顾地奉命西征。夏鼐是科班的考古学出身,显然是此行的主力,但他十分敬佩向先生的道德文章。阎文儒(述祖)是向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向、夏两先生的得力帮手。我们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出,三人的合作十分愉快。

西北科学考察团原拟于1943年9月出发,临行前夏鼐突然染病,计划不得不拖延了半年<sup>〔4〕</sup>。1944年3月21日,向达由重庆飞抵兰州,开始“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的工作。因飞机座位有限,夏鼐乘下一航班,于4月4日抵兰州。17日,向达、夏鼐由兰州乘西北公路局班车西行。20日至酒

〔1〕 后者收入向达等著《敦煌》,北京学习书店,1951年。

〔2〕 《考古通讯》1955年第1—3期连载。此文收入《夏鼐文集》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时,据手稿增补部分章节,题为《甘肃考古漫记》,唯五、六两章仍缺。近刊单行本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王世民、林秀贞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据作者日记补足了最后两章,使整个甘肃考察记录完整地展现出来。

〔3〕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上、下),《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1987年第1期。

〔4〕 1943年9月21日向达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泉。22日赴文殊山考察。同日,向达、夏鼐致函傅斯年、李济,报告考察情形和下一步计划<sup>[1]</sup>。26日,由酒泉赴金塔县考察。5月1日至7日,由金塔县城北行考察汉代烽燧遗址,拟试掘斯坦因编号 XLV. g 烽燧,因风沙太大而未能成行。8—9日,由金塔回到酒泉。12日,考察团另一成员阎文儒赶到,加入考察。14日,由酒泉乘军车西行,经玉门,15日到安西。16日,转乘大车,至19日晨,抵达敦煌。22日,参观千佛洞,并踏查佛爷庙附近古代墓地,确定具体发掘地点。30日,移住佛爷庙工作站。31日开始发掘魏晋墓葬。

1944年6月末,向达有意东归。6月30日,由于敦煌城东老爷庙发现唐代墓葬,夏鼐转到那里发掘,至7月11日,发掘结束。12日,傅斯年致信向达,谈及经费困难,希望向达打消9月返回念头,多呆一些时间,因为“西北之工作,非先生无以董督其事”<sup>[2]</sup>。19日,佛爷庙墓葬发掘工作也结束。因为戈壁滩上的气温太高,30日,向达等三人移住莫高窟,开始考察洞窟,至8月31日结束。其间,向达等三人于8月5日调查了千佛洞南二里左右之破城子。12—14日,夏鼐、阎文儒、李浴(子青)三人与酒泉专员公署秘书白德清等,往南湖古董滩、寿昌城调查。向达因为已经去过,留在莫高窟,重录任子宜藏敦煌石室出禅宗史料四种,从8日至13日,陆续抄录《定是非论》、《坛语》、《六祖坛经》、净觉《注心经》等,并写题记,说明上次来敦煌时所录一本,因为春天时至江津内学院,送给吕澂(秋逸)先生,因此重录一过。8月22日,向达致书傅斯年,报告敦煌考古进程,并说“盼能至新疆吐鲁番一访高昌遗址”,且允停留至10月返回<sup>[3]</sup>。8月30日,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像中发现残经,向达正好在场,遂写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

[1] 1944年4月22日向达、夏鼐致傅斯年、李济信,史语所档案。

[2] 1944年7月12日傅斯年致向达信,史语所档案。

[3] 1944年8月22日向达致傅斯年信,史语所档案。

9月2日,佛爷庙西区墓地发掘工作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13日,向达致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守和),寄《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评张大千近著二种》以及关于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北魏写本残经消息和目录,两文请投《季刊》,消息则请其斟酌为之,信中主要谈考察团经费之拮据,若哈佛燕京学社可以资助,则“补助夏鼐先生作考古工作”,因“夏先生在今日考古学界中最年轻,而学识修养又极丰富,学术界先进俱应予以扶持爱惜也”<sup>[1]</sup>。考察团原本有新疆考古计划,9月中旬,向达于月牙泉会晤从新疆来敦煌游览之甘肃油矿局孙越崎总经理,得知新疆事变消息,于是计划落空,向达更决意东归。10月19日,向达启程东归。31日,夏鼐、阎文儒由敦煌启程,往西北汉长城遗址考察。11月5日,发掘小方盘城北汉代遗址,获汉简若干。7日,发掘大方盘城东南土台,掘得晋泰始十一年乐生题记石碣。又西行至第17号墩,掘得汉简若干。12月6日,夏鼐、阎文儒赴安西、酒泉考察。1945年2月17日,回到兰州。随后又到武威、民勤、张掖等地考察、发掘。

向达等人第二次敦煌考察,主要是发掘向达第一次考察时所勘探到的古墓群,希望在学术界普遍重视的写本、石窟壁画之外,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由于向达与敦煌各界关系融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发掘工作进展顺利。但敦煌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墓葬,大多在埋葬的同时即遭盗掘,因而虽也获得了一些画像砖、陶俑等随葬品,但却未能像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那样,取得丰富的考古学收获。

### 三、向达两次敦煌考察的学术研究成果

归纳起来,向达的两次敦煌之行,主要成果包括如下三部分:1.《瓜沙谈往》;2.《敦煌余录》;3.文物收集与考古调查。以下分别介绍。

[1] 1944年9月13日向达致袁守和信,史语所档案。

### 1. 《瓜沙谈往》

1955年,向达在编辑自己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时,在《西征小记》一文前写了一条补记:“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两次到敦煌。回来以后,打算根据所看到的材料,写一本《瓜沙谈往》小册子,内中包括:一、《两关考》,二、《莫高、榆林两窟杂考》,三、《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四、《瓜沙曹氏史事攷逸》,一共四篇。前三篇都写好了,只第四篇始终未有成稿。此次重印,因将一九四三年所写《西征小记》作为《瓜沙谈往》第一篇,而将《瓜沙谈往》的总题移在每篇篇名之下,作为小题。”〔1〕显然,向达把这四篇文章,看作是他两次敦煌之行的主要成果,因此放在《瓜沙谈往》的总题下,收入论文集。

《西征小记》是简要记述其考察经过的文字,包括对河西走廊古代遗址和遗留敦煌当地的敦煌写本的调查简记,由于在敦煌时间较长,所以分别叙述两关遗址,敦煌附近之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在敦煌所见到之敦煌写经,其有关当地所存敦煌写本的记录,今天看来仍十分珍贵。此文系1943年1月16—21日写于莫高窟,以应中央研究院月报之约,后不知何故没有发表。1944年9月又在莫高窟重写一过。1950年春,交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内容未加修改,以保持资料的原始性〔2〕。

《两关杂考》一文首先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汉简、敦煌文书以及史籍的记载,确定沙畹、王国维考证汉代玉门关在小方盘城的结论,同时反驳两位关于太初二年之前玉门关在敦煌东面的看法,并进而研究了玉门关在汉唐间的迁徙时间和位置。本文初稿完成于1944年2月,3月修订,以方回笔名,发表在《真理杂志》上,题曰《玉门关阳关杂考》〔3〕。1945年3月改

〔1〕《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37页。

〔2〕《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1—24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37—372页。

〔3〕《真理杂志》第1卷第4期,1944年,389—398页。

订,后收入论文集〔1〕。向达的初稿发表后,方诗铭先生发表《玉门位置辨》,有所驳难〔2〕。夏鼐遂撰《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替向达作答〔3〕。

《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主要内容共三节,即《武周李君修佛龕记中之东阳王事迹考》、《榆林窟小记》、《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特别是最后一节,作者讨论了画壁制度、粉本比例及其他、天竺传来之凹凸画法、绘画中之空间观念、曹氏归义军的画院,涉及到敦煌石窟、壁画研究的许多重要方面〔4〕,是用科学的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敦煌石窟的开拓性论文,为以后的敦煌石窟、壁画研究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虽然敦煌学界有不少学者比较强调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向达在文中指出的种种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学者们所重视,有的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有的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一文,根据考察所校录的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和在国内外新见的敦煌文书资料,对罗振玉的《补唐书张议潮传》做了极其重要的订正和补充,是归义军史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5〕。

遗憾的是,本欲作为《瓜沙谈往》组成部分的《瓜沙曹氏史事攷逸》,最终未能完稿。

## 2. 《敦煌余录》

向达两次在敦煌期间,细心访查,得以看到任子宜等当地文人家中秘藏

---

〔1〕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73—392页。

〔2〕 《西北通讯》创刊号,1947年。

〔3〕 原载《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2月1日《文史周刊》第70期,署名夏作铭,后有向达1947年9月30日所写跋语;收入《夏鼐文集》中,87—91页。

〔4〕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敦煌文物展览特刊》下册,1951年,76—95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93—416页。

〔5〕 原载《辽海引年集》,沈阳,1947年,85—93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17—428页。

的敦煌写本,其中如《毛诗郑氏笺》、《逆刺占》、《文选》、《寿昌县地境》、《唐代地志》、《占云气书》、《三界寺经录》、《定是非论》、《坛语》、《坛经》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典籍,有些还是迄今所知敦煌卷子中的孤本。向达利用第一次在敦煌的冬季和第二次在敦煌的夏季,趁考察洞窟或发掘古墓的间隙,把借到的卷子中有价值的写本全部抄录下来,有的后来又用伦敦、巴黎所藏同一文献的其他抄本做了校勘,如《坛经》等禅宗典籍;有的写有跋语,略加考证;只有一篇文献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即《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sup>〔1〕</sup>。这篇《地境》首尾完整,专记沙州寿昌县的地理,因为唐高宗上元年间以后,寿昌县管辖范围远至西域的鄯善和且末,也就是今天的罗布泊和且末地区,所以这份保存完整的数据不仅可以补伦敦藏《沙州图经》卷五残本寿昌县部分的缺失部分,而且对于研究唐代西域史地也是十分珍贵的参考文献。此外,向达在《西征小记》中对其中一些写本做了简要介绍。

《西征小记》还提到,向达曾把所抄录的敦煌文献辑成《敦煌余录》一书。1948年北大校庆期间,曾经作为“敦煌考古工作展览”的陈列品之一展出,然未见刊行。幸运的是,这部书稿经过“反右”和“文革”,居然保存下来。《敦煌余录》稿本计两册,一册封面题“敦煌余录”,下小字题“佛陀耶舍手写”(佛陀耶舍为向达之号),右列“残道经”至“三界寺经录”目录。又一册封面题“敦煌所出禅宗史料四种·敦煌余录之二”,右书“一九四四年觉明居士写于敦煌莫高窟,一九六二年重装于北京”,此为后加封皮,其内封题“敦煌余录”,右题“禅宗史料四种”,下有具体篇目:《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神秀门人净觉注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以下按原书顺序逐篇介绍向达所抄文献的内容,并标点移录他所写的跋文,最后提示笔者调查到的该写

〔1〕 原载《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年,1—11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29—442页。

本现藏单位、刊布、研究情况。

(1)《残道经·上元金录简文真仙品》

本篇向达仅有录文，未做题跋。按，此卷首尾俱残，每一段落都以“上元金录简文真仙品”起首。就目前所知，敦煌卷子中像这样的书写格式的道经，有 P. 3148、P. 3663、Dx. 158 三件，俱见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篇》33—34 页；P. 3148 图版见《图录篇》38—39 页；P. 3643 见《图录篇》40—41 页；Dx. 158 见《图录篇》42 页，大渊忍尔将它们拟名为《太上洞玄灵宝金录简文三元威仪自然真经》，三元即上、中、下三元，而已知的这三件都是以“下元黄录简文灵仙品”作为段落的开首，表明是《三元威仪自然真经》的“下元品”。《道藏》中有《中元玉篆简文》，是讲中元黄篆简文的。向达所录此卷应该正是专讲上元金录简文的，属于《三元威仪自然真经》的一部分，故可拟名为《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威仪自然真经·上元金录简文真仙品》。此书系《道藏》未收的古灵宝经之一，P. 2256《灵宝经目》有著录〔1〕。迄今为止，笔者已经落实了大部分向达抄本的目前收藏单位，唯有此件和《寿昌县地境》尚不知所在，甚盼方家赐教。

(2)《采华违王上佛授决号妙华经》

向达抄本后有 小字题跋曰：“敦煌所出武后时书《采华违王上佛授决号妙华经》一卷，存五十一行，首尾完具，原本黄纸，长一〇六·五公分，高二五·八公分。不知藏敦煌谁氏，卅二年一月十日，在莫高窟从张大千氏假来录副，抄写既毕，因记之云尔。佛陀耶舍。”此卷现归敦煌研究院收藏，编号敦研 340，首题及首行文字已较向达录文时略残，现已印入《甘肃藏敦煌文献》第 2 卷 97—98 页，《叙录》据武周新字定为武周时写经，并指出文字见于《大正藏》第 14 卷，778 页中—779 页上。

(3)《龙种上尊王佛印法经》

本篇向达仅有录文，未做题跋。此卷现归敦煌研究院收藏，编号敦研附

〔1〕 关于此卷名称的比定和考释，非常感谢刘屹先生的帮助。

382,文字与向达抄录时完全相同,唯向达用另外一纸绘制写本中间上方的手印,抄本此处留了空白。原卷已印入《甘肃藏敦煌文献》第2卷227—228页,《叙录》定为晚唐、五代写本,而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题记系后来用纸粘连上去的,并指出写本所抄佛经不见于历代藏经。按,此卷题记为后来粘上,时间应在元代,故此当为莫高窟北区出土物。

(4)《逆刺占》

此卷文字颇长,向达录文首尾完整,凡遇朱笔处,则用朱笔或朱墨合写,后有小字跋文:“敦煌所出五代天复二年翟奉达写本《逆刺占》一卷,卅一年十二月廿九日录讫。佛陀耶舍谨记于敦煌莫高窟,时在零下八度。”此卷现归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为新836,1988年和1992年两次北京敦煌学术讨论会期间均曾展览。本卷首题“逆刺占一卷”,尾有翟再温题记,相当完整,前有目录,内容是有关逆刺占的杂抄<sup>[1]</sup>。

(5)《大历序》及《历法立成》

这两项内容,《大历序》粘在《逆刺占》卷首,其背面则与《毛诗》在同一面。向达分别录文,置于《逆刺占》和《毛诗》钞本中间。邓文宽曾撰《重新面世的敦煌写本〈大历序〉》,据展览时所见内容,略有考订<sup>[2]</sup>。

(6)《毛诗文王之什诂训传》第廿三卷十六《郑氏笺》

此卷即《逆刺占》的另一面,实为写卷的正面。向达录文后有小字跋:“敦煌所出唐人写本《毛诗文王之什诂训传》第廿三,凡一卷。卅一年十二月卅日录讫。佛陀耶舍谨记于敦煌莫高窟,时零下八度。”此卷正背面中间部分都缺失一段文字的上部。

关于此卷,向达随后用另纸大字写题记曰:

右唐人写《诗毛氏文王之什诂训传》第廿三卷十六郑氏笺残卷,存

[1] 参看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155—158页。

[2] 载《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敦煌学专辑),1995年,155—158页。



一二二行，又五代天复二年翟奉达写本《逆刺占》一卷，存二九六行，首尾完具，中略损十余行，两者分书于卷子两面。首另粘残纸一方，略同书衣，两面书《天成三年具注历序》及《历法立成》，率残缺不全。原卷白纸，全长四四一·七公分，高（原缺二字）公分，不知藏敦煌谁氏。卅一年十二月廿六日在张大千处见之，廿八日承张君假归录副，十二月下旬以来，此间常在摄氏零下七八度，笔墨俱冻，几不能书。室内燃木柴，则烟雾迷漫，写此时往往泪随笔下，概不之顾。穷两日半之力，仅乃蒧事，如释重负。自来敦煌，寓居山寺，倏将三月，鸣沙似雪，边月如霜，岁莫大寒，弥增凄楚。今竟获此，以送残年，既慰边关羁旅之思，复有贫子暴富之乐，故记之云尔。

又，案《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逆刺占》三卷，题京房撰，与此当是一书，分卷不同，疑是写官随意并合，不足异也。此书文辞俚俗，又时杂象教话语，断非汉人著述，当属唐代术士所作，以其中涉及京房，修《旧书》者不察，遂题为京房所撰耳，不足为据也。《诗毛氏诂训传》廿卷，唐以后即已佚失，敦煌石室藏书出，遂重显于世，往在英京，曾睹数卷，俱留影片；法京所藏，有三（王重民）亦为著录；今兹所见，当又出于英法藏本之外，弥可珍贵。惜未能摄影，仅克录一副本，至于两书原本误字复句，有如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今悉仍其旧，不加勘定，藉存其真。卅一年十二月岁尽日，觉明居士谨识于敦煌莫高窟。

又，敦煌任子宜告予，此卷藏敦煌邓秀峰处，张大千谓邓氏索价一万元，亦可谓破纪录矣。卅二年三月四日，觉明补记。

三十三年五月重至敦煌，闻罗寄梅言此卷邓氏已售诸青海韩辅臣矣。韩氏合所得他残卷，粘裱为一长卷，《逆刺占》亦为粘没，一劫也。九月十五日晨，觉明补记于鸣沙山下。

由此题记，我们不难看出向达抄得此卷的艰辛和喜悦。惜此重要写卷迄今尚未影印刊布。

(7)《文选·运命论》

本卷首尾俱残,起“之而弗为乎”句,讫“则善恶书乎史策,毁誉”句,存 22 行文字。向达抄本后小字跋曰:“敦煌任子宜藏石室所出唐人书残页,疑是《论衡》(后涂去,改作《文选》)残篇。卅二年二月廿三日晨写毕,因记之,佛陀耶舍。”可见,在莫高窟无书可按的情况下,向达初疑为《论衡》,后改作《文选》。此卷解放后归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收藏,编号敦研 356。宿白先生曾将其照片交王重民先生考证,1974 年 4 月 1 日,王重民撰《敦煌本文选残卷跋》,推测其与 P. 2645《文选·运命论》为同一写卷,但因为当时没有钞本和照片在手边而未能确定〔1〕。1983 年,李永宁先生撰《本所藏〈文选·运命论〉残卷介绍》,在王重民先生的提示下,确定此卷是接在 P. 2645 后的残篇,可以直接缀合,并刊出原卷照片〔2〕。此卷现收入《甘肃藏敦煌文献》第 2 卷 147 页,与向达过录时无异。最近,徐俊发现 P. 2645 + 敦研 356 李萧远《运命论》和国家图书馆藏新 1543 陆士衡《辩亡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陆士衡《五等论》,都是同一人所抄,后两件原为文物商方雨楼所有〔3〕。

(8)《寿昌县地境》

此篇向达一共录有三份,一份装订在《敦煌余录》册中,书写工整,后有小字跋文:“五代人写《寿昌县地境》,闻藏敦煌祁某处,原本未见到,兹据窈君萃五幼子钞本过录,行款以及讹误之处,一仍钞本之旧,不予改定。窈君于二月十四日逝世,可惜也。卅二年三月四日,佛陀耶舍谨记于莫高窟。”另外册中夹有一较宽的方幅宣纸,其上亦录《寿昌县地境》,文字与册中装

〔1〕 王重民《敦煌写本跋文(四篇)》,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1—2 页。

〔2〕 《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 年,164—172 页,图版 21;法文本“Collation d'un manuscrit fragmentaire du Yunming lun”,*Les peintures murales et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Paris 1984, pp. 25-33, pl. I.

〔3〕 徐俊《书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5 卷,2001 年,370—371 页。

订者基本相同,只是字迹略为草率,估计为册中所录的底稿。此本即向达据以撰写《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的底本,文字基本相同。向达在文章中提到“仅从窦萃五、吕少卿两先生处得见钞本,据以录副”〔1〕,可是从向达册中的跋文看,他写文章时只利用了从窦萃五处过录的本子,而没有利用吕少卿钞本。《敦煌余录》中夹有另一张宣纸,其上也抄录一份《寿昌县地境》,文字与李正宇先生发表的吕少卿编《重修敦煌县志》(未刊钞本)内的录文相同〔2〕,而且后面有跋云:“此《地境》一页,出自千佛洞藏经石室,前高级学校校长祁子厚先生所藏。其中山川地名多不可考,故录之以俟考。”文字与吕少卿钞本后的跋文略同,惟少“文义亦不甚通妥”〔3〕。值得注意的是,此钞本上修订处和纸缝处,均钤小型椭圆章,文字不可识,卷末有铅笔字迹“抄寿昌废县后”,整卷上有毛笔打的两个叉,表明这个钞本已经作废。从全卷的处理情况看,这个钞本原本可能就是吕少卿(吕锺)编《重修敦煌县志》的底稿〔4〕,吕氏过录于《县志》“寿昌废县”条后,把原稿送给向达。向达《记〈寿昌县地境〉》文前言题“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向达谨记于敦煌鸣沙山下”,其时向达不在敦煌,“三十二年”或为“三十三年”之误。文中虽然提到吕少卿钞本,但未及合校,因此吕氏钞本的一些优点也未能吸收。

此后,因为吕少卿钞本一直未能面世,向达钞本成为学者们唯一取材的对象。森鹿三有专论〔5〕,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6〕、郑

〔1〕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29页。

〔2〕 按《重修敦煌县志》迄未出版,《寿昌县地境》部分钞本影印于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445—446页。

〔3〕 《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没有影印这条今人题记,录文载同书328页。

〔4〕 2000年8月,笔者曾在敦煌市档案馆见到《重修敦煌县志》稿本,记得其上修改处也有椭圆章。

〔5〕 《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2期,1948年。

〔6〕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王仲莘《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2〕,均有录文,所据都是向达录文。1993年,李正宇始将吕少卿钞本公布,并撰文介绍其价值〔3〕。以后又在《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中,汇校吕、向两钞本,并有详细笺证〔4〕。遗憾的是,此卷原本目前仍不知所在。

### (9)《唐代地志》

此写本首尾残,存160行,记有陇右、关内、河东、淮南、岭南五道138州府的简要情况,包括州府等第、名称、距两京里程、土贡、公廨本钱数、所属县名等第、县管乡数、公廨本钱数,有朱笔校勘、增订文字,格式谨严。向达据原卷抄录,朱笔处则用朱墨重复抄写,钞本天头有向达用《新唐书·地理志》做的考释文字数十条,册中还夹有《新唐书·食货志》关于公廨本钱记载一条。向达在《西征小记》中略有考订,正确地指出其性质为《地志》,抄写年代在天宝初〔5〕。

解放后,该写本为敦煌县(今改为市)博物馆收藏,编号敦博076。1979年10月,《中国文物》第1期刊出全卷的黑白照片。1982年,吴震、马世长分别发表其录文和校注成果〔6〕,以后校录者还有数家,但均未出吴、马二氏的范围。笔者对比贾耽《贞元十道录》的体例,考虑到本书不分卷,实用性强,随时改订等特征,判断其为官府所编“十道录”类的著作。又据其所记州县名称的改易情况,确定是天宝初编成,因此可以称之为“天宝十道录”〔7〕。现影印

〔1〕 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 李正宇《敦煌吕锺氏录本〈寿昌县地境〉》,原为提交1993年8月香港大学举办的第34届亚洲与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并附有图版一纸,后发表于《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42—46页,惜删掉图版。

〔4〕 《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327—386页。

〔5〕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71页。

〔6〕 吴文载《文史》第13辑,1982年,45—89页;第14辑,1982年,11—67页;马文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265—428页。

〔7〕 荣新江《敦煌本〈天宝十道录〉及其价值》,唐晓峰等编《九州》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16—129页。

本收入《甘肃藏敦煌文献》第6卷224—227页。

(10)《占云气书》

《唐代地志》的背面,前为《紫微宫星图》,大概因为较难绘制而为向达缺录。后为《占云气书》一卷,向达全录,并照原样、原色描绘云图。向达未写跋文,最后一纸背有铅笔“26/IV/32 钞毕”字样,表明是1943年4月26日抄完。又在《西征小记》中,略做提要。1943年向达回到李庄时,曾将此钞本借给史语所陈盘先生,陈盘命书记员李君抄录一份,后撰《影钞敦煌写本占云气书残卷解题》(古讖纬书录解题附录三),考释此书系行军候望云气以占吉凶进退之事,为历代书目所未见著录,文后影印李君抄本七叶,不全,持与向达录本对照,略有失真<sup>〔1〕</sup>。

此卷现编号敦博076VB,马世长有《敦煌县博物馆藏星图、占云气书残卷》文<sup>〔2〕</sup>。详细研究参见何丙郁、何冠彪《敦煌残卷占云气残卷》一书<sup>〔3〕</sup>。图版现影印于《甘肃藏敦煌文献》第6卷228—231页。

(11)《三界寺经录》

向达钞本后有数段小字跋文,主要考证相关的道真材料:

卅二年三月廿七日在敦煌,假任君子宜藏石室本录副。原本长三六四公分,高二五·三公分,书法甚劣,首有残缺。卅四年在李庄,翻检《雪堂丛刊》中《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未有《见一切入藏经目录》,中亦有长兴五年三界寺比丘道真等字,或者此卷裂为二段,一归任君,一为橘瑞超氏将去,亦未可知也。北平图书馆藏服字三十号石室卷子纸背,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三,界道真受持题记。此道真与写《目录》之道真当为一人。卅四年二月十三日,觉明居士记于李庄寓

〔1〕 陈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1分,1979年,1—27页,图壹一柒。

〔2〕 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477—508页。

〔3〕 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年。又另载《文史》第25—26辑,中华书局,1985—1986年。

庐,是日为乙酉元旦。

北平图书馆藏余字十八号有比丘道真受持题记;奈字八十八号一面有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俗姓张氏题记;背面有三界寺道真念题记。道真亦三界寺僧,不知与道真为一人否也。

咸字七十五号《佛说阎罗王授记劝修七斋功德经》尾,有比丘道真受持。

在《西征小记》中,向达抄录了卷中道真的题记。上面的跋文表明向达此后一直在汇集有关道真的材料。此卷后归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编号敦研345,现影印于《甘肃藏敦煌文献》第2卷108—112页,施萍婷《叙录》说明了此卷与国图329号、S.3624的关系,详细研究,见其《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一文〔1〕。

#### (12)《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以下禅宗文献原为一个册子本,计93叶,一叶二页,每页六行,有界栏,每行22至26字,字体工整。前面约缺九页,尾缺一页,基本完整,向达依原书次序录文。在《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钞本后,有小字跋文:“敦煌任君子宜所藏石室本禅宗史料四种,去岁曾录副本,今春过江津,宿内学院,吕秋逸先生将副本索去。五月重至敦煌,因谋重写一部。任君慨以原本相假。八月至莫高窟,五日始写《定是非论》,今日写了,因记之,卅三年八月八日,佛陀耶舍谨记。”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和《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是记录神会和尚言行的重要典籍,早已不传。1926年,胡适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神会语录》和《定是非论》(P.3047、P.3488),又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发现《顿悟无生般若颂》(即《显宗记》),于1930年校订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向达在其录文本第一叶之天头,有如下题记:“《神会和尚遗集》收

〔1〕《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178—210页。

Pelliot 3047 号《南宗定是非论》残卷,存卷首至‘所以简途如’,以下阙,恰可以补此卷之不足。又所收 P. 3488 号残卷,亦是《定是非论》,具见此本中。胡氏虽命名为‘神会语录’,仍疑其为《定是非论》。今以此本证之,胡说是也。”以下天头有几处与巴黎本异同的说明,并在行间用朱笔校写异同文字。

四十年代末,谢和耐找到 P. 2045 号写本,据以校定《神会和尚遗集》中《定是非论》部分<sup>[1]</sup>。1958 年,胡适发表《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又据 P. 2045、P. 3047、P. 3488,校录出完本《定是非论》<sup>[2]</sup>。唯其时胡适未能见到任子宜本(现敦煌市博物馆本),所录仍不完备。1996 年,杨曾文汇集包括敦博本在内的诸本,重录为《神会和尚禅话录》<sup>[3]</sup>,是目前最方便使用的本子。

(13)《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此篇首尾完具,后附录《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向达钞本后有跋:“《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八日始写,九日写了。卅三年八月九日,觉明居士记于敦煌莫高窟。”钞本上没有校记。

1930 年胡适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后,铃木大拙找到北图藏寒字 81 号《坛语》写本,影印、校录在 1935—1936 年所编印的《敦煌出土少室逸书》和《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中。1958 年,胡适发表《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用 P. 2045 和寒字 81 号校录出《坛语》,亦不知有任子宜本。目前最方便的本子是杨曾文《神会和尚禅话录》。

(14)《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

---

[1] Jacques Gernet, *Entretiens du Maître de Dhyāna Chen-houei du Ho-tsö (668-760)*, Hanoi 1949; 2e ed., Paris 1977.

[2]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9 本,1958 年,828—857 页;又收入新版《神会和尚遗集》(台北胡适纪念馆于 1968 年影印本)和《胡适禅学案》(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 年)。

[3] 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

此篇也是首尾完整,向达钞本后跋云:“《六祖坛经》一卷,八月九日午后始写,十二日晨写了。此数日甚热,室内常在华氏八九十度之间,卅三年八月十二日,觉明记于莫高窟。”

按《坛经》敦煌共有五件钞本,其中 S. 5475 的录文早就发表在 1928 年出版的《大正藏》第 48 卷;图版收入 1930 年出版的《鸣沙余韵》,广为学界所知。但这个本子俗、讹字满纸,远不如任子宜本。向达在其录文的后面,又用朱笔写一跋文:“《大正藏》第四十八卷亦收此经,所据为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石室本。兹取《大正藏》本与此对勘一过,其有异同,朱书于旁,日本人校语,间采一二,记于书眉。今日勘一遍。卅四年(1945)二月一日,觉明居士谨记于四川李庄寓庐。”异同文字,写在钞本行间,校语则用墨笔写在天头。

《坛经》其他钞本,一是原藏旅顺博物馆的大谷探险队所得本,著录于叶恭绰编《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经典》<sup>〔1〕</sup>,可惜此本后来佚失,现不知所在,只有首尾页的照片可在龙谷大学图书馆看到。二是国家图书馆藏冈字 48(现编号 8024),著录于陈垣编《敦煌劫余录》<sup>〔2〕</sup>,但未能引起广泛注意。直到 1991 年,田中良昭撰《敦煌本六祖坛经诸本之研究——特别介绍新出之北京本》,才揭示出此残本的价值<sup>〔3〕</sup>。三是近年在国家图书馆找到的有字 79 号残片。综合五种敦煌钞本《坛经》,无疑以任子宜本最佳。1993 年,杨曾文出版整理敦博本的结果——《敦煌新本〈六祖坛经〉》<sup>〔4〕</sup>。1997 年,周绍良出版《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影印五种钞本,并以敦博本为底本,做了校录<sup>〔5〕</sup>。

〔1〕 《图书馆学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26 年。

〔2〕 《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 年,498 叶正面。

〔3〕 《松ヶ岡文庫研究年報》第 5 号,1991 年,9—38 页。

〔4〕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2001 年 5 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5〕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



(15)《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此本大字正文,双行小注。向达钞本后跋云:“神秀门人净觉注金刚般若蜜多心经,卅三年八月十三日晨写了,三宝弟子佛陀耶舍谨记于敦煌莫高窟。”写本书题页的另一面,有向达后来考释净觉文字11行。按,净觉《注心经》还有S.4556一本,为竺沙雅章发表<sup>[1]</sup>。吕澄撰有《敦煌写本唐释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附说明)》一文,所据即向达第一次在敦煌手抄本<sup>[2]</sup>。后来,柳田圣山在《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京都,1968年)附录中,合两本校出一个较好的本子,但没有看到敦博本的原本。

向达在《敦煌余录》禅籍抄本的最后两页,用大字写一跋文,对抄写的过程和写本价值略作陈述:

右敦煌任君子宜藏石室本禅宗史料,计《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六祖坛经》及神秀门人净觉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四种。原为梵夹本,作蝴蝶装,高三二·二公分,广一一·七公分,存九十三叶,每半叶六行,行字数不等,格式与宋藏略同,首尾大约各缺一叶。未有比丘光范跋,谓“命工雕印,永冀流传”云云。不知为雕印四种,抑仅指净觉《心经》而言,惜有缺叶,不知原本雕于何时,唯据写本字体及书写格式推之,最早当不能过于五代也。《南宗定是非论》胡适之据英法藏本校印于《神会和尚遗集》中,而俱有残缺,不及此本。《坛经》胡氏亦有校本。南阳和上即神会,《坛语》北平图书馆藏一残卷。净觉《注心经》则为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以略窥一二,治禅宗史者之要典也。

去岁居此,曾从任君假录副本,今春至江津内学院,吕秋逸先生见而悦之,因以奉贻。五月重来敦煌,即谋更写一本,卒卒未暇。七月杪,

[1] 竺沙雅章《净觉夹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について》,《佛教史学》第7卷第3号,1958年。

[2] 《现代佛学》1961年10月号,32—38页。

移居莫高窟,日长昼永,因从任君复假原书,重事移录,今日写毕,略记数语,以识因缘,并以志任君之高谊云尔。卅三年八月十三日,觉明居士谨记于敦煌莫高窟。

在1944年9月完稿的《西征小记》一文中,向达在此跋基础上对此抄本又做了简单的描述和考证。这个册子的原本,自向达著录后学界一直不知所在。解放后,此本归敦煌县(今改为市)博物馆,编号077。1986年始著录于敦煌县博物馆编(荣恩奇整理)《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sup>〔1〕</sup>,被称作“敦博本”,备受学界重视,单篇整理者已如上述,合全册校录者,有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一书<sup>〔2〕</sup>。现全卷图版,已刊布于《甘肃藏敦煌文献》第6卷。

向达的《敦煌余录》虽然未得出版,但仍然是敦煌学史上的要籍,值得大书特书。向达抄本皆严格依照原卷,有误也不改定,以存其真;有图则绘,不同颜色的文字和图画也用不同颜色描绘抄写,这些做法是和他保护敦煌石窟的做法相一致的。他在录文的基础上,不断校订、考释、研究,只是由于此后不久即抗战胜利,复员搬家,解放初期他又将研究重点放在中西交通方面,至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后,期间种种原因,使他始终未得抽闲把研究工作做完,而此抄本也就一直未能面世。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敦煌学的复苏,收藏在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市博物馆的相关藏卷,也都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向达先生若看到如此丰厚的研究成果,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 3. 文物收集与考古调查

向达的两次敦煌考察,除了撰写研究论文、抄录散藏文书外,还克服重重苦难,用各种方式,收集了各种敦煌文物资料。这些材料一般不为学人留

---

〔1〕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583—584页。

〔2〕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意,但却是我们研究敦煌学史时所不应忽视的。

1948年12月,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之际,特别举办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由向达和王重民两位准备展品,后来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其中有《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使我们今天还能够知道展览的具体内容。以下摘要录出向达自敦煌所获资料,序号为笔者所加:

(1) 王圆禄道士告天文:向觉明先生从敦煌得来。告天时在学部电兰州制台以后,约当宣统二三年(1910—1911)。

(2) 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向达手拓。按此即王道士墓志也。民国二十年赵明玉方至福立石。

(3) 敦煌石室写经有关档卷摘抄:向达手钞辑。原档藏敦煌县政府。始宣统二年九月,迄民国九年六月,凡二十六通。

(4) 六朝经幢残石:向达手拓。碑分三层:上层佛像,中为隶书经文,下为婆罗谜文。

(5) 大唐李君□佛之碑:向达手拓。此碑裂为三段,今仅存中段。按《陇右金石录》据旧拓本,首行题“□□□柱国李君修慈悲佛龕碑并序,□□首望宿卫柱国敦煌张大忠书”。碑文用武后新字,叶氏《语石》谓立于圣历元年(689)也。

(6) 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向达手拓。大历十一年(776)阴庭诚撰文。

(7) 吴僧统碑残石:向达手拓。按此碑旧称“赞普碑”,所存不过六十余字。以敦煌写本证之,为窆夫子撰《吴僧统碑》残石也。碑立于敦煌陷蕃时期。

(8) 赐沙州僧政敕:向达手拓。按僧政指洪辩、悟真等。碑之上段为告身,中段敕书,下段赐衣物录。碑当立于大中五年(851)稍后。

(9) 大唐河口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向达手拓。索公名勋,据碑文,立石盖在景福元年(892)。

(10) 莫高窟造像碑:向达手拓。碑有六体文字,元至正八年(1348)立石。

(11) 重修皇庆寺记:向达手拓。刘奇撰,至正十一年(1351)立石。

(12) 明题名铁碑:向达手拓。碑存敦煌艺术研究所。

(13) 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向达手拓。郭璘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立石。

(14) 敦煌千佛洞相塔记:向达手拓。廷栋撰并书。宣统二年(1910)立石。

(15) 敦煌千佛山咏怀两律:向达手拓。诗为遂安居士廷栋撰。

(16) 敦煌千佛洞九层楼碑记:向达手拓。民国二十五年(1936)立石。

(17) 敦煌千佛洞所出唐代花砖。

这些文物材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石碑拓本,敦煌城内和莫高窟所存碑记,除《索勋碑》背面的《杨公碑》大概因为镶在墙内而缺失外,几无遗漏;另一类是敦煌县政府有关敦煌石室写经的档案,计26通,远远多于卫聚贤《敦煌石室》文所附录者<sup>〔1〕</sup>,而且,笔者曾到甘肃省档案馆和敦煌市档案馆访查这些档案下落,迄今尚无结果,可见向达的眼力和钞本的价值。

至于考古调查方面,向达下面的三篇文章应当被提到:

(1)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这是1944年8月30日敦煌中寺土地庙发现时的记录,后附《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本所后园土地庙残塑像中发现藏经初步检点报告》,共68号<sup>〔2〕</sup>。因为土地庙文书的发现、来源、流散、缀合等等问题还有许多不

---

〔1〕 卫聚贤所录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敦煌特辑专号,1943年5月重庆出版。

〔2〕 此文要旨最早发表于《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年,107—110页,署名方回;全文收入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3—11页。

明之处<sup>〔1〕</sup>，向达的记录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2)《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谜字因缘经经幢残石》：这是1943年2月8—9日，向达在敦煌城西南五里岷州庙中发现的残石，双语书写，向达将婆罗谜文部分拓片寄给在印度的周达夫，转请戈哈里(V. V. Gokhale)翻译。1962年，向达撰上文介绍这一发现，并提到三危山所存另一石塔，正确地判定了石塔的年代，对经文内容做了研究<sup>〔2〕</sup>。现在，岷州庙早已不存，而残塔原物因为向达的发现得以珍藏于敦煌研究院，为后来的北凉石塔研究保存了资料<sup>〔3〕</sup>。

(3)《安西榆林窟记录》：这是向达1943年5月18—20日考察榆林窟时所做的记录，逐日记录张大千编号第1至12窟的壁画、画记、雕塑、供养人题记，有些还绘制了壁画位置图。据说向达的榆林窟考察记录有近10万言之多，可惜“文革”期间毁佚过半，仅存这三天所记榆林窟东崖诸窟情况<sup>〔4〕</sup>。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榆林窟记录，主要有谢稚柳编《敦煌艺术叙录》<sup>〔5〕</sup>、霍熙亮编《榆林窟、西千佛洞内容总录》<sup>〔6〕</sup>。谢录作成的时间与向录相同，但与向录相较，要简略得多；霍录成文较晚，内容准确，但比较简练，也不如向录详细。向达的考察记录十分详细，尤其是壁画题记

---

〔1〕 参看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敦煌研究》第3期，1985年，92—97页；池田温《1944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饶宗颐编《敦煌文荟》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1—38页；施萍婷《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庙写本源自藏经洞》，《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39—46页。

〔2〕 原载《现代佛学》1963年第1期，8—12页，署名觉明；收入《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12—19页。

〔3〕 有关此塔现状和最新研究成果，见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新竹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

〔4〕 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20页。

〔5〕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新版，441—496页。

〔6〕 敦煌研究院编《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254—263页。

(包括画记和供养人题记),保存文字最多、最全,甚至于两年前(1941年11月)张大千在壁上的题记,也都抄录,因此参考价值极高。可惜向达原本没有打算出版这部记录,可能是想继续修订,遗憾的是现在不知是“毁”还是“佚”。

由此笔者连带着想到,向达在给友人信中反复说过,他在莫高窟仔细浏览了三遍,做了详细的记录,他在榆林窟的这份记录也反映出他肯定也有莫高窟记录,甚至还有西千佛洞的记录,而且都应当是十分细致的,所录题记也应当是文字较多的。谢稚柳虽然与向达同在敦煌,而且来得还略早一些,但他引用莫高窟张编第155窟索勋题记时,用的却是向达录文<sup>〔1〕</sup>。这也说明向达工作之细致,记录之重要。我们热切希望向达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记录尚存于世。近年来北京书摊上常见有向达旧藏中西文图书散出,切望有心人留意向达这份珍贵的笔记。

#### 四、向达西征的意义

向达在艰苦的四十年代前半期,克服自然和人为的种种困难,完成了两次敦煌考察,取得了上述多方面的成绩。从敦煌学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向达的西征,我以为有以下两点意义最值得表彰:

一、在向达之前,固然已经有许多探险家、考古家、汉学家、历史学家、画家等等到敦煌考察,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以各种方式攫取宝藏为目的。向达可以说是第一位真正从考古学意义上提出莫高窟的保护问题的,而且,他不顾个人恩怨与安危,撰写《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促成了敦煌石窟保护工作的实施。我们今天得以拥有莫高窟如此精美的壁画,固然与几代人的努力分不开,但追本溯源,我们不能不感激向达的贡献。我不反对给出巨资保护敦煌石窟的实业家立碑,但也希望

〔1〕《敦煌艺术叙录》,14页。

用某种不破坏莫高窟景观的方式为向达先生颂德。

二、在向达之前,由于敦煌写本流散四方,而能亲至敦煌考察者又寥寥无几,所以敦煌学各个专题的研究往往是各自独立地进行的。向达原本最关注敦煌俗文学作品,来到敦煌后,他亲自进行考古发掘、石窟调查、美术史分析、写本文献考释,开拓出考古、美术史、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路。他以《瓜沙谈往》为题发表的四篇文章,虽然有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今天或许已经可以超越,但他这些文章在研究方法上给予我们的启示,却是最为宝贵的敦煌学遗产。

赵朴初先生曾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赋诗一首,其中首尾两句,正可以借用来称赞向达先生的西征及其意义:

沈酣经史探鸣沙,学究敦煌自大家。

遗著辑成君不死,长留余泽护春花。

(2003年1月13日定稿,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1月,99—127页。)

## 关于北大所藏常书鸿致胡适的一封信

北京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着不少现代中国学术史的资料,其中也包括有关敦煌学学术史的材料。因为本次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是“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暨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我特别在此介绍北大所藏的一封1948年常书鸿先生致北大校长胡适的信,借此追思常书鸿先生对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贡献,同时表彰敦煌研究院的先辈们在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弘扬方面所作出的丰功伟绩。

书信封面写“北平国立北平大学胡校长适之勋启”,署“常书鸿”,用专制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信封,上面有邮局印的“航空”、“单挂号”文字,邮戳为“卅七三月八日,Peiping”,知此信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八日寄达北平(今北京)。信文写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用笺”上,计三叶,系常先生用毛笔所书,字体遒劲有力,十分美观。信的全文如下〔1〕:

适之校长先生勋鉴:

敬启者:查敦煌艺术上起魏晋,下逮宋元,为中国二千年文化结晶。第以远处边域,久经湮没。自光绪廿六年石室藏经发现后,虽渐次为国内外学者所注意,但无保管办法。迨卅年秋监察院于院长巡视西北,参

---

〔1〕 此件曾由北大历史系中国现代史专业研究生伍发明同学录出,发表在他整理的《北大藏胡适来往书信选》中,载《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379—380页。大概因为匆忙过录,其中有些文字没有录全,所录文字也有误释。今承友人岳庆平教授商请北大档案馆制作影本赠送敦煌研究院,笔者得以据影本仔细校录如上。



观石窟之后,始提请中央于卅二年设立本所,由教育部聘高一涵先生与书鸿负责筹备成立。其间因漠北生活惨淡,交通阻梗,人力财力俱感困乏之环境中,五载以来,虽极尽绵薄,愧无建树。兹为本所成立五周年纪念之期,拟集合所中同人历年成绩,在国内外作巡回展览,藉以稍尽宣扬敦煌艺术之责。盖过去若干私人临摹敦煌艺术,大体以主观作风为片断之表现。其于介绍敦煌艺术之功能,实至浅鲜。本所同人鉴于此种现象之兆,是故平日互相箴戒,务必以忠诚之态度,作比较详尽、克实、有系统之临摹。例如历代图案集、历代舟车集、历代山水集,均以一定大小之纸张,在各种壁画中收取资料,缩临而成。一旦同时陈列,即可窥见各朝各代作风蜕变之阶段,实为研究中国艺术之宝贵资料。今拟集纳五年来全部作品一千八百余件(另附展览品目录),呈请教育部拨给展览经费,作国内外巡回展览,并拟藉展览门票之收入,以百分之五十作为补修敦煌石室之用,以百分之五十作充实研究设备之用。

素稔台端提倡中国文化事业不遗余力,对于敦煌艺术亦至关切。用敢不揣冒昧,恳请鼎力向有关当局进言襄助,俾有所成,不胜感禱,尚此布臆。

顺颂

勋绥。

后学常书鸿谨启,二月廿一日。

据信封上的邮戳,这里所署的“二月二十一日”,应当是1948年的2月21日。据常书鸿先生自己在《九十春秋》中的回忆,此时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积极筹备信中所提到的这个展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第5章《艰难岁月》中讲到〔1〕:

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到1948年初,我们按计划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

〔1〕 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79页。

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线条选》、《历代建筑资料选》、《历代飞天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服饰选》以及《宋代佛教故事画选》等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工作,共选绘了壁画摹本 800 多幅。为了宣传敦煌、介绍敦煌、保护敦煌,1948 年初,在完成了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和临摹工作后,我们选了壁画摹本 800 多幅准备展览,我打报告给教育部,希望这些作品能在各大城市巡回展出,然后再出国展览。但一直没有消息,直到 1948 年 7 月,才接到通知,8 月在南京展出。

这里只说给教育部打报告,没有提到给胡适去信的事。我检索了《胡适日记全编》、《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等书,此信寄到时,胡适正拟到南京参加“国大”,以后蒋介石提请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虽然此事没有被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但当时弄得胡适十分难受。而北大方面也面临诸多压力,胡适已有辞掉北大校长的念头<sup>〔1〕</sup>。在这样的心境下,我们尚未发现胡适是否对敦煌艺术研究所提出的举办展览一事给予帮助,至少在《胡适日记全编》里没有留下相关文字<sup>〔2〕</sup>。按照胡适往日的性格和他曾经从事敦煌研究的兴趣,如果他有余力顾及于此的话,他是会给予帮助的。而且,1948 年 12 月 17 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日,北大方面正在准备隆重庆祝,而此日也正好是胡适的生日,庆祝活动的重点之一是举办“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sup>〔3〕</sup>,如果敦煌艺术展览可以巡回到北平,不也正好可以互相补充或交相辉映吗。

无论如何,“敦煌艺展”在 1948 年 8 月 22 日至 29 日于南京鸡鸣寺的国

---

〔1〕 参看欧阳哲生《胡适与北京大学》,同作者《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年,318 页。

〔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 7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其中 1948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21 日的日记全缺。3 月 21 日至 5 月 9 日胡适在南京,所记也甚为简略。

〔3〕 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48 年 12 月。

立中央研究院内举行,然后又在同年9月14日至18日转移到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厅陈列。这次展览虽然时间不长,但无疑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最辉煌的一页,也是研究所成员多年来在大漠中默默奉献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最近,我请余欣博士帮我在网上书店搜索,有幸买到一册品相颇佳的这次展览的目录——《敦煌艺展目录》。封面上方横书编者“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中间大字竖写“敦煌艺展”,下面横写“目录”,两边印南京和上海的展览时间和地点,上海的地点是用蓝墨印上去的。封面封底都用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的朱墨拓本作底色,衬托出封面端庄的文字,设计十分讲究。

相信现在研究敦煌的人很少见到这本目录,所以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本目录的内容。目录正文前有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所写的《敦煌艺展与中国文艺复兴》,可见政府对这次展览的重视;然后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夏鼐先生所写的《敦煌千佛洞史略》,简要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夏先生曾代表中央研究院,与北大的向达先生一道赴敦煌作考古调查,是南京最有资格写这篇文章的人<sup>〔1〕</sup>;然后是常书鸿先生的《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作为主题论文,阐述敦煌艺术的基本内涵和她在中国文化建设上的意义<sup>〔2〕</sup>。正文《敦煌艺展出品目录》共分二十一类,即(1)历代壁画代表作选集,(2)历代藻井图案,(3)历代龕楣图案及其他,(4)历代花边图案,(5)历代佛光图案集,(6)历代莲座图案集,(7)历代边饰图案及其他,(8)历代伎乐集,(9)释尊本生故事图录,(10)历代山水人物集,(11)历代舟车,(12)历代动物集,(13)历代手足,(14)元魏力士图录,(15)历代建筑资料,(16)花砖图案,(17)历代飞天,(18)历代服饰集,(19)历代碑碣拓本,(20)照片,(21)创作选。临摹的作者有常书鸿、段文杰、李承仙、常沙娜、李浴、董希文、潘絜兹、钟贻秋、张定南、郭世清、范文藻、黄文馥、欧阳琳、薛德嘉、霍熙亮、孙儒

---

〔1〕 参看夏鼐著,王世民、林秀贞编《敦煌考古漫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2〕 此文没有收入《九十春秋》。

偶,他们对于敦煌艺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总计临摹品 682 件,加上拓本、照片和创作画选,共 740 件陈列品,规模可谓壮观。目录最后是署名编者所写的《写在敦煌艺展之后》,介绍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简况和关于这次展览的筹备工作。我觉得这个展览在敦煌学史上抹上了浓重的一笔,由于这个展览目录是个非正式出版物,使得这个展览容易为只是根据正式发表的文字所写的敦煌学史类的著作所遗忘。其实,在同年底北京大学举办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上,就陈列着这本《敦煌艺展目录》,而且还有《今日》,是《今日画报》为敦煌艺展所出的增刊,1948 年 8 月 27 日出版<sup>[1]</sup>,可见这个展览的后台老板胡适先生和主持其事的向达、王重民两位先生,都没有忽视这个展览在敦煌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对于此前所办的各种展览了如指掌,却只选取了这次的展览目录和特辑来作为敦煌艺术展览的代表。

我们不难看出,常书鸿先生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表述的展览思路,基本上是实现了。这里我觉得特别值得强调常先生在信中所提到的与敦煌艺术研究至关重要的两点。

一是敦煌艺术的临摹方法:常先生说:“盖过去若干私人临摹敦煌艺术,大体以主观作风为片断之表现。其于介绍敦煌艺术之功能,实至浅鲜。本所同人鉴于此种现象之兆,是故平日互相箴戒,务必以忠诚之态度,作比较详尽、克实、有系统之临摹。”这里所说的过去若干私人临摹敦煌艺术的方法,显然是张大千为代表的一派,常先生和张大千是很好的朋友,但学术理念不同,他指出张氏临摹品的问题是“主观”和“片断”,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当然都会认同常先生的看法,40 年代在敦煌考察的向达先生也是持这种态度的<sup>[2]</sup>。这种临摹是研究性质的临摹,这些临摹品既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成员们的艺术结晶,又是他们研究的成果,因为他们在表现

---

[1]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6 页。

[2] 李浴《一段重要而难忘的经历——敦煌艺术研究所二年》,《敦煌研究》1994 年第 2 期,42 页。

所临摹的壁画时,对于临摹的对象就会有着深刻的认识。

二是敦煌艺术的分类研究:常先生下面说到如何对敦煌壁画做比较详尽、克实、有系统之临摹:“例如历代图案集、历代舟车集、历代山河集,均以一定大小之纸张,在各种壁画中收取资料,缩临而成。一旦同时陈列,即可窥见各朝各代作风蜕变之阶段,实为研究中国艺术之宝贵资料。”在当时照相技术,特别是彩色照相技术还不发达而且几乎无法全面使用的时候,临摹是研究敦煌壁画的基础。常先生在此特别指出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即把敦煌各种图像做分类的临摹,然后放在一起,对比他们的发展变化,这是学术含量极高的见识。今天随着照相技术的发达,我们拥有了按年代编撰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sup>〔1〕</sup>、按洞窟编撰的《敦煌石窟艺术》<sup>〔2〕</sup>、按类别编撰的《敦煌石窟全集》<sup>〔3〕</sup>,我们看后者中包含的《本生故事画卷》、《尊像画卷》、《图案画卷》、《飞天画卷》、《动物画卷》、《建筑画卷》、《交通画卷》、《山水画卷》,仍然可以看出常先生当年的一些设想,虽然今天的规模和技术都远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要宽广和高超得多了。

常书鸿先生对于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贡献之巨,社会早有定论。但常先生对于敦煌艺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仍需要学术界加以大力表彰。我这里仅就北大所藏常书鸿先生致胡适校长的一封信,来表彰常书鸿先生以及敦煌艺术研究所先辈们通过“敦煌艺展”而表现出来的成绩。我想,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在保护、临摹、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这是可以告慰常先生以及已故敦煌艺术研究所诸前辈在天之灵的。

(2004年7月2日完稿,原载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1月,85—91页。)

〔1〕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987年。

〔2〕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代陆续出版。

〔3〕 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以来陆续出版。

## 敦煌学研究揭开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

公元九世纪中叶前后,是中国西北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840年,位于蒙古高原的漠北回鹘汗国被黠戛斯击破,部众大批西迁,进入河西走廊和天山东部地区。842年,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内乱,赞普郎达玛遇刺身亡,吐蕃在河陇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秩序迅速崩溃,这些地区的各族民众纷纷从吐蕃统治下解放出来,组成新的集团,扩充实力,抢占地盘。到九世纪末、十世纪初,以敦煌为中心的瓜沙地区是汉人为主导的归义军节度使政权,酒泉、张掖地区是由西迁回鹘的一支组成的甘州回鹘王国,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由西迁回鹘的主力构成西州回鹘王国,东面的凉州(武威)有吐蕃系的唃廝囉部活动,西面的于阗则由原尉迟家族重新执政,鄯善(罗布泊)地区经退浑(吐谷浑)、璨微(萨毗)最终成为小月氏遗种仲云人的天下。此外,还有龙家、南山、通颊等部族,也是举足轻重的力量。然而,由于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原各代王朝,都没有能力直接控制上述地区和民族,因此对于九世纪中至十一世纪初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丰富内容,了解甚微,留下来的记录多是归义军、甘州、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等地方政权遣使朝贡的记载,对于当地各族政权内情和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则付阙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一大批属于这个时期的汉文公私文书,以及一些弥足珍视的回鹘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文书,为我们探讨西北民族变迁,特别是沙州归义军史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最早接触敦煌写本的一些中国学者,从他们所见极其有限的文书中,就意识到重建归义军史的重要性。罗振玉写成《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

氏年表》(《雪堂丛刻》,1914),成为归义军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9:6,1935)、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3,1936)、《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史语所集刊》7:3,1937)、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辽海引年集》,1947)、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1,1962)、姜亮夫《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中华文史论丛》1979:3)、《瓜沙曹氏年表补正》(《杭州大学学报》1979:1—2)等前辈学者的论著,发掘出不少写本文书或石窟题记中的新资料,填补了许多空白,大致勾勒出归义军政治史的脉络,并涉及到归义军与甘州、西州回鹘的关系问题。然而,由于八十年代以前,大批敦煌资料尚未公布,而上述大家的治学重点也不在此。所以,对归义军政治史的精细研究,以及从各种角度对归义军政权各个方面的探讨,是1980年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

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更迭,是归义军政治史研究的中心课题,其年代的确立,则可为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其中从张淮深死到张承奉立的一段史事,十分隐晦难明。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2)据文书、碑铭、题记,否定了罗振玉、向达以来“索勋杀张淮深”的成说。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政者之更迭》(《敦煌研究》1986:2)肯定了上文的观点,并据《张淮深墓志铭》、《沙州进奏院状》等,指出杀淮深者应是张议潮子淮鼎。淮鼎临终又将子承奉托付索勋,勋却自任节度,终被嫁给李明振的议潮女张氏诸子杀掉。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文献》1989:3)则揭出过去不够明了的李明振妻与诸子排挤承奉而独揽政柄的事实。此外,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986)系统地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题记资料,补充了许多晚唐归义军史实。关于张承奉所建金山国的研究,过去仅有王重民《零拾》一文。近年,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3,1982)对《零拾》所定金山国905年建国说提出疑问,并怀疑在908

年。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87:2)、《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敦煌研究》1987:3)二文,指出了905年说所据“乙丑年”的错误,并提出906年说。关于曹氏历任节度使的年代和事迹,贡献最大的是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甘肃师大学报》1980:1;又《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载《敦煌研究文集》,1982及贺世哲上引文略同)。对其中某些年代提出重要补充的是荣新江《敦煌卷子札记四则——关于曹议金的去世年月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1983)、唐耕耦《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敦煌研究》1987:2)、谭蝉雪《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敦煌研究》1988:1)。根据以上研究,虽然目前仍有一些年代系属推测,但已基本可以列出一张较为完善的“归义军节度使世系图”了。此外,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1988年中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考察二百多条史料,对历任节度使生前死后由低到高的各种加官称号作了系统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检验了上列世系,并力图建立归义军史基本资料的年代体系。

在归义军史的其他方面,也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论著,如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4:1)、杨际平《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于土地、赋税制度,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987)于寺院经济,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1986)于使府体制,黄盛璋《沙州曹氏二州六镇考》(《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1987)于军镇建置,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1)、《〈敦煌廿咏〉探微》(《古文献研究》,1989)于教育文化,荣新江《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2)于文化传播等等,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宋之际西北民族,往往是把它们和归义军的关系问题放在一起考察。比较综合性的研究有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4,1983)和荣新江《归义军及其



与周边民族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2)。对于归义军与回鹘的关系,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但迄今仍有很多不明之点,因此也就众说纷纭。刘美崧《论归义军节度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3)对二者前期的关系,执论较钱伯泉《归义军与安西回鹘的关系》(《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为公允。五代时期,多集中在对前人已刊的重要文书的重新解说上,如孙修身《敦煌遗书P.2992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西北史地》1985:4)、《跋敦煌遗书伯2992号卷背几件文书》(《新疆文物》1988:4)、《敦煌遗书伯3016号卷背第二件文书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1988:1—2)、杨圣敏《敦煌卷子P.3633号研究》(《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1988)、苏哲《伯2992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番文献研究论集》5)等等皆是。对于西北民族研究更重要的是新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在汉文文书方面,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5)引入《儿郎伟》,李正宇《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考释》(《文献》1988:3)和《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4)都提供了新史料,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北京大学学报》1989:2)从S.6551讲经文中,复原出五代时期西州回鹘的官制、民族、宗教的部分情况。在民族语言文书方面,黄盛璋《〈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4:2)和王尧、陈践《归义军曹氏与于阆之关系补正》(《西北史地》1987:2)分别介绍了一件于阆文和藏文文书,也有一些学者正致力于回鹘文书的译注。但对于新史料的解释,特别是对于年代不明的民族语文书的使用,应当格外谨慎。黄盛璋《敦煌于阆文书与汉文书中关于甘州回鹘史实异同及回鹘进占甘州的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9:1)和《敦煌于阆文几篇使臣奏稿及其相关问题综论》(《敦煌研究》1989:2)二文所引于阆文书,因系根据英国学者贝利很不完善的英译文再译成汉文的,很难凭信;而对于年代的解说也没有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以至于所论有和其1984年文有自相矛盾处。关于于阆文书年代,请参看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

闻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1989)。

对于在西北地区活动的一些小部族,近年也开始了初步的探讨,黄盛璋《论瓌微与仲云》(《新疆社会科学》1988:6)、《敦煌文书中“南山”与仲云》(《西北民族研究》1989:1)、荣新江《通颊考》(《文史》33)、《龙家考》(《中亚学刊》4)等论文的发表,一定会引起关心西北史的学者的兴趣。

以上对大陆近十年有关唐宋之际西北史的研究作了十分简要的评述,限于篇幅,许多论著未能列入,而台港地区和日本、欧美的研究成果更是一概未提。总起来说,这十年的成果是很大的,而且多姿多彩。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上面所举就有许多观点相对立的论著。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对今后的工作有两点期望:一是加强对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二是批判地继承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尽可能地将涉及到该问题的正、反面资料 and 前人论说均加考辨和评说,这是提高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原载《中国文化》第2期,1990年,7—9页。)

## 敦煌文献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赵声良先生让我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笔谈,确实比较难,虽然限于国内,但字数也有限制,难免有所遗漏。但考虑再三,还是把这项任务接了下来,因为近几年来,我一直和赵和平先生合作,编撰《敦煌学词典》的一般类词条,对八十多年来敦煌研究的成果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现仅就敦煌文献的历史研究方面,谈谈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乞同行指正。

回顾中国的敦煌文献研究历程,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进步快慢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敦煌写本的刊布,二是政治运动的干扰。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宝藏,其中富有历史研究价值的资料,主要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携走,收藏在英国博物馆(今在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因此,初期的敦煌文献研究,是一种挖宝式的研究。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王国维等人的研究,如罗振玉编《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敦煌零拾》、《敦煌石室碎金》和所著《雪堂丛刻》、《松翁近稿》、《丙寅稿》、《贞松老人遗稿》、蒋斧编《沙州文录》、王仁俊编《敦煌石室真迹录》、王国维著《观堂集林》等,基本上依赖于伯希和寄赠的照片和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从伦敦抄回的斯坦因写本,所以只能写一些校勘和题跋文字,对一些文献作个案式的考订,不可能作对比和综合性的研究。二、三十年代,先是北京大学的刘复,然后是北京图书馆的王重民和向达,陆续去法国和英国抄录和拍照敦煌写本。刘复的《敦煌掇琐》固然收集了一些有关历史的材料,但总体上说,他和王重民、向达一样,主要关注的是文学资料和中国传统的四部古籍。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代初,向达、夏鼐、阎文儒先生往河西考古,为敦煌地方史的研

究开辟了新篇章,其成果收入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年三联书店)、夏鼐《考古学论文集》(1961年科学出版社)和向达等著《敦煌》(1951年学习书店)。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的敦煌文献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出版了《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初探》、《敦煌变文汇录》、《敦煌曲校录》、《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变文集》、《敦煌古籍叙录》、《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一系列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成果,而历史研究方面不过几篇重要文章而已,如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1)、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12期)等。五十年代末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S.1—6981号缩微胶卷的公布,预示了对包括历史资料在内的敦煌文献进行综合研究的美好前景,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和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收刘铭恕编《斯坦因劫经录》,就是伦敦藏卷公布后所产生的整理结果。在当时的条件下,作出这样的成果固然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前者的校录工作的确不太理想,受到日本学者池田温的批评(《东洋学报》46卷1号)。然而,更为遗憾的是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敦煌研究全面停止,而日本、欧洲和港台地区,却在这十多年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敦煌研究重获新生。与此同时,包含世俗文献最为丰富的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开,在全国主要学术研究中心,人们可以看到英图、法图、北图三大敦煌写本收集品的缩微胶卷。1981年以后陆续出版的《敦煌宝藏》140册,将胶卷变成书本,更加方便了研究者。此外,解放后在吐鲁番墓葬中发现的大批文书,也在这时陆续整理出版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全十册(1981—1990年文物出版社)。资料的大量公布,是促使这十余年来敦煌研究进步的直接原因。归纳起来,可以从史料整理和研究两方面来回顾十余年来敦煌文献的历史研究。

由于大量原始文献的公布,此时进行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成为可能,出

现了一批分类辑校敦煌文献的专集。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1982—199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是辑录历史资料最为全面的一种,该书上图下文,收录地志、氏族志、传记、邈真赞、籍帐、社文书以及各类官私文书、寺院文书等等共三十四类文献,可以说是迄今敦煌研究中收录历史资料最全的一部录文集。但对比其他一些专项录文集,此书难免有收集不全和校录不精处(参看陈国灿书评,载《九州学刊》5卷4期)。在分类校录文献方面,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1989年中华书局)较日本东洋文库出版的同类合集多出一些吐鲁番文书,并有作者的笺释。属于法制方面的,还有王震亚、赵茨《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199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但此书不论校录还是考释都受到学者的批评(郑炳林书评,载《西北史地》1993年4期)。地理文献有郑炳林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90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和王仲荦遗稿《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前者在收集敦煌地理文献及相关材料上颇为全面,但两书的文字校录工作尚不完善。郑炳林的另一本录文集《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是集敦煌写本功德碑、墓志铭、邈真赞类文献之大成,而且在详细的注释中,用本证的方式辑录考释了许多相关的敦煌文书,极便学人。单就邈真赞来讲,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年新文丰出版公司)中的录文则更为准确。此外,赵和平的《敦煌写本书仪研究》(1993年新文丰出版公司)收录了前人措意不多的敦煌书仪文献的校本。

在研究方面,几乎每个课题都有学者在从事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数散见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5辑、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及《二编》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兰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敦煌学研究室编《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现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及《续集》、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中华书局编《文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国史研究》、文物出版社编《文物》等书刊。近年出版的一些著名敦煌研究者的纪念文集,如《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989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1991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1983年以来的历次敦煌学研讨会的论文集中,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问世,在南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租佃关系、寺院经济、法制史、氏族、兵制、归义军史、唐五代西北民族、丝绸之路等方面有突出的成绩。有些已经结集出版,如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987年中华书局)、宋家钰《唐代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1988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1991年联经出版公司)、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杨际平《均田制新探》(1991年厦门大学出版社)、武建国《均田制研究》(199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1992年新文丰出版公司)、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994年文物出版社)等;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1996年新文丰出版公司)、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近期也将出版。在上举专著中,有三本是关于均田制的,这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这一长期以来讨论的课题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同时也表明均田制的研究已经到了总结的阶段。

总结以往的成果和不足,是为了展望未来,更加完善敦煌文献的研究。

一个可喜的事情是近年来出版界对敦煌文献的出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四川人民出版社自1990年开始出版15卷本《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图集,现已出版8册。此书图版清晰,而且只收非佛教文献,于历史研究最具参考价值,但造价过昂,而且未按原计划及时出版,所以似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在未出版的12—14册中,包含有未公开的S.6981以下文书的图版,学术价值较高,但目前人们只能从拙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1994年新文丰出版公司)中得知这些文书的基本内容。上海古籍出版社则获得出版俄藏、法藏以及国内一些小藏品图录

的权力,目前已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1—5册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先从未全部公布过的俄藏敦煌文献,尽管已出的五册中主要是佛典,但他们按编号影印,大量的世俗文献可以拭目以待。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虽然以佛典为主,但也不乏重要的官私文书,特别是陈垣编《敦煌劫余录》以外未公布的部分。江苏古籍出版社将担负起这部分的出版任务,据说先印佛典,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始,尚不知何时能出版到非佛教部分。

在原卷图版公布的同时,分类校录文书的工作仍在继续。宁可、郝春文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辑校》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李正宇《古本敦煌志八种笺证》将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这些专集的出版,必将有助于这些类别的文书及其反映的问题的系统研究。

系统、综合的研究将是以后一段时间里的主要工作之一,这是建立在大量文献公开发表的基础上的。像涉及文书不多的户籍、法制等问题应当不会有太大的惊人发现,而大量的吐蕃、归义军时期的官私文书尚有不少方面有待整理研究,特别是吐蕃统治时期汉藏文献的对比综合研究,还应投入大量的工作。过去的敦煌研究,颇多受材料的限制,讨论的问题比较狭窄。今后的研究,从横的角度讲,似应对比传世文献和碑志材料,在丰富已有的制度史、政治史、民族史等方面的研究外,加强社会生活史、妇女史、佛教教团、思想文化方面的研讨;从纵的角度讲,应当贯通汉晋简牍、明清档案,全面清理敦煌乃至整个西北历史上的问题,上下打通,为写出敦煌通史、敦煌佛教史等有较大份量的著作而努力。

(原载《敦煌研究》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特刊,1995年,50—52页。)

## 《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编写刍议

敦煌藏经洞宝藏发现后,大宗写本先后入藏于英国博物馆(今归英国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等处,其他较少量的写本则流散在中国、日本、丹麦、印度、美国、联邦德国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在中国,流散的敦煌写本主要保存在五个地区:A. 京津地区;B. 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这两个地区是文化机构、学人集中的地方,所以集中了不少写本;C. 西北地区,河西走廊及兰州、西安等地,因近水楼台,所以也有不少收藏;D. 东北地区,因为大谷收集品存放旅顺和追随溥仪的一些文化人在伪满时期来到东北,使辽宁、黑龙江等地也有较可观的收藏;E. 港台地区,主要是随国民党政政府迁台的“中央图书馆”藏品,其他私人手中为数不多。下面将目前所知的一些收藏单位和有关该处藏品主要的编目、图录、介绍、研究论著陈列如下,除写本外,藏经洞发现的印本和绢纸绘画也包括在内:

### A. 京津地区

#### 1. 北京图书馆

陈垣《敦煌劫余录》六册,1931年

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上下辑,1937年

####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张玉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5(待刊)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338—339 页

3. 故宫博物院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1979 年

《中国古代书画目录》2,1985 年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 隋唐五代绘画,1984 年,图版 73

杨新《唐人书黄巢起义记事墨记》，《文物》1978 年第 5 期

4. 中国历史博物馆

潘吉星上引书,177 页

唐耕耦、陆宏基上引书,479—485 页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图版 78—79

石志廉《五代吴勿昌供养八臂九面观音像立幅》，《文物》1984 年第 7 期

5. 首都博物馆

《中国古代书画目录》1,1984 年

6. 北京市文物商店

同上

7. 荣宝斋

同上

8. 北京大学图书馆系

杨宝玉《下女夫词残卷校录》，《图书情报研究》1986 年第 4 期

9. 北京师范学院

10.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刘国展、李桂英《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敦煌卷子及社会文书目录》，  
《敦煌研究》1987 年第 2 期

B. 东南地区

1. 上海图书馆

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研究》1986 年

第2期

2. 上海博物馆

《敦煌吐鲁番文物》，1987年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1985年

《中国古代书画目录》3

《中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1984年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987年

3. 南京博物院

4. 安徽省博物馆

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兰亭论辨》，1973年

C. 西北地区

1. 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文物资料丛刊》1，1977年

《中国敦煌展》，1985年

徐祖蕃等《敦煌遗书书法选》，1985年

2. 敦煌县博物馆

荣恩奇《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3，1986年

《中国敦煌展》

徐祖蕃等上引书

3. 甘肃省博物馆

秦明智《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1987年

徐祖蕃等上引书

秦明智《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画》，《文物》1982年第12期

4. 甘肃省图书馆

5. 西北师院历史系

曹怀玉《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经卷录》，《西北师院学报》1983  
年第4期

6. 武威地区博物馆

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

7. 张掖县文化馆

同上

8. 酒泉博物馆

同上

9. 陕西省博物馆

梅村坦《敦煌探险研究史》，《讲座敦煌》第1卷，1980年，157页

10. 西北大学图书馆

同上

D. 东北地区

1. 辽宁省博物馆

《书法丛刊》第六辑，1983年

2. 辽宁省图书馆

3. 旅顺博物馆

4. 黑龙江省图书馆

E. 港台地区

1. “中央图书馆”

潘重规《“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敦煌学》2，1975年  
《“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六册，1976年

2. 台北“故宫博物院”

3.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敦煌吐鲁番文物》No. 27

4. 香港中文大学冯平山博物馆

同上 No. 25

5. 香港艺术馆

同上 No. 7

除上举者外,肯定还有不少单位藏有敦煌写本,而且私人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

从上面列举的一些主要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中国收藏的敦煌文献正以各种形式陆续公之于世,为学术界特别是敦煌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同时也表明,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首先的问题是,这些珍贵文献还没有通过目录全部展现在人们面前。目前,A1、A2、A10、B1、C1、C2、C3、C5、E1等处都编有比较简明的目录,从敦煌学研究来看,有些目录还有以下几点不足:

1. 体例不一:因为是各自独立地编出的目录,体例不一是难以避免的,著录的分类项目、次序、方法、用词等不统一,不利于写本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2. 收录不全:如北图自1931年以来又入藏了1500余件,但《敦煌劫余录续编》只收录了1065件;又如A10收藏有300余件,《目录》只收录了197件,使人难窥全貌,有碍于对敦煌文献的综合研究。

3. 缺少考证:近年所编敦煌目录所著录的写本,大都是各处陆续收集起来的,有些并不是新的写本而是某处或某人的旧藏,如法国学者戴仁(Jean-Pierre Drège)指出,《劫余录续编》No. 1—347实际是日本橘瑞超所得文书的一部分,其目录早经罗振玉刊布在《雪堂丛刻》(1914年)中。对比《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收《旅顺博物馆所存敦煌之佛教经典》,这批写本应是从旅顺转藏北图的,编《续编》时似未注意及此,所以未能利用上述两目的某些成果,也容易使人把一件文书认作两件。对于私人旧藏而未说明者

更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定名、缀合等失考处,如《中国敦煌展》图录说明中对 C1、C2 两处藏《法华经》残卷的成功缀合,应在目录中表示出来。

4. 辨伪不精:流散写本中混入一些后人伪造写本或补写的伪题,在目录中应尽量辨明,如北图《续编》No. 0743 中玄奘云云,疑伪。另外,唐五代时期敦煌之外的中国、日本古写经应予剔除,如同上 No. 0772《宝行王正论》系日本天平十二年(740)写经,非敦煌写本。

以上两条系日本福井文雅先生指出,见所著《般若心经之历史的研究》(1987年)。

因此,对于近年编的目录也有补订的必要,而没有编目整理的写本,更需要尽早整理编目。由于敦煌写本的复杂性和分散收藏的特点,我们建议集合收藏单位图书、文物专家和敦煌学研究者的集体智慧和力量,相互协作,立刻着手编纂《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其具体作法是:

1. 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协调,选拔几位对写本编目有一定经验的学者,与北图、敦煌研究院等收藏单位的业务骨干一起,组成编目联络小组。

2. 报请有关领导批准,由联络小组与各地收藏单位联系,确定具体编目人员,共同组成编委会,同时进行普查。

3. 由联络小组拟定详细的编目体例,下发给各编目人员,先分别按单位收藏编号统予编目,难题与联络小组或其他专家共同解决。先编汉文写本,其他只登录语种,不列内容。

4. 汇总各处分别编成的目录,由联络小组统一分类编排,并编制各种索引和对照表类。

5. 由编委会全体具名出版,经费向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或其他国内外基金会申请。

6. 全部计划希望在 1991—1992 年完成,其间考虑将先编出的单位目录单独发表。

《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的编纂,是一个大的古籍整理、敦煌学研究项目,有着重要的意义。系统的编目整理,可以确定每件写本的价值,

有利于它们的保存和利用,并为将来进一步拍摄缩微胶片或照片,全部公开影印出版作准备。只有把所有藏品复制公开发行,才能使这些国宝存于天壤。民主德国鉴于二次大战时吐鲁番文献的损失,在每一册《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后,都将所整理的文献照片刊布,用意正在于此。另一方面,《联合目录》的编成,对敦煌学研究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将改写许多前人所做的统计数字,并为个别或综合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把敦煌学研究推进一步。

笔者1985年在欧洲访查敦煌写本,购置国外敦煌写本编目论著是主要目的之一。回国后,在继续搜求国外编目的同时,也颇留心国内编目工作和各地所藏写本信息,越来越感到编制联合目录的重要性。今借海内外敦煌学者会聚一堂之机,略陈管见,请各位专家指正。

(原为提交1988年8月北京召开的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后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8年第2期,55—58页。)

## 档案与敦煌学研究

敦煌遗书作为中古时期的档案,已经得到充分的研究。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中国国家档案馆和一些地方档案馆所藏资料,对于敦煌学研究的价值。吐鲁番出土文书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此也一并讨论。

### 一、档案有助于弄清敦煌遗书在中国的流散情形

敦煌遗书是1900年由看管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发现的,在1907年斯坦因(Aurel Stein)来到以前,就有少量精美的写卷或绘画流散出来。斯坦因和随之而来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将藏经洞中的精品捆载而去,清朝官府收拾残余,运到北京。但当事者不尽心力,余下了不少残卷,为后来的日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人奥登堡以及当地官僚百姓所得,而运京者复经人截取,所余有价值的写本多入私家。在中国,除了北京图书馆所藏甘肃解京者外,尚有相当数量的敦煌遗书收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这些遗书大都经过由私入公的长期流转过程,其中也陆续混入不少赝品。

在研究一些散藏写本之前,应当首先弄明白敦煌写本的流散情况,否则,一些来路不明的赝品,可能会干扰正常的学术研究。但是,要弄清楚敦煌写本的流散情况,非利用档案资料不可。1943年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西北专号上,曾发表过几件当时收藏在敦煌县政府的档案,对于我们了解宣统二年至民国元年(1910—1912)敦煌写本运出敦煌的情况有很大的帮助。但据说运送写本的马车在路上曾被盗窃,详情不得而知,我们今天能否在甘肃省

档案馆以及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的档案馆里找到有关的一些记载呢？至少我认为甘肃省档案馆藏的甘肃布政使档案中或许会有一些材料〔1〕。

敦煌写本进京后，被李盛铎、刘廷琛、何震彝等人截取归己，当时学部侍郎宝瑞臣拟上章参奏，并把甘肃押解人傅某扣住，只是因为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顾不暇，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清朝学部档案，其中应有关于敦煌写本调京及流散情况的记载，很值得去搜寻一番。

## 二、档案有助于研究外国探险家在中国的考古调查成果

清末民初，欧美和日本的许多探险家来新疆、甘肃等地考察，其中不少人以获取古物为目的。有些探险家，如斯坦因、伯希和等，留下了比较清楚的他们如何得到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录，但有些情况还不甚明了。这些探险家都多少不等地与当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有所联系，所以在各级档案中应当有他们在中国活动的记录，这是了解他们获取敦煌吐鲁番遗书情况的另一个信息源。

例如，斯坦因 1930—1931 年来华做第四次探险，因中国学术界的反对，仅仅考察了和田策勒、尼雅等地后即离去。斯坦因本人对前三次探险都留下了详细的考古报告，而此次探险却未留下系统的记述。斯坦因此行惊动了中国的许多方面，应当在不同地方保存有相关的档案。新疆大学冯锡时教授在考证法显西行路线时，曾引用新疆档案馆所藏有关斯坦因第四次探险的档案材料〔2〕，但这批珍贵的档案尚未系统地整理出来。

另外，新疆档案馆藏吐鲁番档案也包含有外国探险家在吐鲁番盆地的档案记录〔3〕，亟待有人去加以整理。

〔1〕 《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介绍》，《历史档案》1986 年第 4 期。

〔2〕 20 世纪的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1992 年 10 月，乌鲁木齐。

〔3〕 《吐鲁番档案介绍》，《历史档案》1990 年第 2 期。



### 三、一些档案馆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 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

一般来讲，档案馆主要是收藏明清以来的档案，但由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收藏者，则原属于他的文书原件，有时也随他本人的档案，留在了档案馆里，而不是我们经常以为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中。1982年第2期《历史档案》杂志上，就刊布了辽宁省档案馆藏原属罗振玉的六件“唐代档案”。我在《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一文中指出，这六件文书中，五件是唐朝西州（吐鲁番）蒲昌府的文书，和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收藏的156件蒲昌府文书是同一组文书，所记均为开元二年（714）事。另一件是吐鲁番出土的西州诸寺法师名簿〔1〕。

上述斯坦因第四次探险所获的古物都留在了当地，一些欧美学者曾根据他带回去的古物照片做过研究〔2〕。但这些收集品的原物目前还不知所在，它们是否会与有关的一些档案一起秘藏在某个档案馆中呢？很值得一寻。因为一旦发现，则不用动土，即可获得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

以上只是我在读书时的几点感想，借此机会与档案学界的朋友们交流。我相信档案学者的工作成绩将会极大地推动敦煌学的研究。敦煌学研究者应当与档案学者合作，进一步发掘史料，共同把敦煌学研究引向深入。我本人也愿为此贡献微薄之力。

（原为在1994年8月2—5日敦煌档案遗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后刊登在《档案》1996年第5期，12—13页。）

〔1〕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

〔2〕 例如 T. Burrow, “Further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Niya”, *BSOAS*, IX, 1937, PP. 111-123.

## 敦煌学与唐研究

“敦煌学”研究与唐史研究密切相关,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或研究者本身的客观条件的限制等等原因,一些“敦煌学”和唐史研究者,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有某种分流的倾向。首都师范大学的郝春文教授,在1996年11月北京中青年唐史学者联谊会上,就《关于唐史研究者与敦煌文献研究者分流的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希望两方面的研究者共同努力,互相靠拢,扭转这种分流现象<sup>〔1〕</sup>。

在我看来,这种分流的倾向多半是由于“敦煌学”者所处理的材料与唐史学者不完全相同所造成的,分流或许是两方面的研究正在深化的一种表征,当然也有互相轻视对方的因素在内。

我是随王永兴和张广达两位先生学习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而步入学界的,毕业后的十年,更多地“在敦煌学”的圈子里转。199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唐史学会上,我以《敦煌文化与唐文化》一题发表了看法,力图从唐文化的角度审视敦煌文化的价值和局限。但这个问题一时不易讲清,所以拙稿仍在征求意见阶段,而未敢贸然发表。这里我想从“敦煌学”的角度,来谈谈其与唐史研究的关联与不同。

### 1. 何谓“敦煌学”?

八十年代以来,“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事实也是如

---

〔1〕 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7年第1期。

此,1983年在兰州,1984年在巴黎,1985年在乌鲁木齐,1986年在台北,1987年在香港和敦煌,1988年在北京和京都,1990年在威尼斯、台北和敦煌,1992年在北京,1993年在香港和敦煌,1994年在敦煌和柏林,1995年在嘉义,1996年在成都和兰州,1997年在伦敦、布达佩斯和杭州,几乎每一年都有综合的或专题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召开。除了创办《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等专业杂志和丛刊外,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据我和赵和平先生在编辑《敦煌学大辞典》时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1994年,海内外出版的“敦煌学”研究专著共有近四百种之多。

“敦煌学”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

然而,到底什么是“敦煌学”?它的内涵应包括哪些内容?学者间的看法并不一致。

1931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由于陈寅恪先生的名望和《敦煌劫余录》的广泛流传,“敦煌学”一名,逐渐被学术界接受。从陈寅恪先生的上下文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

以后随着敦煌当地考古工作的进步,特别是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敦煌汉简和吐鲁番文书、西域文书的大量出土,以及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敦煌学”的范围应当扩大。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以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sup>[1]</sup>这里的表述虽然不十分科学,但姜亮夫先生强调应当把“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

[1]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1983年。

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实已为“敦煌学”界广泛接受。

学贯东西而又对敦煌文献做过深入研究的周一良先生,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1984年中华书局版)后来,在《何谓“敦煌学”》中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用固有名词构成的某某学又给人不太愉快的联想,不妨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1〕

我基本同意周先生的看法,“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但“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问题是我们切不可把自己完全封闭在的“敦煌学”范围里,反而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因此,周先生的看法是极有见地的。我们要用开放的眼光来研究敦煌资料,这样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的知识;反之,如果把自己封闭在“敦煌学”里,就敦煌而说敦煌,则“敦煌学”的路子会越走越窄。随着敦煌文献资料刊布的增多,后一种倾向已经反映在一些论著中,因此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周一良先生的看法。

## 2. “敦煌学”资料对唐研究的价值

其实几乎每一位研究敦煌历史资料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研究唐五代史,有些所谓“敦煌学”研究本身,就同时是属于唐研究的范围,如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租佃关系、寺院经济、法制文书、氏族、兵制、归义军史、唐五代西北民族、丝绸之路等等。但“敦煌学”中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研究历史资料以外的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等方面的资料,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被纳入唐史研究的范围,但实际大多数仍是属于对历史时期唐朝

〔1〕《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

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属于唐研究的范围。

“敦煌学”研究受资料的限制较唐研究者为甚。在大陆地区,虽然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就获得了英藏敦煌 S. 6980 号以前号码的所有胶卷,但看到的人不多,而且很快就发生“文革”,研究工作全面停止。七十年代末,法藏伯希和汉藏文写本公布,加之已公布的北京图书馆藏卷,而且新文丰出版公司将以上三处藏卷影印为《敦煌宝藏》,更便阅览,推动了各国的“敦煌学”研究。但不论是《宝藏》还是胶卷,清晰程度均欠佳(特别是法藏),而且各地所公布的资料都不是收藏品的全部。

九十年代以来,大陆一些出版社对敦煌写本的影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系列大型图录陆续出版或正在筹划出版。如《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7),计划 15 卷,已出 14 卷,第 15 卷为目录索引。《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计划 20 卷左右,已出 7 卷。《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4 卷已出,1994—),不清楚的图版补拍,汉文外,也拟印藏文及其他西域文字写本。王尧、陈践编法藏藏文写卷目录也在民族出版社待刊。《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 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 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北大的藏品原为向达选购,有非佛教文书和胡语资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刊 1 卷。周叔弢旧藏卷,精品较多。《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江苏古籍出版社摄制中,含《劫余录》8000 余号,《劫余录续编》1192 号,残片 3000 余号,新字号 1600 号,后两组最重要。《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12 卷,东京柳原书店,1994—,罗振玉旧藏,黄文弼所获。《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拟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4 卷本,文物出版社,1992—1997 年。《新出吐鲁番文书及研究》,吐鲁番文物中心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收 1979—1986 年十座墓葬文书。又 1980—1981 年柏孜克里克出土文书,编辑中。

这些资料已经而且必将把“敦煌学”引向深入,也为大多数唐史研究者

取用敦煌文献资料提供了方便。“敦煌学”研究者应留意敦煌文书的局限性,而唐史研究者应充分利用敦煌资料,特别是经“敦煌学”者整理校录的文书资料,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在收集史料时,应该充分注意敦煌史料。

### 3. 辨伪问题和研究课题的展望

如上所举,俄藏等重要的敦煌文献的公布,为“敦煌学”和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对于陆续公布的其他一些小收集品,应留意把赝品排除在外,这需要“敦煌学”者的进一步努力。我们不能把真品误作伪物,更不能以假当真。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使得我们可以把一些个案研究深入下去,也使今后所做的分类合集工作更为完善。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某些可贵之处尚未得到充分发掘,从唐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里仅举四个方面。

- 一、唐朝的宗教史:佛教,道教,祆教,摩尼教,景教。
- 二、吐蕃帝国及其对敦煌的统治。
- 三、唐朝的下层社会和文化。
- 四、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

从方法来讲,(1)敦煌吐鲁番文书有限度,故要与其他史料结合起来,如石刻史料(同样以佛寺和墓葬为主);(2)与其他学科相沟通。

(原为提交杭州大学举办的1997年国际敦煌学研讨会论文)

## “21 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1 年 11 月 2—7 日,“21 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台湾嘉义中正大学、台中逢甲大学、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举行,这次会议由中正大学中文系联合中正大学历史系、逢甲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中国唐代学会和汉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来自台湾、大陆、香港、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的 50 位学者在会上发表了论文,可以说,这是新世纪第一场敦煌学会议,也是集中展示新世纪敦煌学风貌的一场盛会。笔者追随其他 20 位大陆学者之后,参加本次会议,得以聆听海内外诸位先生高论,感受到敦煌学的雄浑气势,愿意把会议有关情况和本人的一点感受写出,与大陆同道分享。

本次会议除了开拓 21 世纪敦煌学的新天地之外,正如会议的副标题所说,“庆祝潘重规教授九五嵩寿暨从事敦煌学研究一甲子”,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会议手册中收录了潘重规教授的学术传人、本次会议的主持者郑阿财教授的文章《潘重规先生敦煌学研究的成就与贡献》,并附有郑阿财与朱凤玉两位整理的《潘重规先生敦煌学论著目录》。中正大学的会场外,陈列着潘先生的敦煌学研究论著,集中展现了这位对敦煌学许多方面都作出自己贡献的老学者的厚重业绩。安排在会议第一场发表的柴剑虹《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谈潘重规先生在新亚演讲的体会》与荣新江《入海遗编照眼明——潘重规〈“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题记〉读后》两篇文章,都表彰了潘重规先生对这两处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潘重规先生自七十年代以来在台湾“中

国文化大学”等高校讲授敦煌学课题,培养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弟子,这些弟子有的又培养出敦煌学的一代新人,他们在敦煌学的许多领域都作出贡献,而尤其在敦煌语言文学方面成绩显著,他们的成果在本次会议上也得以充分体现。

以下按论文发表顺序,提示作者(括注研究单位)、论题,兼或提示主要内容及笔者感受。

第1场:柴剑虹(中华书局)《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谈潘重规先生在新亚演讲的体会》,提示随着俄藏敦煌文献的全部发表,使用俄藏文献做研究工作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如其中混入的非敦煌文献、写本缀合等。石塚晴通(北海道大学)《敦煌文献中混入的日本抄本及伪抄本》,指出中日所藏敦煌写本小收集品中混有日本古写经和今人伪造的写本。荣新江(北京大学)《入海遗编照眼明——潘重规〈“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题记〉读后》,据1996年的调查,提示“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的价值。郑阿财(中正大学)《〈父母恩重经〉传布的历史考察——以敦煌写本为中心》,首先介绍关于本经的经录、写本、石刻以及图像、变文、歌赞,然后分析其历史流布问题。

第2场:陈国灿(武汉大学)《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介绍了原本属于唐敦煌县、豆卢军、归义军军衙的文书和来自敦煌的佛经和文学作品,提出一个观察敦煌文书的新视角。彭金章(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新发现的文献及其学术价值》,概要介绍各种文字的文献目前研究的结果。许建平(浙江大学)《BD14681〈尚书〉残卷考辨》,据照片仔细校订了这件未刊《尚书》写卷的文字,并判定其抄写时间。蔡忠霖(醒吾技术学院)《官定正字之外的通行文字——从敦煌汉文写卷看俗字应有的定位》,确定俗字的定义,考察其流行情况,并给俗字以应有的定位。

第3场:衣川贤次(花园大学)《唐玄宗御注〈金刚经〉的复原与研究》,介绍房山石经和敦煌吐鲁番写本,并作出复原式的校录,探讨产生的背景、



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李诚(四川师范大学)《〈十吉祥讲经文〉研究》,通过分析,指出这是一件浸透着浓郁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通俗宣教作品。伏俊连(西北师范大学)《上古时期的看图讲诵与变文的起源》,以为类似于变文的看图讲故事的文艺形式在中国上古时期就已存在。但所举图像材料似与变相不同。陈庆浩(法国科研中心)与朱凤玉(嘉义大学)《王梵志诗研究之述评与总结》,在分析王梵志诗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整理一个简单校注本的方法。

第4场:柳存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老子化胡经〉卷八的成立时代》,通过与一些佛典和道经的对比,清理《化胡经》的年代问题。吴其昱(法国科研中心)《敦煌北窟叙利亚文课经(Lechonyary)诗篇残叶管窥》,重新转写翻译莫高窟北区出土《圣经·诗篇》叙利亚文课经写本。王小盾(上海师范大学)《结合越南文献研究敦煌文学的前景》,根据本人对越南文献的考察,介绍与敦煌文献相关的资料,提出两者结合研究俗文学的观点。秦思源(Colin Chinnery,英国图书馆)《英国图书馆 IDP 敦煌文献整理工作之展望》,介绍 IDP Database 的最新进展和今后计划。

第5场:朱雷(武汉大学)《敦煌藏经洞发现之民间讲唱文艺作品的历史考察》,以史证文,文史互证,揭示了敦煌讲唱文艺作品中的一些历史内涵。高田时雄(京都大学)《吐蕃期敦煌有关受戒的资料》,对可能是受戒记录的古藏文文书作了考辨。黄正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在整理有关择日和“合婚”文书的基础上,讨论占卜在唐人婚嫁中的作用。刘进宝(西北师范大学)《从 P. 4525(8)〈官布籍〉谈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免征》,是作者一系列相关研究的继续。

第6场:毛汉光(佛光大学)《敦煌吐鲁番居民生存权之个案研究》,从生产形态、分配田亩数、亩生产量、食量、生活线与生存线等,来看居民的生活状况、负担以及生存权问题。这是对敦煌学研究的新开拓,颇有创获。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唐后期五代宋初中印文化对敦煌寺院的影响》,从佛教文献、仪式、节日三方面来讨论两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郑炳林(兰州大

学)《晚唐五代敦煌诸寺藏经与管理》,分别考订净土、龙兴、灵图、三界、报恩等十四寺的藏经及其管理。林冠群(中正大学)《〈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与唐代吐蕃史研究》,分析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价值和意义,并讨论了前人误译的词汇。

第7场:京户慈光(浅草寺)《关于〈净名经集解关中疏〉群》,提出应当按佛典在敦煌当地的用途来进行分类。刘楚华(香港浸会大学)《读敦煌〈观音经〉注——P. 3904》,分析其分科的特色和解释的依据。汪娟(铭传大学)《敦煌写本〈降生礼〉初探》,先作录文,再分析其仪式,并讨论使用场合和用语等。蔡荣婷(中正大学)《敦煌本〈佛说妙好宝车经〉研究》,从经录和写本两方面考察,并作校释,还进而讨论其内容和文学表现手法。

第8场:砂冈和子(早稻田大学)《日本平安古记录文中的“件”——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奏请文比较》,考查了日本古文书、敦煌文书和圆仁行记中这个量词的用法。竺家宁(中正大学)《敦煌卷子 P. 3006 词汇研究》,解释该卷佛经中的八个词汇,即经印、道地、多度、含受、明宣、安习、随顺、严好。玄幸子(新泻大学)《校订敦煌变文资料上的一个建议——“个”的问题》,强调不应把俗字改成正字,即使是一见就明白的字也不应改。洪艺芳(澎湖技术学院)《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通用量词探析》,主要探讨枚、具、个的意思和演化。

第9场:项楚(四川大学)《读变随札》,考释变文中“金枪之难”、“吼石”、“旁箕”的语义。罗宗涛(玄奘大学)《敦煌变文中晋骂赌咒之探讨》,区分称呼、作为、惩罚三类骂人语,加以说明。这是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金荣华(逢甲大学)《读敦煌变文杂记》,涉及《李陵变文》、《太子成道经》、《破魔变文》、《丑女缘起》。刘长东(四川大学)《孔子项诩相问事考论——以敦煌本〈孔子项诩相问书〉为中心》,考证项诩神格化的过程及《孔子项诩相问书》的民间性和文化内涵。

第10场:王国良(东吴大学)《〈刘萨诃和尚因缘记〉探究》,重新校释了本文,并讨论相关问题。王三庆(成功大学)《敦煌文献中斋愿文的内容分

析研究》，分析唐代全国各地斋会的类别，从而确定敦煌斋愿文献的意义和地位。黄征（南京师范大学）《敦煌愿文考订》，系对所著《敦煌愿文集》的校订。张勇（四川大学）《唐五代禅宗修习的典籍——以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为考察范围》，讨论《坛经》引用佛典和写本后面的文字。衣川贤次指出后面的文字可能是受戒记录，而非作者所说的藏经简目。谢海平（逢甲大学）《由〈舜子变〉看唐人推行孝道教育的政治措施》，讨论《舜子变》的孝道观和唐朝的各项措施。

第 11 场：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敦煌文献中之〈往五台山巡礼记〉——兼谈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及日记的起源》，重新校注 S. 529《诸山圣迹志》和 P. 3931《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启文》。萧登福（台中技术学院）《藏经及敦煌写卷所见受道教辟谷食气思想影响的佛典》，指《佛说停厨经》、《观音菩萨最胜妙香丸经》中的辟谷法和《佛说三厨经》、《佛说三厨法》中的食气法源自道教。杨秀清（敦煌研究院）《唐宋敦煌地区的世俗佛教信仰——以知识与思想为中心》，重新检讨敦煌民众的世俗佛教信仰，分析信仰者获得知识的途径和内容。罗彤华（政治大学）《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利用寺院帐目，研究使客的类型、支出及其意义，指出敦煌寺院的人间性和世俗性。文章内容扎实，从繁琐的帐目中得出较为深刻的认识。

第 12 场：林平和（铭传大学）《试论敦煌文献之辑佚价值》，概述敦煌写本中的佚书和佚诗文。王克芬（中国艺术研究院）《敦煌舞蹈壁画研究》，考查了敦煌壁画中舞蹈形象的来源问题。陈应时（上海音乐学院）《论敦煌乐谱的节奏解释》，对比其他构拟方案，提出自己的解译结果。林聪明（逢甲大学）《谈吐鲁番蓝书写本》，统计了蓝书的形态、年代，并与墨书和朱书写本作比较。

听了三天的会议论文和讨论，我感到作为新世纪的第一场敦煌学会议，确实为今后敦煌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课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1. 随着俄藏敦煌文献和中国一些小收集品的出版，不仅要辨别藏经洞

文献和混入的新疆、黑城等地文书,也要辨别真伪写本。2. 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扩大,特别是要把和敦煌一样同处于唐朝文化周边的吐鲁番、于阗、日本、越南的材料都作为参考,进行对比研究,过去我们比较注重吐鲁番的材料,今后应当重点放在日本传存的资料上。3.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希望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本次会议的一些力作,提倡跨学科研究,如朱雷用文史互证的方法,阐明了敦煌讲唱文艺作品中的史事;郑阿财收集各种形式的佛典,给以历史的解说;王三庆则从佛教斋会的历史存在形式,来看敦煌斋愿文的功能。可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11月5—7日,会议代表从台中到台北,参观了东吴大学、“故宫”、“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文哲所,还看到一些敦煌卷子,其中尤其以傅斯年图书馆藏卷最珍贵,因为这批敦煌卷子品质较佳,而且长期不为学界所知,只是在不久以前才有郑阿财教授的目录发表。

与会者在汉学研究中心举行座谈,由中心主任庄芳荣和大陆敦煌学会秘书长柴剑虹两位先生主持,依次发言的有:荣新江谈敦煌写本真伪问题,强调要熟悉清末民初历史,要建立写本流传档案,要注重写本内容。郝春文谈敦煌历史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强调按号校录文书的重要性,需要加强对社会史、图像学和民族语言的研究。项楚谈敦煌文学研究,认为扩展的余地宗教文学、仪式文学作品和理论探讨,强调加强语言学的根基,开展跨学科研究。王三庆谈敦煌文献缀合,呼吁汉学研究中心支持建立敦煌数据库乃至网络数据图书馆,成为敦煌学的信息交换中心。陈国灿谈吐鲁番文书的研究现状和吐鲁番文书总目的编纂工作。高田时雄谈日本敦煌学研究,认为并不乐观,他介绍了日本藏敦煌卷子的情况,并谈到京都大学所藏李盛铎旧藏文书照片的出版问题。他呼吁成立国际敦煌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以安排电子文本、图像的录入工作,协调召开会议和研究课题。衣川贤次提示日本的读书班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值得中国学者借鉴。郑阿财谈台湾的敦煌学研究,建议出版《台湾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王小盾呼吁突破“敦煌学”的藩篱,站在整个学术史、文学史高度来研究敦煌文献。黄

## “21 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

正建提议总结敦煌学的教学经验,指出敦煌学的发展需要批评,应当提倡批评学风。

这场座谈会的学术水准较高,给“21 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1 年 12 月 19 日完稿,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3 期,17—20 页。)

## 《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评介

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 *The Corpus of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 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全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 简称《俄藏敦煌文献》( 以下简称《俄藏》), 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 孟列夫、钱伯城任主编, 丘古耶夫斯基、李伟国任副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专家分担各册的编辑工作。这是一部总计约有二十余册的大书, 按俄藏敦煌文献的编号顺序刊布全部图版, 现已出版五册, 即第1册收Ф.001—Ф.042号, 第2册收Ф.043—Ф.085号, 第3册收Ф.086—Ф.149号, 第4册收Ф.150—Ф.250号, 第5册收Ф.251—Ф.366号。至此, 全部Ф.编号的材料已经刊布完毕, 我们先就这五册内容略加评述。

1914—1915年被奥登堡从敦煌带走的俄藏敦煌文献, 是很晚才为学界所了解的。但是, 直到本书出版以前, 人们只是通过孟列夫主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1—2册<sup>[1]</sup>, 得知总数约一万八千号写本中不到三千号的内容。而写本原貌, 也只有孟列夫发表的一些俗文学作品和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 莫斯科, 1983年) 中公布的一些世俗文书。《俄藏》首次全部刊布俄藏敦煌文献, 无疑将全面地推动敦煌学的研究。因此, 本书的出版深受敦煌学研究者的欢迎。编者在第1册的前面, 用46幅精美的彩色图版, 展示了俄藏文献的重要内容, 包括

---

[1] 莫斯科, 1963, 1967年, 以下简称《注记目录》。

Φ. 编号之外的古籍和世俗文书,如《老子》(Дх. 01111)、《庄子》(Дх. 00178)、《论语》(Дх. 02144)、《诗经字音》(Дх. 13660)、《医方》(Дх. 10298)、《社条》(Дх. 11038)、《某寺入历》(Дх. 01433)等等,每一件没有完全展现的写本都让人企盼《俄藏》的以下分册早日出版。

单就前五册来讲,这是弗路格检出的最完整的一批文献,主体是佛典,其中有一些富有研究旨趣的写本,如昙旷的《金刚般若经旨赞》卷下(Φ. 334v)和《大乘起信论略述》(Φ. 366)两种,字数较多,为上山大峻《敦煌佛教之研究》(京都,1990年)昙旷一章所不得利用的新资料。上山先生同书研究法成一章所列法成弟子听讲《瑜伽师地论》的笔记,也可以加上Φ. 330号一种。古佚禅籍《历代法宝记》(Φ. 261)写本,柳田圣山先生做《初期的禅史》第二册《历代法宝记》汇校本时,当然无从取材。《讲座敦煌》第8卷《敦煌佛典与禅》<sup>〔1〕</sup>也未提及。此本始于柳田校本第54页第5行“无名”,止于第77页第1行“北齐朝第二祖”,可以用为新的校本。此外,《景德传灯录》(Φ. 229v + Φ. 241v)、《一切经音义》(Φ. 230)以及一些疑伪经和藏经目录等,也是佛教文献和敦煌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非佛教文献方面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文选》(Φ. 242),虽然早就有狩野直喜《唐钞本文选残篇跋》<sup>〔2〕</sup>、G. Schmidt《从唐抄本看〈文选〉最早的写本形态》<sup>〔3〕</sup>的先行研究,但原卷如此清楚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自然有助于此卷被更为广泛地使用。1994年8月敦煌举行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李伟国先生提交了《俄藏Φ. 242〈文选〉注本写卷初探》(提要),我们希望其全文早日发表。法忍抄本《王梵志诗》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是敦煌文学研究者更为关心的一个写卷。由于前苏联出版速度的迟缓,孟列夫教授有关此卷的研究一直放在

〔1〕 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

〔2〕 《支那学》第5卷第1期,1929年。

〔3〕 G. Schmidt, “Aufschlüsse über das *Wenxuan* in seiner frühesten Fassung durch ein Manuskript aus der Tang-Zeit”,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XIV, 1968, pp. 481-488.

出版社而未能出版,法国陈庆浩先生托人抄出,发表于《敦煌学》第12辑(1987年)。张锡厚、项楚两位在此基础上又有校记发表,直到项楚先生出版《王梵志诗校注》的前夕,才从葛莲女士处看到原卷照片。现在此卷与《文选》一样用占整版的大幅照片发表,为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原始素材。

按照《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体例,编者给每一号文献加了标题,除了照相制版等技术性工作外,给没有头尾的残卷题名,是反映这样一部图录成果大小的主要标识。这五册图录所刊文献,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由弗路格整理了307件,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以来,又有孟列夫为首的研究班子继续考释,其成绩记录于上举两册《注记目录》当中。相对于以后的写本来讲,“Φ.”编号的文书大多数已被定名,但也有少数写本在上述《注记目录》中列为俟考诸经,有的根本未见著录。本书编者在充分吸收《注记目录》的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如考订出Φ.268是《菩萨本行经》卷下,Φ.271是《大般涅槃经卷卅二摘抄》,Φ.278是《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九,Φ.291是《大涅槃经》卷十六,Φ.261是《历代法宝记》等。有些旧目的错误或不准的定名,也得到订正,如Φ.299《维摩经注》改正为《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卷上,Φ.319《无常经变文》改正为《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并且和Φ.361、Φ.342号缀合。按《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是后唐鄜州开元寺僧智严所作,同光年间智严西行经过敦煌时留下,于当地颇为流行,有一些抄本保存下来,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sup>〔1〕</sup>下卷曾据四卷伯希和本整理校录,未及此本。这件抄本书体浑重,在俗文学作品抄件中可以说是较为整洁者,可作参校本。而且此本《十二时》前有《发愿文》一篇,其中提到“司□(空)”,当指同光年间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曹议金,这有助于我们确定这篇作品写成的年代。

敦煌写本残卷的定名工作,不是一二位专家和几年的劳动就能圆满解

〔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决的,这需要集合各科的研究者长期的研究成果。然而,俄藏文献一向没有公布,前期工作自然较英、法藏卷要少得多,这更使得本书的定名工作较英、法藏卷要艰难得多。在这五册所刊的写刻本佛典中,尚有一些没有比定出原名,尤其是第5册中那些《注记目录》所没有著录的佛典断片,还有待专家的考证。黄永武《敦煌写本最新目录》中,有他据《注记目录》编译的《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卷子目录》,其中有些佛经题名不见于《注记目录》,大概是据《注记目录》所记写卷的首尾两行文字推断的,应当参考。

学术界虽然对俄藏文献研究的较英、法藏卷要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在做好任何一册类似的图录前,应当充分检索学界的研究成果,并且吸收到目录中去。在这方面,《俄藏》似乎做得还不够。比如第4册收有Ф. 247, Дх. 1368, Дх. 2153, Дх. 2197, Дх. 2752 + Дх. 2842, Дх. 2863 + Дх. 3076号,均标作《百行章》。其中 Дх. 2863 + Дх. 3076 存首题“百行章”,可以确定无疑。《百行章》每章有题,而且文字不长,极易辨认<sup>[1]</sup>,持与其他各件对比,文体不类。其实 Ф. 247、Дх. 1368、Дх. 2153 三件,已由郑阿财先生考订为《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其考释、校录和部分图版发表于《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sup>[2]</sup>中,所据为王三庆先生得自日本东洋文库的写本照片。其后,王三庆先生又将这几件写本的照片重刊于他所编的《敦煌类书》<sup>[3]</sup>中。综合两位的研究成果,Ф. 247、Дх. 1368、Дх. 2153 三件为《新集文词九经抄》无疑。《俄藏》于 Дх. 2153 号下注“馆藏缺”,不知何故。但据《注记目录》所记 Дх. 2153A 起讫行文字,对比郑、王二氏所刊图版,Дх. 2153A 有(1)、(2)、(3)三片,Дх. 2153A(1)即《俄藏》所刊之 Дх. 2752 + Дх. 2842 号,Дх. 2153A(2)《俄藏》缺,郑书342页、王书下册1240页均有影本,Дх. 2153A(3)即《俄藏》所刊 Дх. 2197 号,可见 Дх. 2153 号三残片中有两片

[1] 见邓文宽《敦煌写本〈百行章〉校释》,《敦煌研究》第2期,1985年,71—98页。

[2]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3] 高雄丽文公司,1993年。

馆藏并不缺,而是新编了号码,另一片则希望将来用东洋文库的照片补上,以保存资料的完整性。又如第5册所收Φ. 325v,《俄藏》沿用《注记目录》,仅标为“藏文转写汉文经典”和“祈祷文”,实则此卷1—61行为藏文转写汉文《法华经普门品》,61—72行为藏文《归敬文》,已由高田时雄氏考释发表<sup>[1]</sup>。《俄藏》以下各册进入Дx. 编号写本,研究成果更较这五册所收文献为多,希望能够及时吸收到这部很难重版的定本图录中来。

有些写本虽然未经学者们的研究,但与之同类的文献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定名工作。《俄藏》第5册收Φ. 342v,题作《书仪》,更确切地讲,当作《斋琬文》。《斋琬文》写本见于P. 2940、北图新311v、P. 2104v、P. 2178v、P. 2547、P. 2867、P. 3772、P. 3541等等写卷,法国梅弘理《根据P. 2547号写本对〈斋琬文〉的复原和断代》一文有详考<sup>[2]</sup>。饶宗颐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第4册收有P. 2547号精抄本的清晰图版,Φ. 342v所抄大部分文字见于P. 2547,其为《斋琬文》无疑。

学者们早已指出,编在Φ.、Дx. 号下的文献有些是敦煌以外的地区出土的。《俄藏》为了保存资料的完整性,依编号顺序收录全部文献,这是聪明的作法,因为有许多文献早已相混在一起,要想一一分别是不可能的。但读者在利用《俄藏》时,则需小心谨慎,不可以非敦煌的材料来讨论敦煌的某些问题,也不应忽视这些非敦煌资料在研究高昌、于阗、西夏等问题时的重要价值。被戴仁(J. -P. Drège)在《写本时代的中国藏书》<sup>[3]</sup>中用来讨论敦煌藏经的Φ. 221 + Φ. 228 + Φ. 266《大乘入藏录》,则被方广錫《俄藏〈大乘入藏录卷上〉研究》一文指为黑城出土物<sup>[4]</sup>。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

[1] 见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出版的《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第VI—VII卷,1990—1991年。

[2] 文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

[3]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au Xe siècle)*, Paris 1991.

[4]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1期。

上,笔者曾指出《俄藏》第4册所收Φ. 229 + Φ. 241《景德传灯录》也是得自黑城。最近,我收到英国图书馆寄来的斯坦因从科兹洛夫发掘的黑城同一地点所获KK. II. 0238(k)号写本照片,正面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九二,背面为《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字体、形制与俄藏本完全相同,系同卷散出的一叶。斯坦因文书有黑城遗址的原编号,确证了这件曾被当作敦煌藏经洞最晚写本的《景德传灯录》,根本就不是敦煌写本。《俄藏》前五册所收Φ. 214天庆丙辰(1196)写《亲诵仪》、Φ. 311皇庆二年(1211)写《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是黑城出西夏佛典无疑;而Φ. 123A、Φ. 204A、Φ. 308、Φ. 360、Φ. 317、Φ. 335、Φ. 337等刻本佛像和佛经,大多也不是敦煌藏经洞所出,其中Φ. 337《佛说竺兰陀心文经》有北宋元丰六年(1083)题记。

相对来讲,黑城文献较易辨别,吐鲁番、和田等地的写经和文书则很难区分。Φ. 320《大方等无想大云经》卷第六有题记“缘禾三年岁次甲戌(434)九月五日于田地城北刘居祠写”云云,田地城在今吐鲁番盆地鲁克沁,此件当是高昌写经<sup>〔1〕</sup>。此外,如Φ. 340《妙法莲华经》写本隶意极浓,且多有残缺,也和吐鲁番所出高昌郡写经相似。

有一些非敦煌文献在《注记目录》中已经指出,虽然也不是当事人的记录,但俄方编者所了解的情况肯定比读者要多。有关的注记大概是放在《俄藏》叙录中交代,但按照《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体例,《俄藏》的叙录是到最后才出版的,换句话说就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这对于读者来讲是很不方便的。笔者建议《俄藏》的叙录可以阶段性地发表,像现在Φ. 编号的文献已经全部印出,就可以在《中华文史论丛》或其他刊物上先予发表,本刊也愿意提供发表这种叙录的篇幅。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1995年,368—373页。)

〔1〕 参看《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姜伯勤先生文。

##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

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博物馆合编,照相影印了上海博物馆所藏全部 80 件敦煌吐鲁番文献和 11 件传世的唐宋写本佛典,共两册,前面选印了 60 幅彩色图版,以显示黑白图版所不能明了的内容,后有叙录、分类目录、年表、索引,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使读者看出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编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每一种书的总体构成。郝春文教授《〈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读后》一文<sup>〔1〕</sup>,对本书的价值和编辑上的缺点作了中肯评介,请读者参看,这里在郝文的基础上,略述己见。

本书所刊布的材料,过去只有姜亮夫《莫高窟年表》偶尔提及<sup>〔2〕</sup>。1987 年,曾有部分藏品送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出,而后该馆出版了展览图录《敦煌吐鲁番文物》,但流传不广。本书首次将上博所藏全部文献公开出版,无疑为学术研究的许多方面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如第 1 册所收的南北朝时期的古佚经书和戒本,是北朝佛教义学和敦煌佛教教团研究的重要文献材料;《造莫高窟记》(应作《沙州刺史李庭光莫高窟灵岩佛窟之碑并序》)一篇,可以和 S. 1523 缀合<sup>〔3〕</sup>,共同构成我们今天认识唐代敦煌莫高窟开凿过程的史料基础。第 2 册中所收的上博 48 号册子本,是研究唐五代盛行的疑伪经和民俗佛教的珍贵资料;而其中的《清泰四年归义军节度使

---

〔1〕 《敦煌学辑刊》1994 年第 2 期。

〔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3〕 详马德文,《敦煌研究》1994 年第 4 期。

曹元深祭神文》，确定了学界争论已久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卒年问题。两册中所收的《大乘廿二问本》、《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是研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唯识学高僧昙旷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本书所收佛典，多数为民国年间著名书法家的旧藏，故书法价值颇高，而且，编者极有见地地将这些旧藏家及其他书法家的题跋一并收录，更增加了它们的书法观赏价值，这是英、法等处藏卷所不能比拟的。

上举上博48号册子本中，包含许多研究信息，如第28篇《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一篇尤其引起笔者的注意。这篇《十二时》，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卷六据P. 2054、P. 2714、P. 3087、P. 3286四卷校录，并论证作辞年代在德宗至宣宗之七十年间，即八世纪末叶(781)至九世纪中叶(851)<sup>〔1〕</sup>。而饶宗颐先生《敦煌曲》(Paris 1971)则据P. 2054背“智严大师十二时一卷”的题记，指出此篇为S. 5981所记同光二年(924)往西天取经的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智严所作。从写卷校录来讲，上博48(28)和俄藏Φ. 319为我们增加了两个新校本，而且上博藏卷首尾完整，尤为珍贵。更为可贵的是，上博藏卷后有题记：“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东方汉国鄜州观音院僧智严，俗姓张氏，往西天求法，行至沙州，依龙光(‘兴’之误，原校作‘立’)寺憩歇一两月说法，将此《十二时》来留教众，后归西天去展转写取流传者也。”这条题记为饶先生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笔者在《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一文中，曾收集有关智严的材料，有所论说<sup>〔2〕</sup>。这条题记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认识，即智严俗姓张，同光二年三月他经行敦煌是前往印度途中，而不是拙文所说的从印度求法归来。举这个例子，一来补正旧说，二来用以显示上博藏卷对敦煌学各方面研究的价值。

本书的定名工作做得较好，几乎未留下太多的没有比定的文献。诚如郝春文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本书的非佛教文献的定名还有待改进。其实，如

〔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 见《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册，1991年，956—957页。

果把标准定得再高些的话,佛教文献的标名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编者的体例是原卷有名称者照录,但原卷的名称有时不够规范,有些尾题实为残失的首题的缩写,对此似应有所统一,如上博 62《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第七,不标卷数;而上博 73《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又无品名。又如上博 42《大小乘廿二问本》,一般都称《大乘廿二问本》,似应遵从。名称的统一,有利于将来整个敦煌文献索引的编纂。

李伟国等四位先生所编《叙录》,极为详尽,为读者提供了想要了解的各种情况。特别是把收藏家的朱印大都识录下来,这是十分不易的一件事,应当特别表彰。但《叙录》考证某些写本所引用的参考文献还不够透彻,以至有时影响了行文的准确甚至结论的正确。如上博 25《佛说佛名经》卷第六,应当参考井之口泰淳《敦煌本〈佛名经〉的诸系统》<sup>〔1〕</sup>。上博 30 唐宫廷写本《妙法莲华经》,应据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说》<sup>〔2〕</sup>。上博 49《文殊像》一条,若参考拙稿《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sup>〔3〕</sup>,则可以不把于阗王误为昆仑奴,也可以点出善才童子的名字。上博 07 观自在菩萨像所引《敦煌宝藏》“美”字编号,应使用《宝藏》所用原书的出处,以便读者知其来历。像《叙录》经常使用的《大正藏》、《莫高窟年表》的结论,都有用更新的研究结果检核的必要。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计划中,有不少类似上博藏卷这样的非直接得自敦煌藏经洞的散卷合集。在敦煌学界中,对于散卷的利用态度很不一致,有的不加区分地对所有散卷的可靠性都加以怀疑,有的则不考虑真伪地使用,正确的观点是对每一具体文书加以具体分析。上博藏卷多经清末民初著名鉴赏家的辨别,有的具有明确的来历,总体讲可靠程度较高,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比如上博 18《妙法莲华经》卷第五,尾有题记:“仪凤二年

〔1〕 载《东方学报》(京都)第 35 册,1964 年,397—437 页。

〔2〕 Fujieda Akira,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Zinbun*, No. 10, 1969, pp. 31-36.

〔3〕 《文博》1987 年第 4 期。

二月十三日,群书手张昌文写,用纸二十张。”钤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按,既为群书手所写,当为唐朝宫廷写经,但对比已知的唐朝宫廷写经,此题记显然不规范完全,而且李盛铎的藏印更增加我们对它的怀疑。伪卷的情形有多种,有的写经是真而题记、印鉴是假,在没有见到原卷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些写卷还是存疑而不下结论为好。

虽然有一些不足,总体上讲,《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图版清晰,叙录详尽,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出版的典范。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1995年,373—376页。)

##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出版,是敦煌学界期盼已久的事情。上海是清末民初以来学者、收藏家、书画家荟萃之地,通过各种途径从敦煌流散出来的写经文书,有不少辗转到了上海私人手中,有些陆续进入上海图书馆。因为上海的私人藏家眼界较高,而上图的专家更具慧眼,所以,我们可以推测,除了北京图书馆外,上图应当是藏有敦煌写本精品并有一定数量的收集的馆藏之一。1986年,吴织、胡群耘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在《敦煌研究》当年第2—3期连载,使人略窥上图藏卷的名目。1990年2月,曾经阅览过全部上图藏卷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施萍婷女史,在日本东洋文库的讲演报告中,也谈到上图藏卷的情况,特别是来源和真伪问题<sup>〔1〕</sup>。直到1999年6月,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的《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大型图录四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馆藏全部敦煌写本187号,不仅为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献上一份厚礼,而且也大饱了当今敦煌学人的眼福。

上图藏卷主要是从一些私人藏家手中陆续得到的,其中有的是曾经任官甘肃的人士带到内地的,如1911年后任甘凉(今甘肃张掖)道尹许承尧及其子许家栻、1920年暂护甘肃省省长陈鼐、1910年任甘肃布政使何彦升(其子鬯威即押运敦煌卷子入京者)等家藏的敦煌经卷,这

---

〔1〕 讲演稿由池田温译载《东洋学报》第72卷第1·2号,1990年12月,87—106页。



些官员近水楼台,所以很早就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敦煌写卷,其中不乏精品<sup>〔1〕</sup>。也有著名收藏家历年收购的写卷,如叶景葵(揆初)、袁克文(寒云)、罗振玉、吴士鉴、龚钊、吴曼公等人的收藏,还有后来买到的从甘肃流出的张维旧藏卷。这些人物都是很有鉴赏力的收藏家,他们所聚的材料,也有不少是相当好的资料。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较之先前发表的《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简称《目录》),在定名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定名工作是衡量这种大型图录的学术价值的最主要依据。试看《目录》中的许多标作“写经残卷”者,大多数已经指实为何经何品,这在还没有《大正藏》光盘可供检索的时代,确实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还有像第066号背面,《目录》原题“不知名佛典”,本书考订为昙旷《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颇见功力。

由郭子建、刘景云、王翠兰、夏颖四位合撰的本书《叙录》,对从图版上不能得知其详的写本尺寸、颜色等外观,定名依据、相关文献等情况的著录,为读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只可惜《目录》中已经抄录的长段今人题跋,《叙录》按统一体例没有照录,固然有原跋的图版在,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讲,看录文比较方便,而且这些跋文是和《叙录》著录的印鉴等是同组的东西,不应分开。

翻阅图版,有些写本确是精品。如第021号《妙法莲华经》卷六,有高昌义和五年(618)题记。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sup>〔2〕</sup>,曾推测题记中的“夫人和氏伯姬”,很可能是当时取代麴氏而执掌高昌王权的政变首脑之妻。原卷各品题下,有朱书“和夫人经”,是十分少见的做法,也说明这位和夫人不同一般。而且楷体字较一般写经浓重端庄,应当是高昌王国后期精心抄写的佛经之一,值得珍重。

---

〔1〕 有关这些人物的情况,参看拙文《甘藏敦煌文献知多少?》,《档案》2000年第3期,16—19页。

〔2〕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6年,163—188页。

第032号《妙法莲华经》卷一,有上元元年(674)写经题记,是唐朝宫廷写经,属于敦煌写经中的上品。

第028号《廿二问》,此即昙旷《大乘二十二问本》,《叙录》作“五代写”,似有未谛。背面《欢喜国王缘》,则当是五代所写。此件原为罗振玉旧藏,曾印入《敦煌零拾》,陈寅恪先生撰有《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考出故事所本<sup>[1]</sup>,其所藏《敦煌零拾》上的批语,也经笔者整理为《〈敦煌零拾〉札记》发表<sup>[2]</sup>。后原卷归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启功先生将此卷(自“谨案”至“国主乍闻心痛切”)与P.3375缀合,作为《敦煌变文集》的底本,改题为《欢喜国王缘》。同时,启先生还把同一文物保管委员会收藏的另一件《欢喜国王缘》(即本书第016号),取作《变文集》的参校本。现这两件写本都已转入上海图书馆,而印入本书。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搜索,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欢喜国王缘》,还是这三件写本构成的两个文本<sup>[3]</sup>,可见上图本的珍贵。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第017号《唐民间文书集册》是前人没有利用的新史料,包括《家书》、《葬经》、《僧正致都督状》、《卜筮法》、《分家契》(书仪)、《丁丑年赤心乡百姓郭安定雇驴契》、《开蒙要训》,可以补入相应的录文集中。

此外,第034号的粟特文、回鹘文写经,也是极其珍贵的。

从不同的学科研究的角度看,有价值的文书还有不少。如第009号佚名《律杂抄》一卷,较《大正藏》卷八五所据P.2064多三倍强。同号最后一种,所抄是未比定律书,对于佛教戒律的研究,可能更有意义。

第019号《天宝八载公文》虽然字数不多,但却是原本属于唐朝西州的一组文书中的一件。《叙录》有录文,但人名有的没有录出。按,府罗及和

[1] 文载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2号,1927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71页。

[2] 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11页。

[3] 见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1089—1101页。

〔仓曹〕参军庭兰,又见于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墓地所获吐鲁番文书、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等,这组文书据陈国灿先生考证,应当都是属于《唐天宝八载西州仓曹检勘诸仓仓粮案卷》,其中普林斯顿藏卷之一的纪年是“天宝八载三月廿四日”,亦有“府罗及(陈录作“通”)”和“仓曹参军庭兰”署名<sup>〔1〕</sup>。因此,上图的这件所谓“公文”,应当是同组案卷中的一件,应当定名为“唐天宝八载西州仓曹检勘诸仓仓粮案卷”。

另外,018《书仪镜·凶》下、030V《新集文词九经抄》一卷、114 裱纸上的海晏七言诗一首、141《玄藏法师十二月礼佛除罪文》和《秀禅师劝人药病偈》,以及078《太玄真一本际经》卷二和166《太玄真一本际经》卷十(存《称扬持戒品》第三至卷尾),都富有研究旨趣。

近年陆续刊布的敦煌小收集品,由于来历不一,所以难免其中会混入其他地方传存的古写经,因为敦煌卷子有名,所以不论是旧藏家,还是图书馆,都会把其他一些写本当作是敦煌写本。更有甚者,就是今人伪造的写卷,有时也会混迹其中,因此,确定是敦煌还是非敦煌写本,辨别真伪,是目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施萍婷《敦煌遗书编目杂记二则·康有为与敦煌写经》一文,指出上图原编号812442 金银字《妙法莲华经》卷六,很可能是中原传世写经,而非敦煌卷子<sup>〔2〕</sup>。此卷上图《目录》作为敦煌写经处理,编作085号。大概接受施萍婷先生的看法,在本书中将此卷编作附3,做非敦煌经卷处理。

另外,第029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六四和第063号《妙法莲华经》,都是瓷青纸,用金粉写,似非敦煌写经。后者卷首有“弟子彰义军节度使钱宏信敬舍”,应是传世写经,绝非敦煌写经。

第152号《中阿毘经》卷第五,卷尾钤“法隆寺一切经”,施萍婷<sup>〔3〕</sup>和

〔1〕 见所撰《美国普林斯顿所藏几件吐鲁番出土文书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1997年,113—114页。

〔2〕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1995年,321—323页。

〔3〕 《东洋学报》第72卷第1·2号,93页。

《叙录》都疑为日本古写经,可作定论。其印与日本奈良法隆寺藏写本所钤“法隆寺一切经”方型墨印完全相同<sup>[1]</sup>。

上图有些卷子上有“木斋审定”、“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等李盛铎的藏书印,因为日本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指称李氏造伪,所以值得注意。我过去在考察李氏藏卷的流散过程时,曾经对证出,上图这些带有李氏藏印的卷子,其名确实不见于李氏自编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sup>[2]</sup>,似乎不是李家所藏得自甘肃运京的那批。而其中一些写本可以和《李木斋旧藏敦煌名迹目录》第二部分中著录的一些写本相勘同<sup>[3]</sup>。但是,拿《李木斋旧藏敦煌名迹目录》提供的信息和上图《目录》提供的材料相对照,有许多卷子无法对应。现在,随着本书的出版,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名迹目录》第二部分编作《总目索引》散录六的第0601—0644号,本书按照馆藏号排序,同时另编上图新序号于馆藏号前,这样的序列往往可以使我们看出入藏之前旧藏品分组情况,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对证出:散录的0601—0631即本书上图106—136号,散录0638—0643即上图137—142号,中间上图所缺的散录00632—00637六个号,《名迹目录》已经明言“此六卷为日本所藏唐人写经”,所以早已被剔除。散录最后一个号0644《索铁子状》,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此点沙知先生早已指出,见所撰《跋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平康乡百姓索铁子牒》<sup>[4]</sup>。《名迹目录》所谓“梵文经两卷”,上图《目录》原未著录,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先生曾寄给笔者复印件,经与黄维忠君合作,考出实为藏文《般若心经》。

[1] 见《法隆寺とシルクロード仏教文化》,法隆寺,1989年,75页。

[2] 稿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录文见荣新江《鸣沙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115—143页。

[3]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散录六。参看拙文《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鸣沙集》,109页。

[4] 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234—238页。

这一部分据说是得自李盛铎的写卷,有的上面确实有李氏的印记,但我们并不能够因此就指其为假货,不论有无李氏印记,我们首先应当从内容上检验卷子的真伪。试举一例:

第117号《瑜伽师地论随听手记》卷首朱笔题:

《瑜伽师地手记》卷第六,六月十七日起首说,沙门洪真随听镜。

以下卷中依次朱笔题记为:

《瑜伽论手记》卷第七,七月五日说讫。

《瑜伽论》卷第八手记。《瑜伽师地论》卷第八手记。

《瑜伽论》第九卷,九月十七日说竟,沙门洪真手记。

卷末墨笔题记:

《瑜伽论》卷第十。

接着有朱笔题记:

上元元年十月三日说竟,沙门洪真手记讫。

下铃有“木斋审定”朱文方印。背面有朱笔“沙门洪真”骑缝押,尾铃“德化李氏木斋阁家供养经”朱文方印。

按,敦煌写本中多有《瑜伽师地论随听手记》,据上山大峻氏研究,都是归义军初期敦煌高僧法成讲经的记录本,当时跟随法成听讲的学生有谈迅、福慧、法镜、一真、洪真、明照、恒安等,其中谈迅与福慧、法镜、洪真的三套记录基本上保存下来,讲经开始于大中九年(855)三月前后,每月大约讲一、二卷<sup>〔1〕</sup>。按照上山氏的结论推算,大中九年六月十七日开始讲《瑜伽师地论》卷六,正好相符。本卷还提供了卷七和卷九讲毕的时间,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瑜伽师地论》卷第七末,也有题记:“大中九年十月,沙弥一真书记。”这是一真的笔记,可惜这个卷子目前已不知所在,也没有图版可以对

〔1〕 见上山《敦煌佛教の研究》,法藏馆,1990年,219—230、244—246页。

照,这里所据为罗振玉发表的《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sup>〔1〕</sup>,颇疑“十月”为“七月”的误书。从敦煌本《瑜伽师地论随听手记》的序列来看,此卷为大中九年沙门洪真听讲记录无疑。可疑的是最后的“上元元年”的题记,这个年代即使按《叙录》所标放在肃宗的上元元年(760),也是无法和敦煌全部《瑜伽师地论随听手记》相符合的。因此,这个“上元元年”的题记,一定是伪作。而且,我怀疑作伪者意中的上元,很可能是高宗的上元元年(674),因为敦煌卷子中,有一批高宗上元年间唐朝长安的宫廷写经,最为精美,如本书第032号《妙法莲华经》卷一,即上元元年(674)所写。这件《瑜伽师地论随听手记》的伪题下,有李盛铎印,但这并不能证明就是李氏本人所钤,因为李氏去世后,他的藏书印流落到书肆,很多造伪者把李氏的真假印鉴钤在普通的卷子上,以谋取高价<sup>〔2〕</sup>。总之,这件写本提供给我们一个真卷子、伪题跋的最好例证。

上图所得据称原为李盛铎所藏的这组卷子,从内容来看,其中确实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如经疏、疑伪经、禅籍、道经等;但从题记看,有不少题记都值得怀疑。在真卷上加年代较早的伪题的做法,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造伪方式之一。

最后应当提到的是,第058号《大乘无量寿经》尾题“贞观五年冬唐文英写”,《叙录》已指出系伪署。第169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一,有“永徽六年(655)”题记,池田温先生疑为伪题<sup>〔3〕</sup>。

(2001年8月28日完稿,原载《历史文献》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322—329页。)

〔1〕 1914年,收入《雪堂丛刻》。

〔2〕 参看拙文《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鸣沙集》,103—146页。

〔3〕 1989年10月21日来信。

## 《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评介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古代写本数万件,内容包括佛、道经典和经、史、子、集及各方面的社会文书,这些古代文献绝大部分是用毛笔抄写的,时代上自十六国,下迄宋初,保存了六百多年间的古代法书墨迹。这些时代久远、数量庞大、风格多样的写本,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珍贵的资料,是认识和研究中国书法史不可或缺的素材。然而,对于敦煌书法的研究,却起步很晚。

五、六十年代,学者们开始较多地注意到敦煌写卷的书法艺术。日本二玄社出版的《六朝写经集》等书法选集,刊布了部分敦煌写卷。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发表了《敦煌写卷之书法》一文,对英藏敦煌写卷中的书法资料作了深入的研究。以后,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都相继刊印了敦煌写卷的书法作品,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然而,规模最大而且最集中地介绍和研究敦煌书法的巨著,毫无疑问,当推饶先生的《敦煌书法丛刊》。全书共29册,1983年起由日本二玄社陆续出版。饶先生有机会较长时间逗留法国巴黎,在国立图书馆检阅敦煌原卷,从中精选了150件敦煌写卷,编成此书,包括了真、草、隶、篆各体,时代从六朝到北宋,涵盖了敦煌书法的各个方面,可以说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敦煌书法。但日文版价格昂贵,在国内不易找到,而且日文解说,也不便国人参考利用。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适应国内学者和书法爱好者的需要,出版了中文版,名为《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分装为八册,即一,拓本、碎金;二,经史(一);三,经史(二);四,书仪文范、牒状;五,韵书、诗词、杂诗文;六,写

经(一);七,写经(二);八,道书。图版全与日文版相同,照原大影印,解说部分则参照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有所补充。

从书法研究的角度来看,《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它不仅对“敦煌学”,而且对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中国书法的研究,历来比较重视名家的作品,清代包世臣、康有为开始改变世风,充分肯定以魏碑为代表的民间书法的价值,一时,碑学兴起,学书者始知除名家名帖之外,尚有如此丰富的天地。然而,碑刻文字是雕刻家最后完成的,由于刻工有高下之别,难免不改变书法家的原意,特别是南北朝时代的碑刻,与毛笔书写的距离是很大的。学书者不鉴于此,故有人为做出刻工效果的书法,形成了碑学的弊端。敦煌写卷的公诸于世,使人们看到了六朝以来毛笔书写的真实面貌。这些写卷大都是民间书手所写,如果配合同时期的碑刻比较研究,将会呈现出一部脉络清楚的民间书法艺术史。所以,日本著名书法家西川宁先生认为,《敦煌书法丛刊》的出版是独树一帜的重要著作。

二、由于敦煌写本在时代上的连贯性,用敦煌写卷比较研究,还可以解决书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前人曾对王羲之的书法有过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关键在于人们所见到的六朝书法材料太少,无法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敦煌写卷中的许多六朝书法墨迹,非常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本书第6册刊载的P. 2196 梁天监十八年(519)的《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P. 3308 大统二年(536)《法华经义记》等,这些稳重工整的楷书,流畅潇洒的行书,特别是圆润和穆的笔致,灵活自然的章法,令人不敢相信这是那些没有什么地位的写经手所书。当然,从时代上看,这些写本要比二王的时代晚一些,但如果考虑到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家的创作要在民间普及,必然要经过较长的时间,那么,王羲之时代能创作出《兰亭序》这样的千古杰作,基本上是可信的。此外,隋唐时期的写卷对于认识唐代书法家的书体也很有意义。如本书所收P. 2617《周易经典释文》(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书法与



颜氏《勤礼碑》极为相似，而此时颜真卿还不到二十岁，而《勤礼碑》的完成更晚于此卷四十年。说明了像颜真卿这样的书法家，其书法风格的形成，必然吸取了民间书法中许多有益的成分。本书选取了不少像这样具有重要书法史价值的写卷，使人们可以从中对比探讨书法史上的一些大问题。

三、饶宗颐先生对每件写本所撰写的解说，渗透了编者对敦煌书法的透彻理解和深入研究，这也是本书区别于一般书法选本而富有学术价值的一个方面。本书涉及的范围极广，编者将选本分为拓本、经史、书仪、牒状、诗词、写经、道书等几大类，对所选写卷的内容及书写者的生平均有所考释。相对于各个时代的书法家来说，敦煌写卷书写者往往名不见经传，其生平和时代要从大量敦煌写卷中去爬梳，才能得到一些线索。如在 P. 2179《成实论》的解说中，饶先生列举了 8 件写卷上的令狐崇哲的题名，并在时代和书写特色方面作了比较，显示出北魏至西魏初敦煌一地的写经风格。编者还善于利用考古材料作比勘，如对 P. 2596《道德经序诀》的解说中，即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作比较，使我们对《老子》一书的书写流传演变，有了系统的了解。写卷中的俗字、别字的不同写法，往往能够反映出时代和地域特征，因此，它是书法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饶先生在这方面也花了较大的功夫，如对 P. 4506《金光明经》、P. 2078《佛说观三昧海经》、P. 2619《周易王弼注》的解说等等，体现了饶先生文字学的深厚功力。

作为一部书法的专著，从编选到撰写说明文字无不渗透编者对书法艺术深厚的鉴赏力。饶先生对每件写本书法特征的品评，用语不多，如称 P. 2495《庄子节本》：“书法全无修饰，用笔纤瘦，结字疏通。有薛稷之清秀，雄劲恣意，诚佳品也。”又评 P. 4506《金光明经》：“结体跌宕，行笔逋峭，《刁遵》、《高湛碑》之劲美，兼而有之。论其书法艺术，顿挫行阵之中有一片浑穆气象，谓为标准之魏法，可以当之无愧。”P. 2179《成实论》云：“每字起笔细而收笔饱满，十分劲健，意态极近《龙门造像记》。”P. 2019《长孙讷言切韵序》：“行笔略近欧阳率更，仍存北朝风范。”P. 3994《词五首》：“字极拙重健拔，在欧、柳之间，毫锋取势，可与王案《汝帖》第十二卷所收李后主书《江行

初雪》画卷赵幹题字相颉颃,可定为五代时书风,在书法史上应为极难得之妙品。”这些寥寥数语,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很富有启发性。

由于本书只编选法国所藏部分,而不及英国、俄国、日本和中国的藏品,所以不足之处是不能更全面地反映敦煌书法的成就。如英国图书馆所藏 S. 797 西凉建初元年的《十诵比丘戒本》,S. 81 天监五年的《大般涅槃经》等一些珍贵的书法精品未能选入。又如本书拓本部分选印了欧阳询《化度寺塔铭》,实际上该卷被人为地撕成两片,一件存法国国立图书馆,仅两页,即本书所选部分;另一件存英图,有十页,若能将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就能使读者了解这个拓本的原貌了。又如碎金部分选了唐人临王羲之《十七帖》残卷,英图藏本中也有《十七帖》的另一些残卷,若能合在一起,更利于书法的研究。

饶先生选录此书标准有三:(一)具有书法艺术价值;(二)注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三)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者。说明着眼点除了书法作品外,也兼顾文献价值。其中选印的经史典籍如《周易》、《毛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晋春秋》、《大唐西域记》、《沙州图经》、《书仪》;文人诗词及俗文学作品如《文选》、《玉台新咏》、《高适诗》、《云谣集》、《王昭君变文》;重要官私文书如《封常清谢死表》、《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状》、《曹元忠状》、《大云寺安再胜牒》;佛典如《金光明经》黄绢写经、《东都发愿文》、《生经》、《三阶佛法》、《因明入正理论》、《大乘起信论略述》;道经如《太玄真一本际经》、《无上秘要》、《阅紫录仪》、《玄言新记明老部》等等,都是敦煌写本中极具校勘和研究价值的文献材料,其中有些还是佚书,这里的图版要较此前的刊本清晰,而且以原大印出,是其他印本所无法比的。

饶先生对每件写本的解说,实际就是一篇考释研究论文,其中不乏作者的研究心得。如牒状类所收 P. 3412《大云寺安再胜牒》的解说,参照敦煌藏文文书 P. t. 1189 中的类似记载,相互发明,为前人所不及。中文本又补充了近年关于郑氏注《论语》、书仪、归义军史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较日文本更具参考价值。周绍良先生说:“这一百五十多篇提要,既博且精,实为

饶先生多年治敦煌学之结晶,不可以寻常书法文字视之。”(人民日报 1986 年 8 月 28 日)可以作为我们对本书的总评价。

中文本可以说远较日文本完善,但也有个别处值得将来有机会加以修正。日文本前面有编者中文原序一篇,交代编选的原则和本书产生的经过,中文本亦当收入。以下是随手检出的排印错误:第 1 册 285 页注“□逸”当作“逸”;第 3 册 308 页下栏第 2 行“昔年”以下另起一行;第 4 册 234 页插图三“圆”当作“体圆”;235 页下栏第 5 行“保德”应作“董保德”;246 页注〔七〕“う”当作“ウ”;注〔十〕“法见”当作“发见”。

(与赵声良合撰,原载《敦煌研究》1995 年第 1 期,172—174 页。)

##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 新疆出土汉文文书》评介

1913—1915年斯坦因的第三次中亚考察,先是发掘和田、尼雅、楼兰等地的古代遗址,在麻札塔格、巴拉瓦斯特(Balawaste)、瓦石峡(Vash-shahri)等处都有新的收获。而后进入甘肃,发掘敦煌酒泉间的长城烽燧。再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又获得570件敦煌藏经洞写本。并深入居延,发掘了黑城子(喀喇浩特, Khara-khoto)西夏古城,然后到吐鲁番,发掘阿斯塔那(As-tana)古墓,揭取柏孜克里克(Bezklik)石窟壁画,在吐峪沟(Toyuk)等处也有许多收获。最后,又调查发掘了部分库车遗址,然后出中国国境,往东部伊朗考察。斯坦因1928年出版了他的正式考古报告《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共四卷。

英国图书馆 Or. 8212/1—1946 编号文书,主要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献,但也有一些第一和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文书。Or. 8212/1—195 号是民族语言和汉文与民族语言文字混在一起的写本,文字有梵、佉卢、藏、粟特、于阗、吐火罗、突厥、回鹘和汉文,许多极具研究价值的文书都在其中,如著名的“粟特文古信札”(Or. 8212/92—101)。这部分写本,由巴内特(L. D. Barnett)在1912年编过一个草目,名为《斯坦因收集品中各种中亚语言和梵文写本草目》(L. D. Barnett, *Preliminary List of Manuscripts in Languages of Central Asia and Sanskrit from the Collections Made by Sir M. Aurel Stein*, MS, 1912.),未出版,只有打字本存在英国图书馆东方部阅览室中,1985年笔者初访英图时见过。这一部分中的许多文书,后来都有人做

过专题研究。

以下, Or. 8212/196—199 为预留空号, 迄今未用。Or. 8212/200—855 是木简或纸本汉文文书。Or. 8212/856 以下是汉文或其他语言文字资料。

除了 Or. 8212/417—477 号木简碎片外, 马伯乐(H. Maspero)整理了 Or. 8212/200—855 汉文文书, 编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由于二战的原因, 迟到 1953 年才由英国博物馆出版。该书共由五部分组成: 第一, 敦煌长城烽燧出土的汉简(Nos. 1—166)和唐代文书(Nos. 167—168); 第二, 楼兰地区出土的晋代和十六国简牍与纸本文书(Nos. 169—261); 第三,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前凉至唐代的文书和文献(Nos. 262—443); 第四, 塔里木盆地出土文书(Nos. 444—472), 主要是和田地区出土文书和典籍; 第五, 黑城子(Khara-khoto)出土的唐代到元代的文书和文献(Nos. 473—607)。马伯乐书的主体是敦煌、楼兰的汉晋木简、吐鲁番的唐代文书、黑城子的元代文书, 马氏对每件文书都作了外观描述、汉文录文、法文翻译和考释, 后附有部分比较完整的文书的图版。

Or. 8212/856 号以下的文书, 与马伯乐整理的文书来历大体相同, 即主要是出土于楼兰、吐鲁番阿斯塔那、高昌故城、吐峪沟、交河古城、黑城子、和田达玛沟、哈达里克、麻札塔格等地, 汉文之外也有其他民族文字资料, 只是大都为残片, 所以整理工作十分缓慢。从总体来讲, Or. 8212/1—1946 中有许多重要文书, 只可惜没有全部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公开发行, 因此这一部分文献的研究还是一种挖宝式的做法。

1989 年, 兰州大学郭锋先生在英国图书馆工作一年, 编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 1993 年 2 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麻扎(札)塔格文书、和田多摩克(达玛沟)文书、楼兰文书、敦煌烽燧木简及石室文书、黑城子文书、吐鲁番文书六部分, 专门抄录、考释马伯乐未发表的材料。我们知道马伯乐当年是把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残卷放在一起加以整理的, 也就是说, 马氏未刊的文书

多是一些相当残碎的断片,这实际上也是多年来无人问津的原因之一。郭锋知难而进,对这些残片进行整理,其勇气十分可佳。作者声明大多数佛典残损过甚,难以定名,且价值不大(此点笔者不能苟同),因此排除在外。但仅就非佛教文书来讲,也包含了作者所说的信状、启辞、牒文、状文、诏敕、田簿、给粟帐、欠麦帐、帐目、契约、名簿、医方、医书、古籍、童蒙读物及乘法口诀等种类,年代从东汉到元朝,定名工作和校录都十分不易。作者在一年的时间里,总共整理校录了420件文书,对每件文书加以定名、定性和归类,并据原卷注记了外观形态,这对于大多数不能看到原件的人颇有助益。

郭锋的初录本揭示了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文书的大体面貌,为学界提供了许多前所不知的新材料,这是值得我们给予充分肯定的。作者录出相当一批和田出土文书和黑城子文书,其中就有不少珍贵的资料。如麻札塔格出土的 Mazar tagh 0130(Or. 8212/1516)文书中提到于阗王尉迟珪,此前发表的唐代于阗文书已不在少数,但提到于阗王者实属罕见。又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一批高昌国时期的《负麦帐》,也为高昌国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还有黑城子文书中的一些古籍写本或印本,都是宋元时代的佚籍善本。然而,由于时间仓促,文书破碎,字体潦草,作者提供的录文尚有不少值得修订的地方。比如我们对照一下本书345—426号和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所录同一件吐鲁番文书,即可看出此点,但我们也不应忘记陈氏录文是在郭氏基础上做的。另外,大概因为英国图书馆已将所有文书残片按顺序号固定地夹在了玻璃框或塑料薄膜中,所以作者虽然面对原卷,却也不容易做缀合工作,一些原可缀合或归为同组的文书仍分别录出,如上述《负麦帐》即是一例。实际上,作者没有注意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第55册中的碎片106—183号,即为Or. 8212中马伯乐未刊的部分文书,虽然许多模糊不清,但也聊胜于无。作者的一些录文显然是因为回国后见不到图版,所以在格式上与原件有不少出入,如316号黑城子出土的KK II 0244 a xx d(Or. 8212/1243)刻本,存12行,除第7行外每行录文前后均作缺字符号,但我们从《敦煌宝藏》碎片170

号即可看出,此残片上部保存完好,没有任何缺字,而且黄永武已经正确地标为《单疏本孔颖达春秋正义(文公二十年左传)》,而不是作者所说的“宋刻本孔颖达礼记正义(单行本)”。虞万里先生在郭锋录文的启发下,依英国图书馆提供的清晰照片,判定这是北宋刻单疏本《春秋正义》,可补十三经北宋单疏本版式之缺(虞文刊台湾《敦煌学》第20辑)。

过去我们只是从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和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中获知 Or. 8212 编号文书的部分情况。郭锋书前有《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及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概介》,后有《大英图书馆斯坦因三探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文书注记目录(初稿)》,使人们可以粗略了解这批文书的全貌。而且,书中对大多数文书的外观作了描述,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整理这批资料。如前所述,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文书种类多,年代跨度大,而且还有许多佛典和各民族语言材料,在学科分工日细的今天,一个人是很难胜任全部的编目工作的。也正因为此,我们在编目前应当尽量多地掌握各科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作者在这方面似乎准备不足。日本学者兜木正亨走访英伦期间,曾比定出 Or. 8212 编号下的 140 件佛典残片为《妙法莲华经》,并编入所著《斯坦因伯希和蒐集敦煌妙法莲华经目录》(东京,1978年);黄永武《敦煌宝藏》的碎片目录(即《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相关部分)的文书部分没有什么发明,但在典籍类的定名上有可取之处。可惜作者在编《注记目录》时都未得利用。

作者是史学工作者,在初步整理这批残文书之后,也就一些有关历史的问题作了探讨,这包括用楼兰文书证纸写诏书开始行用的年代,由楼兰文书所见官职看魏晋西域长史设置问题,依文书来考证麻札塔格遗址的废弃年代,并力图说明唐代于阗的军事活动和日常生活状况,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是值得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参考的。

(原载《唐研究》第3卷,1997年12月,572—575页。)

##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评介

近年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郭锋编著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出版后不到两年,武汉大学陈国灿先生根据日本东洋文库所藏部分 Or. 8212 文书的缩微胶片,就马伯乐已刊和未刊的文书,整理成《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一书,1994 年 12 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又将这一领域的工作推进一步。

本书内容由三部分组成。

一、对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包括对高昌国负麦粟帐的年代和性质的探讨;对高昌某寺月用麦粟钱酒帐内容的分析,讨论了高昌寺院向政府交租的问题,以及寺院中使人和作人的性质;考证唐西州诸曹符帖目的年代在开元十六年(728),并研究了其所记西域史事;又考察唐西州的屯田规模与意义,以及助屯输丁问题;有关唐天宝二年(743)汜忠敏侵占仓物案文书的研究;唐建中七年(786)西州蒲昌县配造秋布花问题的分析。作者结合史籍和其他几组吐鲁番出土文书,如《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所刊资料、大谷文书和尚未刊布的吐鲁番文物中心编《新出吐鲁番文书及研究》所收 1976 年以后出土资料,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在高昌赋税制、唐代西域史等方面提出新见解或新问题。

二、对文书的重新整理和录文。除重新校正马伯乐的录文外,还补充了部分马伯乐未刊的文书。作者整理文书的原则与马氏的分类整理方法不同,而是用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文书方式,即把文



书按每个遗址或墓葬单位归在一起,先依年代先后,录有年代的文书,再录无年代的文书,这样有利于根据遗址和墓葬的年代,来判定一些没有纪年的文书的年代和性质。依此原则,作者先录斯坦因所掘阿斯塔那二十一座墓葬文书,然后是高昌古城、丫头沟、吐峪沟、交河古城出土文书,后附营盘、巴拉瓦斯特、麻札塔格、丹丹乌里克、安德悦出土文书。

### 三、附录参考文献、文书编号对照表、阿斯塔那墓葬分布图。

此书以文书录文为主体,并收录了作者的研究论文,加上附录,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整体,除缺少必要的专有名词索引外,是人们目前利用斯坦因吐鲁番所得文书的最佳本子,也可以看作是十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一个续编。

笔者赞同按墓葬为单元来整理文书的方式,但同时也觉得它仍不够完善。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年代的文书不易安排它们的位置。如本书311—336页所录七区二号墓文书,先录有年代者,第一、二件均为天宝八载府罗通牒,三以后是没有年代的文书,大体上是依内容安排,最后总是最残的文书。但这里第九件残文书提到“罗通”,第一一件中的“胤”,即第二件中的“休胤”,这些断片似乎都应前提到一、二件之后。其实,有些没有年代的文书反在有年代的文书之前产生,而这种方法整理的文本,常常会使人误以为有年代的文书写成的时间在前,没有年代的文书在后。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困难。

墓葬之外的遗址,实际也应当再细分到每一个房址或洞窟,但由于有的具体出土地点不明,作者没有像墓葬那样做,有悖于原则,因而这一部分文书之间的关系也无法用上述原则来理解。由此看来,按遗址分类整理文书的方法固然很好,但不是万能的,因为大多数已出土的吐鲁番文书是无法确知其具体出土的。本书所略去的佛经和其他典籍类文献,也应当有区别于墓葬文书的整理方法。

在录文方面,作者的校录本较马伯乐和郭锋的著作进了一大步,除了俗别字的释读成果外,作者以其丰富的整理吐鲁番文书的经验,缀合或归组了

一些文书群,如 Yut. 08、09、012、06 四片的缀合,让人叫绝。但也有一些校录文字恐怕有误,如 221 页第 2 行“索”当作“案”,280 页第 4 行“论台”当作“轮台”,313 页第 2 行上部缺字当作“罗护”,473 页第 6 行“口”当作“起”,“亢”当作“黑夜”,480 页“大歷”当作“大曆”,487 页“郭峰”当作“郭锋”,有些可能系手民之误。又 215 页文书前三行上部都没有缺文,不应加缺文符号,第 4 行文字较前三行高一格。535 页的文书格式,也不确切。

作者对文书的定名比较规范,可以依从。对文献类的材料,则新的比定不多。

附录的于阕出土文书,虽然材料不多,且前人大多已有校录发表,但遗留的问题尚多。

近年,荒川正晴撰《唐代于阕地区的乌骆马》(载《龙谷史坛》第 103、104 合刊号,1994 年),池田温撰《麻札塔格出土盛唐寺院支出簿小考》(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1996 年),表明了这一研究趋向。

1994 年和 1996 年,中国人民大学沙知先生应英国图书馆的邀请,到伦敦为 Or. 8212 编号文书做全面整理并编目,我们期望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早日发表。

(原载《唐研究》第 3 卷,1997 年 12 月,575—577 页。)

## 《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评介

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有所不同,因为主要是来自墓葬的废纸和石窟寺院的遗址当中,所以大多数残缺不完。古代的高昌位于西域,较敦煌的民族更为复杂,沿丝路往来或定居该地的外国人也更多,因之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语种远较敦煌为多。在众多的胡语材料中,以回鹘文为大宗,因为自九世纪中叶以后,回鹘人渐渐成为吐鲁番盆地的主人。

回鹘文契约文书是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发现以来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拉德洛夫(Wilhelm W. Radloff)、马洛夫(S. E. Malov)、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羽田亨、冯家升、捷尼舍夫(E. R. Tenishev)、护雅夫、哈密顿(James R. Hamilton)等人都先后有所贡献,而集此项文书研究之大成者,当属已故日本学者山田信夫教授。

山田信夫教授出身东洋史学科,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为参加大谷文书的整理工作,而转入回鹘文献的整理研究,除了发表《大谷探险队携来回鹘文买卖借贷文书》(见下)外,还整理过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带回的《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断片》<sup>[1]</sup>。为了深入研究回鹘文契约文书,山田教授先后走访了柏林、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伦敦、巴黎、赫尔辛基、伊斯坦布尔等地,全面调查收集回鹘文契约文书材料,得以掌握大量未刊的写本照片。在此期间,山田教授曾把收藏此类文书比重最大的德藏文书做了初步转写和英文翻译,准备发表在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主编的

---

[1] 《东洋学报》第40卷第4号,1958年。

《吐鲁番突厥语文献丛刊》( *Türkische Turfantexte* ) 中,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

1984年,以山田教授为首,有日本年轻一代回鹘文研究者小田寿典、梅村坦、森安孝夫三氏参加,组成了回鹘文契约文书整理小组,在山田教授工作的基础上,更系统全面地整理研究回鹘文契约文书,其初步的成果即四人合撰的《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综合研究》<sup>〔1〕</sup>。可惜的是山田信夫教授在1987年不幸去世,给这项工作带来一定影响。此后,整理小组成员组成编辑委员会,并邀请德国回鹘文专家茨默(Peter Zieme)氏参加,继续山田教授的未竟事业,终于在1993年完成了这部署名为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茨默、梅村坦、森安孝夫编的《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三卷本巨著,并由大阪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第1卷由山田信夫教授的18篇论文组成,文章均用原文影印的方式印出,只作个别文字订正,有些文章后面,附有编者据山田教授遗留下的修订本的校注和编者们的意见所写的注记,略有补充,或注明参照事项。这些文章的题目和原载处如下(加\*号者原文为英文,余皆为日文):

1. 回鹘文书:资料与研究,《中央欧亚文化研究的课题与方法》,大阪大学,1975年。

2. 大谷探险队携来回鹘文买卖借贷文书,《西域文化研究》第四(中亚古代语文献),京都法藏馆,1961年。

3. 回鹘文买卖契约书的书式,《西域文化研究》第六(历史与美术的诸问题),京都法藏馆,1962年。

4. 回鹘文借贷契约书的书式,《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1号,1965年。

5. 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所藏东突厥斯坦出土文书类——特别是回

---

〔1〕《中央欧亚大陆史的再构成》,非卖品,1987年;《内陆亚细亚史研究》第4号,1988年再刊。

关回鹘文书,《西南亚研究》第20号,1968年。

6. 回鹘文奴婢文书及养子文书,《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6号,1972年。

7. Bulmiš 文书,《东西文化交流史——松田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京雄山阁,1975年。

8. \* 各国所藏回鹘文书概说,《第三届东亚阿尔泰学会议纪要》,台北,1970年。

9. \* 新疆出土回鹘文契约中的 Tamgha-与 Nishan-形式,《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纪要》,莫斯科,1963年。

10. \* 回鹘文书上的私印与手印,《阿尔泰文明研究论集》,布鲁明顿,1963年。

11. \* 大谷探险队携来回鹘文买卖借贷契约文书(附:回鹘文买卖契约的书式),《东洋文库欧文纪要》第23号,1967年。

12. \* 回鹘文书中的度量衡名称札记四则,《突厥学论集》,布达佩斯,1971年。

13. \* 一件回鹘文奴隶解放契约文书,《亚洲学报》第269卷,巴黎,1981年。

14. Tamgha-与 Nishan-,《足利惇氏博士喜寿纪念东方学印度学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1978年。

15. Tamgha(印章)杂考,《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讲谈社,1961年。

16. Qiyimtu 文书考,《东洋史研究》第34卷第4号,1976年。

17. 回鹘文人质文书,《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2年。

18. 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2号,1968年。

这些日文和英文论文,为人们提供了大批回鹘文契约文书的转写和日、

英文译文,并且探讨了与契约相关联的一些问题。

第2卷是四位编辑委员在山田教授遗稿的基础上,对121件回鹘文契约文书的转写和日文、德文翻译。这是这部著作的核心部分,是编著者对回鹘文献研究的重大贡献,可以说是拉德洛夫/马洛夫《回鹘文书研究》<sup>〔1〕</sup>之后回鹘文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正像庄垣内正弘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部分的日文和德文翻译有时有所不同<sup>〔2〕</sup>,读者应当留意此点。

第3卷是图版集,收录了编者可以找到的119件回鹘文契约文书,许多是从原件直接拍摄的,因此十分清晰。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讲,这是本书的另一个贡献,因为即使是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文书,也是不那么容易见到原件的,更何况远在圣彼得堡、赫尔辛基等地的材料了。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除了本书里刊布的山田信夫教授的18篇论文外,第2卷的参考文献目录中所列小田寿典、茨默、梅村坦、森安孝夫诸位有关契约文书的论文,也都与本书有密切关系,应当参考。在此书出版之后,森安孝夫教授又发表了《回鹘文书札记(之四)》<sup>〔3〕</sup>。他从书式和书体的组合来看回鹘契约文书的年代,得出与山田教授相同的结论,即十至十四世纪。文章最后还有对本书第2卷的若干补正,应据以订正。此外,《内陆亚洲语言研究》第X号上,发表了伊斯拉菲尔先生刊布的一件新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可补此书之缺。

《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是一部收罗较全的资料合集,对我们今后从事法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地域史、语言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感到以下三方面更值得注意。

一、前人已经指出,回鹘文契约深受汉文契约的影响,在汉文契约文书和回鹘文契约文书都已经得到比较完满的整理以后,对比研究仍有待深入

〔1〕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

〔2〕 《东洋史研究》第53卷第2号,1994年,140—141页。

〔3〕 载《内陆亚洲语言研究》第IX号,1994年,63—93页。

一步,而且,这种对比研究应扩大到藏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的契约文书,而单就回鹘文契约文书而言,尤应注意黑城等地出土的元代汉文契约文书。

二、已有一些学者利用已刊的回鹘文契约文书来研究回鹘社会经济史,这一研究应扩大到吐鲁番地域史的许多方面,其中有一些文书有它们出土地的原编号,可以使我们对吐鲁番某一地域的历史面貌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回鹘文契约文书中一些汉语借词的确定,对文书本身的研究贡献极多,如“四至”等等,但也有一些已比定的借词如“官布”仍有疑问<sup>〔1〕</sup>,更重要的是还有相当一批人名、地名、渠名、寺名有待研究勘同,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吐鲁番地区从唐朝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演变到元朝以回鹘人为主体的社会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

(原载《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172—174页。)

---

〔1〕 参看荒川正晴书评,《史学杂志》第103编第8号,1994年。

## 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

1988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了林其燮、陈凤金两位先生合著的《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作者自敦煌卷子中辑得六种《刘子》写本,即P. 3562、P. 2546、P. 3704、P. 3636、罗振玉和傅增湘校录的何穆忞旧藏本、傅增湘校录的刘希亮影写刘幼云旧藏本,刊出每件写本的图版或校录本,并点校排印,做出详细的校勘记,后附敦煌遗书中有关《刘子》的资料《杂抄》影印本五种以及今人就敦煌本《刘子》所写的研究论说。本书是作者在完成《刘子集校》〔1〕后,在《刘子》研究上取得的又一成果,也是对敦煌遗书分类研究的贡献。虽然作者在本书中再次重申的《刘子》作者即刘勰的观点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2〕,但作者在校勘上所下的功夫,受到了同行的好评。

作者收集的六种敦煌《刘子》写本中,据前言所述,最后两种为民国初年国内私家收藏者,一件为何穆忞旧藏,1914年(甲寅)春傅增湘曾经校录一过。此卷1922年(壬戌)归罗振玉所有,但文字已较傅氏校时少了142字,罗氏亦做校勘记,并将录文别刊于《敦煌石室碎金》中。此卷后不知所在,故作者言“此卷原件已不知下落”。另一件是刘幼云旧藏,一直秘不示人,直到1939年(己卯)四月〔3〕,傅增湘才从其长君刘希亮处得见影本,但

〔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2〕 参看杨明照《再论〈刘子〉的作者》,《文史》第30辑,1988年,73—82页;李隆献《刘子作者问题再探》,《台湾大学中文学报》1988年第11期,121页。

〔3〕 《集录》作者误此年代为“乙卯”(1915年),见前言第3页。参看第22页傅氏手迹。



此后情形,作者也说“原件下落不明”〔1〕。因此书中刊出的这两件抄本的图版,只能用1935年5月东方学会印《敦煌石室碎金》木刻本和傅校湖北崇文书局光绪年间木刻二卷本《刘子》来加以影印,使人难见唐本原貌,不免遗憾。

其实,这两件写本均未佚失,数易其主之后,现分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

1990年11月,笔者在日本访查流散的敦煌吐鲁番遗书过程中,曾往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大谷探险队所获而于战后流散到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部分新疆文物,看完大谷收集品后,馆方又安排参观陈列文物,于展品中无意看到一件只展出中间一小部分的“敦煌写本《刘子》”,引起极大兴趣,随即往资料馆,见到全卷清晰照片,方知为罗振玉旧藏卷,经馆方同意,购得照片。此卷已经托裱,首部裱纸上钤“罗振玉印”、“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白文方印各一方(图45)〔2〕;尾部裱纸上钤“松翁鉴藏”白文方印(图46)。其保存情况与罗振玉校录时完全相同,持此原本以校罗氏校录本,知罗校甚精,凡原卷朱笔订正或乙倒处,均已校正,但尚有误,如《崇学》第五“雕以文藻”上漏“则”字,“教始然也”原作“教使然也”,“目之始昧”的“昧”原作“昧”,下“意有暴昧”同,《专学》第六“二关外雍”原作“外壅”,《履信》第八“而不之立行”与“知欲修行而不知立信”下均有“者”字,“吴起不愆后轅之赏”原作“移轅”,“名动于海内”原作“名勋”,“信必而言”原作“言必而言”,“在言前也”前有“则信”。持与傅校本相校,除上述几条中罗校本误而傅氏指出者外,傅校本与罗本不同处,均非原本面貌,傅氏未明言其校本从何而来,笔者颇怀疑他看到的是一个不高明的今人抄本,以致所校多与原本不符,其较罗校本多出的142字,文字也必有讹误无疑。

〔1〕 作者对此本曾有专论,见林其铤、陈凤金《一种未被著录的〈刘子〉敦煌残卷》,《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53—70页。

〔2〕 参看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所收部分文书上的同文印迹。

1981年7月,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印了《敦煌劫余录续编》,揭示出1949年以后该馆入藏的敦煌遗书1065件。其中的“新0688”号为“《刘子新论》卷中九篇”,始于“下可”,终于“第廿”,并记其“共十四纸,二八八行”。但因其来历不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最近,北京图书馆尚林先生根据馆藏档案,查清这件《刘子》写本,就是刘幼云旧藏,经张子厚、黄某之手,于五十年代入藏北图〔1〕。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本现存288行,首部残阙过甚,第四行始于《贵农》第十一的“庙,下可以”,末行至“《因显》第廿”篇名,较傅增湘校本多出48行,可知当年刘希亮出示给傅增湘的影写本并非首尾俱全,其遮住残阙部分的目的,大概是为求高价。刘幼云旧藏卷书写精美,原有行间校订,他日得暇细校,必有可以订正傅校本处。

(原载《书窗》1993年第1期,上海书店,61—63页。)

〔1〕 尚林先生以未刊稿《刘廷琛旧藏敦煌遗书考述》见示,谨此致谢。

##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

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出版的王素先生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是对中国传统经学的一大贡献,也是近年来敦煌吐鲁番学的又一重要成果。

本书正文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校录。《论语郑氏注》自南宋亡佚,明清以来不断有辑佚本出现,但都不足原书的十分之一,无从窥知其书原貌。本世纪初,人们在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古代遗址发现的唐写本中,陆续找到了六件《论语郑氏注》残卷,即英国博物馆藏 S. 3339、S. 6121,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P. 2510,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卷,日本龙谷大学藏大谷探险队得自吐鲁番的断片两件,从而对郑注《论语》有了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1959—1975 年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的五座墓葬中,又发现二十余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其中包括比较完整的所谓卜天寿写本。然而,这些新出土的写本除了卜天寿写本之外,鲜为人知。1977 年,旅居法国的中国学者左景权先生在巴黎参观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时,曾敏锐地发现展出的一件《论语郑氏注》残片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卜天寿本,而是另一写本(现知为 TAM27:39(b)号写本)。左先生希望:“今日何幸我们拥有大宗郑注本文,几达原著的一半。将这些写卷汇印为一册,应是当今亟务。”〔1〕王素先生的《研究》一书,正是对已知所有的唐写本《论语郑

---

〔1〕左景权《敦煌古图书蠡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10 卷上册(1979 年),19—25 页。

氏注》的整理。其校录精选出九件写本作底本,又以其他二十二件作校本,同时收集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白文论语》、《论语集解》、《论语郑氏注对策》和何晏《集解》、皇侃《义疏》、邢昺《义疏》的刊本,以及各种《论语郑氏注》辑本作为参校本,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加之自己的心得,精心作出了录文和详细的校勘记。此书无疑较1978年出版的金谷治《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进了一大步,虽然仅得原书的一半左右,但作为辑佚书来讲,其成就之大自不待言。

本书下卷是研究篇。王素先生除将中国前辈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王重民、陈铁凡的研究成果录入外,还把日本学者月洞让的《关于〈论语郑氏注〉》和金谷治的《郑玄与〈论语〉》两篇长文译出,使读者免去翻检之劳。编者自谦于经学研究并无把握,但收入本书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校读札记》和《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考索》两文,表明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功夫,对有关郑注《论语》的基本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学研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今天,这项研究成果虽不够丰富,但却是难能可贵的。

本书的价值还在于收入了全部唐抄本的图版,其中的新出吐鲁番写本图版,大多是首次公布,虽然有些质量欠佳,但能使人们窥见唐本原貌,并且可检校作者的校录正确与否,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

本书完稿于1986年底,此前发表的《论语郑氏注》可谓收罗殆尽。然而,《论语》是唐朝国子学必修之科,朝廷著之于令,劝励有加。时人趋于功利,争相传习。敦煌吐鲁番出土儒家经典中,以《论语》写本最多<sup>〔1〕</sup>。本书所收集的《论语郑氏注》,也只不过是唐沙州和西州传写流行的该书很小一部分。笔者亦曾留心唐抄本郑注《论语》,得知还有三件唐抄本留存于世间,下面简要加以介绍,以续貂尾。

(一) 1966年发掘的吐鲁番TAM360号墓出土的残卷中,有五残片属于同一件《论语郑氏注公冶苕篇第五》抄本,此墓文书不知为何没有收进十册

〔1〕 参看陈铁凡《三近堂读经札记》,《敦煌学》第1辑,1974年,109页。

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直到最近才由柳洪亮先生发表，因柳氏已做了校勘，此不赘述〔1〕。

(二) 1987年6月25—27日香港举行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期间，上海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举办敦煌吐鲁番文物展览，以后编成《敦煌吐鲁番文物》图录一册，其中所收展品第31号，已由饶宗颐先生判定为《论语》郑注残简，并谓：“存《子罕》第九共三十二行。《论语》正文起‘子云：吾不试故艺’句，迄‘〔衣狐〕者立’句。”饶先生还持此与P. 2510做了正文部分的对校〔2〕。

此件(以下简称A本)藏上海博物馆，首尾俱残，下截大部分残掉三分之一，仅有四行完整，尾部四行上下均残，每行仅可见正文三、四字或注文十字左右(图47)。始于《研究》第105页第17行正文“子云”，止于108页第60行注文“之”字。书法严整，殆唐前期写本。持与《研究》所录P. 2510号底本相校，颇多胜处。今依《研究》录文行数，将校勘所得，表之于下：

P. 2510 底本	A 本
18 艺，伎艺也	无“也”字
18 故多伎艺也	无“也”字
19 我叩其两端焉	“焉”上有“而竭”
20 渐以进之也	“之”下有“鲁读叩其两端，无‘我’，今从古”
21 伤不得见用也	无“用”字
22 弁衣常	“常”作“裳”
23 基服	作“丧之服”
23 人乐也	作“乐人”

〔1〕 柳洪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60号墓出土文书》，《考古》1991年第1期，35—37页；图版柒。

〔2〕 饶宗颐《写经别录》，高美庆编《敦煌吐鲁番文物》，香港，1987年，14页；收入饶宗颐《固庵文录》，台北，1989年，411—412页。

23	下“趋”	下有“者”字
26	忽,谓如恍之惚之惚	作“忽读如恍忽之忽”
26	濡	作“奕”
27	蹇	作“暂”
28	谓立言也	无“也”字
28	绝望之辞也	无“也”字
29	已尽矣	无“矣”字
29	谐	作“階”
29	谓病益困也	“病”作“疾”;无“也”字
31	焉	作“為”
31	追	作“退”
31	无臣之也	无“之”字
31	欲我使我欺	无上“我”字
32	天乎也	无“也”字
32	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	无“予”字;“手”下有“也”字
33	毋宁	“毋”作“无”
33	不如弟子之恩至也	无“也”字
33	且予纵不得大葬	无“且”字
34	大葬,大夫礼葬也	无“也”字
34	致仕乃以大夫礼葬也	无“也”字
35	韞柜而藏诸	“柜”作“匱”
35	求善價而沽诸	“價而”作“贾如”
35	缁,裹也	“缁”作“韞”;无“也”字
35	柜,匣也	“柜”作“匱”;无“也”字
35	匱	作“卖”
36	故發此言	“發”作“设”
36	以视观其意	无“视”字

- |    |           |                     |
|----|-----------|---------------------|
| 36 | 可求善價而卖之也  | “價”作“贾”;无“也”字       |
| 37 | 我待價者也     | “價”作“贾”             |
| 37 | 我坐而待價者    | “價者”作“贾也”           |
| 38 | 有九种       | “种”下有“孔子”二字         |
| 38 | 欲往居之      | “之”下有“也”字           |
| 39 | 返         | 作“反”                |
| 40 | 反鲁        | “反”作“返”             |
| 40 | 不相夺伦      | “伦”下有“也”字           |
| 44 | 二“匱”字     | 均作“箒”               |
| 44 | 吾止也       | 无“也”字               |
| 45 | 少未成匱而止    | “匱”作“箒”             |
| 45 | 人之解倦日日有甚也 | “解”作“懈”,无后“日”字、“也”字 |
| 46 | 犹写也       | 无“也”字               |
| 46 | 以成高大也     | 无“也”字               |
| 50 | 来者之不如今也   | 无“之”字               |
| 50 | 斥颜渊也      | 无“也”字               |
| 50 | 故发言       | “言”上有“此”字           |
| 53 | 能无说乎      | “说”作“悦”             |
| 60 | 子路于诗士太简略  | “士太”作“大事”           |

(三) 另一件《论语郑氏注》残片,是笔者 1991 年在英国图书馆编制 S. 6981 以后的世俗文书目录时发现的。此件编号为 S. 11910,系《述而篇》第七抄本(以下简称 B 本)。四边均残,存十残行,起《研究》第 75 页第 2 行“倦”字,止于 76 页第 8—9 行“有用”(图 48)。B 本有界栏,正文“子”字上例有朱点,持与《研究》一书所收之 S. 6121 号写本相较<sup>〔1〕</sup>,书法、纸质、朱点、界栏全同,审其内容,B 本实系接在 S. 6121 下的残片,其第一行“倦”字,

〔1〕 参看金谷治编《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东京,1978 年,200—202 页图版。

两本各残一半,其二至五行,上接 S. 6121,中间文字没有遗漏。B 本下部仍有残缺,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以下先将 B 本录出,作为底本,再就《研究》所收 TAM184:18/7(b),18/8(b)(《述而篇》第七底本与辛本,本文通称辛本)和 TAM27:38(b)(壬本)两号写本残存文字略做校勘<sup>[1]</sup>。

- 1 〔倦〕
- 2 羲不能徙也。不
- 3 也 申申,减视听  
天天,安容贞子曰。
- 4 汲汲然常梦见之。末年  
此言者,惧倦志道,自
- 5 所以艺子曰:自行束
- 6 有恩好者,以施遗焉。诗  
常有所教诲忠信之道。鲁读
- 7 不以三隅反,则不〔复〕
- 8 人不思其 子食于〔丧〕  
不思也。
- 9 日之  
歌,是
- 10 俱道  
艺有用

以下校记亦按行表出:

- 2 也 辛本无。
- 3 也 辛本、壬本无。
- 4 汲汲然常梦见之 壬本作“不能究”,辛本有“见之”,《研究》合作“不能究见之”。
- 4 自 辛本作“深自”。
- 6 诗 壬本作“诸”。
- 6 教诲 辛本下有“以”字。

[1] 参看《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303—304、361页。



- 6 道 辛本下有“也”字。
- 6 鲁读 辛本无此注。
- 7 隅反 辛本作“隅返”。
- 7 则 辛本下有“吾”字。
- 8 不思也 辛本“也”上有“之”字。

以上只就笔者管见,略作补缺拾遗而已,尚望王素先生及读者诸君有以教之。

(原载《文物》1993年第2期,56—59页。)

## 《敦煌汉文文献》评介

本书是自1980年以来出版的九卷本《讲座敦煌》的第5卷,是最后一本,也是最厚的一本。这一卷内容为讨论敦煌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汉文文献,因此学界盼望已久。正如编者池田温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由于巴黎吴其昱先生执笔的《敦煌汉文写本概观》一篇推迟了很长时间才交稿,所以多半的文章是1980—1981年间就写好而未能发表的。从1981年到本书截稿的1991年,再到1992年由大东出版社出版,敦煌学有了相当大的进步,这在《概观》及有关敦煌官私文书的各个章节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相反,除了类书一章外,有关四部古籍的各章节,没能展现近年来的一些重要成果。但这部新集有些特点,值得称道。

吴其昱《敦煌汉文写本概观》实际是一篇并不只限于汉文写本的通论,内容涉及写本的发现、流散、影印、编目,写本的题材、价值、形制、语言文字、符号等许多方面。这或许可以说是藤枝晃的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1] 之后,对敦煌写本最为扼要而又全面的一篇概说。作者还详细地说明了敦煌佛教文献中最有价值的禅宗文献、中唐新译经论与中世经疏、中世伪经和寺院文书的内容,也对道教、景教、摩尼教文献以及非宗教文献中最有价值的四部书作了提要。本文成文较晚,所列参考文献十分完备,可补本讲座已刊各卷甚至本卷中其他章节有关部分之不足。作者在这篇概论中详录有关《景教三威蒙度赞》和摩尼传记资

---

[1] *Zinbun* 9-10, 1966, 1969.

料,不免有些枝蔓。

伊藤伸《中国书法史上所见之敦煌汉文写本》选取十二件南北朝时期的写本,对比碑志,探讨了南北朝时期的敦煌书法。

石塚晴通《敦煌的加点本》专论写本上表示句读、科段、发音、语意等意义的加点。由于这些朱点在影本和胶片上很难看到,非亲察原卷者不得其详,所以石塚氏的报告至堪注意。

最早接触敦煌写本的中国和日本学者,对儒家经典倍加重视,因为这是清儒所未曾见过的材料,只可惜罗振玉、王重民等先生的时代,所见敦煌写本不全,尚有不少工作要做。由于“文革”对大陆学术的干扰,中国学者只有在海外的陈铁凡、饶宗颐、潘重规诸先生仍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而日本学者却始终未曾间断研究。土田健次郎《儒教典籍》一章,概要介绍了敦煌儒家经典的编号、抄写年代和校勘价值,并且探讨了敦煌所存各种儒家经典的特征、传承,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佚书,于日本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有论列,值得参考。值得提到的是,近年来,敦煌儒家经典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也重新受到重视,如最近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他》(北京,1991年),收罗至富。土田氏将目前已刊儒教经典的书名和文书卷号,列为表一,十分方便读者。笔者1991年在英国图书馆编制未刊敦煌残片时,又比定出S. 9219《周易》王弼注, S. 8464、S. 10524A《尚书孔传》, S. 11563《春秋左氏传》, S. 11910《论语郑注》, S. 9213《孝经郑氏解》, S. 9956、S. 10056 + 10060、S. 12911白文《孝经》, S. 10726A + 10312《御注孝经赞》,可补此表之不备。另外,土田氏将有题记的写本按年代顺序列表二,此表对于我们了解敦煌地区儒学的衰落不可或缺。

专治中国古籍版本的尾崎康氏,在《史籍》一章中,主要讨论了敦煌写本正史、别史、杂史和传记,尤详于正史。对于王重民先生定为蔡谟注的《汉书》佚名者注,他认为可能出自晋灼。尾崎氏在介绍P. 2586时,依罗振玉说定为《晋纪》,虽然指出此本形式和文体与吐鲁番新出的孙盛《晋阳秋》

相类,但不知周一良先生早已订正此本即孙盛之书<sup>〔1〕</sup>,饶宗颐教授也同意周说<sup>〔2〕</sup>。尾崎氏指出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绍熙刊本《史记》的栏外,有《春秋后语》的佚文多条,为台北康世昌的新辑本所未载<sup>〔3〕</sup>,因而至堪注意。他提到的东洋文库藏镰仓时代写本虞世南《帝王略论》,也是探讨P. 2636所抄同书的重要参考材料,林聪明先生已有详细论证,见《东吴文史学报》第6期(1988年)。此外,尾崎氏认为藤枝晃先生定为《张淮深碑》的写本,很可能是一篇传记,笔者以为藤枝先生的说法不误,只是碑文的原名很可能是另一敦煌写本上所题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见近刊《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所收拙稿。

在《地理书》一章中,日比野丈夫氏指出敦煌所出地理书全是佚书,故而备受重视。文章只就十六种地理书的研究状况略加介绍,没有新的论说。实际上,敦煌地理文书中尚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虽然在日比野氏此文完稿后郑炳林氏出版了《敦煌地理文书辑校》一书<sup>〔4〕</sup>,但是这些文书的研究和校录工作尚有待完善。

台北的王三庆先生贡献给本书的《类书》一章,是一篇力作,此文首次全面系统地分类整理了敦煌文书中除佛道类书外的所有类书,共分六类四十一一种,计112件写本。文中对每一种类书的作者、卷号、子目及各卷保存情况作了说明,有序者照录,无者则作解题;此外,还探讨了敦煌类书写本的特征、用途,恰当地阐明了它们的价值。作者本人以及郑阿财、陈庆浩、郭长城、朱凤玉诸氏,已经发表了《类林》、《勤读书抄》、《新集文词九经抄》、《励忠节抄》、《语对》、《古贤集》、《兔园策府》、《杂抄》等篇的校录研究,我们希望其他类书也能早日出版,因为这些文献是研究整个中古文化史的重要素材。

〔1〕 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8页。

〔2〕 见《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1986年,3页。

〔3〕 见《敦煌学》第14—15辑。

〔4〕 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东野治之《训蒙书》完稿于1984年10月,因此只就《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 Giles 目录所记学郎写本来统计蒙书的范围,似有未备,此点可参看郑阿财《敦煌写本蒙书概论》的分类解说<sup>〔1〕</sup>。东野氏文章的重点在于探讨《千字文》,特别是对照日本古抄本李暹《注千字文》,指出S. 5471和P. 3973《注千字文》写本乃取舍杂糅先前诸注而成;并且认为S. 5467和S. 5961《新合六字千文一卷》写本,即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著录的“加五百字千字文一卷”。东野氏指出,日本和敦煌同样处在唐朝的边境位置,因此学术和文学作品有共同性,日本传存的旧抄本对于敦煌文献的研究至关重要,反之亦然。除了东野氏的文章外,上述本书《儒教经典》和《史籍》两章也充分地利用了日本古写本文献。推而广之,日本学者在研究唐朝官文书时,同样得助于《令集解》、《令义解》、《延喜式》等,这是历来中国学者忽视的,敦煌学界亦然,故亟应有中国学者系统地收集日本传存的中国古籍写本和近年该国出土木简中的典籍材料,在中国出版流传。在日本古写本的整理上,中国学者有母语的优势,试看东野氏所录古抄本李暹《注千字文》序中一段:“遇大司徒侯景称兵作乱、遂为之维繫奔梁、不可得还业(邲?)、无路岁次、大火被逼、入关遂在西京。”此段实应标点为:“遇大司徒侯景称兵作乱,遂为之维繫,奔梁不可得,还业(邲)无路。岁次大火,被逼入关,遂在西京。”

以下菅原信海《占筮书》、宫岛一彦《历书算书》、宫下三郎《敦煌本的本草医书》三章,概述了这四类文献的写本。这些专门之学,笔者不敢妄加评论,唯请读者注意以下相关研究文献:马克(Marc Kalinowski)《敦煌数占小考》<sup>〔2〕</sup>、席泽宗与邓文宽合撰《敦煌残历定年》<sup>〔3〕</sup>、赵健雄《敦煌医粹》<sup>〔4〕</sup>。

〔1〕 《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2年。

〔2〕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续篇》,1991年。

〔3〕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2期,1989年。

〔4〕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与其他章有所不同,冈野诚《敦煌资料与唐代法典研究——西域发现之唐律律疏断简的再检讨》一文,实为对作者与山本达郎、池田温合著之《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第1卷《法制文书》<sup>〔1〕</sup>一书的补充,专论此书出版后新出的敦煌《名例律》(S. 9460)、《职制律》写本(丽字85号)和吐鲁番《名例律》写本,对已有的考释加以评估,认为遽定前二者的年代尚缺乏证据,因为文书过残。此文中文本将发表在《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

对唐代官文书研究贡献极多的中村裕一氏,其许多研究成果发表在《武库川女子大学史学研究室报告》中,即使在日本也不易找全。曾见近年有人撰文于中村氏对唐代“王言之制”的考释多所批评,但实未看全中村氏的论著,1991年中村氏同时出版了《唐代制敕研究》(汲古书院)和《唐代官文书研究》(中文出版社)二书,使我们能够方便地得知其有关论述,而收入本书的氏撰《官文书》一章,正可视作这两部有些过于繁琐的大书的摘要和读书指南。在本文中,中村氏以敦煌材料为主,依次介绍了制书、发日敕书、敕旨、论事敕书、敕牒等王言类,奏抄、表、状、牒等上行文书,制授、敕授、奏授等告身,过所以及补任文书、公验、帖、榜、致书等公式令规定以外的官文书。笔者所能补充的是论事敕书一种,近年发现了S. 11287《景云二年(711)七月九日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是唐中央朝廷下发到沙州的敕书原本,形式俱全,远较中村氏所举《敕洪誓诏书本》能说明问题。此文书的彩色图版,已发表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一书的每一卷木匣封面上,录文见拙稿《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阆影响的几个问题》<sup>〔2〕</sup>。另一点补充是,中村氏提到的被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戊编误标为“令狐怀寂军符”的那件告身,与上述S. 11287同样,原是粘在经帙上

〔1〕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Legal Texts*, The Toyo Bunko 1978.

〔2〕 载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创刊号,1992年。

的,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经帙”条也曾著录此件,当是1909年与王仁俊同在北京伯希和寓所亲见,但此后研究者不知其所在。直到1989年3月,Laure Feugère在《伯希和的敦煌收集品》一文中,发表此经帙图版<sup>[1]</sup>,方知在巴黎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编号EO.1208。以上两件文书,值得从官文书的角度加以考察。

竺沙雅章《寺院文书》一章,重点论述了有关敦煌佛教教团的组织、运营和僧尼宗教活动的文书,由于作者曾对敦煌的僧官制度及僧尼籍等资料下过工夫,因此本文通过各类文书,简明地描绘出敦煌佛教社会的实相。本文也和竺沙先生最近发表的《敦煌吐蕃期的僧官制度》<sup>[2]</sup>一样,在各个不同文书中记录的僧名对证上有许多创获。今后敦煌文书的深入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此,人名索引的编纂将是一项艰苦而有意义的工作。

池田温《契》分类概述了买卖、交换、贷借、雇佣、遗书、分书、放书及契书仪的形式和内容,还极为完备地介绍了契的研究史,包括非汉文契约文书,较此前作者发表在《汉学研究》4卷2期上的《吐鲁番敦煌契券概观》更为详尽。此文实为池田先生与山本达郎先生合著之《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第3卷《契约》<sup>[3]</sup>的成果,这部以英语解题的著作,发表了约520件契约文书的录文和图版(其中251件敦煌文书),与此同时完稿的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真迹释录》第2辑,于1990年由北京的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收录以敦煌为主的契约186件。池田先生比较了两书的内容和特点,并指出《真迹释录》图版欠佳,对于参考文献和已刊录文注记不全。实际上,这不仅是《真迹释录》一书的缺点,而是中国许多出版物的通病,注记不全应当由研究者努力改进,图版欠佳则主要是学术经费不足。

[1] “The Pelliot Collection from Dunhuang”, 见 *Orientalism*, 20. 3; 《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有中文译本。

[2] 《东亚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90年。

[3]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II. Contracts, The Toyo Bunko, 1986-1987.

周一良先生贡献给本书的《唐代书仪的类型》，是一系列书仪研究中的一篇，本文的中文原文题作《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sup>〔1〕</sup>，但本文有编者池田温先生加的注，值得参考。

作为全书的主编，池田温《敦煌汉文写本的价值》算是本卷的总结发言了。此文虽然很短，但内容丰富。首先，作者提纲挈领式地指出，在外观破碎的残卷或残片上，保存了学术上看来最珍贵的资料：十一世纪印刷术普及以前的大批写本；为旧史家所忽视的物质、精神生活与基层社会构造史料；各种各样的古佚文献和书法标本等等。其次，作者讨论了敦煌写本中的伪物问题，介绍了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对流散敦煌写本中伪物的种种论说，并据自己在《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的研究成果，谈了对伪物的看法。最后，作者进而讨论了敦煌写本的真伪鉴别，指出了伪品的内容和外观的一些特征。笔者与林悟殊教授最近发表的《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sup>〔2〕</sup>，就是从内外两方面来论证日本小岛靖所得《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实系伪造，可以作为池田先生论文的一个注脚，唯此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因为目前中国各地收藏的敦煌写本正计划陆续公布，辨伪问题至关重要。

本书可以说是对八十多年来敦煌汉文文献研究的一次总结，读本书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即敦煌汉文文书的研究已经从过去的挖宝式，全面进入总体分类研究的阶段。本书使人了解前人已经做了的工作和不足，也为今后的敦煌学研究应向何处发展提供了指南。

(原载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东方文化》第31卷第1期,1993年,174—178页。)

〔1〕 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并收入作者《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2〕 《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学专期，1992年。



## 《写本时代(十世纪以前)的中国藏书》评介

1991年,巴黎出版了戴仁(Jean-Pierre Drège)先生所著《写本时代(十世纪以前)的中国藏书》(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 manuscrits),列《法国远东学院丛刊》第161种(Pu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ume CLXI)。全书由五章组成,即第1章皇家藏书,第2章藏书的分类法,第3章私家藏书、藏书家与讲学,第4章佛教藏书,第5章道教目录与藏书。不言而喻,这是一部探讨宋代刻本充当藏书主体之前的中国藏书通史。

戴仁先生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书史、书册制度以及敦煌学的论文,特别是在敦煌写本的形制、用纸、文字等方面,成绩斐然。本书(以下简称戴著)则从藏书的角度,结合文献和敦煌文书,对中国藏书史作全面的论说。对于熟悉图书馆学史的读者来说,本书的特点及优点,在于其利用敦煌文书阐明佛教藏书的部分,这也是笔者关注的焦点。

无独有偶,199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方广錩博士的《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以下简称方书),与本书第4章探讨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上,惟本期《九州学刊》有谭世宝先生评方书的专文;最近,台北出版的《敦煌学》第19辑,也刊出汪娟女史对方书的批评介绍。因此,以下仍以戴著为主要评介对象。

从总体上看,戴著较方书篇幅要少,分析自然不如方书细致;在资料的使用上,戴著与方书虽各有优劣,但以戴著取材更为广泛。

戴书第4章共四节,虽然总标题表明是以一般的佛教藏经为研究对

象,但几乎全部是以敦煌写本作为论据的。第1节首先概述了从竺法护到圆照所编的各种藏经目录及其分类方法,然后重点介绍了敦煌所保存的重要经录。所概述的目录,大致以年代先后为序,首先是学界一般称之为现存最早的经录《众经别录》(P. 3747, S. 2872)。然而,戴著当然尚未注意到谭世宝著《汉唐佛教史探真》<sup>〔1〕</sup>中的不同说法,因此对于所谓《众经别录》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在有关《大唐内典录》部分,戴著详细对比了S. 2079与彦琮录及静泰录的关系,但却忽视了自己所列为《内典录》的P. 3807实际上与之内容完全相同。这两件写本,方书做了录文,并考证其为以《内典录》为依据的敦煌龙兴寺藏经目录。戴著可谓失之交臂。然而,这一节最重要的是刊出了前此尚未公布的俄藏Φ. 221号《大乘入藏录》,并且发表了该残卷的图版。这件写本提到玄逸法师的《略录》,因文书下残,不知是否就是玄逸所著《释教广品历章》三十卷中的内容,但无论如何,它提醒人们在讨论敦煌佛寺藏经目录时,不应仅仅在《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现存经录中考虑问题。还值得提到的是,与S. 3624《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有关的另两件目录,现藏北京图书馆和敦煌研究院,详参施萍婷女史的论文<sup>〔2〕</sup>。

第2节寺院藏书的组成,分四小节探讨写经的抄造、捐赠等问题,对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冯熙写经、东阳王造经以及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写经活动,均有所论列。特别是对各种杂文书中有关纸张的捐赠记录和有关经帙的记载的辑录,不仅对于研究藏书史,而且对于研究中古佛教社会史也极有参考价值。然则,伦敦、巴黎实际藏有一些经帙的实物,似乎没有受到充分的认识。此外,戴著在探讨敦煌的抄经活动时,注意到藏文文献中的有关记录。事实上,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佛典,与汉文佛典同样是当时寺院藏书的组成部分,本期发表的方广錩《关于敦煌遗书北新八七六号》,即证明了吐蕃

〔1〕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2〕 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2年。

统治末期到归义军初期活跃于敦煌的高僧法成所用的“诸杂蕃汉经论”，在其去世后得到妥善的收藏。因此，仅仅从汉文角度探讨敦煌藏经问题是片面的，戴著虽然注意到这一点，但却没有深入下去。

第3节研究藏书制度问题，对于敦煌寺院经藏的构造，从经楼到经案，以及分上下藏问题，都有详明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戴著进而讨论了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原藏地问题。这个问题关涉到对敦煌文献的全面理解及藏经洞的封闭等许多重要的问题，藤枝晃教授曾根据自己对《大般若经》藏卷数量的统计，提出藏经洞文书来自一个寺，即三界寺的说法〔1〕。戴著则据现在所见到的材料，指出《大般若经》并非一寺只有一部，从根本上反驳了藤枝氏的说法。P. 4660(10)《沙州释门勾当福田判官辞弃邈生赞》记：“数部般若，紊乱纷然。处处零落，散失人寰。收拾排合，教理可宣。尽归龙藏，各使牢坚。”似说明敦煌教团所在的都僧统司本身，有保存经藏的龙藏，其中就有数部《般若》。

如何理解藏经洞出土的各寺原藏经，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笔者将另撰专文讨论。我们应当感谢戴仁先生的是，他在本章附录中，根据写本上的印章和寺名注记，详列了可以肯定的文书来源，包括报恩、金光明、净土、开元、莲台、灵图、灵修、龙兴、普光、乾明、乾元、三界、圣光、显德、永安和永寿寺所藏的佛典实物。戴著在此使用了伦敦未刊 S. 10000 号以后的写本约一百五十余件，可以说是对学界的新贡献。不过，据我 1991 年在伦敦编目时所见，尚有不少同类文书未被利用，如属于大乘寺的 S. 10900、S. 11373 等，这些材料大部分将选收入即将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第 12—14 卷中（四川人民出版社印）。在本节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图书分类和编号系统，有关《开元释教录》和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的比较，颇值得参考。对于后者，有许端容氏的专门研究，载《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 年），可以参看。

〔1〕 见 *Journal Asiatique*, 269, 1981, pp. 66-67.

第4节则专门研究敦煌的各种藏经文献,包括写经、勘经、借经、欠经记录,对于理解敦煌藏经的管理体制,以及对全面整理敦煌佛典,均有参考价值。

随着敦煌写本渐渐地全部公开,从整体上研究敦煌文献的来源、组织等问题成为可能。然而,戴著和方书只是这项艰巨研究的开始,也就是对藏经洞出土文献占主体的汉文佛典的研究。事实上,要全面地理解藏经洞出土文献和文物,还应当考虑佛典之外的四部书、绢纸绘画,以及藏、粟特、回鹘、于阗等非汉语文献的存在。因此,藏经洞出土材料虽然有了九十余年的研究史,但在笔者看来仍然是个谜。

(原载《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敦煌学专号,1995年3月,171—173页。)

## 《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评介

近年来,学术界创办了许多新刊,要在这个百家争鸣的领域里立足,是要体现出自己的特色的。方广錩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就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学术刊物。该刊的主旨是想把所能收集到的藏外佛典,即不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入的各种佛教文献,悉数加以校录刊布。编者取材的范围包括敦煌佚书、近代汉译佛典、僧人著作、散在传世文献中的资料等等,而第1辑所刊文献,大多数是敦煌写本,而且有不少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孤本文献,学界从未有缘见其真相。因此,本刊第1辑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于1995年12月出版后,立刻引起学术界相关同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敦煌学界的同仁,更是如此。据笔者管见所及,已见到三篇书评,即邓文宽的书评<sup>〔1〕</sup>、黄征与杨芳茵的书评及林世田的书评<sup>〔2〕</sup>。其实,该刊所录的文献,不仅是敦煌学与佛学的研究素材,也是值得唐代研究者注意的文献材料,因为其所刊敦煌禅籍和疑伪经,都是我们探讨唐代思想和社会时所不可忽略的资料。

上述三篇书评已经充分肯定了该刊在佛教文献学上的价值,并依敦煌写本的校录原则,提出若干文字校录上可商榷的地方。他们已谈的几个方面,这里不必赘言,以下只提示一下该刊所录文献在某些方面的价值,并略述笔者对个别文献解题或研究的补充意见。

---

〔1〕 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

〔2〕 两文均为提交1996年10月兰州召开的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本辑所刊文献依类分成五组。

第一组“敦煌禅籍”有三种,即《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论》、《禅策问答》、《息诤论》,实际都来自北图藏新 1254 + 新 1255 号。这三种文献连续书写,第一种首残,由田中良昭先生比定为《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论》,原有 P. 2039 写卷,由田中良昭发表<sup>〔1〕</sup>。第二种《禅策问答》据称为孤本,尤值得留意。第三种《息诤论》题达摩禅师作,是早期禅宗思想史料。卷末有王质作五、七言诗数首。这个王质,不知是否就是文宗时的宣州刺史王质<sup>〔2〕</sup>?本书也没有解答,有待详考。这三种禅籍发表前,整理者方广錡先生曾把录文带到京都,在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的研究班上讨论,所以整理工作得到日本学者的帮助。

第二组密教典籍只有一种,即《八种粗重犯堕》,是俄藏黑城出土但混入敦煌写本者,现编号 Φ. 221,由方广錡整理,被认为是西夏文献。

第三组三藏论疏有三种,是篇幅最多的一组。

《天请问经疏》,文轨著,是对玄奘译《天请问经》的注疏。《大正藏》卷八五曾录北图藏黄 19(北 6662),但非全本。王惠民《关于〈天请问经〉和天请问经变的几个问题》<sup>〔3〕</sup>,已经指出北图新 316 完本的重要。这次整理者李际宁先生即以此本为底本,参校北 6662 和 P. 2135,录出全本,功德无量。新 316 系原大谷探险队所得,且经过校勘,颇可信赖。后附李际宁《文轨的著作及其它》<sup>〔4〕</sup>,探讨了作者文轨的生平和著述,确认其为玄奘弟子,并进而推断此书产生的年代及其归属。

《〈行事钞〉中分门图录》,由苏军先生据北图新 722 号孤本整理而成。此《分门图录》系京兆崇义寺沙门道宣述,是研究唐代律宗的新资料。

《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由苏军据北图 L. 3736 + 新 1400 整理而成,

〔1〕 《敦煌禅宗文献之研究》,东京,1983 年。

〔2〕 《旧唐书》卷一六三、《新唐书》卷一六四。

〔3〕 《敦煌研究》1994 年第 2 期。

〔4〕 又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5 年第 3—4 期。

是该疏卷三的完本,而此前《大正藏》卷二九只收有一个敦煌节本(P. 3196)。此《疏》产生于公元六世纪,梵本已佚,但从梵本译成的藏文本仍存。英藏敦煌文献中还有两件由汉文译成回鹘文的本子(Or. 8212—75A/B),长达7015行,相当于汉文本的卷一和卷四,已由庄垣内正弘在三卷本《古代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之研究》做了彻底的整理研究<sup>〔1〕</sup>。新刊此《疏》卷三的汉文本虽然与回鹘文不完全对应,但仍然会对回鹘文的研究有所贡献。庄垣内氏在最近发表的《关于回鹘文本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的内容》已经注意到北图藏本<sup>〔2〕</sup>,但尚未寓目。

第四组疑伪经有八篇,也是最能反映唐代社会思潮的文献材料。

《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附注疏)是一部重要的禅宗系伪经,《大正藏》卷八五据S. 2474录出一个残注疏本。1931年,赖歌尔特(H. Reichelt)刊布了英国图书馆藏Or. 8212(160)号粟特文佛典,戴密微(P. Demiéville)教授认为相当于汉文《头陀经》残本后面缺失的部分,这一比定虽然为学界认同,但无法确认。近年来,伊吹敦先生从研究禅学的目的出发,用粟特文本来复原汉文原本<sup>〔3〕</sup>。这次整理者方广錫先生以北图新1569为底本,校以S. 2474、P. 2052、三井文库藏本、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本、伊吹敦复原粟特文本,提供给学界一个全本。在所有六本中,一半是没有公布资料,整理者能把它们汇在一起,不知付出了多少辛苦。同时此本的整理,得到了日本学者衣川贤次、吉田丰、伊吹敦诸氏的大力帮助,使得此校录本在参照古今文献上,远比其他几种做得充分。随着汉文完本的公布,应当可以全面比定粟特文本了,这不仅对粟特语言文字的研究有所帮助,也有助于我们对入华粟特人佛教信仰的深入探讨。但应当指出的是,附录的《关于〈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一文,对粟特文本的原编号Ch. 00353有所误解,甚至怀疑

〔1〕 京都,1991—1993年。

〔2〕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ed. by R. E. Emmerick et al., Berlin 1996, pp. 293-306.

〔3〕 载《亚洲文化与思想论丛》第2号,1993年。

是斯坦因从其他地方发掘所得。实际上,Ch 是 Ch'ien-fo-tung(千佛洞)的缩写,即敦煌莫高窟。Ch 编号的文书,主要来自藏经洞,个别的出自北区元代窟,如上述 Or. 8212(75A/B)。粟特文本《头陀经》出自敦煌藏经洞,当无疑义。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只有北图玉 64(北 8300)一卷,由方广錩整理,他此前已写过《敦煌写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简析》<sup>〔1〕</sup>。

《最胜妙定经》用北图新 330 和临 1757 两号合校而成。

《佛说水月光观音菩萨经》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4532 号校录,后附整理者方广錩先生的说明,提示此卷与 P. 2055 的关系。遗憾的是未能参考施萍婷《一件珍贵的社会史史料》和王惠民《敦煌写本〈水月观音经〉研究》两文<sup>〔2〕</sup>,前者已经指出属于同卷的除津艺 4532 和 P. 2055 外,还有北图冈 44;后者则已经据津艺原卷做了录文,还指出此经是截取《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发愿文而成。

《佛说金刚经纂》由方广錩据 P. 3024 + S. 2565 缀合本整理。

《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由徐绍强据奈 59(北 76)等写本整理而成。

《天公经》不长,现存三本互有参差,整理者方广錩分据北图新 627、鸟 62、S. 2714 录成三本,以便读者对照研究。

《佛母经》写本较多,《大正藏》卷八五只据 S. 2084 录一种,整理者李际宁先生收集了 26 件写本,区分为四个系统,分别校录成四本,这一工作较川崎氏《关于〈佛母经〉》<sup>〔3〕</sup>更进一步。

本书最后有研究论文一篇:方广錩《关于禅藏与敦煌禅籍的若干问题》,其繁简不同的文本,还刊载于《禅学研究》第 2 辑(1994 年)、《中国嵩山少林寺建寺 15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sup>〔4〕</sup>,已广为学界所知。

〔1〕 载《南亚研究》1988 年第 2 期。

〔2〕 分别载《敦煌研究》1987 年第 2 期、1992 年第 3 期。

〔3〕 《东洋学论丛》第 12 号,1987 年。

〔4〕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年。



惟此问题比较复杂,这里暂不讨论。

总之,《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根据以北图所藏为主的未刊敦煌写本,为学界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值得唐代思想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学者深入研究。本书部分文献的校录,得到了日本佛教专家的帮助,表明《藏外佛教文献》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从全书的录文看,虽然尚有不少文字可商,但每一位整理者的认真负责的校录,集体讨论的方式,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笔者感到最遗憾的是对已有的前人工作成果吸收不够,甚至所据的一些原材料也未注明出处,为了把这件事做成功、做好,仅提出这样一点意见。当然笔者更大的愿望,是有关出版单位能够尽早刊布北图所藏新、临等编号的未刊敦煌文献。

(原载《唐研究》第2卷,1996年,463—466页。)

## 台北“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评介

1986年8月1—3日,在台北召开了“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共五十九人,四十五人来自台湾各地,其他人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香港、日本、南朝鲜和美国。会议共收到论文三十一篇。近承陈庆浩先生的帮助,自香港辗转收到提交会议的全部论文,披览之余,颇感有向同好介绍的必要。但会议论文涉及面很广,以下评介容有不当,请各行专家指正。

饶宗颐(香港中文大学)《敦煌与吐鲁番写本孙盛〈晋春秋〉及其“传之外国”考》(1—8页)一文,在王素<sup>[1]</sup>、陈国灿和李征<sup>[2]</sup>研究的基础上,肯定吐鲁番阿斯塔那151号墓所出残卷即孙盛《晋春秋》(即《晋阳秋》),并列举周一良先生考订的敦煌写本P.2586号《晋春秋》和南朝鲜弘文馆所辑《文献备考·艺文考》刊出书单有孙盛《晋阳秋》等材料,证实了《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所记“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的记载;指出孙盛之书在晋唐之间,不仅传之辽东,且播及西陲。至于新发现的北传本之来源,未必迟至苻坚建元之末江汉人万户徙于敦煌时,因为孙盛之书此前早已入燕,或可由燕入秦。

池田温(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吐鲁番、敦煌契券概观》(9—57页),是所有论文中篇幅最长的一份。本文先阐明契券在中国古代历史

---

[1] 《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25—47页。

[2] 《出土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52—158页。

上的地位及其普遍应用的情况,并概要介绍了各国学者对各种契券的研究历史。然后分别说明吐鲁番、敦煌、龟兹和于阕等地发现的契券的内涵和特点,按内容将契券细分为二十种,并分别举出实例,所录文对前人所录多有改正。作者指出,中亚出土的佉卢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似应补上于阕文)契券和敦煌、吐鲁番汉文契券的比较研究,是将来应当努力钻研的有趣课题。文末附录《中国古代契券略目》和《吐鲁番、敦煌等契券分类略表》<sup>〔1〕</sup>,按出土地点、时间,分类罗列所有已知契券的名称和编号,总计四百九十九号,可谓富矣。此文是作者自1973年和1975年发表《中国古代的租佃契》上、中两篇以来,对契约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所有契券的录文和综合研究将在作者和山本达郎合编的集录《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第3卷《契约文书》中刊出。

金荣华(在南朝鲜檀国大学中文系执教)《斯坦因(1862—1943年)——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59—72页)一文,根据斯坦因自己的记述,特别是作者在伦敦英国博物馆调查斯坦因取走的佛画时亲眼所见原物状态,说明斯坦因在中国的种种盗掘、骗取行径,批驳西方世界给予他的奖励和密尔斯基在斯坦因传中的种种辩解。据笔者所知,金荣华还以“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为副题,写有《蒋孝琬》、《潘震》、《汪宗翰》等文<sup>〔2〕</sup>,这种系统的探讨,补足了“敦煌学”研究的一个侧面。

关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敦煌写本,张广达<sup>〔3〕</sup>、姜伯勤<sup>〔4〕</sup>、黄振华<sup>〔5〕</sup>、徐文堪<sup>〔6〕</sup>等均曾撰文介绍,但因未睹原件,所以难尽其详。吴其昱(法国科研中心)根据他1983年秋在列宁格勒的亲

〔1〕 此已正式刊于1986年3月东京出版的《中国朝鲜文书史料研究》中。

〔2〕 载《华冈文科学报》第13、14、15期,1981—1983年。

〔3〕 《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2期。

〔4〕 《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5〕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

〔6〕 《读书》1986年第10期。

自调查,写成《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73—82页),较为具体确切地记录了这个收集品的基本情况:藏卷总数是11375号,共分五部分。(1)F. 1—325号是三十年代K. K. Flug所编号码;(2)Dh. 1—2800为图书馆藏书号。以上两部分基本上已编入孟西可夫主编的《目录》中(1963、1967年);(3)Dh. 2801—9584号,大都为手掌大小的碎片;(4)Dh. 9585—10150号则是奥登堡于1909年购自黑水城等地,非敦煌所出;(5)Dh. 10151—11050号为一纸或更小的碎片,其中十一个号,有号无书。文章强调这些文书中碎片特多,且来源不一,甚至有一件(10467号)是用近代越南字喃写的《中庸章句》,不知何时混入。从内容上看,仍以佛书居多,但也不乏孤本和珍本,如作者文中校录的开元时广文馆博士郑虔残札二通(10839号)、《孟兰盆经讲经文》(10734号)等。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粟特文、回鹘文、藏文、梵文文献。

由于敦煌文书散在世界各地,所以写本目录的编制是敦煌文书研究的基本工作,同时也是比较难做的工作。近年,黄永武(成功大学文学院)在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又据缩微照片,对已公布的斯坦因、伯希和和北京图书馆收集品重加爬梳,其成果综合反映在他辑印的《敦煌宝藏》中。在提交这次会议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83—108页)一文中,作者除了补充《宝藏》付印后又比定出的斯坦因卷子和北图藏卷的名目外,特别对王重民的《伯希和劫经录》加以订补,还据照片把王目编成后法国国立图书馆又找到的残片P. 5580—6038号编制了新目。黄永武的工作为我们目前检索敦煌写卷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将来编制完整的“敦煌遗书总目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近年来,戴仁(法国远东学院敦煌研究组)一直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来研究敦煌写本,成绩卓然。在提交会议的《敦煌写本的物质性分析》(109—114页)一文中,他介绍了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形态学的分析法,即测定出纸张的长宽厚度、帘条纹和编织纹间的距离以及形状、颜色等特征,再根据有年款的写本,确定写本纸张的类型。这种方法可以推定没有书写日期的写本的年代,同时能够检查出某些收藏品中的赝品。作者用这种方法分析

了斯坦因卷子中 35 件带有武则天新字的写本,认为只有 8 件抄于武后时代,而其余 27 件只不过是九、十世纪时的过录本,这一结论是值得注意的。另一种方法是微量化学性分析,即用显微镜等设备对纸张纤维、纸药、染料、色素甚至墨进行分析,以确定更精密、更有用的类型。对于敦煌文书的研究者来说,最好能够掌握这种新的方法,至少应当了解这种方法研究写本的已有成果。

潘重规(“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可以说是台湾“敦煌学”的倡导者和带头人,培养和影响了一批年轻人。他的《敦煌王梵志诗新探》(115—128 页)强调了王梵志是个平常的人,而不像个别日本学者所说的那么神秘,他的作品是讽刺当前时事、歌咏平实道理的通俗诗。本文的主要论点已见于作者 1985 年 4 月 11 日发表在《中央日报·文艺评论》第 54 期上的《王梵志出生时代的新观察——解答全唐诗不收王梵志诗之谜》一文。

罗宗涛(政治大学文学院)《敦煌讲经变文〈古吟上下〉探原》(129—140 页),专门探讨了讲经变文中的一类诗歌。这类诗有时标明“古吟上下”、“吟上下”、“上下吟”、“吟”、“平侧”等字眼,或未标注,但特征是一、二句,三、四句……最后一字的平仄必定相异,而二、三句,四、五句……末了一字的平仄又必定相同。作者认为,这种诗律初见于隋阁那崛多所译的《佛本行集经》中的偈子,它虽未见于中国传统的诗歌,在敦煌讲史性变文中也很难找见,但它透露了佛典的翻译对中国诗歌声律的影响,这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译经与变文的关系。

邱燮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唐代敦煌曲的时代使命》(141—157 页),是从民俗学的角度说明敦煌曲子词的社会、文化、宗教、教育、文学五种使命,可以加深人们对曲子词的社会功能的认识。

程石泉(师范大学教育系)《由敦煌词看词之起源》,是根据敦煌词的年代,批驳胡适等人关于词是八世纪下半叶由绝句发展来的说法,认为词早在开元、天宝时就和绝句并行了。此文在 1970 年就刊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AOS)第 90 卷第 2 期而为学界所知。

车柱环(南朝鲜汉城大学东洋学研究所)的《敦煌词中的男女》(159—172页)一文,简要地探讨了敦煌曲子词中“艳情与闺怨”的主题以及“社会阶层”、“衣着穿戴”的反映。该文是这次会议收到的唯一一篇南朝鲜学者的论文,限于汉文水平,质量不是很高。但近年来南朝鲜的中国学研究发展很快,其学术成果值得注意。

杜玫仪(淡江大学中文系)《敦煌曲在词学研究上之价值》(173—197页)是作者多年来探讨敦煌曲的总结性论文。文章分六节说明敦煌曲对词学研究的贡献:(1)证明词体的成立应在盛唐以前;(2)可藉以考订词调流变的轨迹,不同调名的衍生关系;(3)帮助了解长调慢词的区别和短调、中调、长调同时并茂的情形;(4)表明词题起源早在唐代,而不必晚至北宋;(5)可以论断词中加衬的确实存在;(6)结合敦煌发现的舞谱调名,说明曲子词亦兼歌舞。以上综论对前人有补充,有批驳,不失为一篇词学研究的佳作。

陈祚龙(法国远东学院)《看了敦煌古抄〈报恩寺开温室浴僧记〉以后》(199—222)页,先将P. 3265《报恩寺开温室浴僧记》据原卷抄出,再推测它来源于后汉安世高译《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然后说明中古佛寺浴室的普遍存在,以及佛教这种制度对道教的影响。陈氏近年在台湾公私刊物上发表文章甚多,结成集的已有数种。但他的论著,除早年用法文发表的几种外,大多芜辞过半,如国内曾经介绍过的《敦煌学要龠》一书,即大多抄自他书,发明甚少。然作者身居巴黎,可以随时借阅伯希和写本原卷,因此,其大、小文章中的写本录文及校语最值得注意,特别是我们在国内缩微胶片上看不到的红字、朱记、印鉴之类。如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据北大图书馆等处所藏拓片及诸家录文,校录出较完整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龕碑》<sup>〔1〕</sup>,但阙文尚多。其实,P. 2551号内有唐人抄的此碑文字残本,因用红色淡墨所写,故在缩微胶卷上几乎看不到一个字。早年王重民

〔1〕 载《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56—61页。

先生的录文欠佳。陈祚龙在《敦煌学新记》中抄出此卷所保存的碑文,初载《幼狮学志》第14卷第1期(1977年2月出版),后收入《敦煌文物随笔》<sup>〔1〕</sup>。据陈氏录文,至少可为李氏录文补52字,而异读亦堪推敲取舍。将来若能以李永宁录文为基础,对勘P.2551号原卷,再参考那波利贞、石璋如等人的录文,一定能提供一个更完整、更精确的《李克让碑》录文。

释晓云(华梵佛学研究所)《敦煌壁画佛经变相与现代经变图》(223—230页)借敦煌壁画的经变图来阐明寓佛法于艺术的道理。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批唐五代文献表明,当时这里的文化水平是相当高的,这无疑与当地的教育有密切关系。高明士(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唐代敦煌的教育》(231—270页),把敦煌的教育史分成盛唐(618—787年)、吐蕃(787—848年)和晚唐(848—907年)三个阶段,认为前期可据《沙州图经》的记载考订为按唐制规定而设的庙学制;吐蕃时期则据窦良骥等属衔中的“国子监博士”,推测吐蕃曾在沙州设国子监;而归义军时期的“检校国子祭酒”即保存的吐蕃遗制,但同时也恢复了州、县官学,并增设阴阳学,创立技术院。但作者在探讨敦煌教育的变迁时忽略了一项重要材料,即在晚唐五代所写的《敦煌录》等五种敦煌方志中,均不见州县医学的记载,反而明确记载了晚唐敦煌文士张球在沙州城西北一里寺中教授诸生的情况(《敦煌录》65—70行)。吐蕃时代的“国子监博士”可以解作没落的前官,或可解释为藏文某词的翻译,不必强解为沙州立有国子监,因为吐蕃王国的中心在逻些,其在河西走廊的统治中心也不在沙州,而在瓜州。归义军时代诸职官所兼的“检校国子祭酒”为藩镇自辟无疑,与吐蕃毫无关涉。此时虽有州学之名,但从大量的寺院学士郎的题名来看,当时的教育主流已转入寺院,而所用课本仍以儒家典籍为主。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敦煌训诫类通俗读物之一《新集文词九经抄》,过去只有王重民做过叙录,提供了三个写本。郑阿财(中兴大学法商学院)的《〈新集文词九经抄〉

〔1〕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4月。

研究》(271—290页)一文,从伦敦、巴黎和列宁格勒藏卷中共找出十三个编号的写本,并考出其中 P. 2557、P. 3621、P. 2598 是前后衔接的一个完本,而 P. 3615、P. 3469、P. 3169 则是同一文本的三个断片。作者以缀合的完本为基础,通过详细对比,认为这个新集抄本当来源于《文词教林》(卷上并序存 P. 2612 号),而对宋代《明心宝鉴》的纂辑影响至巨。作者指出了这种通俗读物的价值所在,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一种重要的参考资料。郑氏是近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出于潘重规门下。此文反映了台湾年轻一辈敦煌学者治学上有较深厚的根基,方法上有较好的训练。

郭长城(“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敦煌写本朋友书仪试论》(291—299页),将书仪分为类书式和总集式两类,而特别探讨总集式中的“朋友书仪”类。他以 S. 5660 为标准本,共鉴定出十一本计十三个号码的卷子,分别加以提要,并考其源流,最后是校录的定本。

金冈照光(日本东洋大学文学部)《关于敦煌变文演出的二、三个问题》(301—310页),主要根据讲经文的题记,认为今天我们虽然称变文、讲经文为通俗文学,但在其创作、演出、书写的时代,却是被当作经典,抱着宗教的目的而做的,它们作为佛教法会中仪式的一部分而讲经时,是有一定的组织和仪式的,与宋以后的演艺完全不同。这种看法颇具新意,但仍须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才更能说服人。

梅维恒(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东方学系)《从口传和写作角度看讲经文》(311—334页),根据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卷 No. 32 号和 S. 6551《佛说阿弥经讲经文》等,着重说明了讲经文是根据口头讲说记录稿,经反复修订而成的文本。作者提出的变文与讲经文的区别问题,除列举二者的开头套语分别是“某处若为陈说”和“唱将来”外,只是强调变文的写本不像是讲经文写本那样从听讲到修订弄得十分杂乱,而和传统著作或佛经一样,是抄自比较固定了的作品,因而也比较整齐。文章对近年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似未充分参考。

曾锦漳(香港浸会学院中文系)《从小说艺术看敦煌史传变文的成就》



(335—354页)一文,从叙述方法、人物刻画、情节处理、环境设置、语言运用等方面对敦煌史传变文在中国小说发生发展史上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说明。

周凤五(台湾大学中文系)用1986年5月台北明文书局出版的《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一书的第三章《太公家教内容分析》和第四章《武王家教研究》作为提交会议的论文《太公家教重探》(355—377页),已有排印本出版。

朱凤玉(“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太公家教研究》(389—408页),先据《太公家教》的序和跋,认为“太公”即如宋王明清所言,指曾高祖类,《家教》的作者是位历经沧桑的乡村老者,成书在唐安史之乱以后,唐武宗会昌年间以前;继而详细考订了《太公家教》的取材来源;最后指出它作为格言谚语类蒙书的祖祢,对《文词教林》、《新集文词九经抄》乃至《明心宝鉴》的影响。此文是作者研究王梵志诗的副产品,但在写本搜罗和内容分析两方面都值得大陆研究《太公家教》者参考。

王国良(东吴大学中文系)《敦煌本〈搜神记〉考辨》(379—387页),从现存五个写本证句道兴《搜神记》包含三十四个故事,它和八卷本《搜神记》可能有一共同的祖本,但与二十卷本关系不大。

林炯阳(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韵书残卷在声韵学研究上的价值》(409—420页)共条列三事:(1)由敦煌韵书和《广韵》反切的比例证《广韵》无轻唇音;(2)由五代本《切韵》之部次论《广韵》部次并非直承李舟《切韵》;(3)由敦煌韵书反切异文看当时的方音现象。

林聪明(东吴大学中文系)《敦煌汉文文书解读要点试论》(421—435页)一文,简明扼要说明了在利用敦煌文书时所要注意的文书形态、体制、抄校、年代、复抄、割裂、错乱、题名以及俗字、通假字、讹误字。这是用汉文写的一篇较好的通论性文章,既可作为研究者的工具而常常翻阅,也可作为初学者的教材而指示门津。

王三庆(“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的《敦煌写卷中武后新字之调查研

究》(437—464页),根据作者调查的近三百件写有新字的写本,统计其比率,补充丰富了以常盘大定《武周新字之研究》一文为代表的武周新字研究,结论是载初元年造照、载、初、年、月、日、星、正、天、地、君、臣12字,以后又陆续增补授、证、圣、国、人5字,其中除照字仅用于则天本名外,其余16字则因政治目的而推行全国。文末附录有《史志书等征引武后字表》、《敦煌写卷征引新字调查表》、《武后新字写卷题记时间表》等,可见作者用功之勤。

苏莹辉(台北“故宫博物院”)《瓜沙史事述要》(465—481页)一文,声称利用敦煌资料,纠正史籍记述晚唐五代宋初瓜沙史事者12条,名目虽烦,但新意较少,有些来源于他书。苏氏早年在敦煌工作,论资格应是台湾“敦煌学”界的前辈,有关归义军史的文章甚多,然有许多重复,观点也不时改变。他虽有往巴黎、伦敦阅读原卷的机会,但论文所据材料很少得之原卷,多为转相抄引,至有不确切处。

另一篇探讨晚唐归义军史的文章是林天蔚(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的《论〈索勋纪德碑〉及其史事之探讨》(483—495页)。作者先据徐松《西域水道记》、张维(文中皆作张淮,误)《陇右金石录》及“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拓本,校录了《索勋纪德碑》。此录文未能利用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及陈万里《万里校碑录》(《西行日记》收)等成果,故还不能算作完本。其所论归义军史事,常以苏莹辉的论点为依据,多有未谛;但作者从地方豪族角度来考察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史,无疑是一个新颖而又正确的出发点。

王吉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唐与吐蕃关系中的禄东赞家族》(497—507页),总结前人考证的结论,条列汉藏史籍的有关记载,发明不多,仅仅提出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柳存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卷第五——P. 2337中金明七真一词之推测》(509—531页),是补充日本学者吉冈义丰的说法,认为此写本中的“金明七真”确实与天师道有关。但作者同时认为,金明之

说还可能与当时道教人士所知之摩尼教的知识有关涉。如果能举更多的证据说明道教与摩尼教的关系,将使人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加深一步。

敦煌藏经洞中出土了大量的禅宗典籍,在胡适、铃木大拙等的倡导、推动下,本世纪的禅宗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收获。1976年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的影印出版,使人们又找到一份重要的禅籍(编号133)。潘重规和田中良昭将其考订为圭峰大师宗密的《禅源都诠集都序》。对此,冉云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学系)的《敦煌卷子〈大乘禅门要录〉的研究》(533—547页)一文指出,这个残存180多行的写本中,除《都序》外,还有一份宗密著作清单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著作,总起来不应叫作《都序》,而应据抄者题记,称全卷为《大乘禅门要录》。此卷的重要价值是宗密的著作目录,它使我们知道宗密曾有《注辨宗论》一书,从而说明了禅宗与道生“顿悟”之说的关系。此卷写本还进一步证明所谓《禅藏》的存在。敦煌禅籍的研究涉及宗教、历史、文化诸方面,因此倍受学界重视,特别在日本,近十年来研究者较多,比较而言,国内成果较少,似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这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不仅反映了国际上“敦煌学”研究的进展,更主要的是对台湾“敦煌学”研究力量的一次检阅。从提交会议的台湾学者的论文来看,他们在敦煌俗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王梵志诗、讲经文、变文、曲子词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蒙书等方面成绩显著。此外,在没有反映到会议上的敦煌俗字和敦煌写本儒家典籍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相比之下,其他领域则比较薄弱,虽然有个别学者于瓜沙史事多所措意,但贡献不多。

从与会台湾学者的年龄来看,许多是3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他们比较坚实的国学基础,对敦煌文献也有比较科学、全面的认识,而且在某一专题上,往往以博士或硕士论文为基础形成专著,成为台湾“敦煌学”界的生力军。

近年来,台湾和大陆学界都对敦煌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由于近年台湾对大陆学术出版物放松控制和台湾翻印行业的发达,台湾学者对大

陆学术研究成果掌握得十分及时,征引时也不必回避或更名<sup>〔1〕</sup>。对于大陆的敦煌研究者来说,也应及时掌握台湾“敦煌学”研究的成果,以免人云亦云或花费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双方学者都能及时掌握对方的研究成果,互相补充,共同提高,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体贡献。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2期,22—28页;转载《敦煌学》第13辑,1988年。所评论文已刊《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故在每篇名后加页数。)

---

〔1〕 早年如杨家骆将大陆《敦煌变文集》翻印,更名为《敦煌变文》,致使大陆某些学者介绍时,误以为是杨的新著,造成混乱。

## 《吐鲁番敦煌文献：丝绸之路的文明 汇聚研究论集》评介

本书由卡多那(Alfredo Cadonna)编,原名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 列为《威尼斯东方学丛刊》第4卷(*Orientalia Venetiana*, IV), 由 Firenze 的 Leo A. Olschki Editore 于 1992 年出版。

本书是 1990 年 2 月 15—16 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的“吐鲁番敦煌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副标题一方面赋予了吐鲁番敦煌文献在更宽广的历史研究背景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表明了这次会议与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整体研究计划的联系。

本书共收十篇文章,意大利东方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伯戴克(Luciano Petech)教授的“*The Silk Road, Turfan and Tun-huang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A. D.*”(公元后第一千年的丝绸之路以及吐鲁番和敦煌)一文,对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特别是吐鲁番和敦煌的历史做了简洁的概述,为以下各篇专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背景。

未能与会的匈牙利哈玛塔(Janos Harmatta)教授的短文“*Origin of the Name Tun-huang*”(“敦煌”名称的起源),强调了“敦煌”一名的伊朗语源说,并指出“吐鲁番”一名很可能与“敦煌”出于同源。对于这一问题,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最近发表了长文“*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Name ‘Dunhuang’-With an Added Note on the Identity of the Modern Uighur Place-Name ‘Turpan’*”(关于现代标准官话地名

“敦煌”的起源的几点看法——兼论关于现代维吾尔语地名“吐鲁番”的比定),对此做了详细的而且过于复杂的解说<sup>[1]</sup>。哈玛塔在简短的附录“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粟特文古信札的年代)中,对 F. Grenet et N. Sims-William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sup>[2]</sup>一文对他本人的观点的批判做了反驳,但似乎并未能驳倒这两位学者的论据,我们期待哈玛塔教授许诺发表的详细研究。笔者倾向于公元四世纪初年说,根据敦煌汉文文书《沙州图经》等汉文材料,晋唐间敦煌西北的长城烽隧一直都在使用,而且,胡平生先生最近解读的楼兰出土汉文本简(L. A. I. iii. 1)所记“建兴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云云<sup>[3]</sup>,证明了公元330年时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东部的存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件汉文本简是和 L. A. Vi. ii. 0104、L. A. II. x. 01—02、L. A. IV. v. 028 粟特文残片出自同一地区,而这些残片的粟特文字与“古信札”一样古老<sup>[4]</sup>。同样持四世纪初年说的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sup>[5]</sup>在汉文史料方面补充了伊朗语专家用第二手材料的不足。

茨默(Peter Zieme)“Probleme alttürkischer Vajracchedika-Übersetzungen”(关于回鹘文《金刚经》译本的问题)一文,主要是讨论回鹘文译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翻译问题,可以补充的是除了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残卷外,1980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又发现了至少一件这部伪经的回鹘文本,见多鲁坤·阙白尔和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载《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IV,1988年,79—80页。

[1] 《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Studia Iranica*, cahier 5, Paris 1987, pp. 101-122.

[3] 《文物》1991年第8期,41—42页。

[4] Grenet et Sims-Williams, 上引文, p. 111, n. 42; N. Sims-Williams, *Indo-Iranian Journal*, 18, 1976, p. 43, n. 10.

[5]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1985年,10—18页。

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n-huang Manuscripts”(从吐鲁番和敦煌写本看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分类概述了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基督教文献,理清了基督教从粟特本土向东方传播的历史脉络,并指出粟特语之外的中古波斯语和新波斯语文献在吐鲁番发现的原因,以及敦煌基督教文献与吐鲁番文献的不同。他所展示的吐鲁番基督教文献内容,较 O. Hansen<sup>[1]</sup>和 J. P. Asmussen<sup>[2]</sup>的更为丰富而且准确。作者提到的尚未发表的粟特文本《三威蒙度赞》(Gloria in excelsis Deo)最引人注目,因为迄今为止,学者们在研究敦煌出土汉文本《景教三威蒙度赞》时,没有考虑在汉文译本和叙利亚文原本间有无粟特文的中介问题<sup>[3]</sup>。据笔者的初步观察,九、十世纪敦煌和吐鲁番的基督教徒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吐鲁番出土的伊朗语摩尼教文献数量极多,但是和基督教文献一样缺乏纯粹的世俗文书。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的“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有关吐鲁番地区的吐鲁番出土伊朗语摩尼教文献)一文中,从赞美诗、题记、供养人题名、书信、文书、词汇表等材料中,发掘出一些零星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史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被作者看作是1007—1019年在位的回鹘可汗的资料,后记中提到的森安孝夫教授的不同看法,见森安《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sup>[4]</sup>。另外,作者提到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新发现的几件粟特文信札尤为引人注目,可惜尚未全文发表。宗德曼在第73页讨论了帕提亚语彼拉多审问耶稣的文献最后所写的供养人名darsah,将它与Xurransah, Perozsah等伊朗语人名做了对

[1]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IV, 2/1, Leiden-Cologne 1968, pp. 91-99.

[2] *Indological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 W. de Jong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Canberra 1982, pp. 11-29.

[3] 参看吴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3分,1986年,411—438页。

[4] 《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1991年。

比。我以为此词即钵罗婆语的 *tarsag*<sup>〔1〕</sup>, 意为“基督教徒”, 后者已由饶宗颐教授比定为元代汉文史料中的“迭屑”<sup>〔2〕</sup>, 此词的粟特文形式见本书第 50 页辛姆斯-威廉姆斯文, 作 *trs'q*。

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收藏的中亚写本究竟有多少? 似乎一直是个谜。我们高兴地从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Margaret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的“The Leningrad Collection of the Sakish Business Document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Central Asian Texts”(列宁格勒收集品中的塞语商业文书和中亚文献的调查研究)一文中得知, 那里收藏着迄今从未发表过的于阆语文书 250 件! 根据她的介绍, 这批文书的绝大多数来自同一个地点, 即 Gaysāta, 而且是一位叫 Siāka 的人任村长(auva hamdasta)时的产物。遗憾的是作者没有看到张广达教授和我合撰的《〈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铎牒〉跋》<sup>〔3〕</sup>或其法文译本“Sur un manuscrit chinois découvert à Cira près de Khotan”<sup>〔4〕</sup>, 不知道我们已将于阆文的 *gayseta spāta Sīd aka* 圆满地比定为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汉文文书中的“杰谢萨波斯略”。由此可以得知 Petrovsky collection 当来自丹丹乌里克, 唐朝时称杰谢镇。同样, 作者在考证于阆王 *Viśa'Vāham* 的年代时, 也没有参考我们的《关于和田出土于阆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sup>〔5〕</sup>,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补充了 Sten Konow 早就提出的看法, 即 *Viśa'Vāham* 就是汉文文献中的尉迟曜<sup>〔6〕</sup>, 他在位的年代大致为 755—790 年。尽管她的研究尚不够完备, 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首次公布了如此丰富的于阆语世俗文书的存在, 这些文书中的许多于阆人或汉人名称同样出现在 Stein 和 Hedin 的收集品中, 预示这批文书的

〔1〕 D. 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1971, p. 82.

〔2〕 《固庵文录》, 台北, 1989 年, 181—182 页。

〔3〕 《新疆社会科学》1988 年第 1 期。

〔4〕 *Cahiers d'Extrême-Asie*, 3, 1987, pp. 77-91. 按文中的“Lixie”为“Jiexie”之误。

〔5〕 《东洋学报》第 69 卷第 1.2 期, 1988 年, 69—78 页。

〔6〕 *JRAS*, 1914, pp. 342-343.



全部公布将有助于于阗语和汉语文书的解读，并且必将为唐代于阗史的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

哈密顿 (James Hamilton) “Etude nouvelle de la lettre Pelliot ouigour 16 bis d'un Bouddhiste d'époque mongole” (伯希和回鹘文 16 bis 号：蒙元时期一封佛教徒书信新考) 是在法国国立图书馆近年对这件文书进行的修复的基础上，订正森安孝夫旧刊本的结果，包括转写、翻译、注释、词汇和图版。

已故乌瑞 (Geza Uray) 教授的 “The Structure and Genesis of the Old Tibetan Chronicle of Dunhuang” (敦煌《古藏文大事纪年》的结构与来源)，根据文书的内容和写本背面汉文佛典纸叶的黏接情况，来排列《大事纪年》各段落间的次序，并且通过对内容的分析，反驳了此书来源于 rgyal-rabs (王统世系) 和 \*blon-rabs (大臣世系) 的说法。由于这一问题关系到《大事纪年》所记一些吐蕃王朝重大事件的年代，因此，这篇文章和乌瑞教授的其他一些文章一样，均为吐蕃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分别为斯坦因和伯希和所获的 Ch. 00120 和 P. 5597 号敦煌写本，是同一件用于阗文所使用的婆罗谜字母书写的汉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过去主要是汉语音韵学家用它来探讨中古汉语音韵问题。恩默瑞克 (Ronald E. Emmerick) “The Dunhuang MS. Ch. 00120: its Importanc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Khotanese” (敦煌写本 Ch. 00120 号：论其在重建于阗语音系统上的重要性) 一文，报道了他与汉语音韵学家蒲立本 (E. G. Pulleyblank) 合作研究此卷的成果。笔者尚未见到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 一书，希望它早日出版。据东京大学熊本裕博士给我的这篇文章的稿本，第 159 页婆罗谜字母下的空白处漏掉了以下文字：

that a remote resemblance with the Tumshuqese sibilant can be imagined.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question of the graphic origin of the subscript

hook, it will be instructive to give me more detailed consideration than hitherto to its actual use in the texts. I do not

这恐怕是排版之误。

本书唯一一篇有关汉文写本的论文是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from Tun-huang: The state of the field(1980-1990)”(1980-1990年间汉语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研究现状),他重点介绍了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在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通论、校勘、刊布、译注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同时概要介绍了他本人在这一领域里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内容,并且进而对涉及所有敦煌文献的研究文献目录和写本目录的出版情况做了评述。梅维恒教授在上海的徐文堪先生的帮助下,对直到最近出版的敦煌俗文学研究文献搜罗殆尽。然而,在俗文学范围之外的领域,尚有一些可以补充的情况。比如,甘肃各地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有黄文焕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sup>[1]</sup>和简单的目录《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sup>[2]</sup>、《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sup>[3]</sup>,此外,他还在《河西吐蕃文书中的“钵阐布”》一文中发表了对其中某些文书的研究成果<sup>[4]</sup>。至于中国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的迟迟没有刊布,的确使学术界感到失望,笔者曾在1988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编写刍议》的报告<sup>[5]</sup>,其中包括一份已经公布的小收藏品目录的目录。原属私家收藏而现在不知所在的一些重要写本,确如梅维恒教授所期望的那样需要认真调查,据我所知,罗振玉旧藏的敦煌写本现分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而其中很珍贵的《刘子》残卷,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笔者1990年11月访问该馆时曾亲眼看到写本上所钤的罗氏藏书印。显然,敦

[1] 《文物》1978年第12期,59—63页。

[2] 《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56—62页。

[3] 《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84—102页。

[4]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1984年,222—236页。

[5]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8年第2期,55—58页。

煌吐鲁番乃至所有中亚写本的公布需要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此也希望美国的同行尽早发表 Judith O. Bullitt 介绍的“Princeton's Manuscript Fragments from Tun-huang”〔1〕,德国的同行尽快公布 Volkerkundemuseum, München 所藏 A. H. Francke collection 中的于阆文、藏文和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中,以汉文写本最多,相比之下,这本论文集关于汉文文书的文章似乎少了些。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成绩,是对公元六、七世纪吐鲁番的麴氏高昌国和对九、十世纪敦煌的归义军政权的研究。正像梅维恒教授关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已经影响到吐火罗语文献的研究一样〔2〕,如果研究中亚古语的专家能够掌握有关归义军的研究成果的话,必将促进对吐鲁番和敦煌的各种非汉语文书的研究。梅维恒教授对许多中国学者不考虑非汉语因素的批评是中肯的,笔者也深信敦煌汉文文献与藏文、回鹘文、于阆文、粟特文甚至吐火罗文之间存在深浅程度不等的联系,因此热切希望在这一领域中的国际协作研究。

(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44卷第4期,1992年,307—309页。)

〔1〕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III/2, 1989, pp. 7-29.

〔2〕 Cf. G. -J. Pinault,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3, 1989, pp. 149-220.

## 《东亚古文书的历史学研究》评介

本书是日本唐代史研究会部分成员 1988—1989 年间写的研究论文,作为唐代史研究会编的《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 VII 集,1990 年 9 月由刀水书房出版。在中国、朝鲜出土文书的范围内,大致可分成三部分内容:I. 汉文木简史料,II. 汉文文书、碑铭史料,III. 藏文、回鹘文史料。各位执笔者从自己的着眼点出发来撰写论文,相互间的内容没有关联。以下重点评述有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论文。

池田温《论九世纪敦煌的土地税役制度》,在姜伯勤<sup>[1]</sup>、杨际平<sup>[2]</sup>研究的基础上,据 S. 4491、S. 9156,指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每人 10 亩(一突,藏文 *dor*)的给田制度;又据 S. 5760、P. 2162v、P. 3491v. bis 等文书,换算出按户征收约 10 驮(=藏文 *khal-bo* = 20 *bre*)麦,和以五日为单位的身役及野菜的上贡等土地税役制。又在冷鹏飞<sup>[3]</sup>、唐刚卯<sup>[4]</sup>、杨际平<sup>[5]</sup>、堀敏一<sup>[6]</sup>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了归义军时期 2 顷 50 亩或 3 顷课布 1 匹的“官布”和每亩征麦 4 升加粟 3.5 加 0.5 升共计 8 升的“地子”两种税收,并指出此制与中唐以后实施的两税法有相似的性质。此外,

---

[1] 《敦煌学辑刊》第 5 期,1984 年。

[2]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 年。

[3] 《敦煌学辑刊》1984 年第 1 期。

[4] 《敦煌学辑刊》1985 年第 2 期。

[5] 《敦煌学辑刊》1988 年第 1.2 期。

[6] *Acta Asiatica*, 55.

还探讨了柴草税的征收范围问题。唯其疑“白刺”为修渠用的材料似有不妥,白刺系烧火用草料,至今敦煌郊外仍然生长。

大津透《大谷·吐鲁番文书复原二题》分两项内容:一、据中国新刊布的吐鲁番 TAM227 墓出土的两个断片,补其先前据大谷文书和 TAM230 墓出土文书所复原的《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sup>〔1〕</sup>,并对补充的内容略加分析,详论则见作者《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补考——唐朝的军事和财政》<sup>〔2〕</sup>。二、对大庭修、内藤乾吉早年研究的“北馆文书”<sup>〔3〕</sup>重新复原,调整了各断片间的排列顺序,并将大谷 1699、2841、4924、4930、1700 和《流沙遗珍》No. 13 等残片缀合到原来的位置上。因为此文发表后,1990 年 11 月东京古典会展出了一件从未发表过的“北馆文书”<sup>〔4〕</sup>,闻作者正在准备新的研究论文<sup>〔5〕</sup>。

冈野诚《论唐户婚律立嫡违法条》,专就敦煌写本唐律断简(P. 3608)中“立嫡以长”一句,在《故唐律疏议》中作“立庶以长”的问题,详细探讨了两者各自的渊源和成立年代,以及由前者转换为后者的社会原因。由此看来,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法律文书已基本整理完了以后<sup>〔6〕</sup>,仍有一些细致的问题有待研究,本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小田义久《谈大谷文书与吐鲁番文书的关连》,根据陈国灿《略论日本大谷文书与吐鲁番新出土墓葬文书之关连》<sup>〔7〕</sup>所指出的 TAM501 墓部分

〔1〕 《东洋史苑》第 28 号,1987 年;《史学杂志》第 95 卷第 12 号,1986 年。

〔2〕 《东洋史研究》第 49 卷第 2 号,1990 年 9 月。

〔3〕 《西域文化研究》第二、三卷,1959、1960 年。

〔4〕 《古典籍见展观大人礼会目录》No. 1924。

〔5〕 见《吐鲁番文物研究会会报》No. 50,5 页。

〔6〕 T. Yamamoto, O. Ikeda and M. Okano,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Tokyo 1978 - 1980;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

〔7〕 1988 年北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论文,现收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1990 年。

出土文书与大谷文书 3022、2848、3020、3030 等多件文书原属同一组的看法,详细讨论了这些关连文书的内容,以及大谷文书中的同名人物资料。作者讨论唐、蕃争夺西域史事和西州折冲府时,主要以汉文史料和前人成说为基础,而未能充分利用森安孝夫《吐蕃之中亚进出》<sup>〔1〕</sup>、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sup>〔2〕</sup>等研究成果。

菊池英夫《中国古文书古写本学与日本——东亚文化圈的交流痕迹》共两部分:一、日本僧人圆珍带回日本的唐朝官文书,二、《王梵志诗集》与山上忆良《贫穷问答歌》,构成本书篇幅最长的文章,但恐怕也是最陈旧的文章。两部分原来分别是提交 1973 年巴黎第二十九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和 1983 年东京第 31 届国际亚非人文科学会议的论文,略就此后的研究成果做了补充说明。但前者虽引用了 1990 年出版的佐伯有清的《圆珍》一书,却未提收集圆珍资料极富的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之研究——智证大师圆珍篇》<sup>〔3〕</sup>;后者虽引用到了项楚《列 1456 号王梵志诗残卷补校》<sup>〔4〕</sup>,但却未提项楚更为详尽的研究成果《王梵志诗校注》<sup>〔5〕</sup>。作者以研究唐代军制见长,近刊《有关敦煌发现的〈算书〉所见之军制模式的一点考察》<sup>〔6〕</sup>较本文更富新意。

土肥义和《唐代敦煌均田制的田土给授文书——开元十六年敦煌县史汜知节请给田卫士某大庆牒之分析》,根据池田温从北京图书馆藏姜字 73 号敦煌写本上找到的这件牒文,参考西州退田、给田类文书,确认唐代沙州与西州一样存在着退田、给田制度,而且推测沙州(宽乡)似乎也存在着特

〔1〕 《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第 4 号,1984 年。

〔2〕 《东洋文化》第 68 号,1988 年。

〔3〕 全二卷,京都:法藏馆,1982—1983 年。

〔4〕 《中华文史论丛》1989 年第 1 期。

〔5〕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4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修订本现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6〕 《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第 35 号,1990 年。

有的(?)给田基准。本牒的发现无疑使人们对唐代均田制的收授问题加深了认识,但在分析本牒时,应充分考虑所请之地远在城北三十里抱辟渠(其用水系统见P. 3560v 沙州用水细则文书)。另外,有助于判断文书性质的印记、押缝等情况,尚待据实物加以考察。

中村裕一《敦煌发现唐公式令残卷的制成年份考》,据残卷上所钤“凉州都督府印”加以考证,但最终也未能断定是开元七年令还是开元二十五年令。本文系作者现已出版的《唐代制敕研究》<sup>〔1〕</sup>的组成部分。

船越泰次《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等文书觉书》,是对唐代户等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即把《吐鲁番出土文书》1—8、《中国古代籍帐研究》、*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I*、《大谷文书集成》等书中所收各类文书中的户等记载列表分析,统计出各户等的总户数,从而看出西州地区八、九等户占绝大多数的社会情貌。按户等制与唐朝许多制度相关,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sup>〔2〕</sup>曾分析了户等与府兵征发的关系,类似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在参考本文的统计成果时,应补充新刊《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大谷文书集成》中所收文书的记录。

山根清志《唐代的奴婢买卖与市券》,主要是通过对敦煌研究院藏《唐天宝年间敦煌郡行客王修智卖胡婢市券公验稿》和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九年(731)二月西州兴胡米禄山卖婢市券公验》的分析,来探讨市券的书式和内容。但作者未能吸收近年的研究成果(注引的参考文献均为1979年以前发表者),特别是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sup>〔3〕</sup>对市券及相关文书的明确解说,以致不能明了文书上判词“同元”的“元”字应指卖主原先买婢的市券,而不能作人名解。

上山大峻《敦煌的藏文人名资料——台湾本125号文书》,转写刊布了

〔1〕 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

〔2〕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3〕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大乘稻苳经疏》背的藏文写本。其内容是吐蕃时期虎年沙州 rgod sar kyi sde(阿骨萨部落)和 stong sar kyi sde(悉董萨部落)的人请求某物的名表。作者还原了其中藏文拼写的汉文姓名,并分析了名表中其他类别的名字。本文无疑是在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重要资料,特别有助于分析当时的部落人种构成问题。

梅村坦《回鹘文家产分割文书之一例——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 K7716号》,系对黄文弼发表在《吐鲁番考古记》图版一〇五,图 95 的元代回鹘文文书的转写、翻译和注释,有关这件文书形态和内容的概说,将附图版发表在近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上。作者近年一直在调查中国所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的情况,并就所见原件整理研究了部分文书,其成果值得注意,详见其所撰《中国现存回鹘文古文书觉书》〔1〕。

山口瑞凤《吐蕃王朝外戚统治机构“尚论”制的成立与意义》,利用《智者喜宴》和敦煌藏文法律文书 P. t. 1071 及《有关吐蕃历史的敦煌文书》,对外戚统治体制的建立、渊源及在不同赞普时期的权力升降加以仔细分析,可视为作者《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2〕的续章。

除了以上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外,本书较突出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石刻史料的研究,计有石见清裕《阿史那施墓志试释》、清木场东《仓颉所见唐太仓的构造》、铃木靖民《广开土王碑文有关的“倭”的记事》、高桥继男《唐代后期的解府君墓志与殷府君墓志》、砺波护《京都大学所藏的唐墓志》、滨田耕策《朝鲜所传的广开土王陵碑文》,表明日本唐史研究者在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同时,已经开始广泛注意石刻史料了。

(原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110—112页。)

〔1〕《内陆亚细亚研究》第6号,1990年;英文本载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 Kyoto 1990。

〔2〕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



## 《中古时期社邑研究》评介

1998年12月,郝春文教授曾出版《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1〕,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笔者曾撰文评介,认为该书“系统地揭示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僧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增进了我们对整个敦煌社会的认识,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五代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帮助”〔2〕。我们知道郝春文在完成这部著作之前,曾发表过一系列有关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社邑的论文,并且和宁可先生一起合作整理出版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3〕,对于中古时期佛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社邑做过细致的研究,可是一直没有见到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直到2006年11月,学界所期盼的这部有关社邑研究的著作——《中古时期社邑研究》,终于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列为饶宗颐先生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十一,是作者2003年9—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修订研究的结果。

本书分上、下篇。上篇题“中古时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主要是两篇长文,分别讨论非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社邑和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社邑与佛教的关系问题。

前者题为《从冲突到兼容——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4〕,探讨魏晋

---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2〕 《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167—169页。

〔3〕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4〕 原以《从冲突到兼容——中古时期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为题,发表于《普门学报》第24期,2004年,1—64页。

南北朝从事春秋二社祭祀活动的邑社及唐五代从事春秋祭社与经济互助活动的私社(即作者所谓传统社邑)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社日举行“血祠之祀”上双方有着尖锐的冲突,但通过寺院和僧人的努力,传统社邑逐渐“止杀存生”,并从事造像一类的佛教活动,最终成为寺院的外围组织。到了唐五代时期,传统社邑的活动多在寺院举行,并大量从事举办佛教斋会、开窟、造像等佛教活动,而不少僧人加入私社,作为社邑成员参加社邑活动,同时寺院也组织一些传统的社邑活动,但以前者的情况为多。于是文献中有关传统祭社的“血祠”记载逐渐消失,虽然传统社邑的核心思想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但已经很大程度上和佛教思想融合起来了。

后者题为《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民间团体及其与佛教的关系》<sup>〔1〕</sup>,探讨了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广泛存在的僧尼与在家佛教徒共同组成或仅由在家信徒组成的邑义(或称邑、法义、邑会、义会、会等),其组织形式和首领的身份、作用,指出这些比较松散的邑义组织往往是为造像、建塔而临时组织起来的。到了隋唐五代时期,这种佛教邑义和上述传统的社邑在名称、思想、活动上都逐渐合流。作者利用敦煌文书,探讨了隋唐时期佛教社邑的组织形态、首领名称的转变过程,并讨论了这种社邑作为佛教寺院的社会基础对佛教势力的增长所起的重要作用。

下篇题“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研究”,包括十篇文章,是对敦煌社邑文书某些问题的个案研究,也有学术史的回顾,还有对新出史料的整理校录。这里简要提示各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壹《敦煌社邑文书与中古社邑研究》,前半是对各类敦煌社邑文书的介绍,后半是对1938—2006年间中外学者有关社邑文书研究的述评。贰《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教育与教化功能》<sup>〔2〕</sup>,指

〔1〕 参看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又《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2006年,303—315页。

出私社在儒家文化和佛教教化传播方面所起的作用。叁《再论敦煌私社的“义聚”》<sup>〔1〕</sup>,阐述这种私社公共财产积累的来源、管理和用途等方面的问题。肆《再论敦煌私社的“春秋坐局席”活动》<sup>〔2〕</sup>,通过详细分析这种春秋二社祭社和坐社活动的内容,反驳了那波利贞早年认为是支持春秋俗讲的看法,并进而讨论了这种活动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伍《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与宁可合撰)<sup>〔3〕</sup>,具体分析了社邑在社人家庭遇到丧事时所做的种种救助活动。陆《敦煌的渠人与渠社》<sup>〔4〕</sup>,对渠人的组织、渠人活动方式、活动的性质做了探讨。柒《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sup>〔5〕</sup>,根据新发现的女人结社文书,对自己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加以补充,除了北朝隋唐五代宋初女人结社的存在,表明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这样基本的看法之外,与其他处理同一问题的研究者不同,作者认为女人结社成员大多应当是家庭中地位较高的女性,她们走出家门来结成团体,不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而是对男性结社行为的模仿,更直接的原因是比丘尼僧团存在的影响和有关“优婆夷”佛典的翻译与流行。捌《〈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商榷》<sup>〔6〕</sup>和玖《再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sup>〔7〕</sup>,是作者与杨际平教授有关巷社为官社还是私社、敦煌的官社问题、敦煌是否存在按阶级和阶层结社以及敦煌社邑文书研究方法的争论,有助于有关敦煌社邑问题的深入研究。拾《〈敦煌社邑文书

〔1〕 原载《敦煌学》第25辑,2004年,279—292页。作者旧稿《敦煌私社的“义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1—5页。作者旧稿《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座局席”考》,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31—35页。

〔3〕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4〕 作者旧稿《敦煌的渠人与渠社》,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5〕 作者旧稿《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6〕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89—102页。

〔7〕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67—76页。

辑校》补遗》<sup>〔1〕</sup>,对1997年以后新发现或者新发表的敦煌社邑文书做了校录,这些材料曾分四篇文章陆续发表,现在集中于此,便于读者,这是我们今后利用《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时所不可或缺的。

本书附录两篇文章《敦煌写本斋文及其样式的分类与定名》<sup>〔2〕</sup>和《关于敦煌写本斋文的几个问题》,是作者整理社邑文书的相关成果,由于作者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敦煌斋文,所以较一些文献研究者只从文本出发所给予的定性来得准确,因此也值得敦煌文献研究者参考。

读完这本书,笔者才明白作者为什么一直不肯把已经发表的社邑论文合集出版。对比作者已经发表的文章,我们知道本书的各篇文章都做了程度不等的增补,有些干脆就是新的“再论”,不少篇章从内容到观点,都有相当程度的改变。一般来说,一个研究者对于自己所写的东西往往敝帚自珍,不愿意改动;或者随着年龄的增加,固执己见,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章中的错误。本书作者能够把自己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加以彻底的修订,这种对学术的尊重态度是非常可嘉的。

作者之所以能够对自己的旧作加以大力修订,一方面和作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进一步加深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作者一直不懈地收集新发现和新出版的石刻史料和敦煌社邑文书有关,我们翻阅本书,不难看出作者对相关史料的掌握是值得称道的,这些材料都是比较零散的碑刻和文书,收集整理的功夫很大,作者在《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之后继续收集相关文书,现在又集中在本书当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史料方面的用心。

“中古社邑”原本是不被重视的研究课题,随着敦煌文书的大量公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宁可和郝春文一边整理校录社邑文书,一边做相关问题的研究,为学术界开垦出不少新的天地,在这当中,郝春文的贡献尤多。

---

〔1〕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2000年第2期,2001年第4期,27—33页;《汉语史学报专辑》第3辑《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368—386页。

〔2〕 原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91—97页。

由于有关社邑的资料主要是石刻和文书,许多都不完整,因此一些问题也记载得不够清晰,研究者之间对于一些问题还有不同的理解。作者对于有关社邑的同行研究成果非常熟悉,并且对直到2006年的研究论著都有所评述,在一些文章中对于低水平的论文也不留情面地做了学术批评。还有一些作者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提出来让读者思考,比如在讨论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佛教的关系时,作者提出“有关传统私社的400多件敦煌写本社邑文书,也是在佛教寺院的洞窟中发现的,这都是耐人寻味的事情”。(40页)据笔者在英国、法国的调查所见,许多社司转帖其实在藏经洞开启时是贴附在佛经上面的,也就是说它们在作废以后是被寺僧用作裱纸来修补佛经了。不过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能从物质形态的角度考察一遍社文书的原本状态,那对于我们理解社邑和佛寺的关系一定是会有帮助的。

近年来,在《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第4卷《社及其相关文书》<sup>〔1〕</sup>等史料集的推动下,有关社的研究又有了开拓,其中以孟宪实发表的关于敦煌民间结社的论文最多,笔者所见有《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sup>〔2〕</sup>、《敦煌社邑的分布》<sup>〔3〕</sup>、《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组织形态》<sup>〔4〕</sup>、《唐宋时期的敦煌官人结社》<sup>〔5〕</sup>、《论渠人社》<sup>〔6〕</sup>、《试

---

〔1〕 Yamamoto, T. & Y. Dohi, Y. Ishida,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V. The Associations and Related Documents (A) (B)*, Tokyo: The Toyo Bunko, 1987.

〔2〕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文科版)2001年第1期,25—30页。

〔3〕 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422—435页。

〔4〕 《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59—65页。

〔5〕 刘泽华主编《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133—150页。

〔6〕 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3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11月,121—145页。

论敦煌的妇女结社》〔1〕、《唐宋之际敦煌的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2〕、《论敦煌民间结社的社条》〔3〕、《论敦煌结社抗灾》〔4〕、《论敦煌民间结社与佛教寺院的关系》〔5〕,这些论文主要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讨论敦煌社邑问题,有些也和本书作者的观点不太一致。对于2006年以前孟氏发表的文章,本书中有些回应,但还有一些问题的看法,作者在改订本书时没有看到,相关的讨论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最近,刘淑芬发表《中古佛教政策与社邑的转型》〔6〕,主要依据传统文献和石刻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北朝隋唐政府的佛教政策着眼,来看中古社邑的转型问题,值得与本书上篇并列阅读。

(2008年2月29日完稿,原载《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2008年3月,163—166页。)

---

〔1〕 季羨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1月,89—104页。

〔2〕 《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543—558页。

〔3〕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5月,317—337页。

〔4〕 “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006年12月。

〔5〕 “基调与变奏——7—20世纪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007年9月。

〔6〕 《唐研究》第13卷(从汉魏到隋唐:变迁与延续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233—291页。

## 《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评介

我们盼望已久的王冀青先生关于英国所藏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文献研究的成果,在2005年初春时节,终于有两种和读者见面了,这就是《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和这里评论的《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sup>〔1〕</sup>。这两本由甘肃教育出版社精心印制的图书,开启了名为“国际敦煌学丛书”的一个系列,它们典雅而朴素的封面、精心细致的校对和排印、详实有趣的内容,都使得看腻了平庸而乏味的一些所谓敦煌学制作的我们,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有一个长长的副标题:“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考古档案日本敦煌学史文献研究”,表明作者写作本书的主要依据是保存在牛津的斯坦因档案以及日本有关敦煌学史的文献资料。对于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和数据的来源情况,作者在《前言》中做了详细的叙述,请读者参考。

本书由42篇长短不一的文章组成,根据现存资料的情况,十分具体地叙述了斯坦因和日本敦煌学界的种种关系。文章中大量翻译了斯坦因与日本学者的往来信件、日本有关斯坦因的报道等等,归纳起来,本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1)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对日本的影响,特别是对大谷探险事业的影响;(2)日本学者早期对运回英国的斯坦因中亚、敦煌收集品的调查和整理,以及这些学者与斯坦因的交往。以下对这两方面的内容略

---

〔1〕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

作介绍,由于本书对于事实本身叙述得非常详细而且准确,所以我只是重点提示这本著作提供给敦煌学史研究哪些重要的史实,而这些史实是以前我们无法了解到的,或者不太受到重视的内容。

### (1) 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与大谷探险队的三次中亚之行

在叙述斯坦因的中亚考察对日本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之前,作者介绍了欧洲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亚探险的主要活动,其中揭示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虽然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已经跻身世界列强,但在1902年9月德国汉堡召开的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俄、法、英、德等国正式成立了“中亚和东亚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考察国家协会”,日本虽然派遣了包括白鸟库吉在内的十名学者参加,却没有正式加入这个协会。而就在此前一个月左右,在斯坦因中亚探险的直接影响下,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的僧人大谷光瑞组成的中亚考察队,已经从伦敦出发,奔赴新疆。这个事实决定了日本的中亚考察和欧洲的中亚考察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欧洲的考察事业是有政府、博物馆和一些机构作为后援的,而日本的中亚考察则是大谷光瑞个人的事业。

斯坦因是1900—1901年从事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的,我们注意到1902—1904年的大谷探险队第一次中亚考察,大概是受斯坦因的影响,首先考察的地点是和田。或许是在和田的发掘收获不大,所以渡边哲信、堀贤雄二人北上阿克苏,发掘库车和吐鲁番的古代遗址,收获颇多。斯坦因1906—1908年进行了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大谷探险队又是亦步亦趋地在1908—1909年间进行了第二次中亚探险,而这次考察的主角橘瑞超于1909年2月从库尔勒南下罗布泊,发掘了楼兰古城,在现在确定为魏晋西域长史府的“三间房”遗址中,发现了完整的李柏文书。正如王冀青所指出的那样,这件事使得斯坦因一直耿耿于怀(59页)。因为斯坦因曾经在“三间房”及其周围大肆发掘,把西域长史府及其住宅的垃圾堆都翻了个底朝天,而西域长史李柏寄给焉耆王的这样一组重要的书信,怎么就被这个不懂考古的日本年轻僧人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一点实在让斯坦因既懊恼,又嫉妒



(61页)。为此,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探险中的1914年2月份,曾经重新考察“三间房”遗址,只看到推测是橘瑞超获得李柏文书的小洞,其他则一无所获(153页)。

显然,在斯坦因看到大谷探险队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收获以后,他无疑把橘瑞超看作是自己在中亚考察的强劲对手,因为除了以地理考察为主的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外,西方主要的中亚考古探险家,如德国的葛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和勒柯克(A. von Le Coq,本书译作“勒考克”)、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俄国的奥登堡(S. F. Oldenburg),都没有进入斯坦因考古的主要场所——塔里木盆地南沿进行发掘,只有大谷探险队曾两次进入和田地区,而且橘瑞超还闯入楼兰,发现了令人羡慕的李柏文书,并进而发掘尼雅等南道遗址,这在对中亚文物争夺日益激烈的20世纪初叶,无疑是让斯坦因十分警惕的事情。而与斯坦因争夺中亚古物的意识,恐怕也是大谷光瑞等人心里早有的盘算。1910年8月,橘瑞超抢在斯坦因之前,从伦敦开始了大谷探险队第三次中亚探险,这次探险一直延续到1914年结束。虽然一直给斯坦因的中亚考察写报道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干事凯尔梯(J. S. Keltie)在1910年5月就写信给斯坦因,报告了橘瑞超即将进行的中亚考察计划,但斯坦因此时还在忙着其他事务,没有时间马上步橘瑞超的后尘而前往中亚。直到1912年11月,斯坦因从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给英属印度政府提交了第三次中亚考察的申请书,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我在1900年至1901年间进行的第一次旅行所获成果引起他人的注意,结果导致德国、俄国、法国、日本后来派出了好几支考察队去中国突厥斯坦探访”,“来自日本一侧的竞争也是可以预见的,虽然不成体系,但同样具有竞争力”。(148页)这真切地反映了斯坦因的想法。

斯坦因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斯坦因在第二次考察中,于1907年1—2月份对米兰佛寺遗址做过大规模的发掘,由于米兰五号(M. V)遗址发现的雕像很大,而且壁画需要特别的工具加以切割,所以他在翌年3月从事完其他考古工作以后,自和田策勒村派他的印度随从奈克·拉姆·辛格

(Naik Ram Singh)前往米兰揭取壁画和搬运佛像。可是拉姆·辛格在到达米兰时,患青光眼而双目失明,没有完成使命,而斯坦因也在9月考察昆仑山脉时双脚冻伤,只好把掩埋在米兰佛寺遗址的精美壁画、雕像留到以后来取。1913年4月斯坦因获得英国印度事务部批准进行考察,于9月21日抵达喀什噶尔。斯坦因从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G. Macartney)那里听说,德国的勒柯克已从他1912年出版的第二次中亚考察游记《契丹沙漠废墟》中得知米兰壁画,认为“他似乎下定决心要抢走我在1907年发现的、因拉姆·辛格失明而未能移走的精美米兰壁画”〔1〕,所以斯坦因于10月9日出发,直奔米兰。当1914年1月17日到达米兰遗址时,斯坦因发现取走米兰壁画的不是勒柯克,而是橘瑞超。他说“这位日本旅行者在这处遗址逗留了几天时间,将他能够成功剥离的所有壁画墙面全都拿走了……由于匆忙而草率的工作方法,这些被掠夺的东西一定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2〕。这是斯坦因1921年出版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本书译作《塞林底亚》)中比较客气的说法,实际上,斯坦因一定是认为橘瑞超抢走了自己发现的壁画和雕塑,并把没有搬走的壁画也破坏殆尽,他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正式考古报告《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再次谈到了这件事,对于残留的壁画,他说:“那些没有被剥离的、曾经画有壁画的泥墙壁,也因为暴露在外而变得黯然失色,完全毁灭。”(151页)我们从王冀青译出的1914年11月5日斯坦因从吐鲁番喀拉和卓遗址给马继业写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斯坦因对橘瑞超的不满:“日本的橘瑞超开挖了一些古墓,成果很不错。当地人一直用他们那种破坏性的方法持续着这种搜寻活动。由于一些当地人是为中国官员们工作的,所以我希望,如果我们试图沿着这条线索系统地开挖下去,将不会引起什么人以宗教为借口提出什么反对意见。”(155页)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斯坦因一边批评橘瑞超是破坏性地开挖古墓,而

〔1〕 1913年9月30日致阿伦信,见本书149页。

〔2〕 A. Stein, *Serindia*, I, p. 533, n. 10; 此据本书译文, 150页。

他自己却也沿着橘瑞超的路子继续做下去,也就是说把橘瑞超的开挖看成是他试探当地民情的先导活动。事实上,斯坦因的许多逻辑是说不通的,不论斯坦因还是橘瑞超,他们把米兰精美的壁画和雕像加以切割甚至拿走,都是对古代文物的巨大破坏,也是对中国文化财产的无情掠夺。斯坦因埋藏在中亚各地而未能带走的文物不止米兰壁画和雕像,1973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墓区的一个墓道中,发现了一批斯坦因从各个墓葬中发掘而得的墓志或墓表,上面都有斯坦因的考古编号,这又是一批他有意埋藏而准备以后取走的文物,斯坦因如果活到1973年,他也一定会大骂中国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为什么把他发现的文物拿走;橘瑞超如果活到1973年,他也一定会惋惜这批已经由斯坦因准备好的文物为什么没有落在自己手中。

本书虽然是以时间为序来阐释相关的历史事件,但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则可以看出在斯坦因和大谷光瑞、橘瑞超等人表面的友好关系背后,对中亚文物你争我夺的真实面貌,这一点从双方对于米兰佛寺遗址壁画和雕像的争夺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来。

## (2) 日本学者对斯坦因中亚、敦煌收集品的调查和整理

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察获取了大量古代文物和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他从敦煌藏经洞所获的写本文书,这些资料极大地吸引着日本学者的目光。从1912年开始,到20年代中叶,日本东西两京的一些学者,陆续前往伦敦,调查、抄录、拍摄这些艺术品和文书。王冀青利用在东洋文库从事研究的机会,彻底收集了日本学者调查斯坦因藏品的有关通信、报道、回忆录、讲演稿、目录、札记、论文等材料,其中有些是油印本一类的不易见到的资料,还有一些发表在杂志上的消息,时过境迁,也不为一般人所注意,而王冀青却细心地把它们勾稽在一起,给日本早期的敦煌学史,描绘出一幕幕绘声绘色的场景。

这些考察包括:1912—1913年,东京大学的泷精一和京都大学的狩野直喜、滨田耕作一起在伦敦调查,泷精一的重点在敦煌绘画,狩野直喜则侧重在敦煌俗文学作品,他们两位对敦煌美术和敦煌文献的研究都作出了贡

献,其中狩野直喜抄录的许多资料后来还借给王国维阅览,并由此产生了王国维对伦敦藏卷的一系列跋文,丰富了主要以伯希和藏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敦煌学研究<sup>〔1〕</sup>。滨田耕作的主要兴趣在考古学,同时也涉及敦煌文书。1920年,京都大学的羽田亨前往伦敦调查回鹘文写本,但没有取得多大成果,于是转赴巴黎,与伯希和合作编辑出版《敦煌遗书》。1924年,京都大学内藤虎次郎在长子乾吉和大阪外国语大学石滨纯太郎陪同下到伦敦,由于翟林奈(L. Giles,本书译翟理斯)的阻挡,只阅览了134件写本,所获不多。

相对来讲,日本学者对于斯坦因收集品的调查最为彻底、获得资料最为丰富、学术成果也最大的学者,是东京大学毕业、后来主要在大正大学任教的矢吹庆辉。1913—1916年和1922—1923年,矢吹庆辉两次赴伦敦,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中的佛教经典,主要目的是寻找现存大藏经中已经佚失的文献。本书关于矢吹庆辉两次调查斯坦因敦煌收集品以及矢吹与斯坦因之间通信的记录,无疑是本书有关日本学者调查记录的最精彩篇章,有关其他调查者的记录基本上是根据日本书刊上的资料,而矢吹庆辉的部分,则首次翻译发表了大量矢吹和斯坦因之间的往来信件,也包括斯坦因为矢吹的工作而从印度给伦敦方面的信件,这些资料无疑是非常珍贵的,其中涉及的敦煌学史的内容,远远不止矢吹本人的调查工作。

在第一次调查中,矢吹得到斯坦因等人的关照,得以通览全部写本,拍摄了部分重要写本的首尾,并把需要下次来拍摄的写本做了记号。但是,到了矢吹在启明会的资助下准备第二次来伦敦拍摄时,虽然得到斯坦因的认可(254页),但是从1919年翟林奈接手负责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编目工作开始,英国博物馆改变了斯坦因邀请各国学者整理中亚收集品的做法,给矢吹的工作设置了种种障碍,如规定“本大英博物院所藏的物品,向来须

---

〔1〕 参看拙文《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

首先经过英国各专门学者之手进行整理,然后才能供外国人研究”,还有许多让外人难以接受的条款。但矢吹也针锋相对地列出若干条理由,其中包括“不管怎么样,这些写本总有一天是要由贵院整理与公布的,到了那个时候,本人也许要对贵院进行最猛烈的批评”(271—272页)。矢吹的这种态度让翟林奈改变了主意,事实上,矢吹的佛典学识可以对翟林奈的编目工作给予巨大的帮助,斯坦因之所以对矢吹的要求予以支持,恐怕也是因为矢吹研究敦煌文献的结果对于他的考古报告的撰写是有很大帮助的。矢吹庆辉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在伦敦克服种种困难,最终拍摄到6042幅照片,取得巨大的成功。这批照片成为他撰写的巨著《三阶教之研究》<sup>〔1〕</sup>的材料基础,同时也是他贡献给高楠顺次郎编纂《大正新修大藏经》古逸部、疑似部的文献的主要来源。此后,矢吹还把这些照片的精华部分,印成《鸣沙余韵》(岩波书店,1930年),并另外出版了《鸣沙余韵解说》<sup>〔2〕</sup>,成为敦煌学的奠基著作之一。

本书揭示的斯坦因和矢吹庆辉之间的通信还让我们了解到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比如敦煌发现的三件汉文摩尼教经典中,伦敦所藏的《下部赞》无疑是矢吹庆辉首先发现的,他也对这篇赞文做了长期的研究,斯坦因在多次通信中督促矢吹尽早把关于这件写本的研究完成,矢吹也多次回答他的研究进度,并曾把这个写本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报告给不懂汉文的斯坦因(188、193—194、199—200、202、247、259、266、267、269、333页),但矢吹的兴趣和专长不在摩尼教,而是佛教经典,所以没有能够按照斯坦因的希望用英文写出有关《下部赞》的文章,他自有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所以他对摩尼教文献的研究成果是在他晚年陆续发表的,即他提供给《大正藏》第54卷的《下部赞》录文(1928年),以及他的文章《关于摩尼教下部赞》<sup>〔3〕</sup>、《佛

〔1〕 东京岩波书店,1927年。

〔2〕 东京岩波书店,1933年。

〔3〕 《宗教研究》第74号,1933年12月。

教与摩尼教》<sup>〔1〕</sup>和一本小书《摩尼教》<sup>〔2〕</sup>。1988年,他的有关摩尼教的论著由学生辑成《摩尼教与东洋之诸宗教》一书出版<sup>〔3〕</sup>。

又如,我们通过本书发表的斯坦因致矢吹庆辉的信件,得知斯坦因曾经要求矢吹帮他打听敦煌藏经洞写本在中国政府于1910年解往北京后的情形,矢吹为此还帮助斯坦因找到一本蒋斧为这批写本编写的一份简目(252、266页)。这份目录很少有人提到,是值得留意的早期敦煌学目录之作。

此外,斯坦因也向矢吹打听橘瑞超所获敦煌写本的保存和研究情况,以及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橘瑞超拿走的那批米兰壁画是否有人研究并发表了照片(253、259页)。为此,矢吹在1922年10月末去英途中经过上海时,还特意拜访了住在那里的大谷光瑞和橘瑞超,把了解到的大谷收集品的分散情况告诉了斯坦因(264—266页)。这些斯坦因和矢吹庆辉通信中所透露的史事,是我们从普通的敦煌学史论著中所看不到的。

本书是作者精心撰写、校对的一部著作,虽然我一向是写批评式的书评,但通读全书,确实错误很少。如果非要挑剔的话,可以商榷的有:63页译Orkhan为“额尔汗”,大概这里的原文把Orkhon写错,其实所指应当是“鄂尔浑”,即突厥、回鹘以及后来的蒙古游牧汗国的中心。79页正文记黑板胜美《欧洲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一文刊载的杂志是《汉学》,而注中又作《文献》,应以正文为是。191、193页作者谨慎地把从拉丁字转写的日语书名《东瀛珠光》和出版社名“审美书院”都标作“音译”,其实他的译名是准确不误的,虽然这表现出作者的慎重,但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确定。

如果说本书还有一些遗憾的话,那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示,其所据资料主要是“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考古档案日本敦煌学史文献”。还有一些

〔1〕《大正大学学报》第21—23号,1935年11月。

〔2〕岩波讲座东洋思潮13,东京岩波书店,1935年11月。

〔3〕东京佼成出版社,1988年。

资料因为无法看到而未用,特别是书中反复提到的收藏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的斯坦因档案中的有关通信,作者根据艾娃·阿波尔(Eva Apor)与汪海岚(Helen Wang)主编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目录》〔1〕,提示了这些信件的存在,希望将来作者有机会看到这些信件,并将其最重要的信息以某种形式做些补充。另外,2003年11月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的《佛教艺术》杂志第271号为“敦煌学の百年”纪念专号,高田时雄教授发表《敦煌写本を求めて——日本人学者のヨーロッパ訪書行》,简要介绍了早期日本学者寻访、调查伦敦、巴黎藏敦煌写本的史事,其中提到的一些资料也可以补充本书的内容,比如高田教授据《黑板胜美先生遗文》〔2〕所刊黑板的日记及讲演报道,得知他在1927年曾第二次到欧洲调查敦煌写本,但没有研究成果发表;又如高田教授据梶原隆净、别府一道编《矢吹庆辉博士旧藏遗品目录》〔3〕,指出矢吹收集的一些照片资料后来由其哲嗣矢吹辉夫捐赠给佛教大学净土宗文献中心,这大概正好可以说明本书423页统计大正大学所存矢吹照片为何少了一些的原因。

最后,根据“国际敦煌学丛书”已出版的两种著作来看,这是一套体大思精的系列著作,而且一本本书之间会有不少相关之处,这样的话,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索引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希望以后出版的著作能够编制出人名和地名索引。

(2006年2月25日完稿,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2006年5月,512—518页。)

---

〔1〕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udapest 2002; 参看拙撰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502—504页。

〔2〕 吉川弘文馆,1974年。

〔3〕 佛教大学,1996年3月。

## 贝利教授与于阆语文献研究

1996年1月11日,国际知名的印欧语言学家贝利(Harold W. Bailey)教授在剑桥去世,终年96岁。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研究过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中的许多种语言,但他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对敦煌、和田出土的于阆语写本的解读。他的学术成就,值得我们颂扬;他的学术贡献,值得我们纪念。

贝利1899年12月16日出生在英格兰,11岁以后到西部澳大利亚,在那里读完大学和硕士。1927年入牛津大学,师从托玛斯(F. W. Thomas)学习梵文,1933年获博士学位。1929—1936年,他任伦敦大学亚洲学院伊朗语讲师。1936—1967年,任剑桥大学梵文教授。1967年退休,获荣誉教授衔。从1944年以来,他除任英国学术院院士、皇家亚洲学会主席等职外,还获得了欧、亚、澳许多国家科学院或大学给予的荣誉称号。他也确实是国际东方学界名副其实的带头人。由于他对学术的贡献,他还获得英国的爵士称号。

贝利虽然是梵文教授,但他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伊朗语。他对奥塞提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粟特语、瓦罕语、吐火罗语、犍陀罗语(印度西北俗语)、中亚混合梵语等都有研究和多少不同的贡献,然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和成就是对于阆语文献的解读。

贝利自1934年开始从事于阆语文献的研究,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研究伊朗语,即他想从这些十一世纪以后灭绝的“死语言”所写文书中,找出一个“中古伊朗语”(Middle Iranian)阶段,并由此帮助他对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



《阿维斯塔》(Avesta)的语言做研究。但后来,他的工作不得不部分地转向另一方面,即注释、整理于阆语文献所包括的佛教内容。

贝利围绕着于阆语文献做了大量工作,从词汇的识读、溯源,到写本的转写、比定、翻译。他几乎收罗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于阆文残片,包括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大谷光瑞、亨廷顿、彼得罗夫斯基等人所获材料,并全部做了转写,前人的转写,也全部重新校录。这些成果收入他的《于阆语佛文献集》(*Khotanese Buddhist Texts*)、《于阆语文书集》(*Khotanese Texts*)中。他还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于阆语佛典和世俗文书,其中敦煌所出于阆文信札的译文,虽不尽完善,但为后人的译释开辟了道路,也使非伊朗语专业的研究者大致了解到这些文书所反映的十世纪敦煌及其周边民族的情况,特别是于阆王国与瓜沙曹氏的关系。

贝利通晓多种印度伊朗语,他的《于阆塞语辞典》(*The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给出每一词的多种语言的对应词,是一部集大成的中古伊朗语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从广阔的印欧语系的背景下来审视中亚的于阆语,并给予它适当的地位。在最后十余年的研究中,他企图在伊斯兰化以前的西域,特别是塔里木盆地,追寻出一种他所说的“北伊朗语传统”(North Iranian Tradition),他利用西域出土的伊朗语文书和汉文、突厥文中保留下来的材料,归纳出“北伊朗语词汇”,这些词汇不能用西伊朗语的波斯语或帕提亚语来解释,甚至和粟特语也不一样。通过这些词汇,他力图说明古代西域历史中的“伊朗特征”(Iranist features),而这一点是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的。他1985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于阆语文书集》(第七卷),内容不是对文献的转写译注,而是对于阆语文书中出现的部族的研究。他在这本书以及在此前后所写的一些有关部族的文章中,都试图找寻这些部族语言中的伊朗语因素。

从西方中亚史研究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沙畹系统地解译了汉文文献,如果说巴托尔德大量利用了阿拉伯文史料,那么贝利应当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伊朗语文献背景。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对贝利的学术成就了解的

太晚而很不全面。原因之一是贝利的论著散在世界各地,收集不易。八十年代初,伊朗设拉子曾出版过他的两本论集(*Opera Minora. Articles on Iranian Studies*),但原订的以下三本迄未见刊出。他的论著目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BSOAS*)第33卷曾刊出1930—1980年部分,《伊朗学丛刊》(*Acta Iranica*)第20卷也有1969—1978年的简目,他的弟子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教授正在编制其全部论著目录。

笔者1985年留学荷兰莱顿,曾前往剑桥拜访贝利教授。他热情相待并送我许多他的著作和论文抽印本。当时他拿着高本汉的字典谦虚地对我说,他不懂汉语,而于阆语文献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大量的汉语、藏语、突厥回鹘语的知识,加上年老眼花,他决定告别这一领域。实际上,直到1991年为季羨林教授纪念文集写稿,他仍在讨论于阆语文书中的问题。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于阆语的研究。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309—324页,后附之论著目录从略。)

## 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侧记

在科班跟随季先生学习梵文的季门弟子面前,我不敢说是季先生的学生,但我一直在北大读书学习,得地利之便,有许多机会向季先生请教。记得我上大学三年级时,张广达先生就带我去拜访了季先生。当时季先生听说我想做于阆的研究,就高兴地拿出 C. Bartholomae 编的 *Altiranisches Wörterbuch* (Berlin 1904) 和 É. Benveniste 编的 *Textes sogdiens* (Paris 1940) 等书来给我看,并谈到伊朗学对西域研究的重要性。以后,每当有疑问时,就去向季先生请教;读书略有心得时,也愿意向他做汇报。然而,对我来说受益最大的还是季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

“西域研究读书班”是季先生取的名字,顾名思义,是以西域为研究对象的。古代中国典籍中的西域,指称的范围从小到大,包括了今天的新疆、中亚各国、印度乃至伊朗、西亚和欧洲,中心区域是中亚,这里正是许多不同学科的人都关心的焦点。从八十年代初,季先生就把一些在研究工作中与西域有关联的学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地聚会,我这个当时还是学生而后来成为教员的小卒,也一直忝陪末席。季先生用“读书班”一词,是表示它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而只以读书为目的的学术聚会,更确切地讲是相当于德国一些大学中的 Seminar。时间大体上数月一次,有题即谈,无话则不聚。

开始时,季先生经常讲起德国大学中的 Seminar 情形。他讲到这些 Seminar 是不同学科,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一些人聚在一起,围绕一定的主题,各抒己见,有时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甚至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会用拐杖把地板剁得咚咚响。但争论归争论,友情归友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绝不伤

害感情。季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工作很忙,但只要读书班有活动,他每次必到,而且常常是提前到场。每个人发言,他都会留心地听,然后提出疑问,有时是十分尖锐的问题。比如有一次是他指导的博士生王邦维讲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即印度佛教的部派问题,季先生就提出了许多质询的问题。在读书班上,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讨论解决,而有些问题一时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质询和争论促进在座的每个人去思考,使一些问题得到深入探讨。

季先生讲过,世界上唯独特一个汇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区就是西域,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扰人的缘由。季先生早年受学于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德施米特(E. Waldschmidt)和西克(E. Sieg)两位梵文教授,而他们都是解读西域发现的古代语言的大师,除梵文的极高造诣外,瓦尔德施米特还研究过中亚发现的摩尼教文献和中亚艺术史资料;而西克则读通了灭绝千年的吐火罗文。季先生从两位大师处学得的真本领,完全够他自己做学术研究用的了。但是,季先生从长远的学术发展着眼,利用他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把当时以北大为中心的有兴趣于西域研究的人召集在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些西域的问题,这无疑比每个人都闭门造车要好得多。通过这种形式,学有专长的人之间交流了信息和学术观点,而对于像我这样从学生到初出茅庐者来说,学到的东西就更多了。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读书班断断续续讨论过《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亚和西藏发现的梵文贝叶经、于阗文资料、粟特文资料、所谓“图木舒克语”资料、新疆新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和《弥勒会见记剧本》、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西域史料、汉文典籍中的南亚史料等等。而且,季先生一直想利用读书班的形式,把中亚各种语言的佛典做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还有意重新会读并详注《大唐西域记》。

先后参加过这个读书班的成员有:北大历史系的张广达、王小甫和我,北大南亚所的王邦维、耿引曾、段晴、张保胜、钱文忠;社科院南亚所的蒋忠新、郭良鋆;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黄宝生,中央民族学院的耿世民,文物局古

文献研究室的林梅村等。这些人中有研究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回鹘文的，有研究南亚、中亚历史的，有研究佛教、摩尼教的，他们对西域的某一方面，都各有各的研究专长。在这个大家庭中，你可以学到在其他的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也会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因为读书班有时邀请一些来京访问的国外中亚学者一起座谈，每当这时，主从客便，公共的语言换成了英语。这种场合，又是季先生为我们年轻人的成长创造的另一种环境。季先生常讲，西域研究是国际性的学问，我们一定要把英文学好，用英文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这虽然不是定性的要求，但从各位读书班成员在各种西文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季先生的鼓动不是没有效果的。

在读书班上，常常听到季先生讲起德国人做学问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他曾说过：“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心。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季羨林序跋选》64页）这实际上是季先生在方法论上给我们讲的一课。

在读书班上，季先生反复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他说，按照德国大学的制度，一篇博士论文在答辩前一个小时，看到世界任何地方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此文即告作废，一点都不含糊。他还说，最初德国的学术刊物不仅要求作者引文要注明页数，而且要注明行数。后来我翻开上个世纪的德国学术刊物一看，果然每一行都编了数码。从我一开始做论文，就努力遵循季先生所讲的这些从内容到形式的学术规范，有时为了一个页码，要跑到图书馆去借出一本刚刚还掉的书。每当想偷懒时，就会想起季先生的话语。

由于种种原因，“西域研究读书班”已经停顿很长时间了。每当我回想

起读书班召开时的情景,就感到季先生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家长,哺育了我们的成长;又像是一个严厉的教授,训导我们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前行。

(原载《人格的魅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241—245页。)

## 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

### 小 引

饶宗颐先生,号选堂,又号固庵。1917年生,广东潮安人。父亲饶锸先生,颇富藏书,著有《潮州艺文志》等。选堂先生自幼承家学渊源,谙熟岭南文献掌故,而且于经史、释道书,皆有深嗜,打下了极好的学问根柢。抗战前后,他在两广一带整理乡邦文献,并助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又曾应顾颉刚先生之约,编《古史辨》第八册,并撰《新莽史》。1949年以后饶先生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度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并曾从事研究或讲学于印度班达伽(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法国研究中心(C. N. R. S.)、美国耶鲁大学、法国远东学院(E. F. E. O.)、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E. P. H. E.)和日本京都大学等高等学府。退休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

饶先生学艺兼美,早已名闻海内外。但是,由于大陆多年来的封闭,很难看到港台、海外出版的饶先生著作,对饶先生的学问往往不甚了然。自八十年代以来,饶先生时常到内地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著作也不断在北京、上海等地刊出,今天国内学界,饶先生的大名可谓无人不晓了。我因研治“敦煌学”的因缘,早已特别留意饶先生的著作,数年来游学欧洲、日本,见饶先生大著,必购而读之。但饶先生研究方面之广,无有涯际,文章散在四方,常恨搜集不易。今有机会来港,亲承指教,得接道风,并得饱览饶先生“敦煌学”论著。饶先生百科全书式的学问远非我所能述,以下谨就我所熟

悉的所谓“敦煌学”范围,略表一二。

所谓“敦煌学”,严格来讲并不能算作一个学科。敦煌只不过是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洞窟、壁画、雕塑,特别是数万件遗书。随着遗书的流散,这些内容涉及多种学科的文献,吸引了世界上一大批学人专心于此,探索钻研,各逞其能,“敦煌学”也就应运而生。

敦煌遗书散在英、法、俄、日等国,在英法分别于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公布所藏之前,研究起来并非易事。而且写本数量庞大,内容博杂,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

## 一、发前古之秘,凿破混沌——道教研究

1956年4月,饶先生发表第一部“敦煌学”著作《老子想尔注校笺》<sup>〔1〕</sup>,将伦敦所藏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录出,兼做笺证,阐明东汉老学神仙家说,书中还就《想尔注》与《河上公注》、索洞玄本《道德经》、《太平经》等做了比较,并辑录《想尔注》佚文,考述张道陵著作,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资料,于道教研究贡献至巨<sup>〔2〕</sup>。其后不久,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M. Kaltenmark)即以此书教授诸生,其弟子们后来有欧美道教研究计划,实与饶先生这部书有关。《校笺》出版后,东西学人探讨《想尔注》者日众,许多关于道教史的专著都采用饶先生的论说<sup>〔3〕</sup>。有些日本学者对此书年代有所怀疑<sup>〔4〕</sup>,饶先生亦间有补充,先后

〔1〕 全称《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副题《道教原始思想初探》,香港:东南书局,1956年4月出版。

〔2〕 参看 Anna Seidel, “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 *Cahiers d'Extrême-Asie* 5 (1989-1990), pp. 230, 235。

〔3〕 如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

〔4〕 参看楠山春树《老子伝説の研究》第六章老子想尔注,创文社,1979年;麦古邦夫《老子想尔注について》,《东方学报》(京都)57册,1985年,75—107页;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三章老子想尔注,创文社,1990年。



撰写了《想尔九戒与三合义》<sup>〔1〕</sup>、《老子想尔注续论》<sup>〔2〕</sup>，今并收入199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老子想尔注校证》，其中新刊之《四论想尔注》，利用新出马王堆帛书材料，破除日人对道气论的疑虑，使旧说更为坚实。

饶先生熟悉《道藏》，故能从敦煌残篇断简中找出《道藏》所缺而又能够说明问题的资料。对于《道藏》已存的敦煌道典，饶先生也有不少发明，如判断P. 2732残卷为陶弘景《登真隐诀》杨君服雾法七韵之残文，其所注用韵数，今本或缺<sup>〔3〕</sup>。又《敦煌书法丛刊》第27—29卷三册为《道书》，虽然主要是从书法角度选取素材，但其所选的玄宗御注《老子道德经》、葛玄无注本五千文《道德经》、《庄子节本》、《太上洞玄灵宝度人上品妙经》、《太玄真一本际经》、《无上秘要》、《二教论》、《阅紫录仪》、《玄言新记明老部》等，均为道教史上重要典籍，极具参考价值。饶先生曾慨叹“道教典籍久为人所漠视，今之业绩反得力于异国人士”<sup>〔4〕</sup>，故此奋起其间，做出优异成绩。目前，道教研究已在国内广泛展开，但有关敦煌道教典籍的研究尚不多见<sup>〔5〕</sup>。

## 二、原始要终，上下求索——文学和乐舞研究

饶先生早年治《楚辞》，曾详校敦煌出土的释道騫《楚辞音》<sup>〔6〕</sup>。饶先生自言：“平生治学，所好迭异。幼嗜文学，寝馈萧选。”<sup>〔7〕</sup>他对敦煌遗书中

〔1〕 《清华学报》新4卷2期，台北，1964年，76—84页。

〔2〕 《福井博士颂寿纪念东洋文化论丛》，东京，1969年。

〔3〕 《论敦煌残本登真隐诀(P. 2732)》，《敦煌学》第4辑，1979年，10—22页。

〔4〕 黄兆汉《道教研究论文集》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

〔5〕 如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道教文化研究》，但一、二辑中未见有关敦煌道教文献的论文。

〔6〕 载所著《楚辞书录》，香港，1956年版；又收入所著《文轍》上，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123—130页。

〔7〕 《选堂字说》，载所著《固庵文录》，台北，1989年，325页。

文学作品的研究,更重要的起点是1957年发表的《敦煌本文选斟证》一、二篇<sup>[1]</sup>。其后不久,伦敦公开出售斯坦因所获写本六千余件的缩微胶卷,饶先生斥资购得一份,爬梳出许多珍贵秘籍,如迄今所知仅有一件写本的《文心雕龙》,即由饶先生于1962年首次影印行世,并且指出胶卷所摄有所夺漏<sup>[2]</sup>。现此卷研究影刊者又有数家<sup>[3]</sup>,但饶先生首刊之功实不可没。此外,饶先生还据原件校补了敦煌写本《登楼赋》,并考其写作年代<sup>[4]</sup>。又据S.4327《谩语话》,讨论话本的起源问题<sup>[5]</sup>。

在敦煌文学领域,饶先生的最大成就应推他对曲子词的研究。1971年,饶先生完成《敦煌曲》一书,由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P. Demiéville)教授译成法语,合法汉两本于一编,由法国科研中心出版<sup>[6]</sup>。饶先生早年整理清词,后上溯宋、明,有《词籍考》之作<sup>[7]</sup>。以此深厚的词学功底,和1965年在巴黎、伦敦亲接原卷的有利条件,饶先生精印出一大批前人不知的敦煌曲子词,包括两件难得的俄藏敦煌曲子词写本,嘉惠学

[1] 《新亚学报》3卷1期,333—403页;3卷2期,305—328页,4图版。

[2] 《文心雕龙专号》,香港大学中文学会,1962年。又所附《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跋》,今收入《文辙》上,407—408页。

[3] 参看潘重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香港新亚研究所,1970年;林其琰、陈凤金《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合校》,上海,1992年。

[4] 《敦煌写本登楼赋重研》,《大陆杂志》特刊第2辑,1962年,511—514页;收入《文辙》上,267—275页。

[5] 《敦煌本谩语话跋》,《东方》(中国小说戏曲研究专号),1968年;收入《文辙》上,443—449页。

[6] 全称 *Airs de Touen-houang (Touen-houang k'iu), textes à chanter des VIIIe-Xe siècles. Manuscrits reproduits en facsimile avec une Introduction en chinois par Jao Tsong-yi, adaptée en français avec la traduction de quelques textes d'Airs, par Paul Demiéville, Paris 1971*。应当指出的是,此书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系作者自己抄写的,而是假手他人,故有笔误。

[7] 《词籍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63年。新编《词集考》,1992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林<sup>〔1〕</sup>。此书所校录的敦煌曲子词,杂曲之外,兼收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未收之赞偈佛曲,且作校记,订正旧录之误极多。其所刊新资料,于历史研究也多有裨益,如《谒金门·开于闐》一首,是敦煌与于闐关系史的重要篇章,至此时方显于世<sup>〔2〕</sup>。另外,对敦煌曲之年代、作者,词之起源,词与佛曲、乐舞、龟兹乐之关系等问题,均做了切合实际的考察。书中附有敦煌曲系年、敦煌曲韵谱、词调卷号索引等,便于读者使用。此后有关敦煌曲的研究著作,无不取材于此书。但饶先生本人并未满足,而是继续补阙拾遗,又撰有《曲子定西蕃——敦煌曲拾补之一》<sup>〔3〕</sup>、《长安词、山花子及其他——大英博物院藏 S. 5540 敦煌大册之曲子词》<sup>〔4〕</sup>。并在陆续发表的多篇论文中,进一步申论曲子词的种种问题,如《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sup>〔5〕</sup>、《敦煌曲子中的药名词》<sup>〔6〕</sup>、《法曲子论——从敦煌本〈三皈依〉谈“唱道词”与曲子词关涉问题》<sup>〔7〕</sup>等。1989年出版的任半塘先生著《敦煌歌辞总编》,于《敦煌曲》有些不符实际的批评。近年来,饶先生重新检讨曲子词及其相关的种种问题,先后撰有《后周整理乐章与宋初词学有关诸问题——由敦煌舞谱谈后周之整理乐章兼论柳永〈乐章集〉之来历》<sup>〔8〕</sup>、《从敦煌所出〈望江

〔1〕 参看杨联陞书评《饶宗颐、戴密微合著〈敦煌曲〉》,原载《清华学报》14卷2期,1974年;收入《杨联陞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42—247页;苏莹辉《〈敦煌曲〉评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卷1期,收入《敦煌论集续编》,台北,1983年,301—320页。

〔2〕 参看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闐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291页。

〔3〕 《新社学报》第5期,新加坡,1973年,1—3页。

〔4〕 《新亚学报》第11期上,1974年,49—59页。参看魏礼贤(Hélène Vetch)的法译“Note sur le Tch'ang-Ngan Ts'eu”, *T'oung Pao*, LX. 1-3, 1974。

〔5〕 《敦煌学》第1辑,1974年,69—78页。

〔6〕 《明报月刊》237期,1985年9月号,68—69页。

〔7〕 《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53—60页。

〔8〕 《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创刊号,台湾,1991年,25—38页。

南》、《定风波》申论曲子词之实用性》〔1〕、《“唐词”辨正》〔2〕、《敦煌词札记》〔3〕等,并整理影印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李卫公望江南》〔4〕,阐明自己对曲子词的观点。饶先生说:“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即文学方面,赏鉴评鹭之余,亦以治史之法处理之。”〔5〕在曲子词的研究上,正是如此。我于词学是外行,对于任先生的批评,不敢赞一词,但任先生关于一些歌辞年代的界说,如《五台山曲子词》,若依治史方法处理之,则只能说是后唐时的产物,而非武周〔6〕。

饶先生对敦煌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成果部分汇集在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出版的《文彻》一书中。

饶先生善鼓琴,通乐理。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注意到敦煌遗书中保存的珍贵乐谱、舞谱,撰有《敦煌琵琶谱读记》〔7〕、《敦煌舞谱校释》〔8〕,是这一研究领域里的先驱者之一。八十年代以来,饶先生发表《敦煌琵琶谱〈浣溪沙〉残谱研究》〔9〕、《敦煌琵琶谱与舞谱之关系》〔10〕、《敦煌琵琶谱写卷原本之考察》〔11〕、《论□·与音乐上之“句投”(逗)》〔12〕、《敦煌琵琶

---

〔1〕《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395—400页。

〔2〕《九州学刊》4卷4期,1992年,109—118页。

〔3〕《九州学刊》4卷4期,1992年,119—120页。

〔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

〔5〕《文辙》小引。

〔6〕参看拙稿《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55—62页。

〔7〕《新亚学报》4卷2期,1960年,243—277页。

〔8〕《香港大学学生会金禧纪念论文集》,1962年。

〔9〕《中国音乐》1985年第1期。

〔10〕1987年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

〔11〕《音乐艺术》1990年第4期。

〔12〕《中国音乐》1988年第3期。

谱史事的来龙去脉》〔1〕等等一系列论文,于琵琶谱的年代及曲体结构,创获最多。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均收入《敦煌琵琶谱》〔2〕和《敦煌琵琶谱论文集》〔3〕两书中。黎键先生《饶宗颐关于唐宋古谱节拍节奏记号的研究》〔4〕和陈应时先生《读敦煌琵琶谱——饶宗颐教授研究敦煌琵琶谱的新记录》〔5〕两文已有专门论说,此不赘述。

### 三、搜虫书鸟语之文,溯龙树马鸣之论 ——历史语文研究

在历史学领域,饶先生利用敦煌文书,同样做出许多令人瞩目的开拓性工作。

禅宗入藏,是西藏佛教史与汉藏关系史的重要课题,自来研究者皆为欧美日本学者。饶先生在戴密微教授刊布的法藏本《顿悟大乘正理决序》之外,新发现了英藏本 S. 2672,撰《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6〕,并依此文书及相关汉藏文材料,对有关禅宗入藏的宗论与历史、地理、年代问题做了深入的考述。与此相关的还有《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7〕、《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8〕两文。前者重要在讨

〔1〕《音乐研究》1987年第3期。

〔2〕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

〔3〕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

〔4〕《敦煌琵琶谱》155—171页。

〔5〕《九州学刊》4卷4期,1992年,121—125页。

〔6〕《崇基学报》9卷2期,1970年,127—148页;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713—770页。

〔7〕《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香港,1964年,173—181页,图I—IV;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697—712页。

〔8〕《东方文化》9卷1期,1971年,1—57页;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672—696页。

论摩诃衍禅法的来源,后者则据敦煌文书,论证戴密微提出的敦煌贞元三年(787)陷蕃说<sup>[1]</sup>。饶先生上述三文,属于这一复杂问题的开创期的研究成果。仅此一例,可见饶先生治学,往往能够抓住一代新学术的重点,而做出奠基性的工作。

翻开《选堂集林·史林》,上至三代,下迄明清,所论极为广博,一些论文,虽非直接讨论敦煌文献,但随处拈来,得心应手。如《论古文尚书非东晋孔安国所编成》<sup>[2]</sup>,引 P. 2549《古文尚书孔传目录》为证,说明是西汉临淮太守孔安国撰。《穆护歌考》于敦煌袄教、摩尼教史料采论至广,多有新意<sup>[3]</sup>。《维州在唐蕃交涉史上之地位》一文<sup>[4]</sup>,对 P. 2522《贞元十道录》有所考订。《论七曜与十一曜——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简介》<sup>[5]</sup>,由 P. 4071《康遵批命课》,申论《聿斯经》出自西域都赖水,并考辨“七曜”有摩尼教传入之“七曜”与中国天文数术传统中固有的“七政”两意,引敦煌历书等材料为证。《三教论及其海外移殖》引敦煌本《新集孝经十八章》,证唐代君主的三教汇合论,又指出 S. 5645 刘晏《三教不斉论》,即日僧最澄、空海传入扶桑者<sup>[6]</sup>。

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陈寅恪先生以

---

[1] 按此说大致不误,惟因据《新唐书》所记依满十二年计,为贞元三年,实多计一年。目前学界一般取贞元二年说,参看池田温《丑年十二月僧龙藏牒》,《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72年,737页,注6;山口瑞凤《吐蕃支配时代》,《敦煌の歴史》,东京,1980年,197—198页;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1期,1—7页。

[2] 《选堂集林·史林》上,398—410页。

[3] 《选堂集林·史林》中,472—509页。

[4]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本下,1969年;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656—671页。

[5]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ed., M. Soyumié, Genève-Paris 1979; 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771—793页。

[6] 《选堂集林·史林》下,1207—1248页。

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饶先生曾留学印度梵学研究中心班达伽东方所,从巴朗吉(Paranjpe)父子攻治婆罗门经典,研治《梨俱吠陀》,通晓梵巴诸语文,因而能够揭出刘熙《释名》渊源于婆罗门经《尼卢致论》(Nirukta)<sup>〔1〕</sup>,韩愈《南山诗》实受马鸣《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影响<sup>〔2〕</sup>等前人未发之覆。饶先生还由敦煌写本《悉昙章》,申论梵文 ण, ण, ण, ण 四流音对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的深远影响<sup>〔3〕</sup>。又如“敦煌学”界讨论极繁的“变文”之“变”字,饶先生在《从“变”论变文与图绘之关系》(1980年)一文中<sup>〔4〕</sup>,指出即梵文所谓“神变”之 Pratiharya。后来美国学者梅维恒(V. H. Mair)在所著《唐代变文》<sup>〔5〕</sup>和《绘画与表演》<sup>〔6〕</sup>两书中,详考“变”字的印度来源,实未出饶先生此文的篱藩。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一书中的各篇文章,虽篇幅不长,但发明极多。

〔1〕 《尼卢致论(Nirukta)与刘熙的〈释名〉》,《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北京,1985年;49—54页;又载川口久雄编《古典の変容と新生》,东京明治书院,1984年,1190—1196页;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1—10页。

〔2〕 《韩愈南山诗与昙无讖译马鸣佛所行赞》,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9号,1963年,98—101页;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118—122页。

〔3〕 “The Four Liquid Vowels ण ण ण ण of Sanskri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Note on Kumarajiva's T'ung Yun. Tun-huang Manuscript S. 344), *The Adyar Library Bulletin*, vol. 31-32 (Dr. V. Raghavan Felicitation Volume), Madras 1968; 许章真译载《国外学者看中国文学》,台北,1982年;英文本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下;中文本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29—38页;亦收入许氏《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台北,1989年;此外,金文京日译本载《中国文学报》32号,1980年。

〔4〕 《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东京,1980年;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123—137页。

〔5〕 Cf.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9.

〔6〕 Cf. *Paintings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Honolulu 1988.

#### 四、他生愿作写经生——书法绘画研究

敦煌艺术以绘画最为脍炙人口,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只注意壁画和绢画。饶先生独具匠心,留意写本中的绘画资料,曾撰《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P. 2682, S. 6261)》<sup>〔1〕</sup>,于此两卷书法绘画,有所考述。后在巴黎讲学之际,将散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研究敦煌画极重要的材料辑出,编成《敦煌白画》一书,由戴密微等译出,中法对照,有图有说<sup>〔2〕</sup>,于沙州画样来历以及画法、题材,结合画史,多所阐明。以后又在《魏玄石白画论》一文中<sup>〔3〕</sup>,对白画二字来历,有所补充。此书填补了敦煌画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近年来,饶先生多次访问敦煌,得以亲睹莫高窟壁画,在陆续发表的文章中,对敦煌壁画中的刘萨诃<sup>〔4〕</sup>、围陀<sup>〔5〕</sup>、俄尼沙<sup>〔6〕</sup>等形象,皆有新说。

饶先生绘画史论文,现集为《画颂》一书<sup>〔7〕</sup>,其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

〔1〕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1969年,539—543页,图1—9。

〔2〕 全称 *Peintures monochromes de Dunhuang. Manuscrits reproduits en facsimile, d'après les originaux inédit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n chinois par Jao Tsong-yi, adaptée en français par Pierre Ryckmans, préface et appendice par Paul Demiéville*, 3 v., Paris 1978。

〔3〕 《选堂集林·史林》上,308—310页。

〔4〕 《刘萨诃事迹与瑞像图》,《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336—349页。

〔5〕 《敦煌石窟中的俄尼沙》,《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6〕 “The Vedas and the Murals of Dunhuang”, *Orientalism* 20. 3, 1989;《围陀与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16—26页。

〔7〕 台北时报出版社,1993年。



《吴县玄妙观石础画迹》一文<sup>〔1〕</sup>。此文由台湾史语所保存的石础画像,论到《灵宝度人经变相》,于人们熟知的佛教经变画之外,揭示了道教经变与变相的关系,所引敦煌写本如 P. 4979 所记《道教天尊变》一铺,为许多讨论变文变相问题者所忽略。

相对而言,饶先生于敦煌艺术更具开拓性的研究,是对敦煌书法的系统表彰。早在 1961 年,饶先生就写有《敦煌写卷之书法》<sup>〔2〕</sup>,利用当时所见英伦藏卷,选印精品为《敦煌书谱》。以后 1964、1974 年两度逗留法京,遍览伯希和取去之宝藏,更扩大规制,选取拓本、经史、书仪、牒状、诗词、写经、道书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辑成《敦煌书法丛刊》29 册,于 1983—1986 年间,陆续由日本二玄社照原大影印,佳书妙品,融于一编。在每册的解说中,饶先生系统揭出敦煌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其论各个时代的法书风格,可从以下例子中窥之一二:P. 4506 北魏皇兴五年书《金光明经》,“结体诎荡,行笔逋峭,《刁遵》、《高湛碑》之劲美,兼而有之。论其书法艺术,顿挫行阵之中有一片浑穆气象,谓为标准之魏法,可以当之无愧”;P. 3471《仁王般若经序》“书写于陈世,必在天嘉以后,坚挺秀整,开唐人之先河,劲古而不媚俗,孰谓经生书为无足观耶?”P. 2508《南华真经郭象注》“为唐初道书之精写本。自袁桷误题《灵飞六甲经》为钟绍京笔,后人悉目此为经生书。此卷当亦属经生书,〔《徐无鬼》卷〕意态飞动,尤为妍秀。因知经生书体类多姿,非仅《灵飞六甲经》一路而已也”。P. 3994《词五首》“字极拙重健拔,在欧、柳之间,毫锋取势,可与王案《汝帖》第十二卷所收李后主书《江行初雪》画卷赵幹题字相颉颃,可定为五代时书风,在书法史上应为极难得之妙品”。我们对照影本读这些典雅的鉴赏跋语,实在是一种美的享受,惟日译往失去文言意趣,今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中文修订本,题曰《法藏敦煌书苑菁华》,正可以弥补此失。

〔1〕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5 本第 2 分,1974 年,255—309 页。

〔2〕 《东方文化》第 5 卷,1961 年,41—44 页,图 I—XXIV。

饶先生选录此书标准有三:(一)具有书法艺术价值;(二)注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三)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性者。包括书法精品《温泉铭》、《化度寺塔铭》、《金刚经》三拓本<sup>〔1〕</sup>,以及《十七帖》、《智永真草千字文》临本;经史典籍《周易》、《毛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晋春秋》<sup>〔2〕</sup>、《大唐西域记》、《沙州图经》、《书仪》;文人诗词及俗文学作品《文选》、《玉台新咏》、《高适诗》、《云谣集》、《王昭君变文》;重要文书《封常清谢死表》、《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状》、《曹元忠状》、《大云寺安再胜牒》;佛道经典《金光明经》黄绢写经<sup>〔3〕</sup>、《东都发愿文》<sup>〔4〕</sup>、《生经》、《三阶佛法》、《因明入正理论》、《大乘起信论略述》等等(道书已见上),对所收每件文献,均有考证,多所发明。周绍良先生说:“这一百五十多篇提要,既博且精,实为饶先生多年治敦煌学之结晶,不可以寻常书法文字视之。”<sup>〔5〕</sup>柳存仁教授也称:“其所审鉴之《敦煌书法》,益见其考索之贍备。”<sup>〔6〕</sup>人称饶先生“业精六学,才备九能”<sup>〔7〕</sup>,我以为此书最具代表性。

〔1〕 以上三帖又详见《论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1987年,298—304页。

〔2〕 详见《敦煌与吐鲁番写本孙盛晋春秋及其“传之外国”考》,《汉学研究》4卷2期,1986年,1—8页。

〔3〕 详见“Le plus ancien manuscrit date (471) de la collection Pelliot chinois de Dun-huang P. 4506 (une copie du *Jingguangming jing* 金光明经)”, *Journal Asiatique*, 269, 1981, pp. 109-118。

〔4〕 详见“Le ‘voeu de la capitale de l’Est’(东都发愿文) de l’Empereur Wu des Liang(梁武帝)”,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III, Paris 1984, pp. 143-154 + pl. XVIII。

〔5〕 《一部研究敦煌写经书法的专著》,《人民日报》1986年8月28日。

〔6〕 《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序,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

〔7〕 苏文撰《佛国集后序》,《选堂诗词集》,选堂教授诗文编校委员会,1978年,12页。

“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1〕这两句题画诗，真切地表现了饶先生对敦煌艺术的热爱。

## 小 结

饶先生研究敦煌遗书，着眼点往往是汉学领域中的大问题，但他所论又往往不限于汉文材料，古今中外，取材得心应手，故而多有创新之论。饶先生对敦煌资料的研究表明，他不愧是一位“当今汉学界导夫先路的学者”〔2〕。

（初稿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3年5月号，修订稿载《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4期，1993年，37—48页。）

---

〔1〕《选堂诗词集》，157页。

〔2〕施岳群《在饶宗颐顾问教授聘书颁发仪式上的讲话》，复旦大学，1992年11月。

## 入海遗编照眼明

——潘重规《“中央图书馆”所藏  
敦煌卷子题记》读后

—

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工作,因为面对的是一批杂乱无章的写本文献,所以和其他某个人文或社会学科的专题研究有所不同,往往先要进行文献的编目、整理工作,然后才能进入研究阶段。一个优秀的敦煌学者,常常是既能做写本编目、文献整理,也能着手敦煌写本内容的专题研究,而敦煌写本内容多样,有的学者可以兼跨两个或者更多的专业领域,并做出优异的成绩。潘石禅(重规)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对敦煌学的许多方面做出过贡献的佼佼者。

笔者对潘先生的许多研究领域,如《诗经》、变文、曲子词、俗字等,属于外行,实不敢赞一词<sup>[1]</sup>。但因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海内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调查与研究,对潘先生整理刊布“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的业绩至感敬佩,并且在潘先生所编目录的引导下,于1996年11月走访该馆,浏览若干敦煌文书。现借表彰潘先生此项业绩的机会,略述“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的价值,兼介绍笔者阅览的一点收获。

---

[1] 参看潘重规《我探索敦煌学的历程》,《中央日报》1982年10月3—4日;又载《敦煌学》第13辑,1988年,190—194页;郑阿财《潘重规教授与敦煌学研究》,《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7辑,1996年,27—43页。

二

原在南京的“中央图书馆”〔1〕,在1949年迁台以前,就陆续收集到流散在社会上的一些敦煌写卷。但过去人们只是从《“中央图书馆”甲库善本书目录》中,得知该馆藏有敦煌写卷66号,共75件卷子或残片〔2〕。该《目录》主要著录题名、著译者和写本年代,除了三种道经外,全是佛教经典,因此没有引起敦煌学者的注意,而且,写本运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之外的学者也很难接触这些原卷,而台湾之内的学者也没有人想去检索一番。

1967年秋,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潘重规先生,因侍母疾而返台,抽暇阅读“中央图书馆”藏全部一百五十余卷敦煌写本,撰成《“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对每件写本的内容和外观做了详细记录,相当于敦煌写本编目中的注记目录〔3〕。此目一经刊出,受到广泛关注。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先生立刻在《东洋学报》上撰《台北图书馆所藏敦煌古钞目录》一文,据潘先生《题记》择要加以介绍〔4〕。而以研究敦煌疑伪经著称的日本学者牧田谛亮教授,也在潘先生《题记》的导引下,于1969年春访问“中央图书馆”,得阅所藏敦煌经卷,写成《台北“中央图书馆”之敦煌经》一文,简要介绍了《鸠摩罗什法师诵法》、《大乘莲华宝达菩萨问答报应沙门品》第二十八、《大悲禅门偈》、《佛说香火本国经》、《惟教三昧》下卷等藏外佛典的价值〔5〕。法

〔1〕 该馆数年前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本文仍用“中央图书馆”名,这样也和潘先生论著的名称一致,免得造成更多的混乱。

〔2〕 王重民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四《敦煌遗书散录》1《前“中央图书馆”藏卷目》,即据《“中央图书馆”甲库善本书目录》转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314—315页。

〔3〕 载《新亚学报》第8卷第2期,1968年,321—373页。

〔4〕 此据邱荣竊译文,载《敦煌学》第2辑,1975年,70—73页。

〔5〕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8卷第2号,1970年,197—202页。此据杨钟基译文,载《敦煌学》第2辑,1975年,74—79页。

国吴其昱先生据潘先生寄赠的照片,考释了其中四件古藏文佛经,先用法文发表<sup>〔1〕</sup>,续又自译成中文,并略加增订<sup>〔2〕</sup>。此后,《“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第2册,也著录了全部敦煌卷子<sup>〔3〕</sup>。1975年,潘先生又依《善本书目》次序,并附吴其昱先生的补正之说,撰成修订本,仍称《“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编入《敦煌学》第2辑,此辑连同上述石田、牧田、吴其昱的三篇译文,合成《“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专辑》,由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出版,成为七十年代敦煌学的一个小高潮。

潘先生在《题记》修订本中呼吁:“至台馆所藏,虽仅余百卷,然皆国之瑰宝,故尤渴望影印出版,传播寰宇。倘有能发大弘愿,将全部卷子影印流通,成此伟业,诚不胜跂望乐观其成云。”很快,潘先生的呼吁得到回响。1976年11月,潘重规编《“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六册,由台北石门图书公司出版,全部写卷用八开铜版纸影印。在此之前,只有罗振玉全部影印过自家藏卷<sup>〔4〕</sup>,而公立图书馆还没有一家采用影印的方式来公布全部资料。潘先生说 he 极力怂恿“中央图书馆”将敦煌卷子全部影印公诸于世的目的,“一方面,希望在学术上有切实贡献;一方面,也希望对全世界拥有敦煌卷子的图书馆,产生一点刺激的作用”<sup>〔5〕</sup>。现在看来,潘先生此举不仅在推动敦煌学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他按馆藏单位影印全部敦煌卷子的理念,远胜于先前所有的缩微胶卷,因而成为近年来敦煌文献出版的主要形式。在我们敦煌学界拥有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仅

〔1〕 Wu Chi-yu, “Quatre manuscrits bouddhique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a la Bibliothèque centrale de T'ai-pei”,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a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1971, pp. 567-571.

〔2〕 吴其昱《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敦煌学》第2辑,1975年,56—69页。

〔3〕 台北,1967年。

〔4〕 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年。

〔5〕 潘重规《“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影印流通的贡献》,《汉学研究通讯》第1卷第1期,1982年,2页。

收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1—15册,未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15册,未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2册)、《北京大学藏敦煌西域文献》(1—2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1—7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4册),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肃藏敦煌文献》(1—6册),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浙藏敦煌文献》,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5册,未完)的今天,我们应当对潘先生在敦煌文献整理刊布上的开拓性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在感激的同时,应当把潘先生的这项富有远见的贡献,写入将来的敦煌学史当中。

潘先生在编写目录、刊布原卷的基础上,也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发掘其中有价值的研究素材,《孟兰盆经讲经文》就是一例。此卷首残,存130行文字,有墨笔校改,尾题“孟兰盆经”,又有诗一首<sup>[1]</sup>。潘先生拟题为“孟兰盆经讲经文”,并细加校录,收入所编《敦煌变文集新书》中<sup>[2]</sup>。我们知道,英、法、中国所藏敦煌变文类写本资料,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六位先生的多年收集,五十年代全部编入《敦煌变文集》,除俄藏写本不得见外,几乎收罗殆尽<sup>[3]</sup>。潘先生能够在中国所藏敦煌卷子中检出一卷变文,实属难得。而且,潘先生的录文准确,校语得当,这是初次校录一个俗字较多的变文类写本时所不容易做到的,试看《敦煌变文集》中的有些录文常常受到责难,而目前敦煌变文集大成的著作——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于潘校多予肯定,少有改正<sup>[4]</sup>。潘先生发现的这个卷子,不仅为敦煌俗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对于研究讲经文的实际

[1] 《“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12—13页;《“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第2册,273—277页。

[2] 《敦煌变文集新书》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3年,487—496页。

[3] 《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4] 《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005—1010页。

应用情况也大有助益。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指出,由于它有大量的修改和注记文字,所以是唐朝俗讲僧人所使用的原始文本,在现存的敦煌讲经文或变文写本中十分突出〔1〕。

“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的影印出版,也为其他专家发掘、利用其中的有用资料提供了方便,以下举两个例子。

1. 第133号写本,首残,前面抄圭峰大师宗密的《禅源诸论集都序》,后抄宗密“所纂集著经律论疏钞集注解文义及图”的全部目录,后有题记:“广顺二年(952)三月十日,从京来汉大师智清本上抄写。”最后是题名“大乘禅门要录一卷”〔2〕。这个卷子不仅提供了宗密《都序》的最早抄本,重要的是保存了宗密的全部著作目录,对于研究宗密和禅宗历史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卷子是个孤本,最早发现它的学者是陈寅恪先生,他在自己的《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五藏论》一卷”处,有眉批曰:“宗密《禅源诸论集都序》引此书,近有敦煌残本。”〔3〕大概因为住在北京的陈先生只是临时到南京时看到该卷,所以没有来得及做任何研究,以至于这个重要的写卷一直沉睡在“中央图书馆”里。潘先生把它刊布出来以后,很快就被禅学研究者发现。1976年,田中良昭教授撰《关于敦煌本〈禅源诸论集都序〉残卷》,加以介绍〔4〕。1979年,田中良昭教授又发表《敦煌本〈禅源诸论集都序〉残卷考》,抄录全卷两部分文字,并特别考察了敦煌本《都序》的特色和系统〔5〕。以后,加拿大学者冉云华教授在一连几篇文章中,指出该卷作为宗密著作最早传本的价值,并利

〔1〕 V. H. Mair, “Oral and Written Aspects of Chinese Sutra Lectures (*Chiang-ching-wen*)”, 《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 1986年, 315—320页。

〔2〕 《“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 51页; 《“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第6册, 1237—1241页。

〔3〕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49页。可惜整理者误录为“宗宏《禅源语谈集》都序引此书”。

〔4〕 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5卷第1号, 1976年, 107—112页。

〔5〕 载《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37号, 1979年, 51—71页; 又载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の研究》, 东京大东出版社, 1983年, 413—442页。



用宗密的著作目录说明其所编《禅藏》的存在,分析了目录中著录的另一部书《道俗酬答文集》,还考证了全卷名称《大乘禅门要录》的意义〔1〕。

2. 第125号《大盛稻芊经随听疏》背面,有183行藏文,所记为寅年沙州阿骨萨部落(stong sar kyi sde)和悉董萨部落(rgod sar kyi sde)的人名表。这个名表已由日本藏学家上山大峻教授转写出来〔2〕,高田时雄教授判定其为捐献写经的记录〔3〕,它对于研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制度、汉人身份地位、汉藏音的对译等等,都富有参考价值〔4〕。

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发表,还会有某些专家感兴趣的资料被发现。

### 三

从潘重规先生发表《题记》的1968年,到刊布《“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1976年,正直大陆地区轰轰烈烈的“文革”年代,当然对于海峡彼岸敦煌遗编的出版没有任何反映。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人可以看到一些

---

〔1〕 冉云华《宗密著〈道俗酬答文集〉的研究》,《华冈佛学学报》第4期,1976年;又《敦煌本〈禅源诸论集都序〉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敦煌学》第12辑,1987;两文收入作者《中国佛教文化研究论集》,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116—174页;又“A Study of Ta-ch'eng Ch'an-men yao-lu; Its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533—547页;又《宗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38、42—54页。

〔2〕 上山大峻《敦煌のチベット字人名資料》,唐代史研究会编《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90年,402—419页。

〔3〕 高田时雄《有关吐蕃期敦煌写经事业的藏文资料》,郝春文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642—644页。

〔4〕 本次研讨会结束后,曾有机会与高田教授一起“中央图书馆”观看这件敦煌藏文写卷子,其名单的后面部分,每段后有圆形朱印,背面纸缝处,也有同样印鉴,值得今后的研究者注意。

台湾的出版物,潘先生校录的《孟兰盆经讲经文》,受到变文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1〕;广顺二年抄本宗密的《禅源诸论集都序》及宗密的著述目录,也引起讨论〔2〕。然而,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所藏《“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一书,是三卷的简本,笔者所关心的一些写卷背面的世俗文书,仍不得一见。于是,1996年11月,笔者借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与赵和平学长一起,在汉学研究中心刘显叔先生和中正大学郑阿财教授的精心安排下,得以阅览部分敦煌写本原卷,现将调查结果,抄录于下,兼做简要说明,以飨读者。

第32号《孟兰盆经讲经文》背面,《题记》著录有《敕肃州诸军事牒》一件。此卷为肃州刺史授官牒的草稿,文字如下:

- 1 敕肃州诸军事 牒
- 2 前件人补充
- 3 衡前子弟
- 4 牒奉 处分,前件人久在军门,
- 5 奉使无失,既当展效,须励勤劳。
- 6 须补充衡前子弟将,牒举
- 7 者,准状,各牒帖所由。牒知
- 8 者,故牒。
- 9 天五年正月卅日牒
- 10 肃州刺史检校大夫索

其后又抄一遍,表明是授官牒的拟稿,所以文字有改订和省略。其年号只写“天”字,尚难确定时间,估计当在天宝以后,最有可能还是归义军时期的文

〔1〕 据潘先生校本而做的再校录收入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编《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005—1010页。

〔2〕 参看荣新江《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242页。

书。肃州原为归义军领地,大概在张淮深统治末期,被甘州回鹘夺取,这件文书或许是归义军仍然控制肃州时的产物。另外,这件授官牒文草稿虽然文字不多,但对于我们理解唐朝的子弟之制,还是有所帮助的<sup>[1]</sup>。

第78号背抄《梵网经》等,后有杂写<sup>[2]</sup>:

季夏极热,伏惟都知张押牙同行上下等并各尊体

起居万福,即日□□蒙恩(以下原卷未抄)

阿磨不用入,今日切忌,不宜向东,人入此者有讳。

阿磨阿郎。

二月仲春渐暄,伏惟

梁法师闍梨法体起居万福,即日重(?)远蒙恩不审

尊体何似,伏惟(以下原卷未抄)

敕归义军节度留后使检见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

敕河西陇右楼兰金满等州节度观察(以下原卷未抄)

以上杂写,也透露了若干信息,最后两条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题衔,对比其他敦煌文献,可以确定为曹议金在924—925年间的称号<sup>[3]</sup>,所以其他杂写也应当是曹氏归义军初期的文字。杂写中提到都知张押牙一行上下,应当是归义军的一组重要使臣。而“阿磨阿郎”尤值得注意,“阿郎”是主人的意思<sup>[4]</sup>,这里的“阿磨”是译音词,所指当然不是归义军的主人,即节度使。S. 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第1—2行,记有“支公主、阿磨遍次面五

[1] 关于唐朝子弟制度,参看孙继民《从〈唐大历三年(768年)曹忠敏牒为请免差充子弟事〉看唐代的子弟》,收入所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0—120页。

[2] 三卷本《敦煌卷子》图录,709—710页。

[3] 参看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99—101、363页。

[4]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15页。

斗”的帐目〔1〕,敦煌归义军文书中的“公主”,往往指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的可汗或国王的女儿,和她一起被归义军官府款待的阿磨,应当也是这些王国的重要使臣或首领。在此,“阿磨阿郎”最有可能的是指甘州回鹘的可汗。还应当提到的是,“阿磨”和“阿摩”的原文应当相同,而后者曾出现在吐鲁番出土《高昌章和五年(535)取羊供祀帐》中,作“供祀大坞阿摩”。姜伯勤考订此“阿摩”为粟特文 Adbag“大神”的译音,指祆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2〕。甘州回鹘的宗教信仰当以摩尼教为主,而摩尼教的许多神灵是借自祆教的,所以“阿磨”的名称也透露了回鹘人的宗教信仰。

第108号《观音经》衬裱纸上,《题记》著录有《借券》一件。现据原卷录出文字如下:

- 1 癸丑年正月廿三日,捉磴户高员友□
- 2 周年沿磴诸处破用及矜局□□
- 3 硕壹斗,并在员友身上,限日便
- 4 充,用为后凭。
- 5 欠裸人高员友
- 6 口承人侄高□□

此件可以供研究归义军经济史者参考。

第119号《妙法莲华经》背面,先抄《君子小人》文,然后是《书仪》,有《谢得马》、《谢银器》、《谢人口》、《谢□园》、《谢幞头》、《谢帽子》、《谢腰带》,书写者自称“员住”,而赠物者为“尚书”,知为实际应用的书仪文本,可作为书仪研究者的参考资料。最后是《祭文》和《祭社人文》〔3〕。

〔1〕 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281页。

〔2〕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239—240页。

〔3〕 三卷本《敦煌卷子》图录1124—1125页。

“中央图书馆”和其他敦煌小收集品一样，世俗文书不多，但这些资料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获得圆满的解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它们的价值会进一步发挥出来。

#### 四

关于这批写本的来源，《题记》告诉我们：“询之馆长屈翼鹏教授暨前馆长蒋慰堂先生，知多为抗战时及胜利后，购自李木斋之女暨叶誉虎所藏。”

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一字誉虎),民国初任职交通及邮政部门,且关心学术。1921年曾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与李盛铎(号木斋)等从事辑录敦煌写本目录事,大概对李木斋所藏敦煌卷子略知一二。他所写的《寄庵敦煌图录序》称:“余知李(木斋)、刘(幼云)二氏多佛经以外之典籍,偶露麟爪,难窥其秘也。近年李、刘皆去世,所藏始分别散出,余首介绍‘中央图书馆’购入二百余卷。李所藏由家属析分各售,不复能聚。”<sup>〔1〕</sup>然而,据我多年来的调查可知,李盛铎所藏敦煌写卷(主体为盗自甘肃运京的写本),往往加盖多种李氏印鉴,并著录于《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中,共432号,这一部分,在1935年全部出售给日本某氏,现在仍完整保存<sup>〔2〕</sup>。《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六所载《李木斋旧藏敦煌名迹目录》第二部分(据传抄本),由于近刊《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是按照馆藏号排序,使我们得以对证出《散录》的0601—0631即上图106—136号,《散录》0638—0643即上图137—142号,中间上图所缺的《散录》00632—0637六个号,《名迹目录》已经名言“此六卷为日本所藏唐人写经”,所以早已被剔除。《散

〔1〕 张虹《敦煌图像徵考录》,香港弘道艺术院,1963年,5页。

〔2〕 荣新江《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载《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1—18页;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录〉简介》,《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91—101页。

录》最后一个号 0644《索铁子状》，则已归上海博物馆收藏〔1〕。在这批据称为李盛铎旧藏的卷子上，印有个别李氏的印鉴，但和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所藏李氏所藏真品上施印的情形不同，是否确切得自李家，似难肯定。“中央图书馆”所藏，没有任何带有李盛铎印鉴的卷子，使人对叶氏的说法有些怀疑，特别是该馆所藏全部只有 144 号，而叶氏称“余首介绍‘中央图书馆’购入二百馀卷”，显然是回忆时的张大之词。叶恭绰本人也藏有敦煌写本，《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续）著录第 147 号抄录叶氏跋语有：“余（供）养敦煌经卷不下百事，今仅存十一。”〔2〕时在 1949 年 6 月，或许“中央图书馆”的藏卷大多数来自叶氏所藏，只不过他出售时声称是藏有敦煌真卷的李氏藏卷而已。这是一点推测，尚无确据。

从《题记》提供的信息，“中央图书馆”所藏卷子记明来历者，有沧县张溥泉先生旧藏（第 4、29 号），有钤“歙许茆父游陇所得”印的许承尧旧藏品（第 85、95、127 号），有钤“洹上寒云”印的袁克文藏卷，并有袁氏题记（第 98 号），有钤“曾在不因人热之室”印并有启功跋语的卷子（第 13 号）等，还有馆方著录为从北平（第 50、56、65 号）、上海（第 117、118 号）所购者，说明来历不一。其中以许承尧的旧藏品最佳，因为许氏民国初曾官甘肃，获得不少精美写卷〔3〕。“中央图书馆”所藏第 85 号《大般涅槃经》，卷尾有“三界寺藏经”印，其为真品无疑。第 127 号残经疏背纸缝有“福惠”署名，《题记》引吴其昱先生曰：“疑福惠即福慧，似为敦煌净土寺僧，曾于大中末在沙州开元寺听高僧法成讲《瑜伽论》，录有《瑜伽论手记》。此卷疑是《瑜伽论手记》之类。”按吴说甚是，据上山大峻教授对敦煌写本中一大批法成讲义的

〔1〕 荣新江《〈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 6 辑待刊。

〔2〕 《敦煌研究》1986 年第 3 期，91 页。

〔3〕 参看荣新江《甘藏敦煌文献知多少》，《档案》2000 年第 3 期，17—18 页；鲍义来《许承尧与敦煌遗书拾掇》，《档案》2001 年第 5 期，22—25 页。

详细研究,福慧与谈迅为一组听法成讲《瑜伽论》。两人大概分工记录《瑜伽论手记》和《瑜伽论分门记》,背面纸缝交互署名<sup>〔1〕</sup>。“中央图书馆”此卷应当即是福慧听讲记录,这类文书是近人无法做伪的卷子,当系真品,并且可补上山教授《〈瑜伽师地论〉讲义录一览表》所缺<sup>〔2〕</sup>。

谈到真伪问题,这是我们利用敦煌小收藏品时面临的一个难题。笔者1996年走访该馆时,因为时间很短,没有来得及特别关注。但从《题记》所记某些卷子的情况,有值得怀疑处,如第129号《惟教三昧》的尾题作:“金二丈四寺道人僧成敬写供养,普为法界众生。”敦煌卷子中从未见有“金二丈四寺”,牧田谛亮先生疑为“金光明寺”之误,其说甚有道理,因为“二丈”当是“光”字的误读,“四”则“明”字的误读,但题记书写工整,表明书写者完全不知敦煌有金光明寺,而照猫画虎成“金二丈四寺”,不伦不类,显系后人添写。其他卷子是否有问题,需要做个案分析。

附记:本文之能够成文,端赖刘显叔、郑阿财、赵和平诸位先生之助,特此致谢。

(2001年10月3日初稿,12月18日修订;原载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3月,14—26页。)

〔1〕 上山大峻《敦煌佛教之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226—227页。

〔2〕 上山大峻《敦煌佛教之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244—246页。

## 作者已刊论著编年目录

篇名后所加 A、B、C、D、E、F、G 者，已分别收入下列各书中：

A = 《于阗史丛考》(与张广达合著)，上海书店，1993. 12。

B = 《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6。

C = 《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1。

D = 《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 9。

E =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 12。

F = 《敦煌学新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11。

G = 《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1。

DD = 《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鸣沙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2 年

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与张广达合撰)，《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179—209。(A)

### 1983 年

敦煌卷子札记四则，《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631—673。



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与张广达合撰),《新疆社会科学》1983:4,78—88。(A)

#### 1984 年

“Les noms du royaume de Khotan, les noms d'ère et la lignée royale de la fin des Tang au début des Song” (with Zhang Guangda),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III*, ed. by M. Soyumié, Paris 1984, 23—46 + pls. I—IV.

#### 1985 年

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4,29—35。

#### 1986 年

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2,24—44。

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与张广达合撰),《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69—147,图20—34。(A)

于阗佛寺志(与张广达合撰),《世界宗教研究》1986:3,140—149。(A)

敦煌文书 P. 3510 于阗文《从德太子发愿文》(拟)及其年代(与张广达合撰),《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163—175。(A)

欧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献闻见录,《敦煌学辑刊》1986:1,119—133。

欧洲所藏西域出土汉文写本调查随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10,24—29。

(翻译)乌瑞: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1986:4,106—113。

1987 年

九、十世纪于阗族属考辨,《新疆社会科学》1987:4,76—83。

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西北史地》1987:4,53—55。

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阗语写卷目录初稿(与张广达合撰),《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90—127。(A)

“Sur un manuscrit chinois découvert à Cira près de Khotan” (with Zhang Guangda), *Cahiers d'Extrême-Asie*, 3, 1987, 77-92.

台北“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2,22—28。(D)

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胡戟等编《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26—85。

(翻译)彼得森: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敦煌学辑刊》1987:1,132—137。

(翻译)宇野顺治:民主德国科学院藏西域出土佛典的国际合作研究情况报告,《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8,30—33。

1988 年

《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铎牒》跋(与张广达合撰),《新疆社会科学》1988:1,60—69。(A)

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与张广达合撰),《东洋学报》69:1.2,1988,59—62。(A)

关于敦煌和田出土于阗文献年代问题研究概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8:1,17—27。

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2,55—62。(C)

敦煌的兴衰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文史知识》1988:8,23—29。

《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编写刍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

通讯》1988:2,55—58。(D)

(翻译)井之口泰淳:于阆语资料所记之尉迟王家的系谱和年代,《新疆文物》1988:2,113—124,131。

(翻译)蒲利本:钢和泰藏卷年份考,《新疆文物》1988:2,125—131。

(翻译)哈密屯:公元851—1001年于阆年号考,《新疆文物》1988:2,133—138。

### 1989年

上古于阆的塞种居民(与张广达合撰),《西北民族研究》1989:1,172—183。(A)

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与张广达合撰),《北京大学学报》1989:2,24—36。

关于敦煌出土于阆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与张广达合撰),《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84—306。(A)

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文献》1989:3,87—100。(C)

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9:4,70—78。(C)

(翻译)贝利:于阆王国,《新疆文物》1989:3,37—43。

(翻译)乌瑞: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藏文史料概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5,1989,39—81。

(翻译)恩默瑞克:于阆语中的藏文借词和藏语中的于阆文借词,《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6,1989,136—161。

### 1990年

《唐刺史考》补遗,《文献》1990:2,80—94。(F)

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2,1—13。(C)

通颊考,《文史》33,1990,119—144。

小月氏考,《中亚学刊》3,中华书局,1990,47—62。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E. Yarshater ed., *Encyclopaedia Iranica*, V—1, New York 1990, 97—99.

敦煌学研究揭开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中国文化》2,1990, 7—9。(D)

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39—354。

(翻译)山崎元一:于阗国传说成立的背景,《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 4,44—53。

#### 1991年

《话说敦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与尚林、方广鋈合撰),日本龙谷大学,1991。

“mThong-khyab or Tongjia: A Tribe i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s in the Seventh to Tenth Centureis” (tr. by W. K. Müller), *Monumenta Serica*, 39, 1990—91, 247—299.

唐宋时代于阗史概说(木田知生译),《龙谷史坛》97,京都,1991,28—38。

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费孝通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81—304。

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敦煌研究》1991:2,1—12。(C)

公元十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583—603。(C)

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955—968。

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及研究状况,《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研究通讯》1991:2,1—7。(B)

### 1992 年

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3,56—64。

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 z di-*”,《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VII, 神户, 1992, 1—12。

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敦煌学》19, 台北, 1992, 15—67。(C)

金山国史辨正,《中华文史论丛》50, 1992, 72—85。(C)

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与林悟殊合撰),《九州学刊》4: 4 敦煌学专号, 1992, 19—34。(D)

敦煌学书评二则,《敦煌研究》1992:4, 106—112。(D)

书评: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 台湾《汉学研究通讯》44:4, 1992, 307—309。(D)

王玄策、裴矩、勃律(以上与张广达合撰)、丝绸之路(与孙毓棠、杨建新合撰)、龟兹、疏勒、焉耆、于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翻译)威廉斯:于阗绘画中的佛像,《新疆文物》1992, 169—176。

### 1993 年

《于阗史丛考》(与张广达合著), 上海书店, 1993. 12。(=A)

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2, 8—15。

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206—216。(C)

关于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3:2, 46—53。(C)

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 黄约瑟与刘健明合编《隋唐史

论集》，香港大学，1993，106—117。(C)

归义军改元考，《文史》38，1993，45—53。(C)

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5，32—39。(C)

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西北民族研究》1993:2，60—72。(C)

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76—87。(F)

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阆影响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1，1993，北京大学出版社，401—424。

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书窗》1993:1，61—63。(D)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文物》1993:2，56—59。(D)

敦煌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语文献研究概述，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57—71。

书评：池田温编《敦煌汉文文献》，香港大学《东方文化》XXXI.1，1993，174—178。(D)

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中国唐代学会会刊》4，1993，37—48。(D)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11，28—29。

#### 1994年

《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S.6981—1367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7。

《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与姜伯勤、项楚合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7。

九、十世纪归义军时代的敦煌佛教，《清华汉学研究》创刊号，1994，88—101。(C)

于阆王国与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2，111—119。

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157—172。(E)

有关敦博本禅籍的几个问题(与邓文宽合撰),《敦煌学辑刊》1994:2, 5—16。(D)

森安孝夫著《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评介,《西域研究》1994:1, 99—103。(E)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评介,《北京大学学报》1994:1, 122—123 + 120。(E)

### 1995 年

(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 566 + 10 图版。

(副主编)《英藏敦煌文献》第12—1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龙家考,《中亚学刊》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44—160。

袄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35—353。(E)

俄藏敦煌西域文献纪略,《学术集林》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255—283。(B)

《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1995:1, 33—43。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敦煌文献考察纪略,《敦煌研究》1995:4, 127—132。(B)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小记(与张国刚合撰),《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辰——中国古代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12, 252—257。(B)

英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纪略,《敦煌学辑刊》1995:2, 1—8。

饶宗颐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评介(与赵声良合撰),《敦煌研究》1995:1, 172—174。(D)

敦煌文献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敦煌研究》1995年特刊, 50—52。

(D)

书评: J. -P. Drège,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au X<sup>e</sup> siècle)*, 《九州学刊》6:4 敦煌学专号, 1995, 171—173。(D)

书评:《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敦煌吐鲁番研究》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368—373。(D)

书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敦煌吐鲁番研究》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373—376。(D)

书评:《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唐研究》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2, 557—560。

### 1996年

《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6. 6。(=B)

《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11。(=C)

(主编)《唐研究》第2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2, 565+8图版。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2, 1996, 23—48。

(D)

张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6, 118—132。(C)

“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wo Nestorian Christian Documents Unearthed at Dunhuang from the Li Collection” (with Lin Wushu),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1. 1, May 1996, 5-14.

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兼谈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民大史学》1, 1996, 6—18。(E)

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文化读书班”侧记,《人格的魅力》,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6, 241—245。(D)

敦煌本《书仪镜》为安西书仪考,《庆祝婺源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



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8, 267—273。

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段文杰先生治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学论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 8, 250—253。(D)

ロシア所蔵の景德伝灯録(衣川贤次译)，《禅文化》161, 1996 夏, 134—146。

档案与敦煌学研究，《档案》1996:5, 12—13。(D)

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汉文佛典札记，《华学》2, 1996, 314—317。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敦煌文献纪略，《文献》1996:2, 149—158。(B)

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6, 176—188。(B)

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韩国研究》3, 杭州出版社，1996. 12, 14—34。

中外关系(与廉湘民合撰)，《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432—485。

山田信夫著《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评介，《敦煌研究》1996:3, 172—174。(D)

书评:Chen Guocan, Sitanyin suohuo Tulufan wenshu yanjiu (with Valerie Hansen),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1996, 11.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汉译本评介，《书品》1996:2, 32—34。(E)

书评:方广錫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唐研究》2, 1996. 12, 463—466。(D)

书评: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唐研究》2, 1996. 12, 555—559。(E)

西州回鹘等，《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华书局，1996。

1997 年

(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584+16图版。

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7,231—241。(E)

五代洛阳民间印刷业一瞥,《文物天地》1997:5,12—13。

王延德所见高昌回鹘大藏经及其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67—272。

柏林通讯,《学术集林》卷十,1997.8,380—397。(F)

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3,231—244。(D)

“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 *IDP NEWS*, No. 7, Spring 1997, 1—5 + 3 pls. (F)

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2,1—18。(D)

“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学术研讨会简介,《敦煌研究》1997:4,179—182。(F)

八世纪下半与九世纪初的于阗(与张广达合撰),《唐研究》3,1997.12,339—361。

书评:A. Cadonna (ed.), *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唐研究》3,1997.12,538-543。(D)(E)

书评: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唐研究》3,1997.12,572—575。(D)

书评: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唐研究》3,1997.12,575—577。(D)

1998 年

《敦博本禅籍录校》(与邓文宽合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41+527。

(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579+4图版。

一个人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2—90。(E)

中国所藏吐鲁番文书及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敦煌学》21,1998,41—61。(F)

《唐开元二十三年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残卷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140—146。

《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燕京学报》新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5—92。

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编《华学》3,紫禁城出版社,1998,309—325。

归义军大事纪年初稿,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3,中华书局,1998,234—260。(C)

安世高与武威安姓——评《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黄时鉴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1998,366—379。(E)

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132—148。(G)

贝利教授与于阗语文献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2,1998,309—324。(D)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考察纪略,《中华文史论丛》57,1998,37—65。(B)

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其人其事——《新疆地下的文化宝藏》中译本序,《人民政协报》1998年11月9日第三版《学术家园》。(F)

“Meeting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Cave”, *IDP News*, No. 10, Spring 1998, 7.

通颊、张议潮,《西藏历史文化辞典》,西藏人民出版社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52,338。

仲云、吐蕃王朝编年史、于阗语、粟特语、英国博物馆、李盛铎旧藏、敦煌

石窟图录、斯坦因等,《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12。

### 1999 年

《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探讨》,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 9。(=D)

(主编)《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572+4图版。

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85。(E)

丝绸之路,袁行霈编《中华文明之光》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23—134。(E)

《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王尧编《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北京出版社,1999. 3,130—150。(E)

十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与张广达合撰),余太山编《欧亚学刊》1,中华书局,1999. 12,181—192。

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4(吐鲁番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7—144。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Turfan Oasis and Its Exploration” (with Zhang Guangda),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11, Part 2, 1998 (1999), 13-36.

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残卷考释,《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2,71—73+附图。

敦煌本《天宝十道录》及其价值,唐晓峰等编《九州》2,1999,116—129。

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与徐俊合撰),《唐研究》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59—79。

俄藏敦煌写本《唐令》残卷(Дх. 3558)初探(与史睿合撰),《敦煌学辑刊》1999:1,3—13。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Chinese Fragments from Dunhuang in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vol. 24, No. 1, Spring 1998 (1999), 78—89 + 3 figs.

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概述,饶宗颐编《敦煌文藪》下,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4,121—137。

敦煌古籍整理现状评议,《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2,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5,332—346。(F)

罗布泊:中国西部探险的热点话题,《深圳特区报》1999.6.20《读书》。(F)

重读敦煌书序,追念恭三先生,《仰止集——邓广铭先生纪念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494—499。(F)

敦煌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文史知识》1999:6,40—45。(F)

藤枝晃教授与敦煌学研究(附:藤枝晃教授论著目录),《敦煌吐鲁番研究》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563—576。(F)

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西初识》,大象出版社,1999,139—144。

书评: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历史研究》1999:3,186—188。(F)

书评: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86—590。(F)

书评: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唐研究》5,1999.12,499—504。(E)

书评: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唐研究》5,1999.12,515—518。

书评: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唐研究》5,1999,518—522。(E)

书评:E. R. Knauer, *The Camel's Load in Life and Death*,《唐研究》5,1999.12,533-536。(E)

2000年

(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526+8图版。

(翻译)梅维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与王邦维、钱文忠合译),燕山出版社,2000.6。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刘东编《中国学术》1,商务印书馆,2000,158—171。(E)

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余太山编《欧亚学刊》2,中华书局,2000,73—83。(E)

据史德语考(与段晴合撰),余太山编《中亚学刊》5(1996),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9—21。

法门寺与敦煌,《'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2,66—75。(F)

“The Nature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and the Reasons of Its Sealing” (tr. by Valerie Hansen), *Cahiers d'Extrême-Asie*, 11 (Nouvelles études de Dunhuang), ed. J. -P. Drège, Paris/Kyoto 1999—2000, 247-275.

“More on the Nature of the Tun-huang Treasures: Three Stages Monastery and the Library Cave” (Abstract),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No. XLV, 2000, Tokyo: The Toho Gakkai, 91-93.

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修订稿),《敦煌研究》2000:2,23—28。(F)

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1998]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333—340。(F)

甘藏敦煌文献知多少?《档案》2000:3,16—19。(F)

敦煌文献:新材料与新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1,16—17。(F)  
(G)

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辞海新知》No. 5, 2000. 6, 65—71。(F)(G)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琐议,《光明日报》2000.9.5。(F)

敦煌学の昨日、今日、明日,《人民中国》2000:10,20—24。

敦煌学百年:海外汉学的奉献,《光明日报》2000.10.20《历史周刊》。

(F)

敦煌文献与古籍整理,《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2000,269—280。(F)

敦煌地理文献的价值与研究,《书品》2000:3,33—40。(F)

敦煌本《贞元十道录》及其价值,《中华文史论丛》63,2000,92—99。

《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补正,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379—387。

“[Chines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s” (tr. by Lin Yi),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 2000, 111-123.

“Research on Zoroastrianism in China (1923—2000)” (tr. by Bruce Doar),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IV. 1: Zoroastrianism in China, December 2000, 7-13.

“The Migrations and Settlements of the Sogdian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tr. by Bruce Doar),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IV. 1: Zoroastrianism in China, December 2000, 117-163.

重读《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中华读书报》2000.3.22 第20版。

(F)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评介,《敦煌研究》2000:4,178—180。

(F)

《英藏敦煌文献》定名商补,《文史》52,2000,115—129。(F)

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汉学研究通讯》19:4,2000,649—651。(F)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中国史研究》2000:1,

167—169。(F)

书评:《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北大史学》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28—332。(E)

《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唐代史研究》3,日本唐代史研究会,2000,54—58。(G)

### 2001年

《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11 + 373 + 110 插图 + 4 地图。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12,ix + 6 + 490。(=E)

(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599 + 8 图版。

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1,65—72。(E)

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出自考——ソグド后裔説をめぐって(张铭心、广中智之译),

《内陆アジア史研究》16,东京早稻田大学大学,2001.3,1—12。

“The Relationship of Dunhuang with the Uighur Kingdom in Turfan in the Tenth Century”, *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V)*, ed. by Louis Bazin et Peter Zieme, Brepols 2001, 275-298.

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4,84—89。(E)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郝春文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1—21。

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重研(与徐俊合撰),《唐研究》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125—144。

粟特袄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从粟特到中国,巫鸿编《汉唐之



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9，51—72。(E)

(整理)陈寅恪：《敦煌零拾》札记，《敦煌吐鲁番研究》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2。(F)

中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刊布简介，日本《唐代史研究》4，2001，118—121。

书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第12卷《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敦煌吐鲁番研究》5，2001，332—337。(F)

书评：《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敦煌吐鲁番研究》5，2001，418—422。(F)

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典范——《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读后，乐黛云编《季羨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纪念季羨林教授九十寿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2—46。(F)

《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评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369，2001.11，21—24。

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中文本序，《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4。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前言，《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1，1—10。(F)

申国美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序，同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9，1—2。(F)

## 2002年

《敦煌学新论》(敦煌学研究丛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9。(=F)

(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与朱玉麒合作)，中华书局，2002.4，2+12+331+56图。

(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557+11图版。

《释迦降伏外道像》中的祆神密斯拉与祖尔万,《华林》2,中华书局,2002.1,201—213。(E)

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刘东编《中国学术》2002:4,商务印书馆,2002.12,56—76。

中亚、西亚、南亚、南海、欧洲、非洲关系,胡戟等编《二十世纪唐研究·政治卷》第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60—287。(G)

“The Li Shengduo Collection: Original or Forged Manuscripts?”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3), ed. by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62-83 + pl. 1.

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校录考证(与徐俊合撰),蒋寅、张伯伟编《中国诗学》7,2002.6,1—13。

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郑炳林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7,14—29。(F)

狩野直喜と王国維——初期敦煌学史の一美談,高田时雄编《草創期の敦煌学》,东京知泉书馆,2002.12,47—55。

有关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积翠轩文库旧藏“略出本”校录,《戒幢佛学》2(中日敦煌佛教学术会议专辑),岳麓书社,2002.12,94—105。(DD)

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与张广达合撰),《敦煌吐鲁番研究》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221—241。

近年于阗语及其文献研究论著评介,潘悟云主编《东方语言与文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3,360—372。(F)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评介,余太山编《欧亚学刊》3,中华书局,2002.4,288—292。(E)

(书评) *La Sérinde, terre d'échanges*,《敦煌吐鲁番研究》6,2002.8,375-377。

(书评) *C. G. Mannerheim in Central Asia 1906—1908*,《敦煌吐鲁番研

究》6,2002.8,419—423。(G)

21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3,17—20。(DD)

周一良先生与书,《读书》2002:6,114—120。

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6,2002.8,26—37。(F)

大谷探險队とその将来品,《本愿寺新报》2002年12月20日第7版。

### 2003年

(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8。

(主编)《唐研究》第9卷(“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619+2彩版。

海路还是陆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和流行区域研究述评,《北大史学》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20—342。(G)

“The Illustrative Sequence on An Jia’s Screen: A Depiction of the Daily Life of a Sabao” (tr. by Bruce Doar), *Orientalism*, February 2003, pp. 32-35 + figs. 1-7。

Miho 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艺术史研究》4,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12(2003.7),199—221。

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12,246—260。

佛像还是祆神?——从于阗看丝路宗教的混同形态,《九州学林》1:2,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冬季,93—115。

略谈徐显秀墓壁画上的菩萨联珠纹,《文物》2003:10,66—68+封二

图版。

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128—143。

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邓小南主编《唐宋妇女与社会》下(《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8,723—750 + 图1—15。

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新问题与新探索,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8,1—12。  
(G)

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袄祠的社会功能,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8,385—412 + 图1—9。

《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总序,《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第1辑每本书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8,1—2。

唐写本中の《唐律》《唐礼》及びその他(森部丰译),《东洋学报》85:2,2003.9,1—17 + 图1—4。

盛唐长安:物质文明闪烁之都,齐东方、申秦雁主编《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5,47—53。

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唐研究》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1—8。(G)

隋唐长安史地丛考·引言,《唐研究》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235—236。

隋唐长安史地丛考·三戟张氏,《唐研究》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259。

隋唐长安研究文献目录(与王静合编),《中国唐史学会会刊》22,2003.10,57—86。

唐代禅宗的西域流传,《田中良昭博士古稀纪念论集·禅学研究的诸

相》，东京大东出版社，2003. 3, 59—68。

慧超所记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冉云华先生八秩华诞寿庆论文集》，台北法光出版社，2003. 3, 399—407。

略谈于阗对敦煌石窟的贡献，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 9, 67—82。

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敦煌学辑刊》2003; 2, 123—128。(DD)

“Chinese Inscriptions on the Turfan Textiles in the Museum of Indian Art, Berlin”, Appendix II to *Central Asian Temple Banners in the Turfan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 Painted Textiles from the Northern Silk Route*, by Chhaya Bhattacharya-Haesner,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3, pp. 475-476.

入海遗编照眼明——潘重视《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读后，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2003. 3, 14—26。(DD)

《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后记，同书，463—464。

(讲演稿)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9, 64—88。

(讲演稿)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概况，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9, 89—111。

欧洲学院的缩影——莱顿大学汉学院(海外书话1)，《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 1, 45—49 + 2

插图 + 封二。

神圣的殿堂——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海外书话2)，《中

国典籍与文化》2003:2,55—61。

学术精品的追求——莱顿的布瑞尔书店和它的出版物(海外书话3),《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3,86—91。

莱顿的旧书——海外中国文化研究一瞥(海外书话4),《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4,43—48。

《佛教大词典》的学术价值,《光明日报》2003年7月15日B4版。

跨越中国边境的跨文化互动学术研讨会(附:梅维恒教授敦煌研究论著目录),《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创刊号,北京中华书局,2003.12,41—45。

## 2004年

(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与李孝聪合编),科学出版社,2004.1。

(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与张志清合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4。

(主编)《唐研究》第10卷(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686+48图版。

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1,1—7。(G)

丝绸之路上粟特聚落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Sogdian Colonies along the Silk Road/ツルクロードにおけるソグド人居住地の日常生活,《MIHO MUSEUM 研究纪要》4,滋贺:财团法人秀明文化财团,2004.3,1—15。

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2,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12(2004.4),102—123。

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人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4,3—8。

(图版解说)安伽墓志等,《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

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4,66 以下。

ソグド祇教美術の東伝過程における転化——ソグドから中国へ(西林孝浩译)，《美术研究》384，东京文化财研究所，2004.11,1—17。

四海为家——粟特首领墓葬所见粟特人的多元文化，《上海文博》2004:4,85—91 + 图 1—11。

“Land Route or Sea Route? Commentary on the study of the paths of transmission and areas in which Buddhism was disseminated during the Han period” (tr. by Xiuqin Zhou), *Sino-Platonic Papers*, ed. V. H. Mair, No. 144, July 2004, 1-32.

中古中西交通史上的统万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7,29—33。

韦述及其《两京新记》(与王静合撰)，《文献》2004.2,31—48。

“Juqu Anzhou’s Inscription and the Daliang Kingdom in Turfan” (tr. by Wang Yuanyuan), *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ed. by D. 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268-275 + pls. 1-3 + figs. 1-2.

“Official Life at Dunhuang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 Case of Cao Yuanzhong” (tr. by A. Morrison), *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ed. by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4, 57-62 + fig. 1-4.

历史时期的胡汉葬俗：吐鲁番的例证，余太山编《欧亚学刊》4，中华书局，2004.6,177—181。

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敦煌吐鲁番研究》7，中华书局，2004.1,99—127。(DD)

《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1,41—43 + 4 图。

敦煌本邈真赞拾遗，《敦煌学》25(潘重规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专辑)，2004.9,459—463。

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与余欣、王素合撰),《首都博物馆丛刊》18,2004.10,166—174。

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示例(与余欣合撰),《华学》7(饶宗颐教授米寿志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2,223—233。

《唐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献词,《唐研究》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1—6。(G)

书评:《岑仲勉著作集》,《唐研究》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581—584。

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序,同书,齐鲁书社,2004.6,1—2。

书评: *Sir Aurel Stein in The Times*,《敦煌吐鲁番研究》7,中华书局,2004.1,496—499。(G)

书评: *Handbook to the Stein Collections in the UK;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敦煌吐鲁番研究》7,中华书局,2004.1,499—504。(G)

评《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322—329。(G)(DD)

## 2005 年

《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名家专题精讲系列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G)

(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与邓小南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

(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与华澜、张志清合编),中华书局,2005.12。

前言,《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12,3—8。

金樽美酒醉他乡——从安伽墓看粟特物质文化的东渐,《文物天地》



2005:1, 88—91。

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3, 47—56 + 图 1—6。

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2, 1—11。

“*Sabao or Sabo: Sogdian Caravan Leaders in the Wall-Paintings in Buddhist Caves*”, *Les Sogdiens en Chine*, sous la direction de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et Éric Trombert,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5, 207—230.

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 12, 49—71。

“*Khotanese Felt and Sogdian Silver: Foreign Gifts to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Ninth and Tenth-Century Dunhuang*”, *Asia Major*, XVII. 1, 2004 [2005], 15—34.

从《井真成墓志》看唐朝对日本遣唐使的礼遇,《西北大学学报》2005:4, 108—111。

8 世纪における东アジアの外交情勢と遣唐使による中日交流,《遣唐使と唐の美术》,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2005. 7, 134—137。

汉代から唐代における東西交渉史——新旧史料の概観(西村阳子译),《中国——社会と文化》20, 2005. 6, 445—455。

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1,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 6, 130—137。

丹丹乌里克的考古调查与唐代于阗杰谢镇,《新疆文物》2005:3, 31—35。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见《西域水道记》校补本,《文史》2005:4, 245—256。

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历史研究》2005:4, 165—175。(G)《新华文摘》2005:21, 55—58 摘要转载。

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大中六年—咸通二年)(与余欣合撰),《敦煌吐鲁番研究》8(庆祝饶宗颐先生米寿专号),中华书局,2005. 1, 71—88。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3,267—276+图1—3。

敦煌写本真伪弁别示例——法成の講じた《瑜伽師地論》の学生による筆記を中心として(与余欣合撰),石塚晴通教授退職記念会编《日本学·敦煌学·汉文訓読の新展开》,东京汲古书院,2005.5,61—72。

敦煌写本辨伪示例:以法成讲《瑜伽师地论》学生笔记为中心(与余欣合撰),《敦煌学·日本学——石塚晴通教授退職記念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2,65—74。(DD)

(讲演稿)敦煌学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1,135—159。

(讲演稿)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1,223—248。

古代中亚史研究,余太山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6,123—155。

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序,同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8,3—4。

《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序(与邓小南合撰),《唐研究》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1—3。

## 2006年

(主编)《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粟特与突厥——粟特石棺图像的新印证,周伟洲编《西北民族论丛》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1—23。

新出トゥルフアン文書に見えるソグドと突厥(清水はるか、关尾史郎

译),《環東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一年報》1,新潟大学,2006.3,5—15。

“Sogdians around the Ancient Tarim Basin”, *Érān ud Anērān. 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ič Marš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sup>th</sup> Birthday*, eds. M. Compagnoni, P. Raffetta and G. Scarcia, Venezia: Libreria Editrice Cafoscarina, 2006, 513-524.

“Zoroastrian deities on a Buddhist sculpture from Xi'an” (tr. by Wang Yuanyuan), 古正美编《唐代佛教与佛教艺术》/*Buddhism and Buddhist Art of the Tang*, 新竹: 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 2006.6, 253—261。

“New Light on Sogdian Colonies along the Silk Road. Recent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Northern China”,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ichte und Abhandlungen*, Band 10, Berlin: Akademie Verlag, Oktober 2006, 147-160.

“The Sogdian Caravan as Depicted in the Reliefs of the Stone Sarcophagus from Shi's Tomb of the Northern Zhou”, *Chinese Archaeology* (中国考古学), 6,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6.12, 181—185 + figs. 1—4.

有关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的几个问题, 张庆捷等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 科学出版社, 2006.12, 126—139。

俄藏 Дх. 3558 唐代令式残卷再研究(与史睿合撰), 《敦煌吐鲁番研究》9, 中华书局, 2006.5, 143—167。

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三年—六年)(与余欣合撰), 白化文主编《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8, 333—342。

敦煌历史上的曹元忠时代, 《敦煌研究》2006:6, 92—96 + 图1—5。

欧美所藏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 研究现状与评介, 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学研究: 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10, 37—41。

西域——摩尼教最后的乐园, 《寻根》2006:1, 4—9。

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序, 本书, 中

华书局,2006.3,1—2。

中华古籍特藏保护展览随想,国家图书馆编《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5,7—10。

(讲演稿)谈谈治史学的方法(附讨论记录),张柏春、李成智主编《技术史研究十二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4,13—28。

书评: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9,中华书局,2006.5,512—518。(DD)

(评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5,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2,75—82。

《粟特人在中国》编后感言,《书品》2006:4,14—18。

关于北大所藏常书鸿致胡适的一封信,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85—91。(DD)

新発見の中国中世史,纪平英作、吉本道雅编《京都と北京——日中を结ぶ知の架橋》,角川学艺出版,2006.12,191—207。

## 2007年

(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9。

(主编)《唐研究》第13卷(从汉魏到隋唐:变迁与延续研究专号)(与侯旭东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7+669。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与孟宪实、李肖合撰),《文物》2007:2,41—49,图1—图8。

新獲トウルフィン出土文献概説(与孟宪实、李肖合撰,张娜丽译),《西北出土文献研究》4,2007.2,5—15。

唐代の仏・道二教から見た的外道——景教徒(高田时雄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宗教文献研究》,京都临川书店,2007.2,427—445。

金樽美酒醉他乡——从安伽墓看粟特物质文化的东渐(增订稿),赵丰

编《丝绸之路:艺术与生活》,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7.3,19—24。

一张废纸上的中亚历史脉动,《光明日报》2007年3月19日第9版(史学版)。

刘进宝《归义军经济史研究》序,《敦煌研究》2007:1,114;刘进宝《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1—2。

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2,4—14+图1(封三)。

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浙江大学学报》37:3,2007.5,15—25。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534—548。(DD)

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6,中华书局,2007.6,165—178。

シルクロードの新出土文書——吐魯番新出土文書の整理と研究(西村阳子译),《东洋学报》89:2,2007.9,59—77。

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敦煌吐鲁番研究》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21—41。

书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敦煌吐鲁番研究》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409—413。

书评:Chinese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3,《敦煌吐鲁番研究》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226—430。

《王重民向达先生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序,《敦煌学辑刊》2007:3,169—170。

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人,《吐鲁番学研究》2007:1,28—35。

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与孟宪实合撰),《西域研究》2007:4,51—62。

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续)(与王素、余欣合撰),《首都

博物馆丛刊》21,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10,126—137。

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15—32。(DD)

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4,1—30。

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序,《敦煌研究》2007:4,107—108;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张铭心、郝轶君译),中华书局,2007.12,1—3。

唐代于阗の歴史的環境,日中共同ダンダンウイリク遺跡学术調査隊編《日中/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京都,2007.12,13—40。

ダンダンウイリクの考古学的調査と研究(1896—2002),日中共同ダンダンウイリク遺跡学术調査隊編《日中/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京都,2007.12,41—60。

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写本题记与袄教初传高昌问题,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2,科学出版社,2007.12,1—13+图版1。

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科学出版社,2007.12,13—44。

「井真成墓志」から見た唐朝の日本遣唐使に対する礼遇について(会田大辅译),《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1,2007.3,1—13。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韩昇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138—152。

纪念马尔沙克——兼谈他对粟特研究的贡献,《艺术史研究》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12,451—460。

## 2008年

《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与张广达合著)(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6+421。

《华戎交汇——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走近敦煌丛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9,3+2+178+108图。

(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李肖、孟宪实合编),中华书局,2008.4。

(主编)《走近敦煌丛书》(与柴剑虹合编),12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

(主编)《唐研究》第14卷(《天圣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与社会研究专号)(与刘后滨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增订本)(与李肖、孟宪实合撰),《吐鲁番学研究》2008:1,1—11。

新出吐鲁番文书に見える唐竜朔年間の哥逻祿部落破散問題(西村阳子译),《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XXIII(森安孝夫教授还历纪念特集号),2008.7,151—185+pls. XII—XX。

再谈德藏吐鲁番出土汉文典籍与文书,《华学》9、10(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854—877。

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①《社会·思想》,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等,2008.7,101—117。

碑志与隋唐长安研究,《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10,46—54。

《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11,658—666。

卷首语(与刘后滨合撰),《唐研究》14(《天圣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与社会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1—7。

唐代佛道二教眼中的外道——景教徒,程恭让主编《天问》丁亥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6(12月出版),107—121。

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樊英峰主编《乾陵

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12,3—9。

丝绸之路与古代新疆,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4,298—303。

从图像看历史——新发现的粟特图像及其解释,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三联书店,2008.7,158—174。

再谈丝绸之路上宗教的混同形态——于阗佛寺壁画的新探索,《新疆文物》2008:1—2,29—34。

2008年和田考察行程日志(与朱玉麒、姚崇新合撰),《西域文史》3,科学出版社,2008.12,127—151。

(翻译)吉田丰:有关和田出土8—9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二)(与广中智之合译),《西域文史》3,科学出版社,2008.12,97—108。

盛唐長安と敦煌——俄蔵「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から(西村阳子译),《池田雄一教授古稀記念アジア史論丛》(《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32),2008.3,241—264。

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七年—十三年)(与余欣合撰),编委会编《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0,271—295。

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与余欣合撰),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编《敦煌学》27辑(柳存仁先生九十华诞祝寿专辑),台北乐学书局,2008.2,255—273。

中国の敦煌学研究と国際的視野(广中智之译),《シルクロード研究》5,創価大学シルクロード研究センター,2008.3,114—129。

“Russian Expedition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the Late 19<sup>th</sup> and Early 20<sup>th</sup> Centuries”(in Russian and English),*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ed. by I. F. Popova, St. Petersburg: Slavia, 2008, pp. 219—226 + 3figs. (DD)



考据与义理的相互为用——张广达先生《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读后,《中国图书评论》2008:11,82—86。

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评介,《敦煌学辑刊》2008:1,2008.3,163—166。(DD)

疾病史与世界历史的书写——《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译本评介(与陈昊合撰),《自然科学史研究》27:3,2008,388—390。

## 2009年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粟特文化,郑培凯主编《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9,75—89。

“Further Remarks on Sogdia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tr. by Wen Xin), *Exegisti monument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Nicholas Sims—Williams* (Iranica 17), eds. Werner Sundermann, Almut Hintze and François de Bloi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pp. 399-416.

从聚落到乡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团的社会变迁,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3,京都大学,2009.3,25—36。

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的渊源,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の新研究》,东洋文库,2009.3,201—212。

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の渊源(西村阳子译),同上,213—225。

从巴黎拍卖圆明园文物想到的(编者改名:爱国情绪以外,还须沉着对弈),《明报》2009年2月28日D4版“副刊世纪:人文·关怀·视野”。

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光明日报》2009年4月21日第12版《史学》。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序,同书,三联书店,2009.5,1—2。

《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植松知博日译),《西北出土文献研究》7(吴震先生追悼吐鲁番学特集),2008.3,1—18。

哭季先生,香港《明报》2009年7月15日。

“*Sabao and Sabo: On the Problem of the Leader of Sogdian Colonies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Period*” (tr. by Zuo Ya),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 ed. by Ye Yilia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5, 148—162.

(2009-9-14)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3

作者=

页数=1000

SS号=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